

斯大林全集

第七卷

050
A31
678

斯大林全集

第七卷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五八年·北京

1548:15/00

斯大林全集

第七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635×927毫米1/16·印張22 $\frac{1}{2}$ ·插頁5·字數246,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3,300 定價(5) 3.00元

統一書號 1001·364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第七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包括約·維·斯大林一九二五年的著作。

這個時期，工人階級和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蘇維埃國家過渡到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標誌下舉行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這個時期，我國發展的性質和前途問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問題已成爲黨所面臨的實踐問題。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問題和答覆」、「十月革命、列寧和我們的發展前途」、「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以及其他著作中，約·維·斯大林全面地論證了布爾什維克黨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爲爭取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而制定的總路綫，並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資本主義復辟派分子的投降路綫。

在「關於「得莫夫卡事件」」、「論無產階級和農民問題」、「關於農村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分子」、「論共青團的任務」、「致蘇聯無產階級大學生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等著作中，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和宣傳鼓動部會議的參加者的談話中以及其他著作中，闡明了

鞏固工農聯盟的問題，教育和吸引勞動羣衆和青年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問題。

編入第七卷的還有論述在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條件下外國共產黨的情況和任務的論文和演說：

「論國際形勢和共產黨的任務」、「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以及「給麥—爾特同志的信」。

第一次發表的有：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和宣傳鼓動部會議的參加者的談話、給「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委員們的信、給德—奧夫同志的信、給麥—爾特同志的信以及給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7

1925

目 錄

| | |
|--|-------|
| 第七卷說明 | 一—二 |
| 女工和農婦們，要記住並實現伊里奇的遺訓！ | 三—四 |
| 致教師代表大會 | 五 |
| 論『紅色青年』雜誌的任務 | 六—七 |
| 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 八—二一 |
| 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 二二—二五 |
| 致『工人報』 | 二六 |
| 給德—奧夫同志的信 | 二七—二九 |
| 關於『得莫夫卡事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的演說） | 三〇—三四 |

| | |
|---|-------|
| 論無產階級和農民問題（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 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 三五—三三 |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和德國共產黨黨員海爾佐克的談話） | 三一—二七 |
| 給麥—爾特同志的信 | 三六—三二 |
| 慶祝國際婦女節 | 四一—四四 |
| 俄共（布）中央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 四四 |
| 論國際形勢和共產黨的任務 | 四六—五〇 |
| 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 五一—五九 |
|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 五九—六四 |
| 關於農村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分子（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在俄共（布） 中央組織局會議上的演說） | 六五—七〇 |
| 致蘇聯無產階級大學生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信） | 七一—七四 |
|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向俄共（布） 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所做的報告） | 七五—八三 |

| | |
|--|----|
| 一 國際形勢 | 六 |
| 二 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的當前任務 | 八 |
| 三 殖民地 and 附屬國內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 | 八 |
| 四 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 | 九 |
| 五 黨在農村中的政策 | 一〇 |
| 六 關於金屬工業 | 一〇 |
| 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 大學學生大會上的演說） | 二二 |
| 一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對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所擔負的任務 | 二四 |
| 二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對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國所擔負的任務 | 三二 |
| 致「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全體委員 | 三六 |
| 問題和答覆（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說） | 三五 |
| 給斯維爾德洛夫大學（慶祝本科和專科第二屆畢業典禮） | 三六 |
| 再論民族問題（關於謝米奇的文章） | 三九 |
| 關於東方革命運動（和日本「日日新聞」記者布施先生的談話） | 四九 |
| 給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 五〇 |

| | |
|---------------------------------|---------|
| 和宣傳鼓動部會議的參加者的談話（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 二九一—二九六 |
| 論共青團的任務（答『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提出的問題） | 二〇〇—二〇六 |
| 在米·瓦·伏龍芝葬禮上的演說（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 二〇七—二〇八 |
| 十月革命、列寧和我們的發展前途 | 二〇九—二二二 |
| 給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主席團的信 | 二三三—二四〇 |
|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 二五—二三八 |
| 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十二月十八日） | 二七一—二九一 |
| 一 國際形勢 | 二二七 |
| 一、資本主義的穩定 | 二二九 |
| 二、帝國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 二三三 |
| 三、戰勝國和戰敗國 | 二三五 |
| 四、戰勝國間的矛盾 | 二三〇 |
| 五、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 | 二三三 |
| 六、蘇聯的外部狀況 | 三三八 |
| 七、黨的任務 | 三三四 |
| 二 蘇聯的內部狀況 | 三三三 |

| | |
|--------------------------|---------|
| 一、整個國民經濟 | 二四 |
| 二、工業和農業 | 二六〇 |
| 三、商業問題 | 二六三 |
| 四、各個階級，它們的積極性和相互關係 | 二六五 |
| 五、列寧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口號 | 二六八 |
| 六、農民問題上的兩種危險和兩種傾向 | 二七六 |
| 七、黨的任務 | 二八〇 |
| 三 黨 | 二八三 |
|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十二月二十二日） | 二九一—三三八 |
| 一 索柯里尼柯夫和我國道威斯化 | 二九五 |
| 二 如米涅夫和我們對農民的讓步 | 二九五 |
| 三 誰的失算？ | 二九八 |
| 四 索柯里尼柯夫是怎樣保護貧農的 | 二九九 |
| 五 思想鬥爭還是誣蔑？ | 三〇〇 |
| 六 關於新經濟政策 | 三〇二 |
| 七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 | 三〇三 |

| | |
|-------------|---------|
| 八 季諾維也夫和農民 | 三〇九 |
| 九 意見分歧的歷史 | 三二七 |
| 一〇 反對派的政綱 | 三三三 |
| 一一 他們的「愛和平」 | 三三五 |
| 一二 黨一定能達到統一 | 三三七 |
| 註釋 | 三三九—三三八 |
| 年表（一九二五年） | 三三九—三五〇 |

一九二五年

女工和農婦們，要記住並實現伊里奇的遺訓！

一年前，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我們的列寧，在和我們永別的時候給我們留下了遺訓，指出了我們走向共產主義最後勝利所應遵循的道路。女工和農婦們，你們要實現伊里奇的這些遺訓！你們要用這些遺訓的精神去教育你們的孩子！

列寧同志臨終時囑咐我們要竭力鞏固工農聯盟。女工和農婦們，你們要鞏固這個聯盟！

列寧同志教導勞動人民要支持工人階級去反對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女工和農婦們，你們要記住這個遺訓！你們要支持正在建設新生活的工人階級的政權！

列寧同志教導我們要高舉起一切被壓迫者的領袖——共產黨的旗幟。女工和農婦們，你們要團結在這個黨的周圍，——它是你們的黨！

值此伊里奇逝世一周年紀念之際，黨號召：要為女工和農婦們，為正在和黨一起建設新生活的女

女工和農婦們，要記住並實現伊里奇的遺訓！

斯大林全集 第七卷

工和農婦們開闢更廣闊的道路。

四

約·斯大林

寫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

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

『女工』雜誌第一期

致教師代表大會

人民教師的隊伍是我國正在按社會主義原則建設新生活的勞動大軍中的一個最必需的部分。

只有千百萬勞動農民羣衆緊隨着工人階級前進，工人階級堅定不移地領導勞動羣衆，工人階級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才能是一條勝利的道路。

鄉村教師應當知道，沒有這樣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而沒有這樣的專政，我國就不可能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

要成爲一個連接農民羣衆和工人階級的環節，——這就是鄉村教師的主要任務，如果他們真正願意爲本國人民的事業、爲人民的自由獨立的事業服務的話。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

「教師報」第二號

論『紅色青年』雜誌的任務

斯·大林同志和編輯部委員們談話，在談到雜誌的任務時，他說：

雜誌應當把吸引無產階級出身的非黨大學生參加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工作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只有雜誌在實際上成為真正蘇維埃大學生的雜誌時，才能做到這一點。高等學校、教育人民委員部各個機關以及其他機關的工作當然還有許多缺點。大學生對這些缺點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他們應當經常地揭露、批評這些缺點，指出這些缺點，使我們能夠依靠共同的力量來改進我們的工作。因此，必須廣泛地吸引無產階級出身的非黨大學生中的優秀人物來為雜誌寫稿。大學生應當意識到這是他們自己的雜誌，這個雜誌能夠幫助他們工作，幫助他們進步。

在談到雜誌的某些欄的任務時，斯·大林同志指出：

雜誌的政治欄只須闡明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工作的基本問題。這裏不必重複別種雜誌已經說過的話。我們聯盟內的每一種刊物在整個工作中都應當有它的一定地位。『大學生生活』、『文學』、『科學和技術』等欄必須大大擴充。這些欄正是大學生能夠積極投稿和發揮自己才能的地方。『高等學校的改革』欄內的一些問題，除了吸收教員和教授以外，還要吸收大學生來研究。

只有實現「接近大學生」這個口號，雜誌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才能真正成爲蘇維埃大學生自己的刊物。

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

「紅色青年」雜誌第一期

（總第五期）

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

委員會全會_(三)上的演說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同志們！我受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委託，就有關爭論的一些問題以及和爭論有關的各項決議做一些必要的傳達。遺憾的是，我們不得不在沒有托洛茨基參加的情況下來討論他的言論問題，因為今天接到通知，說他因病不能出席全會。

同志們，你們知道，爭論是由托洛茨基的言論，由他的『十月革命的教訓』引起的。

挑起爭論的是托洛茨基。黨是被迫進行爭論的。

黨對托洛茨基的言論提出了兩點主要的責備。第一點是責備托洛茨基企圖修正列寧主義；第二點是責備托洛茨基企圖徹底更換黨的領導。

對於黨的道兩點責備，托洛茨基絲毫沒有替自己辯護。

他爲什麼絲毫不替自己辯護，——這很難說。通常的解釋是：他生病了，不可能說些什麼來替

自己辯護。這當然不是黨的過錯。既然托洛茨基每次向黨攻擊以後都開始發高燒，這就不是黨的過錯了。

現在中央委員會已經收到托洛茨基的聲明（一月十五日提交中央的聲明），其中寫道，他所以不發言和絲毫不替自己辯護，是因爲不願意使論戰激烈起來，不願意使問題尖銳化。當然，相信或不相信這個解釋的確鑿性都可以。我個人是不相信的。第一、托洛茨基是不是早就了解到他的反黨言論會使關係尖銳化呢？托洛茨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才了解這個真理的？要知道托洛茨基並不是第一次反對黨，也不是第一次對他自己的言論引起關係尖銳化這一點感到驚奇或表示遺憾。第二、如果他真正關心黨內的關係，不願意使關係惡化，那末他爲什麼發表『十月革命的教訓』來反對黨的領導核心，蓄意使關係惡化和尖銳化呢？正因爲如此，我認爲托洛茨基的這個解釋是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

現在簡單地談一談托洛茨基一月十五日提交中央委員會的聲明，這篇聲明我在上面已經談到，並且已經分發給各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了。關於托洛茨基的聲明，首先必須指出和必須加以注意的是：他說他願意按照黨的指示担任任何職務，願意接受對他今後的言論的任何監督，而且他認爲爲了事業的利益，盡速解除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是絕對必要的。

這一切當然必須予以注意。

至於談到問題的實質，應當指出下面兩點：關於『不斷革命』和關於更換黨的領導。托洛茨基說，他在十月革命後因爲個別原因而又一般地引用了『不斷革命』的公式，這只是和黨史委員會有關，這

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上的演說

只是追憶過去，而不是用來說明當前的政治任務。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它涉及到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我認爲，既不能把托洛茨基的這篇聲明稱做解釋，也不能把這篇聲明稱做辯護。這裏連承認自己錯誤的影子也沒有。這是迴避問題。說『不斷革命』論是一種和黨史委員會有關的東西，這是什麼意思呢？怎樣了解這一點呢？黨史委員會不但是黨內文件的儲藏所，而且是黨內文件的解釋者。那裏有些文件在一定的時期是有用的，但是後來失去了效用。那裏也有些文件無論過去或現在對黨都有指導意義。那裏還有些文件具有非常壞的性質，起非常壞的作用，黨對這些文件是不能容忍的。托洛茨基把自己的『不斷革命』論列入哪一類文件呢？列入好的一類還是壞的一類呢？托洛茨基在聲明中絲毫沒有談到這一點。他逃避問題。他對問題避而不談。因此對他修正列寧主義這一點的責備仍然有效。

其次，托洛茨基說，他從來沒有在中央委員會，也沒有在勞動國防委員會，更沒有在國家面前提出過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所解決的問題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任何建議。這種說法不對。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說過什麼呢？他說過幹部不中用，必須徹底更換黨的領導。他現在在『十月革命的教訓』中說些什麼呢？他說黨的基本核心不中用，必須更換。這就是『十月革命的教訓』的結論。出版『十月革命的教訓』就是爲了論證這個結論。『十月革命的教訓』的目的就在這裏。因此對他企圖徹底更換黨的領導這一點的責備仍然有效。

所以，托洛茨基的整篇聲明不是真意的解釋，而是外交辭令的匯集，是已經被黨解決了的舊爭論

的死灰復燃。

黨要求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是這樣的文件。

托洛茨基顯然不了解，而且我懷疑他是否有朝一日會了解，黨對自己過去的或現在的首領要求的並不是使用外交辭令，而是真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托洛茨基似乎缺乏公開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他了解黨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已經加強了，黨已經感到自己是主人，黨要求我們在環境需要的時候能向它低頭。托洛茨基不了解這一點。

我們的各級組織對托洛茨基的言論有什麼反應呢？你們知道，各地方組織對這個問題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這些決議都發表在『真理報』上。可以把它們分成三類。一類決議要求開除托洛茨基的黨籍。一類決議要求解除托洛茨基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的職務，並且撤銷他的政治局委員的資格。第三類決議（莫斯科、列寧格勒、烏拉爾、烏克蘭等地的同志今天送交中央委員會的最後一個決議草案也包括在內）要求解除托洛茨基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的職務，有條件地把他留在政治局內。

這就是關於托洛茨基的言論問題的主要的三類決議。

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在這些決議中進行選擇。

這就是我要向你們傳達的有關爭論的一些問題。

載於約·斯大林「論托洛茨基主義」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

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我現在發言是要盡量支持伏龍芝同志的提議。我想我們在這裏必須決定三件事情。

第一、必須採納伏龍芝同志關於增撥五百萬盧布，共撥款四億五百萬盧布的提議。

第二、必須通過關於批准伏龍芝同志担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

第三、必須責成黨在人力方面盡量支援新組成的革命軍事委員會。

應當說，近來由於我們經濟機關的要求增多了一些，由於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要求超過了我們的能力，我們在軍隊問題上就產生了一種取消主義的情緒。我們有些同志說，應當逐漸取消軍隊，把軍隊變成民警。這裏指的不是民軍制，而是和平的軍隊，這裏指的是把軍隊變成不能隨時對付軍事糾紛的普通的民警。

我必須斬釘截鐵地說，要堅決消除這種取消主義的情緒。

爲什麼呢？因爲近來國際形勢已經開始起根本的變化。向我們預示新的糾紛即將發生的一些新的前提正日益成熟，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便對付這些糾紛。武裝干涉問題現在又成了現實

問題。

有哪些事實呢？

第一、在東方，殖民地運動和一般解放運動日益高漲。印度、中國、埃及、蘇丹都是帝國主義的重要基地。那裏的殖民地運動正在增長並且還會繼續增長。這種情況不能不促使列強的統治階層反對我們，反對蘇維埃，因為他們知道，落在東方這塊肥沃土壤上的種子正在生長並且就要發芽。它們一定會發芽。

第二個事實是：在北非，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地區，正在醞釀糾紛。由於這種情況，帝國主義者正在重新部署力量，正在重新準備新的軍事糾紛。西班牙在摩洛哥遭到了失敗⁽⁵⁾；法國正在把手伸到摩洛哥去，而英國一定不會容忍法國在摩洛哥增強力量；意大利企圖利用新的情況把手伸到突尼斯去，但是其他國家一定不會允許它這樣做；英國和法國正在互相追逐，雙方都竭力設法保證自己在巴爾幹，在奧匈帝國瓦解後成立的那些國家裏的勢力，——這一切都使人回憶起我們所熟悉的上次大戰過程中的一些事實，使人回憶起上次大戰爆發前的一些事實。阿爾巴尼亞政變⁽⁶⁾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列強爲了在這一小塊土地上確立自己的勢力而進行的鬥爭。這一切都說明：由於在遠東已經開始引起糾紛，由於北非的局勢將有新的發展，整個歐洲都在準備力量和重新部署力量。這一切都是新戰爭的前提。而新戰爭是不能不波及我國的。

第三個事實是：英國工人的革命情緒日益高漲。這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實。英國是歐洲的領導

國家。英國工會總委員會和工黨已經開始分裂，英國工黨內部已經發生裂痕，這一裂痕正日益擴大，——這一切都說明那裏有一種革命的東西、新的東西正在成長。這就使英國的統治階層枕心。這就不能不促使他們反對蘇維埃俄國，因為英國的運動是在和俄國友好的旗幟下活躍起來的。

第四個事實是：由於存在着上面所說的那些前提，由於戰爭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當然不是明天，不是後天，而是幾年以後）。由於戰爭不能不使東方和西方的內部革命危機尖銳化，準備對付一切的問題就不能不擺在我們的面前。我認為西方革命運動的力量是強大的，這種力量正在壯大並且還會繼續壯大，這種力量能够在某些地方推翻資產階級。事實就是這樣。但是要保持在這種力量是很困難的。例如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邊陲國家的例子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我們周圍的國家裏發生糾紛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問題，我們軍隊的實力問題和它的戰鬥準備問題就一定會成爲我們面前的迫切問題。

這並不是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去積極地反對誰。這樣說是不對的。如果誰在言談之間流露出這種口氣，那是不對的。我們的旗幟依然是和平的旗幟。但是，如果戰爭一旦爆發，我們就不應該坐着不動。我們必須行動，但我們是最後行動。我們行動的目的是爲了把有決定性的砝碼、把能够舉足輕重的砝碼放在天平盤上。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要準備對付一切，要準備好自己的軍隊，要供給軍隊鞋子和衣服，要訓練軍隊、改進技術裝備，要改進化學部隊和空軍，要把我們紅軍的水平普遍提到應有的高度。這就是國際

形勢要求我們做的事。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去滿足軍事部門的要求。

第一次刊印

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

一五

致「工人報」

(答)

要記住，要愛戴，要學習我們的導師，我們的領袖伊里奇。

要照伊里奇那樣去反對，去戰勝國內外的敵人。

要照伊里奇那樣去建設新生活、新風俗和新文化。

在工作中決不要拒絕做小事情，因為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積成的，——這是伊里奇的重要遺訓之一。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工人報」第十七號

給德——奧夫同志的信

德——奧夫同志！

回信遲了，因為擠不出時間，不能及時答覆。

(一) 我想你沒有很好地讀那篇文章⁽¹⁾，否則你一定會在那裏找到從伊里奇的文章中引來的那段說明『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話。

(二) 如果你聚精會神地讀一讀那篇文章，那你想必會了解，那裏指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而是社會主義的一般勝利，就是說趕走地主和資本人家，奪取政權，打退帝國主義的進攻，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這一切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完全能夠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復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過『幾個國家的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如果確信勝利了的俄國無產階級在其他國家的無產者的公開同情之下，在沒有幾個國家獲得勝利的情況下，『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那末在俄國發動十月革命就是愚蠢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最普通的機會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隨便叫什麼都可以。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論是正確的，那末伊里奇的下面這個論點便是不對的：我們一定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我

們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見『論合作制』⁽²⁾）。

（三）大概你沒有注意到所發表的文章是『序言』的一部分。如果你注意到這一點，我想你就會懂得必須把整篇『序言』拿來看的道理。

（四）我們政治實踐中最危險的就是：企圖把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國家看做一種被動的東西，以為它在沒有得到其他國家勝利的無產者的援助時只能在原地踏步。假定在俄國蘇維埃制度建立以後五年到十年內西方還沒有爆發革命，假定我們共和國在這個時期內仍然作爲一個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蘇維埃共和國存在⁽³⁾，那末你是否認爲我們國家在這五年到十年內只去幹些搗水勾當，而不去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呢？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了解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勝利的理論的全部危險性。

這是不是說，這個勝利是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呢？不，不是這個意思（見我的『序言』）；因爲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就隨時有受軍事干涉的危險。但是人人都會看到，這畢竟是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且這個勝利也就是其他國家革命勝利的前提，——這一點是未必有理由懷疑的。

我看到某些同志還沒有拋棄舊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還認爲在資本主義不像英國或美國那樣發

⊙ 我做這第二個假定是有充分根據的，因爲我們共和國的力量正日益壯大並且還會繼續壯大，同時來自西方同志的援助也正日益增多並且還會繼續增多。

達的國家裏，無產階級革命是沒有根基的。

(五)我建議你再讀讀『逆流』文集(2)中伊里奇的幾篇文章，讀讀他的『無產階級革命』(3)和『幼稚病』(4)這兩本書，以及他的『論合作制』這篇文章。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刊印

關於「得莫夫卡事件」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

會議上的演說(三))

首先來談一談關於索斯諾夫斯基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中心問題。人們責備他，說他似乎在刊物上斷言全部蘇維埃機關甚至制度都已經腐朽。我沒有看到過這種斷言，而且誰也沒有指出索斯諾夫斯基在什麼地方談到過這一點。如果他在什麼地方說過蘇維埃制度已經腐朽，那就是反革命分子。

他的書就在這裏。書中寫道：「我對烏克蘭農村知道得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不來判斷得莫夫卡對整個烏克蘭農村具有怎樣的典型性。讓那些更熟悉蘇維埃烏克蘭的人去判斷這一點吧。但是我敢斷言，得莫夫卡事件決不是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從地方報刊上，從我同工作人員的談話中，同農民的會晤中，以及偶然看到的一些文件中，都覺察到「得莫夫卡事件」的因素在其他村莊中也存在。」

這話說得很溫和，這裏根本沒有講到蘇維埃制度或全部蘇維埃機關在腐化。因此，委員會或個別同志對索斯諾夫斯基提出的責備是不正確的。不管這種責備是省委員會還是專區委員會提出的，是

委員會還是個別人提出的，都毫無根據，都沒有文件來證明。

相反地，我倒想指出索斯諾夫斯基在這裏的功勞。關於這一點誰也沒有談到。「真理報」的功勞，索斯諾夫斯基的功勞，傑米楊·別德內依的功勞，就在於他們有足够的勇氣把實際生活中的片斷抽出來給全國看。這個功勞一定要指出來。應該談到這一點，而不應該說他們過火了。

有人說索斯諾夫斯基過火了。可是在普遍傾向於官僚作風，而膿瘡還在什麼地方隱藏着並且損害着全部工作的情況下，過火是應該的，是完全應該的。這是不可避免的。這只會有好處，不會有別的。當然，這要使某些人受到委屈，但是對事情有利。如果不使個別人受到某種委屈，事情倒搞不好了。

我認爲這裏的基本問題並不是農村通訊員被害，甚至也不是我們這裏發生了得莫夫卡事件，——這一切都很不好，但是事情的根源並不在這裏。事情的根源在於：在村、鄉、區、專區的某些地方，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只是面向莫斯科，而不願意轉向農民，他們不了解僅僅和莫斯科搞好關係是不够的，還必須善於和農民搞好關係。我們農村工作中的主要錯誤、主要危險就在這裏。

許多工作人員說在我們首都時與發表關於農村的新言論，說這是對外要外交手腕，說我們似乎並沒有強烈而不可動搖的願望要改進我們的農村政策。我認爲這就是最危險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不願意相信我們已經認真着手教導我們的工作人員用新的態度對待農村，對待農民，如果他們覺察不到這一點，不願意相信這件事，那末這就是最嚴重的危險。消除地方工作人員的這種

情緒，急劇地把路綫轉向另一方面，使人們把我們對農村的政策看成一種重大的、絕對必需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我們有三個同盟者：不急於革命的國際無產階級，行動得很慢的殖民地以及農民。關於第四個同盟者，即關於我們敵人陣營中的紛爭，我現在不談。很難說什麼時候會爆發國際革命，但是它一旦爆發，就會成爲有決定意義的事情。也很難說什麼時候殖民地會行動起來，這是一個非常重大和非常困難的問題，決不能下斷語。至於農民，我們現在和他們一起工作着，這是我們的第三個同盟者，並且是一個能夠立刻給我們直接援助，能夠提供軍隊、糧食等等的同盟者。我們和這個同盟者，就是說和農民一起工作着，我們和他們一起建設着社會主義，不管好壞怎樣，我們總是在建設着，因此正是在現在，特別是在現在，我們應當善於重視這個同盟者。

正因爲如此，我們現在把農民問題提到我們工作的首要地位。

必須指出，目前我們的政治方針是新的方針，這個方針確定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對待農村的新的政治路綫。有些同志不願意了解這一點。如果他們不去了解這個基本的東西，我們就不能進行任何工作，我們就不會有任何社會主義建設。既然我們有些同志忘記了這個基本的東西，而陶醉於所謂本位主義的思想，認爲必須把「商品的外表」給莫斯科看，認爲他們那裏似乎一切都順利，認爲必須把膿瘡掩蓋起來，似乎用不着批評，因爲批評會損害地方當局和地方工作人員的威信，——既然存在着這類言論，我認爲這就是產生最嚴重的危險的根源。必須消除這種現象，必須對

這些同志說，不要怕把生活中的片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管它們是何等令人不快。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同志有所轉變，使他們不單是面向莫斯科，而且還學會面向他們所服務的農民，使他們不去掩蓋膿瘡，而相反地來幫助我們揭露我們的錯誤，糾正這些錯誤，並且按照目前黨所擬定的路線進行工作。

二者必居其一（我已經不止一次地說過這一點）：或者是我們同非黨農民一起，同我們蘇維埃和黨的地方工作人員一起進行自我批評，以改進我們的工作；或者是農民的不滿情緒逐漸積累起來以至發生暴動。請你們注意，在新的條件下，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新的唐波夫暴動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亂^(三)決不是沒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魯吉亞暴動^(四)提出了一個嚴重的警告。如果我們不學會割開我們的膿瘡並且把它們醫好，如果我們還要在表面上裝得太平無事，那末這樣的暴動將來還是可能發生的。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這裏應當談的不是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陷的個別作家的缺點和他們的過激行為，而是他們的功勞。

這裏我應當談一談關於我們的作家、我們的通訊員的問題。我認為，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在改進我們的農村建設工作、揭露我們的缺點以整頓和改進蘇維埃工作方面，能夠成爲一根主要槓桿的時候已經到了。這一點也許不是我們所有的人都了解到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正是要從這一端來開始改進我們的工作。這些人大多是富有感受力的，他們心裏燃燒着真理的火花，願意不顧一切地揭

露和糾正我們的缺點，這些人是不怕槍彈的。我認爲正是這些人應該成爲揭露我們的缺點和改進我們黨和蘇維埃的地方建設工作方面的一根主要的槓桿。

正因爲如此，我們必須傾聽這些同志的呼聲，而不應該指責我們的報刊工作者。通過他們，通過這個直接反映我們建設工作中的缺點的晴雨表，我們就能揭露和糾正許多缺點。

至於中央監察委員會，我認爲它通過的決議總的說來是正確的，——可能有些地方應該修改或重新修訂。

在報刊上報道得莫夫卡事件時，應當使我們的同志了解到爲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問題不在於農村通訊員被害，更不在於不使專區委員會書記或省委書記受到委屈，而在於把改進我們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納入軌道。這是基本的東西。問題就在這裏。

載於約·斯大林的「農民問題」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論無產階級和農民問題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

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毛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想簡單地談一談現在黨對農民的政策的基礎。目前農民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不容置疑的。許多人甚至津津有味地說，新的時代——農民的時代到來了。另一些人把『面向農村』的口號了解為應該背向城市。還有一些人甚至談到政治上的新經濟政策。這當然是胡說。這一切當然都是極端的看法。但是撇開這些看法，剩下的只有一點，那就是：目前，正是現在，農民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爲什麼呢？原因在哪裏呢？

這有兩個原因。我說的是基本原因。

農民問題目前在我國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第一個原因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同盟者中間，在無產階級現有的一切基本同盟者（在我看來，這樣的同盟者有四個）中間，農民是立刻可以給我們革命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這裏指的正是現在的、目前的直接援助。其餘一切同盟者雖然都有遠大的未

來，雖然都是我國革命的極巨大的後備力量，但是很遺憾，他們現在還不能給我們的政權，給我們的國家直接的援助。

這是些什麼同盟者呢？

第一個同盟者，即我們的基本同盟者，是各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先進的無產階級，即西方的無產階級，是一支極巨大的力量，是我國革命和我們政權的最可靠和最重要的同盟者。但是很遺憾，目前的情況，當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革命運動的狀況是這樣的：西方無產階級現在還不能給我們直接的和有決定意義的援助。現在我們得到的是他們間接的、道義上的援助，這種援助很重要，甚至無法說明它的價值，它是難以估價的。但是，這終究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那種直接的援助。

第二個同盟者是殖民地，是受比較發達的國家壓迫的那些不大發達國家的被壓迫人民。同志們，這是我國革命的一支極巨大的後備力量。但是，他們行動得太慢了。他們是來直接援助我們的，但是看來他們不會很快就來。正因為如此，他們不能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在鞏固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立刻給我們直接援助。

我們有第三個同盟者，一個不可捉摸的無形的然而極其重要的同盟者。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這種衝突和矛盾是無形的，但是對我們政權和我國革命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援助。同志們，這似乎很奇怪，但這是事實。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個主要聯盟在一九一七年帝國主義大戰中不互相進行殊死的鬥爭，如果它們不互相扼住咽喉，如果它們不是自顧不暇，沒有工夫來反對蘇維埃

政權，蘇維埃政權當時就未必站得住腳。重複一遍，我們敵人之間的鬥爭、衝突和戰爭是我們極大的同盟者。現在這個同盟者的情況怎樣呢？現在的情況是這樣：世界資本在戰後經受了幾次危機以後，已經逐漸恢復元氣。這一點是應當承認的。主要的戰勝國——英國和美國現在所擁有的力量，在物質上不僅能在本國相當不錯地安排資本，而且還能輸血給法國、德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一方面。這方面的情況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暫時不像戰爭剛一結束時那樣快地發展。這對資本家有利，對我們不利。但是這個過程還有另一方面，即相反的方面。相反的方面就是：在資本暫時能造成全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相互關係另一端的矛盾，剝削的先進國家同被剝削的落後國家即殖民地 and 附屬國之間的矛盾，開始日益尖銳和日益加深，從新的「意外的」一端造成破壞資本「工作」的威脅。埃及和蘇丹發生了危機，——這你們大概已經在報上看到了。其次，在中國出現了一系列的矛盾。這些焦點會使目前的「同盟者」發生爭吵，會破壞資本的威力。在北非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焦點，在那裏西班牙將失掉摩洛哥，法國的手正向那裏伸去，但是法國不可能把它拿到手，因為英國不會允許法國控制直布羅陀海峽，——所有這些事實有許多方面都和戰前時期相似，它們不能不威脅國際資本的「建設工作」。

這就是矛盾發展總平衡表上的正數和負數。因為在這方面資本的正數暫時還大於負數，在最近期間還不能盼望資本家之間發生軍事衝突，所以很明顯，我們第三個同盟者的情況還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

剩下的第四個同盟者就是農民。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建設着新生活，好也罷，壞也罷，總是和他們在一起。你們都知道，這個同盟者不十分堅強，農民這個同盟者不像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那樣可靠。但是，他們畢竟是同盟者，而且在現有的一切同盟者中間，他們是一直給我們直接援助並且立刻可以給我們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因而他們也換得我們的援助。

正因為如此，農民問題在日前，即在革命危機和其他一切危機的發展進程有些緩慢的時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這就是農民問題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第一個原因。

目前我們把農民問題放在我們政策的首要地位的第二個原因是：作為社會主義基礎和我們政權基礎的我國工業，要依靠國內市場即農民市場。到我國工業十分發達的時候，到我們能應付國內市場的時候，到爭取國外市場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情形將會怎樣，這我不知道。可是這個問題將來一定會擺在我們面前，這一點是不用懷疑的。我們將來未必能指望從比我們更有經驗的資本家手中奪取西方的國外市場。但是談到東方市場，由於我們和東方的關係不能算壞，而且這種關係還會改善，在這方面我們將具備最有利的條件。毫無疑問，在我們同資本家競爭時，紡織品、國防用品、機器等等將成爲我們供給東方的主要產品。但是，這是談到我國工業的未來。至於現在，那我們甚至還沒有能滿足我國農民市場的三分之一，因此現在，在目前，我們的基本問題是國內市場問題，而首先

是農民市場問題。正因為目前農民市場是我國工業的主要基地，所以我們作為當權者，作為無產階級，所關心的是竭力改善農民經濟的狀況，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狀況，提高農民的購買力，改善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調整列寧說過的而我們還沒有很好調整的那種結合。

我們作為一個政黨，應當在目前把農民問題提到首位，應當特別注意和特別關心農民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從這裏產生的。

我們黨對農民問題的政策的前提就是這樣。

同志們，糟糕的是我們有許多同志不了解或者不願意了解這一問題的全部重要性。

常常有人說：在莫斯科，我們的領袖們時與談論農民問題；這大概不是認真的談論，這是外交手腕。莫斯科是需要對外說這些話的，但是我們可以繼續執行舊政策。有些人這樣說。另一些人說：關於農民的談論只是閒談罷了；如果莫斯科人不坐在辦公室裏，到地方上來走走，他們就會看到農民是個什麼樣子和稅款是怎樣徵收的。這樣的話大家都能聽到。同志們，我認為，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不了解我們當前的任務是我們當前一切危險中最嚴重的危險。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了解農民問題的全部嚴重性，那他們就會真正動手吸引農民參加我們的建設工作，動手改善農民經濟和鞏固結合；或者是同志們不了解這一點，那結果就會是蘇維埃政權垮台。

同志們不要以為我是在嚇唬誰。不是的，同志們，嚇唬人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問題太嚴重了，必須像認真辦事的人那樣來對待這個問題。

有些同志來到莫斯科以後常常竭力拿「商品的外表」給人看，說在他們的農村中一切都順利。這樣官僚主義地談順利有時簡直令人作嘔。其實很明顯，沒有而且也不會有順利。顯然，缺點是有的，但是不要害怕批評，應當揭露這些缺點，然後加以消除。要知道，現在問題是這樣擺着的：或者是我們全黨讓非黨的農民和工人來批評我們；或者是他們用暴動的方式來批評我們。格魯吉亞暴動是批評。唐波夫暴動也是批評。喀琅施塔得暴動爲什麼不是批評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不官僚主義地談順利，處理問題不採取官僚主義態度，不害怕批評並且讓非黨的工人和農民（要知道，他們親身體驗着我們所犯錯誤的後果）來批評我們；或者是我們不這樣做，讓不滿情緒逐漸積累逐漸增長起來，到那時批評就會採取暴動的形式。

現在最大的危險就在於我們有許多同志不了解目前情況的這一特點。

這個問題即農民問題是不是和托洛茨基主義問題；和你們在這裏討論的問題有某種關係呢？無疑是有的。

托洛茨基主義是什麼呢？

托洛茨基主義就是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農聯盟，不相信結合。現在我們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用伊里奇的話來說，就是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不實行結合，不能

實現這個任務呢？不，不能。不粉碎這種不相信工農聯盟的理論即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能不能實行結合、建立工農聯盟呢？不，不能。結論很清楚：誰要在新經濟政策中取得勝利，誰就必須埋葬掉托洛茨基主義這個思想流派。

伊里奇在十月革命前常常說，在所有的思想敵人中，孟什維克是最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竭力設法使人不相信十月革命會取得勝利。因此，——他說，——不粉碎孟什維主義，就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我認為當時的即十月革命時期的孟什維主義和目前的即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托洛茨基主義之間有某種類似的地方。我認為在目前，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在現今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共產主義的所有思想流派中，托洛茨基主義要算是最危險的思想流派了，因為它竭力設法使人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農聯盟，不相信新經濟政策的俄國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因此，不粉碎托洛茨基主義，就不能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取得勝利，就不能把目前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黨對農民的政策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

載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二十四號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

(和德國共產黨黨員海爾佐克的談話)

第一·個·問·題·(海·爾·佐·克)：你是否認為德意志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國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必然促使工人階級在不久的將來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

答·(斯·大·林)：如果講的是期限而不是趨向，那末要極其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用不着證明，不論從國際條件或從國內條件來看，目前的局勢和一九二三年的局勢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可是，這並不是說，在最近時期內局勢不會因外部環境可能發生重大變化而產生有利於革命的急劇轉變。國際形勢的不穩定就是這種設想很可能成爲事實的保證。

第二·個·問·題：從目前的經濟狀況和力量對比來看，我們是否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準備時期來爭取無產階級大多數(列寧曾向各國共產黨提出過這個要求，他認爲這是奪取政權前極重要的任務)？

答：既然講的是經濟狀況，那我只能根據我所掌握的一般材料來估計問題。我認爲道威斯計劃(25)已經產生了一些效果，它已經使局勢趨於相對穩定。美國資本的投入德國工業，通貨的穩定，德國一些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的改善(以上三點決不意味着德國經濟的根本好轉)，以及工人階級物質

生活狀況的某些改善，——這一切都不能不使德國資產階級的陣地得到一定的鞏固。這可以說是道威斯計劃的『好的』一面。

但是道威斯計劃還有『壞的』一面，這一面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時期表現出來，而且一定會破壞這個計劃的『好的』效果。毫無疑問，道威斯計劃使德國無產階級受到國內資本和國外資本的雙重壓榨。德國工業的擴大和它的國外市場範圍的縮小之間的矛盾，協約國的過分要求和德國國民經濟滿足這些要求的最大可能之間的不相適應，——這一切必然使無產階級、小農、職員和知識分子的境遇惡化，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革命爆發，促使無產階級直接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

但是，不能把這種情況看成德國革命的唯一有利條件。為了使這個革命取得勝利，還必須使共產黨能夠代表工人階級大多數，使它成爲工人階級內部的決定性力量。必須揭露和粉碎社會民主黨，使它降到只佔工人階級的極少數的地位。不然就休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了使工人能夠獲得勝利，必須用統一的意志去鼓舞他們，必須由一個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真正信任的黨去領導他們。如果工人階級內部有兩個力量相等而彼此競爭的黨，那末，即使外部存在着有利條件，也不可能取得鞏固的勝利。列寧是十月革命以前第一個特別強調這一點的人，他認爲這是無產階級勝利最必需的條件。

可以認爲對革命最有利的形勢是下面這種形勢：一方面德國內部發生危機和共產黨的力量大大地增長，另一方面在德國外敵的陣營中發生嚴重的糾紛。

我認爲，一九二三年的革命時期因爲不具備上述形勢的第二方面，所以情況極其不利。

第三個問題：你說德國共產黨必須使大多數工人跟自己走。至今大家還很少注意這個目標。在你看來，怎樣才能使德國共產黨成爲這種力量不斷增長的強有力的黨呢？

答：有些同志認爲鞏固黨和使黨布爾什維克化就是把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驅逐出黨。這當然是不對的。只有在爲工人階級的具體需要進行日常鬥爭的進程中，才能揭穿社會民主黨，使它降到只佔工人階級極少數的地位。揭露社會民主黨的罪惡，不應當依靠行兇問題，而應當依靠工人階級爲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提高政治地位而進行的日常鬥爭；同時工資問題、工作日問題、居住條件問題、保險問題、稅收問題、失業問題以及生活費用高昂問題等等即使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也應該起極重大的作用。每天都要在這些問題上打擊社會民主黨人，揭露他們的背叛行爲，——任務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不把日常的實際問題和關於德國的國內外狀況的一些根本問題聯系起來，如果在黨的全部工作中不從革命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觀點出發來闡明這一切日常工作，那就不能完全實現這個任務。

而要實行這樣的政策，只有經驗豐富和理論修養很高的幹部所領導的黨才有可能，因爲這些幹部的經驗足以使他們利用社會民主黨的種種失算來加強自己的黨，同時他們的理論修養足以使他們不致因個別勝利而看不見革命的發展前途。

這主要也就說明了所有共產黨（其中包括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問題是實現布爾什維克化的

根本問題之一。

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至少必須具備若干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 必須使黨不把自己看成國會選舉機構的附屬品，像社會民主黨在實際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樣，必須使黨不把自己看成工會的免費附加品，像某些無政府工團主義分子有時反來覆去所說的那樣；而必須使黨把自己看成無產階級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即負有領導無產階級組織的其他一切形式（從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的形式。

(二) 必須使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完全精通與革命實踐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

(三) 必須使黨在制定口號和指示的時候，不是根據背熟的公式和歷史的比擬，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所處的國內外的具體條件的仔細分析，同時還必須考慮到各國的革命經驗。

(四) 必須使黨在羣衆的革命鬥爭的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的正確性。

(五) 必須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來改組黨的全部工作，特別是當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在黨內還沒有清除的時候。這樣，黨的每個步驟和每個行動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羣衆革命化，使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受到革命的訓練和教育。

(六) 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能和宗派主義混爲一談！）和與羣衆最

廣泛的聯系及接觸（不能和尾巴主義混爲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不但不能教導羣衆，而且也不可能向羣衆學習；不但不能引導羣衆並把他們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羣衆的呼聲和預料到他們的迫切需要。

（七）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險主義混爲一談！）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及機動性（不能和遷就行爲混爲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就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的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也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八）必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使它不怕批評，使它善於用自己的錯誤來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九）必須使黨善於把先進戰士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集團中去。因爲這些優秀分子十分忠誠，足以成爲革命無產階級的意向的真正表達者；他們有豐富的經驗，足以成爲能運用列寧主義的策略和戰略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

（十）必須使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會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機會主義分子，以便達到最大限度的團結一致。

（十一）必須使黨制定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這種紀律的基礎是思想的一致性、運動目的的明確性、實際行動的統一和廣大黨員羣衆對待黨的任務的自覺態度。

(十二) 必須使黨經常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的執行情況。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成空洞的諾言的危險，而空洞的諾言只能破壞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對黨的信任。

沒有諸如此類的條件，實行布爾什維克化就是空談。

第四個問題：你說，除了道威斯計劃的壞的一面以外，德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第二個條件是社會民主黨在羣衆面前的被徹底揭露，是它不是工人階級中比較重要的力量。從實際情況來看，要達到這一點還有很遠的路程。這裏明顯地反映出黨目前的工作方法上有缺點和弱點。怎樣才能消除這些缺點和弱點呢？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完全是一個腐化墮落的黨——不但沒有失去什麼，而且獲得了將近兩百萬張選票，你對這次選舉的結果如何估計？

答：這裏問題不在於德國共產黨工作上有缺點。這裏問題首先在於：美國的借款，美國資本的輸入加上通貨的穩定使得狀況有些好轉，因而就造成一種錯覺，認爲和德國狀況有關的國內外矛盾似乎有可能根本消除。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就是借着這種錯覺，像騎在白馬上那樣進入了現今的德國國會。現在維爾斯正炫耀自己在選舉中的勝利。但是，他大概不了解他佔有了別人的勝利。勝利的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而是摩根集團。維爾斯過去和現在都只是摩根的一個代理人。

載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真理報」第二十七號

給麥——爾特同志的信

敬愛的麥——爾特同志！

你二月二十日的信收到了。首先請接受我的問候。現在就來談本題。

(一)你(而且不僅是你)過分誇大了和海爾佐克談話[⊙]這件事。我所以不能並且不想把他趕走，不僅因為他是黨員，而且因為他是拿着蓋什凱同志的信來見我的，蓋什凱同志在信中懇求我和海爾佐克談一次話。我現在將這封信的抄件寄給你。德文原信我已經寄給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了。我在蓋什凱同志的書面請求下同海爾佐克談了一次話，僅僅根據這件事就得出結論說，俄共(布)中央正在改變或者打算改變對布蘭德勒的態度，這不僅是言過其實，而且是無中生有，胡說八道。如果俄共(布)中央知道你或者德國共產黨其他中央委員懷疑俄共(布)中央同情布蘭德勒和塔爾蓋麥[⊙]，懷疑俄共(布)中央從左派轉向右派，那它是會捧腹大笑的。

(二)你說德國共產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完全正確。毫無疑問，布蘭德勒和塔爾蓋麥屬於舊

⊙ 見本卷第三十二頁至第三十七頁。——編者註

式領導者的類型，他們已經過時了，已經被新型的領導者排擠到後面去了。在我們俄國，許多舊的文學界領導者和舊『領袖』也逐漸衰亡了。這種衰亡過程在革命危機時期加劇起來，在積聚力量時期則減緩下去，但它是始終存在的。盧那察爾斯基之流、坡克羅夫斯基之流、羅日柯夫之流、哥里登伯爾格之流、波格丹諾夫之流和克拉辛之流等等，——這就是我首先記起的過去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中的典型人物，他們後來都退到次要地位了。這是富有生命力和日益發展的黨的領導幹部更新的必要過程。順便談一下，布爾德勒之流和塔爾蓋麥之流同上面這些同志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布爾德勒之流和塔爾蓋麥之流除了其他一切以外，還帶着舊社會民主主義的貨色，而上述俄國同志却沒有這種貨色。可見，這種差別不是有利於布爾德勒和塔爾蓋麥，而是不利於他們的。德國共產黨能够把布爾德勒之流和塔爾蓋麥之流排擠出去，把他們逐出舞台，單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德國共產黨在成長，在前進，在壯大。至於德國共產黨的那些明顯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說了，關於這些成就，你在信中寫得完全正確。如果現在有人認為俄共（布）中央有人打算扭轉德國共產黨發展的車輪，那就未免把俄共（布）中央想得太壞了。麥爾特同志，請你慎重些……

（三）你講到德國共產黨的路綫。毫無疑問，德國共產黨的路綫——我指的是政治路綫——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俄共（布）和德共之間才有你在信中所談到的那種密切友好的（而不僅是同志的）關係。但這是不是說我們應該掩飾德共或者俄共（布）的政治工作中的個別錯誤呢？當然不是這個意思。能不能斷定說，德共中央或者俄共（布）中央沒有個別的錯誤呢？能不能斷定說，批評德

共中央的部分活動（沒有充分利用巴爾馬特事件⁽²⁾，普魯士國會共產黨黨團在選舉國會議長問題上的人所共知的投票，同道威斯計劃有關的稅收問題等等）是和完全贊同德共中央的總路線相抵觸的呢？顯然不能。如果我們，比如說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裏見面時，閉眼不看自己黨的個別錯誤，而熱中於炫耀『完全一致』和『平安無事』，並且在一切問題上都彼此附和，那末我們的黨將成什麼了呢？我認爲這樣的黨永遠也不能成爲革命黨。這將是木乃伊，而不會是革命黨。我覺得某些德國同志有時候喜歡要我們完全附和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而他們自己則時刻準備在一切問題上都附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我堅決反對這種相互附和。從來信看，你也是反對這樣做的。這對德國共產黨會更好。

（四）我堅決反對對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採取排斥政策。我反對這種政策，並不是因爲我憐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因爲這種政策會在黨內造成恐嚇制度、威脅制度以及窒息自我批評精神和主動精神的制度。如果對黨的領袖害怕而不尊敬，這並不好。只有黨內不僅害怕黨的領袖，而且尊敬他們，承認他們的威信，黨的領袖才能成爲真正的領袖。造就這樣的領袖是困難的，這件事情是長期的，不容易的，但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爲沒有這個條件，黨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黨的紀律也就不能成爲自覺的紀律。我認爲德國同志違反了這個無須論證的真理。爲了揭露托洛茨基及其擁護者，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展開了非常激烈的原則性的解釋運動來捍衛布爾什維主義基礎，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基礎，雖然按俄共（布）中央當時的力量和威信來說，我們可以不必展開這個運動。

這個運動是否需要呢？是絕對需要的，因為在這個運動中我們用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教育了幾十萬新黨員（和非黨員）。非常可悲的是：我們的德國同志沒有感覺到有必要在懲罰反對派以前先展開廣泛的原則性的解釋運動，或者用這個運動來補充對反對派的懲罰，這樣就不大容易用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教育黨員和黨的幹部。驅逐布爾德勒和塔爾蓋麥並不困難，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戰勝布爾德勒思想是件複雜的重大的事情，這裏單靠懲罰只能損害事業，這裏需要深入地進行工作和認真地啓發思想。俄共（布）一直是在矛盾中、在同非共產主義流派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而且只是在這個鬥爭中才日益壯大並且不斷培養出真正的幹部。擺在德國共產黨面前的同樣是一條通過矛盾、通過同非共產主義流派，特別是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布爾德勒思想等等進行真正的、嚴肅的和長期的鬥爭而發展的道路。但是要進行這種鬥爭，單靠懲罰是不夠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爲德共中央的黨內政策應當靈活些。我相信德國共產黨一定能够改正這方面的缺點。

（五）你對工會工作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德國工會的作用和俄國不同。在俄國，工會是黨成立以後產生的，它們實際上是黨的輔助機關。在德國和整個歐洲就不是這樣。那裏黨是從工會中產生出來的，工會對羣衆的影響勝過黨的影響，並且往往成爲黨的沉重的絆腳石。如果問一問德國或者整個歐洲的廣大羣衆，他們認爲哪個組織對他們更親近，是黨還是工會，他們一定會回答說，工會比黨對他們更親近。歐洲的非黨工人認爲工會是幫助他們同資本家作鬥爭（工資、工作日、保險等等）的主要堡壘，而把黨看做某種輔助的和次要的（雖然是必要的）東西。不論這種看法是好還是壞，但這是

事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廣大的工人羣衆把「極左派」從外面同現在的工會進行的直接鬥爭，看做同他們的主要堡壘進行鬥爭，這個堡壘他們建設了幾十年，現在「共產黨員」却要來破壞。不考慮到這個特點，就會斷送整個西方共產主義運動事業。由此應當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在西方，不掌握住工會，就不能掌握住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

第二、不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不在工會內部加強自己的影響，就不能掌握住工會。

正因爲如此，應當特別注意我們的同志在工會中的工作。暫時就寫到這裏。請別責罵我的坦白和直率。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

慶祝國際婦女節

在人類歷史上，被壓迫者的任何一次偉大的運動都少不了勞動婦女的參加。勞動婦女，一切被壓迫者中最受壓迫的勞動婦女，從來沒有而且也不會站在解放運動大道的旁邊。大家知道，在奴隸解放運動中湧現出了成千上萬個偉大的女烈士和女英雄。在爭取農奴解放的戰士行列中有過千千萬萬的勞動婦女。無怪乎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被壓迫羣衆的一切解放運動中最強大的運動，把千百萬勞動婦女吸引到了自己的旗幟下面。

國際婦女節是工人階級解放運動不可戰勝的標誌和偉大的未來的先聲。

勞動婦女，女工和農婦，是工人階級最大的一支後備力量。這支後備力量足足佔全體居民的半數。婦女這支後備力量是擁護工人階級還是反對工人階級，——决定着無產階級運動的命運，决定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勝敗，决定着無產階級政權的勝敗。因此，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共產黨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爲把婦女——女工和農婦——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而進行堅決的鬥爭，爲在無產階級旗幟下對女工和農婦進行政治教育和把她們組織起來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國際婦女節是把勞動婦女這支後備力量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一種手段。

但是，勞動婦女不只是一支後備力量。只要工人階級的政策正確，她們還能夠而且應當成爲工人階級用來反對資產階級的一支真正軍隊。從勞動婦女這支後備力量中訓練出一支能夠同無產階級大軍並肩作戰的女工和農婦的軍隊，——這就是工人階級的第二項有決定意義的任務。

國際婦女節應當成爲一種把女工和農婦從工人階級的後備力量變成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作戰軍隊的手段。

國際婦女節萬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真理報」第五十六號

俄共（布）中央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你們一起哀悼國民黨的領袖的逝世，哀悼爭取中國人民的自由和自主，爭取中國的統一和獨立的中國工農民族解放鬥爭的組織者的逝世。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毫不懷疑，孫中山的偉大事業是不會和孫中山一同死去的，孫中山的事業將活在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心裏，而使中國人民的敵人發抖。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相信，國民黨一定會在爭取擺脫帝國主義桎梏的偉大門爭中高舉起孫中山的旗幟，國民黨一定會光榮地舉着這面旗幟，直到徹底戰勝帝國主義和它在中國的代理人。

孫中山逝世了，——孫中山的事業萬歲！孫中山的遺訓永垂不朽！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載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報」第六十號

論國際形勢和共產黨的任務

在國際形勢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許多現象中，應當指出下面的主要事實：

一、毫無疑問，資本已經爬出了戰後危機的泥潭。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通貨的穩定，世界貿易的增長和個別國家生產的擴大，資本，特別是英美資本向歐洲和亞洲國家的輸出和投入，——這一切都表明資本的「建設工作」的成就。大家知道，這個「工作」是在英美集團領導下進行的。應當認為這個「工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使德國所謂「道威斯化」，即由軍事干涉的方法轉為財政干涉的方法，轉為在財政上奴役德國的方法。

二、同樣毫無疑問，革命的高漲時期已經在歐洲的中心，即在德國結束了。在革命的高漲時期，運動勢如奔騰的洪流，洶湧澎湃，四處氾濫，而黨的口號却落後於運動；羣衆打破了法制的範圍，衝擊舊制度，自動創立了新法制，——這個時期在德國已經過去了。德國的工人運動已經由衝擊時期進入了積蓄力量的時期，進入了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幾乎用不着證明，這種情況不會沒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必須更加明確地指出這種情況，以便迅速地熟悉新的環境，並且按照新的方式開始做革命的準備工作。

這些就是對資產階級有積極意義的事實，因為它們表明了目前資本的力量和成就。

但是除了這些事實以外，還存在着許多對資本主義有消極意義的事實。

一、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加强的同時，資本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增多了，削弱和瓦解資本主義的力量增長了。英美之間由於石油，由於加拿大，由於銷售市場等等而引起的鬥爭；英美集團和日本之間由於東方市場而引起的鬥爭；英法之間由於爭奪歐洲的勢力而引起的鬥爭；以及被奴役的德國和佔統治地位的協約國之間的鬥爭，——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實表明，資本的成就是不鞏固的，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過程裏隱藏着它內部衰朽和瓦解的前提。

二、印度、中國、埃及、印度尼西亞、北非及其他等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加強，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後方。既然帝國主義的「恢復健康」要求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擴大勢力範圍，而這些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又無疑地在日益加強，那末很明顯，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的成就是決不會穩固的。

三、爭取歐洲工會運動統一的鬥爭和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C. I. O.）的危機。英國工會展開爭取工會運動統一的鬥爭，蘇聯工會對這個鬥爭的支持，爭取工會運動統一的鬥爭變成反對實行分裂工會路線的阿姆斯特丹的反革命上層（烏捷格斯特、查辛巴赫、茹奧等等）的鬥爭，——這一切事實表明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正經歷着深刻的危機。而阿姆斯特丹的危機是什麼呢？這就是資產階級政權的不穩固，因為阿姆斯特丹工會的官僚是這個政權的一分子，是它的支柱。

四、蘇聯經濟的發展。毫無疑問，資產階級論客所說蘇維埃沒有能力管理工業的謠言已經遭到徹底的破產。毫無疑問，在武裝干涉和封鎖消除後的最近兩年來，蘇聯的工業恢復了並且鞏固了。毫

無疑問，工人的物質和文化狀況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大大地提高了。毫無疑問，這種狀況的改善今後還會繼續下去。所有這些情況現在都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革命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認為，西方工人從來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關心過俄國。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聽到了關於這個名叫蘇維埃聯盟的工人國家的蘇維埃工人的新生活、的傳說，並且他們想查對一下這些傳說的真實性。數十數百不同派別的工人從歐洲來到俄國，在各處進行考察，這一事實明顯地說明了西方工人對俄國的關心將逐月增長。毫無疑問，對俄國的這種訪問活動將日益頻繁。只要他們深信俄國工業發展的每一步驟同時就是改善工人狀況的步驟，而不是像資本主義國家通常發生的那種使工人狀況惡化的步驟，他們就會理解到，他們西方工人在自己家裏建立工人國家的時候也已經到了。正因爲如此，單是蘇維埃國家的存在，對帝國主義來說就已經是致命的危險了。正因爲如此，只要蘇維埃國家存在於世界上並且日益發展，帝國主義的任何成就都不會鞏固。

這些就是對資產階級有消極意義的事實，因爲這些事實表明了最近的將來革命運動的力量和它可能得到的成就。

這兩種對立的趨向，即消極的和積極的趨向的鬥爭，構成了目前國際形勢的基礎和內容。

在這個對立性的鬥爭中，所謂和平主義興起了，並且在它還沒有來得及繁榮，也沒有使自己形成一個『紀元』、『時代』或者『時期』的時候就沒落了。它既沒有滿足妥協分子的希望，也沒有證實反革命分子的耽心是有根據的。

彭加勒、尤茲、麥克唐納和赫里歐的「煇赫的」名字就在這個鬥爭中毀滅了。

這兩種趨向中哪一種會佔上風呢，是積極的趨向還是消極的趨向？

毫無疑問，對資本主義有消極意義而對革命有利的趨向將來一定會勝利，因為帝國主義不能解決腐蝕它的那些矛盾，只能暫時緩和這些矛盾，這些矛盾以後又會暴露出來，並且以更大的破壞力發展起來。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目前佔上風的是對資本主義有積極意義的和有利的趨向。

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就在於此。

結果在歐洲和美洲出現了受到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破壞」的和因蘇聯的存在、發展和強大而「黯淡無光」的一種平靜時期。

對資產階級來說，這意味着一個喘息時機，意味着加緊輸出資本，日益發財致富，加緊對殖民地壓迫和剝削，加強對蘇聯的壓力，把一切反革命力量糾集在英美資本的周圍。

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這意味着積蓄力量的時期已經來到，意味着在摻雜「自由」制度的迫害制度的條件下，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已經來到。

對殖民地來說，這意味着反對民族壓迫和剝削的鬥爭的加強，意味着爭取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的鬥爭的加強。

對蘇聯來說，這意味着集中一切力量來進一步發展工業，來加強國防力量和集合世界各國的革命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

因此，共產黨的任務就是：

一、盡量利用資產階級陣營中的一切矛盾來瓦解和削弱資產階級的力量，來加強無產階級的陣地。

二、制定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接近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具體形式和方法，來盡力支援這一反對共同的敵人即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

三、推進爭取工會運動統一的鬥爭事業，並且把它進行到底，同時要記住，這個事業是掌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最可靠的手段。因爲不掌握住工會，就不能掌握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而不在工會中工作，不在那裏逐年逐月地取得工人羣衆的信任，就不能掌握住工會。不這樣，就休想爭取無產階級專政。

四、制定工人階級接近那些受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主義機器摧殘和受全能的托拉斯的掠奪價格壓榨的小農的具體形式和方法，同時要記住，爭取小農的鬥爭是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當前任務。

五、支持蘇維埃政權和粉碎帝國主義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的陰謀，同時要記住，蘇聯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支柱，維護和加強蘇聯意味着加速工人階級對世界資產階級的勝利。

載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第六十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如果撇開某些細節和某些同志摻雜在問題中的個人成分不談，那末，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的意見分歧可以歸結為以下九個問題：

- (一)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是否有危機？
- (二) 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 (三) 危機是什麼性質的，即危險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左面還是從右面？
- (四) 哪一種危險最嚴重，左的危險還是右的危險？
- (五) 為什麼從右面來的危險是最現實的危險？
- (六) 怎樣同右的危險作鬥爭，才能從鬥爭中達到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化和找到擺脫危機的真正出路？
- (七) 使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最近任務是什麼？
- (八) 關於共產國際對各國支部的權利。

(九)關於克雷比赫同志和關於分裂的危險。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是否有危機呢？是的，是有的。這是雙方都承認的。他們在這一點上並沒有意見分歧。什麥拉里同志更進了一步，他說，危機要比某些同志平常所想像的更加深刻。

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什麥拉里同志斷定說，危機主要是由革命高漲時期過渡到平靜時期所造成的那些困難引起的。這是完全正確的。過渡時期要求新的方針，通常會在黨內引起某種危機。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情況也就是這樣。

危機是什麼性質的，危險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左面還是從右面？什麥拉里同志斷定說，危險是從兩方面來的，既從左面來，又從右面來。這也是正確的。有一種危險是過高估計部分要求而損害根本要求，過高估計國會活動和工會工作。這是從右面來的危險，因為它會使我們遷就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有一種危險是過低估計部分要求，過低估計國會活動、工會工作等等。這是從左面來的危險，因為它會使我們脫離羣衆，產生宗派主義。什麥拉里同志在這兩種對立傾向的鬥爭中採取中間立場，他這種願望是完全合理的。糟糕的只是他沒能保持住這種立場，而跟着右派走了。

這兩種危險哪一種最嚴重，左的危險還是右的危險？我認爲什麥拉里同志沒有弄清這個問題。他把批評主要對準左派，認爲主要的危險是在這裏。然而事實表明，主要的危險是從右面來的，而不是從左面來的。什麥拉里同志不了解這一點，他的第一個錯誤也就在這裏。

爲什麼從右面來的危險在目前是最嚴重的危險呢？原因有三個。

第一、從高漲時期到平靜時期這一過渡本身，這一過渡的性質，就增加了從右面來的危險的可能性。如果說高漲時期產生了革命的幻想，使左的危險成爲主要危險，那末平靜時期則恰恰相反，它會產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的幻想，使右的危險成爲主要危險。在一九二〇年，當工人運動走向高潮的時候，列寧寫了一本論「左派」幼稚病」的小冊子。爲什麼當時列寧寫的恰恰是這本小冊子呢？因爲當時左的危險是最嚴重的危險。我認爲，如果列寧還活着，他現在一定會寫一本論「右派老成病」的小冊子，因爲在現在這個平靜時期，妥協的幻想一定會增長，右的危險是最嚴重的危險。

第二、正像什麥拉里同志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過去的社會民主黨人。幾乎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復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不用說，這種情況不能不加深從右面來的危險。

第三、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是捷克人取得民族勝利的國家。捷克人作爲一個統治民族已經獲得自己的民族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工人目前生活得還不壞；沒有失業現象，完全沉醉在民族國家的思想中。這一切不能不使捷克斯洛伐克各階級滋長民族和平的幻想。不用說，這種情況也引起和加劇了從右面來的危險。應當在這裏尋找右派和左派在民族路線方面發生分歧的原因，尋找斯洛伐克人和德意志人（被壓迫民族）站在左翼而捷克人站在相反一翼的原因。什麥拉里同志談到了這種劃分的危險性。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同樣正確的是：如果注意到前面指出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的民族特點和捷克人的統治地位，那末這種劃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使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從右面來的危險成爲特別嚴重的危險的基本原因就是這些。

應當怎樣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的右的危險作鬥爭呢？這個問題使我們接觸到了意見分歧的本質。本來，同這種危險作鬥爭應當是最堅決最無情的。但是在捷克共產黨員那裏情況却相反。什麥拉里同志是否在同右面來的危險作鬥爭呢？是的，是在作鬥爭。但他是這樣鬥爭的：他不去消滅右派，因而最後的結果就是培植和支持了右派，保護右派免受左派的打擊。同志們，這未免有點奇怪，但這是事實。什麥拉里同志的第二個和主要的錯誤就在這裏。

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一、事實是：克雷比赫同志寫了擁護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事實是：這個文件在黨內是大家都知道的，並且是廣泛流傳的。必須把這個文件拿到光天化日之下來，必須當着工人的面從思想上打垮它的作者，使黨能夠認清托洛茨基主義的危險，能夠以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教育幹部。因爲托洛茨基主義如果不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翼，如果不是從右面來的危險，那末又是什麼呢？什麥拉里同志在這種情況下是怎樣做的呢？他不是把克雷比赫同志的托洛茨基主義問題在全黨公佈，而是掩飾問題，抹殺問題，把問題拿到黨的舞台後面，在那裏用解決普通「誤會」的方式極端秘密地「解決了」它。這樣做對托洛茨基主義和克雷比赫同志是有利的，對黨是不利的。結果不是同右派作鬥爭，而是維護右派。

二、大家知道，三個工會，即運輸工會、木工工會和建築工會的某些首領發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文件，要求工會不依賴黨而完全獨立。大家知道，這個文件是捷克斯洛伐克工會內部存在許多右派分

子的標誌。必須在黨的面前分析這個文件，並且告訴黨要提防工會同它脫離的危險。什麥拉里同志在這種情況下是怎樣做的呢？他又掩飾了這個問題，收回了文件，就這樣把文件藏了起來不讓黨員羣衆看見。既使右派安然無恙，又使『黨的威信』得以保持。這就叫做同右派作鬥爭！

三、大家知道，在國會共產黨黨團中有右派分子。大家知道，這些分子常常擺脫黨的領導，企圖同黨中央對立起來。同這些分子作鬥爭，特別在現在，特別在目前平靜的情況下是迫切需要的。什麥拉里同志是怎樣同這種危險作鬥爭的呢？他不是揭露共產黨黨團中的右派分子，而是祖護他們，關於承認黨的領導的橡皮性的決議挽救他們，這個決議是在黨成立的第四個年頭，是在進行了幕後的內部鬥爭以後通過的。結果又是對右派有利，對黨不利。

四、最後，關於布勃尼克的問題。同志們，我應當說明，平靜時期並不是沒有任何發動的時期。平靜時期是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軍隊準備進行革命的時期。但是，只有在發動的過程中才能訓練無產階級軍隊。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現的生活費用高漲的現象就是進行這種發動的有利條件之一。大家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利用了時機，它在不久以前以生活費用高昂為理由舉行了許多次遊行示威。大家知道，現在已被開除出黨的右派共產黨員布勃尼克也利用了時機，他打擊黨的後方，企圖破壞工人的發動。爲了保護黨的後方免受右派的打擊，什麥拉里同志做了些什麼呢？什麥拉里同志不但沒有利用布勃尼克『事件』和當着黨的面在這一問題上無情地揭露整個右派集團，反而把關於右派這一原則性的問題說成是布勃尼克個人的事情，雖然全世界都知道，布勃尼

克不是孤立的，不論在工會中，在國會的共產黨黨團中或者在報界都有他的擁護者。什麥拉里同志以微小的犧牲（開除布勃尼克）作代價把右派集團從毀滅中挽救了出來，而使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根本利益受到了損害。這就是什麥拉里同志所謂的同右派作鬥爭的策略！

什麥拉里同志把這個策略叫做「細緻的」、「慎重的」策略。也許這個策略是真正細緻的策略，但是它和布爾什維克同右派作不調和鬥爭的策略毫無共同之處，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什麥拉里同志忘記了俄國的一句俗話：「細的地方是容易斷的」。他忘記了細緻是不能保證不遭破產的。大家知道，情況也正是這樣，因為這個對付右派的「細緻的」策略在初次嘗試中就遭到了失敗和破產，當時在這個策略養育下的布勃尼克集團差點破壞了捷克無產階級不久以前的發動。右派的加強和布勃尼克的變節，這就是什麥拉里同志的「細緻的」策略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什麥拉里同志的「細緻的」策略是挽救右派的策略，是加深危機的策略，是孕育着黨的毀滅的策略。

作為革命政黨的舊社會民主黨為什麼毀滅了呢？其原因之一就是考茨基之流實際上採取了包庇和挽救右派的「細緻的」策略，採取了同埃·伯恩施坦之流「統一和和平」的「慎重的」策略。由此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在面臨戰爭的緊急關頭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背叛了工人階級，「正統派」做了右派的俘虜，而整個社會民主黨成了「行屍走肉」。我認為，如果你們不迅速而堅決地用布爾什維克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派集團作無情鬥爭的策略代替什麥拉里同志的「細緻的」策略，那末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將來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我不想因此就把什麥拉里同志同社會民主黨人混為一談。

我決沒有這種想法。毫無疑問，他是共產黨員，甚至還可能是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但是我要說，如果不放棄自己的「細緻的」策略，他就必然會滾到社會民主主義方面去。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最近任務是什麼呢？

它的最近任務是：在同「極左」傾作鬥爭的時候，要同從右面來的危險進行堅決的鬥爭，以便完全孤立右派和徹底消滅他們。團結黨內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來徹底消滅右派集團，這就是黨的任務，這就是擺脫危機的出路。不這樣，就休想使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

這當然還不是說一定要開除所有一切右派分子。開除在反右派鬥爭中並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階段。主要的問題是在原則性的鬥爭過程中從思想上和精神上粉碎右派集團，並把廣大的黨員羣衆吸引到這個鬥爭中來。這是以布爾什維主義精神教育黨的一個主要的和重要的手段。如果開除作爲在思想上粉碎敵人的自然結果，確實是需要的，那就應該採用開除的辦法。在這方面，左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爲他們急急忙忙地開除了布勃尼克。他們沒有徹底利用布勃尼克「事件」，沒有把它同右派在羣衆發動問題上的原則立場聯系起來以揭露右派的真面目，却急急忙忙地開除了布勃尼克，切斷了在這方面繼續向右派進攻的一切道路。

至於共產國際的權利和它對各國黨的事務的干預，我堅決不同意某些同志所主張的縮小這些權利的意見。有人想使共產國際變成星球上的組織，使它只是冷漠地觀察各國黨內所發生的事情和平心地登記事件。不，同志們，共產國際不能成爲星球上的組織。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它

和工人運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不能不預各國黨的事務，援助革命分子並同他們的敵人作鬥爭。當然，各國黨都有它內部的自治權，各國黨的代表大會應當是不受約束的，各國黨的中央委員會應當是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但是，如果由此便否認共產國際的領導權利，因而也否認它的干預權利，那就是爲共產主義的敵人效勞。

最後，關於克雷比赫同志。我認爲他的整篇演說是打算用分裂的威脅來嚇唬人。他說，不要觸犯勃留恩的右派，否則就會壞事，不要同他們鬥爭，否則就會分裂。好吧，讓我們看看吧。只是克雷比赫同志別來嚇唬我們了，反正我們是嚇唬不住的。他不能不知道，我們是久經戰鬥的人，用分裂的威脅是嚇不倒我們的。如果他企圖從威脅轉爲行動，我敢肯定地對他說，在這件事情上吃虧的只會是他而不會是別人。

概括地說，黨內是有危機的。危機的原因是無可懷疑的。主要的危險是從右面來的。同這種危險作堅決而不調和的鬥爭，這就是任務。團結黨內的一切革命分子來徹底消滅右派，這就是擺脫危機的出路。

必須利用平靜時期來鞏固黨，使黨布爾什維克化，並使它「時刻準備着」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糾紛」（因爲「新郎來到」的「那日子，那时辰是不得而知的」），從而爲新的革命高漲開闢道路。

載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真理報】第七十二號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謝米奇沒有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對民族問題的提法的實質。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十月革命以後，布爾什維克從來沒有把民族問題和革命總問題分開。布爾什維克對民族問題的看法的實質，就是始終把民族問題和革命前途密切聯繫起來。

謝米奇引證了列寧的話，說列寧曾經主張把解決民族問題的某種辦法規定在憲法中。顯然，謝米奇想以此來說明列寧似乎曾經認爲民族問題是立憲問題，即不是革命問題而是改良問題。這完全不對。列寧從來沒有陷入而且也不可能陷入立憲的幻想。只要看一看他的著作，就會深信這一點。列寧談到過憲法，但他所指的並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立憲道路，而是革命道路，也就是說，他把憲法看做革命勝利的成果。在我們蘇聯也有憲法，並且它反映了解決民族問題的某種辦法。可是這個憲法的問世不是和資產階級妥協的結果，而是革命勝利的結果。

其次，謝米奇援引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所寫的那本大家都知道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小冊子〔三〕，

竭力想從那裏找到哪怕只能間接證實他正確的一些話。但是，這種引證是枉費心機的，因為不僅這些話，就連稍微能證實他對民族問題的「立憲」觀點正確的間接暗示，他也沒有找到，而且不可能找到。爲了證實這一點，我可以提醒謝米奇注意斯大林那本小冊子中的一段話，那裏是把奧國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立憲的）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辦法（革命的）對照起來談的。

這段話就是：

「奧國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緩慢的步驟來實現「民族自由」的。他們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爲實際辦法時，完全沒有指望根本的改變，沒有指望他們遠景中所沒有的民主解放運動。然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民族自由」的問題和可能的根本改變聯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運動聯系在一起，他們沒有理由指望改良。這就使俄國各民族可能的命運問題發生根本的變化。」

看來是很明白了。

這並不是斯大林個人的觀點，而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共同的觀點，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和現在都把民族問題和革命總問題密切聯系起來看。

可以毫不勉強地說，民族問題的提法在俄國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有兩個階段：第一是十月革命以前的階段，第二是十月革命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民族問題被看成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問題的一部分。在第二個階段，民族問題已經擴大和轉變爲殖民地問題，民族問題已經從國內問題變成世界問題，因而民族問題已經被看成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

分，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部分。可見，不論第一個階段或第二個階段的看法都是極其革命的。

我認爲謝米奇還沒有把這一切完全弄清楚。因此，他企圖把民族問題貶低爲立憲問題，即把民族問題看成改良問題。

這個錯誤使他產生了另一個錯誤，就是他不願意把民族問題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爲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把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混爲一談，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民族問題除了包含農民問題以外，還包含民族文化問題、民族國家問題等等。但是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在實質仍然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這也就說明農民是民族運動的主力軍，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所謂浩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一點說的。我認爲謝米奇不願意接受這種說法，是由於他過低估計了民族運動的內部威力，不了解民族運動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這是很危險的，因爲這實際上意味着過低估計蘊藏在運動中，比如蘊藏在克羅地亞人爭取民族自由的運動中的潛在力量，會使南斯拉夫共產黨全黨發生嚴重糾紛。

這就是謝米奇的第二個錯誤。

謝米奇企圖脫離國際形勢和歐洲可能的前途來談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這無疑也應該認爲是錯誤的。謝米奇根據目前在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中沒有強大的爭取獨立的人民運動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民族分離權問題是一個純理論的問題，而決不是一個現實問題。這當然是不對的。就

算這個問題在目前不是現實問題，可是一旦戰爭爆發（或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一旦歐洲革命爆發（或在歐洲革命爆發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會成爲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從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發展來看，戰爭一定會爆發，他們一定會在那裏打起來，這是不容置疑的。

一九一二年，當我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擬定第一個民族綱領草案的時候，在俄羅斯帝國的任何一個邊疆地區都沒有強大的爭取獨立的運動。然而當時我們認爲有必要把民族自決權即每個民族都有分離和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一條列入我們的綱領。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不但以當時已經有的情況爲出發點，而且以整個國際關係體系中不斷發展和日益迫近的情況爲出發點，也就是說，我們那時不但估計到當前的情況，而且估計到將來的情况。我們知道，如果某一個民族要求分離，那末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就要爲保證這個民族獲得分離權而鬥爭。謝米奇在演說中不止一次地引證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小冊子中的話。斯大林在這本小冊子中關於自決和獨立是這樣說的：

『帝國主義在歐洲的增長不是偶然的。資本在歐洲已感到地盤狹小，於是衝入異國去尋找新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新的投資場所。但是這就會引起國際糾紛和戰爭……完全可能造成一種內外形勢結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時俄國某個民族將認爲必須提出和解決本身獨立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加以阻礙，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

這段話還是在一九一二年寫的。你們知道，這個論點後來在戰時和戰後，特別是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勝利以後完全被證實了。

特別是現在，在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日益深入和俄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應當更有理由估計到整個歐洲特別是南斯拉夫的這種可能性。同時應當注意下面這種情況：南斯拉夫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它和某些帝國主義集團有聯系，因而它無法退出南斯拉夫外部所進行的激烈的角鬥。如果你們要為南斯拉夫黨起草民族綱領，——現在要談的正是這個問題，——那末必須記住，這個綱領不但應該以當前的情況為出發點，而且應該以日益發展的和由於國際關係的變化而必然產生的情況為出發點。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必須把民族自決權問題看成是一個現實的迫切的問題。

現在來談談民族綱領。民族綱領的出發點應當是南斯拉夫蘇維埃革命的原理；不推翻資產階級，不取得革命勝利，民族問題便不可能得到比較滿意的解決。當然也可能有例外。比如戰前挪威脫離瑞典就是一個例外，列寧在他的一篇文章^(三)中詳細地談過這個問題。不過這是在戰前，在各種順利情況偶然湊合的條件下發生的。戰後，特別是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以後，就未必能發生這種事情。至少產生這種可能性的機會現在已經少到可以說是等於零了。既然如此，那末很明顯，我們不能制定等於零的綱領。正因為如此，革命的原理應當是民族綱領的出發點。

其次，一定要把關於直到國家分離的民族自決權這一專門條文列入民族綱領。為什麼在目前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下，非有這一條不可，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講過了。

最後，在綱領中還應當包括一項允許那些認為不必同南斯拉夫分離的南斯拉夫境內各民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專門條文。有些人認為必須排斥這種結合，這是不正確的，不對的。在一定的條件

下，由於南斯拉夫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很可能會有某些民族不願意分離，像在我們俄國所發生的那樣。顯然，爲了適應這種情況，綱領中就必須有自治這一條，以便把南斯拉夫國家改變成以蘇維埃制度爲基礎的各民族自治國家的聯邦。

總之，給那些願意分離的民族以分離權，給那些願意留在南斯拉夫國家範圍內的民族以自治權。爲了避免誤會起見，我必須說明，不應當把分離的權利理解爲分離的義務，分離的責任。每個民族都可以行使這種分離權，但是也可以不行使這個權利，如果它不願意行使這個權利，那是它自己的事情，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到。有些同志把分離的權利理解爲分離的義務，比如說，要求克羅地亞人無論如何要分離。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必須拋棄。決不能把權利和義務混爲一談。

載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七期

關於農村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分子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第一個任務就是要保證共青團有基本的無產階級核心作爲全團的領導核心。報告人一點也沒有談到這個問題。這並不奇怪，因爲這裏談的是農村共青團的工作，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核心。但是，保證共青團有無產階級核心，仍然應當是共青團的基本任務。我認爲共青團在這方面的工作進行得比較成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吸收工人青年加入共青團的工作是在順利進行，十分之九以上的工人青年加入共青團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第二個任務就是要把無產階級核心中的工作人員合理地分配到蘇聯各中心地點和主要地區去，以便用這個核心的力量保證對農民青年的實際領導。我的根據是：農民青年在數量上超過無產階級青年，要把無產階級青年的力量平均地分配到蘇聯的各縣和各鄉去是不夠的。因此，必須把這些力量分配到最容易保證對農民青年實行領導的那些地方去。我不認爲共青團已經像完成第一個任務那樣勝利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但是，仍然有根據認爲，共青團正以全力來完成這項任務，並且最近就會迅

速做出成績來。

第三個任務就是要保證共青團在農村中擁有大量農民青年積極分子，要對這些積極分子進行政治教育，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政策在農村中的執行者，使他們成爲把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結合起來的水泥。這是件困難而又極其複雜的事情。要在短期內解決這項任務是完全不可能的。爲了完成這項任務，共青團的無產階級核心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必須全力以赴。然而，這項任務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解決的。因爲，不這樣就不可能鞏固共青團，也不可能保證工農結合。

但是，怎樣保證共青團擁有農民積極分子，怎樣教育這些積極分子，怎樣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政策在農村中的執行者呢？

據說，共青團內單是農村支部書記就有二萬七千人。據說，除了支部書記以外，還有在合作社、蘇維埃、農民委員會、文化機關等等積極工作的共青團員。據說，把這一切都加起來，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至少有十萬人。這一切是不是事實，——很難說。如果這一切都是事實，那末應當說，只要善於利用這些積極分子，他們就可以成爲能夠創造奇蹟的極巨大的力量。由於目前黨在農村中的積極分子的數量要少得多，這種情況就顯得更重要了。

因此，任務就是：怎樣教育這大量的積極分子，使他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中成爲無產階級政策在農村中的執行者。

我不想在這裏做詳盡的回答。要在一篇短短的演說中做到這一點是決不可能的。但是在短短的

演說中指出正確解決這項任務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條件，是完全可能的。這是些什麼條件呢？這些條件至少有八個。

第一、必須供應農村青年積極分子一些解釋蘇維埃政權維護貧農利益的法令的通俗小冊子和參考書。必須使這些積極分子徹底了解這些法令，使他們善於向貧農解釋這些法令，並且善於根據這些法令維護貧農的利益，反對富農的惡勢力。我認爲，不了解這些法令和農村「當權者」經常違反這些法令，是目前農村秩序的主要禍害之一。農村中的共青團積極分子應當捍衛革命法制。他們應當盡力保護農村中的貧農。毫無疑問，這個任務是普通而平凡的。毫無疑問，空談世界革命要比實現這項同蘇維埃法令有關的普通而平凡的任務容易得多。但是同樣毫無疑問，不實現這項任務，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結合。

第二、必須供應農村青年積極分子關於農業基本知識的通俗小冊子。必須使這些積極分子研究農業，懂得改進農業的方法，並且善於在這方面向農民提供必要的意見。農民對共青團員往往採取不嚴肅的嘲笑的態度。這是因爲農民認爲共青團員是脫離農業的人，是不學無術的人，是游手好閒的人。因此，任務就是要使共青團員同農業接近，同農業結合。共青團員積極分子只有同農業結合起來，只有善於提供有關提高農民經濟、改進和鞏固農民經濟的有益的意見，才能得到農民的尊敬和信任。當然，這件事情是相當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枯燥無味的。但是，爲了取得農民的信任，這樣做仍然是必要的。

第三、必須供應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關於農業稅、關於地方預算、關於國家財政狀況的通俗小冊子。稅收和地方預算現在是農村中的第一件大事。目前在這方面發生了無數違法亂紀的行爲。怎樣分攤捐稅，使貧農不受委屈，使富農不致逃脫納稅的負擔；怎樣根據地方預算使用經費，必須把錢花在哪些方面；怎樣才能揭發和杜絕這方面的違法亂紀的行爲，——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共青團員積極分子不能忽視的。任務就是要干預這一切事情，幫助勞動農民。這件事情也是相當困難的，並且遠不是有趣的。但是不這樣做，農村中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蘇維埃建設。

第四、必須供應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關於蘇維埃建設，關於活躍蘇維埃和吸收農民參加村、鄉、區、縣的管理工作等問題的通俗參考書。必須使共青團員積極分子徹底了解關於地方蘇維埃的權利和義務、關於農民對蘇維埃的權利和義務、關於選舉制度、關於選舉程序等等的條例。任務就是要向農民解釋黨和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政策，使這個政策得到切實而認真的執行。不這樣就休想取得農民的信任，休想擴大農民積極分子並且在農村中發揚無產階級民主。

第五、必須供應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關於農業合作社、信貸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關於勞動組合和一般集體經濟的通俗小冊子。必須使共青團員積極分子善於吸引農民參加發展農村合作社組織的工作。這件事情是極複雜極困難的，但是爲了吸引農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樣做是絕對必需的。農業合作社和信貸合作社現在對農民有頭等重要意義。任務就是要使合作社成爲農民的切身事業。同時應該注意到，由於貧農階層沒有農具，在農村中就造成了一種特殊情況，這種情況有利於在國家

信貸機關的一定幫助下建立勞動組合和集體農莊。任務就是要使貧農階層有可能在這方面得到相當的優惠貸款。共青團員積極分子不能忽視這些重大的問題。

第六、必須供應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關於農村文化建設、關於發展農村閱覽室和掃除文盲等方面的必要指示和材料。任務就是要使共青團員積極分子成爲農村中的蘇維埃和文化界在發展蘇維埃文化方面的天然助手。

第七、必須使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得到關於共青團員的權利和義務，關於共青團和黨之間、蘇維埃和共青團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正確指示。必須使共青團員積極分子把自己看做是黨和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助手。農村中的命令主義，選舉蘇維埃時的不法行爲，暗中代替黨組織、合作社組織和蘇維埃組織的企圖，在所謂反宗教宣傳中的流氓行徑，——這一切都玷污了共青團的旗幟，同共青團員的稱號完全不相稱，必須立刻拋棄和根除。任務就是要同這些醜惡行爲作無情的鬥爭，並且在共青團同蘇維埃機關和黨機關之間建立正確的相互關係。

第八、必須供應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關於工農聯盟，關於工農聯盟的意義和作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共產主義基礎，關於十月革命的歷史，以及關於農民過去在沙皇和地主統治下的生活狀況，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他們將來在結合已經鞏固和社會主義已經確立時的生活狀況的通俗小冊子。共青團員積極分子決不應當遷就農民的成見。注意這些成見和遷就這些成見是兩回事。共青團員積極分子應當善於用共產黨員的語言同農民談話。共青團員積極分子應當善於用具體的事實說服

農民，使他們確信除了社會主義沒有別的生路。

這就是對農村共青團積極分子進行政治教育，並且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政策在農村中的執行者所必須實現的一些條件。

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的任務在於促進和監督這些條件的實現。

有人說到共青團在農村中大發展的危險，說到農民青年湧進共青團的現象。毫無疑問，這裏是有些危險的。但是同樣毫無疑問，如果共青團能够光榮地完成上面提出的任務，它就不必害怕這種危險。農村中有十萬共青團積極分子，——對於這樣一支力量，農民青年不管怎樣湧進來都不會有危險。全部問題在於：要加強對這些積極分子的政治教育工作。全部問題在於：要善於指導這些積極分子爲鞏固工農聯盟而努力。全部問題在於：要利用這些積極分子去吸引農民參加新的蘇維埃建設。

總之，（甲）保證共青團有無產階級核心作爲基本領導力量；（乙）從保證這種領導出發，把這個核心的積極力量分配到蘇聯各主要地區去；（丙）教育農村青年積極分子保證在農村中實現無產階級政策，——這就是整個共青團特別是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的當前任務。

有了這些任務，並且在日常工作中完成這些任務，就不必害怕擺在農村共青團面前的危險了。

載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真理報」第八十六號

致蘇聯無產階級大學生第一次 全國代表會議

(信)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要我談談在無產階級大學生中間黨的任務和黨的工作的任務。

讓我同你們簡單地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目前形勢的特點，就是我國的無產階級已經爲自己創造了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環境。如果認爲在一個戰勝了並且驅逐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國家裏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那是不正確的。在一個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擁有豐富的資源並且受到全世界無產者支持的國家裏，是能夠而且必須建設社會主義的。列寧說得對：我國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條件。現時的特點，就是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已經把社會主義由神像變成日常實際工作的實際目標了。

無產階級大學生在這個建設工作中的作用應當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作用無疑是重要的，甚至是頭等重要的。高等學校，共產主義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這都是培養經濟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揮人員的學校。醫學家和經濟學家，合作社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採礦工程師和統計學家，技師和化學家，農業工作者和鐵道工程師，獸醫和林業工作者，電工技術員和機械師，——這都是建設新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的未來的指揮人員。沒有新的指揮人員就不能建設新社會，正像沒有新的指揮人員就不能建立新的軍隊一樣。新的指揮人員的特色，就在於他們進行建設的使命不是爲了剝削勞動者以滿足一小撮富人的私利，而是爲了解放勞動者，反對一小撮剝削者。全部問題在於：要使高等學校學生——工人大學生和農民大學生，黨員大學生和非黨員大學生——了解自己的這個光榮的作用，並且自覺地忠實地起自己的作用。

因此，要竭力使無產階級大學生成爲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自覺的建設者，——這就是黨的第一個任務。

但是，如果沒有勞動羣衆的直接支持，單靠指揮人員的力量是不能建設新社會的。新的指揮人員所具有的知識還不足以建成社會主義。爲此還必須有勞動羣衆對這些指揮人員的信任和支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從事建設的舊的指揮人員的特點，就是他們脫離工人和農民，他們把自己置於勞動羣衆之上，既不重視勞動羣衆的信任，也不重視勞動羣衆的支持，因而也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支持。這種方法對我們國家是完全不合適的。建設新經濟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揮人員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

因爲他們應當斷然地堅決地和舊的發號施令的方法斷絕關係。不脫離羣衆，而最緊密地聯系羣衆；不把自己置於羣衆之上，而走在羣衆前面，引導羣衆前進；不遠離羣衆，而和羣衆打成一片，爭取羣衆對自己的信任和支持；——這就是新的指揮人員管理業務的新方法。不採取這些方法，任何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能想像的。

因此，要竭力使無產階級大學生把自己看做勞動羣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竭力使大學生感覺到自己是社會活動家，並且在行動上表現出自己是真正的社會活動家，——這就是黨的第二個任務。

最後，專門談一談共產黨員大學生的問題。據說共產黨員大學生在科學方面的成就不大。據說他們在這方面大大落後於非黨員。據說共產黨員大學生寧願研究『高深的政治』，花費三分之二的時間去漫無止境地討論『世界問題』。這一切是不是事實呢？我想是事實。既然是事實，那末至少應當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共產黨員大學生有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拙劣領導者的危險，因爲不掌握科學是不能領導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第二、培養新的指揮人員的事業有被那些需要山新的人材來替換的舊教授所壟斷的危險，因爲在不願意或不善於掌握科學的人們中間，是培養不出新的換班人和新的科學工作者的。不用說，這一切不能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事業造成直接的威脅。這種情況能不能容忍呢？顯然不能。因此，共產黨員大學生和全體蘇維埃大學生應當明確而肯定地給自己提出如下的當前任務：掌握科學，從新的蘇維埃人中間造就新的換班人來接替舊教授。我決不是說大學生不應當研究政治。決不是這樣。我只是說共產黨員大學生應當善於把政治工作和掌握科學的事業

結合起來。有人說，要做到這一點是有困難的。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共產黨員什麼時候害怕過困難呢？困難之所以在我們的建設道路上存在，正是爲了要我們去同它作鬥爭並且克服它。

此外，我們還應當注意一種情況。我認爲我們的國家和我們國家的革命習慣、傳統，以及反對因循習慣和思想停滯的鬥爭，給繁榮科學創造了最有利的環境。未必用得着懷疑，資本主義學校舊教授所特有的小市民的狹隘性和守舊思想，是科學的絆腳石。未必用得着懷疑，只有不沾染這些缺點的新人，才能從事充分而自由的科學創造。在這方面，我們的國家有遠大的前途，可以成爲不受束縛的科學的堡壘和苗圃。我認爲我們已經開始走上這條道路。但是，如果共產黨員大學生依舊站在發展科學的大道旁邊，那是可悲的，並且是不體面的。正因爲如此，掌握科學的口號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因此，要竭力使無產階級大學生，首先是共產黨員大學生懂得掌握科學的必要性並且去掌握科學，——這就是黨的第三個任務。

敬禮

致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載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真理報」第八十七號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向俄共（布）莫斯科組織

積極分子所做的報告）

同志們！我認爲在這裏詳細地分析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三）所通過的各項決議是沒有意義的。這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也沒有必要這樣做。我認爲只要指出基本路綫就夠了，因爲它像一根紅綫貫穿在這些決議中。這樣做我們就能夠着重指出所通過的各項決議的基本結論。這樣做也便於今後研究這些決議。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決議，決議中所談到的各種問題可以歸納爲六類主要的問題。第一類問題是國際形勢問題。第二類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的當前任務問題。第三類問題是殖民地 and 附屬國內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問題。第四類問題是在目前國際形勢下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命運問題。第五類問題是我們黨在農村中的政策和黨在新條件下的領導任務問題。最後，第六類問題是我國整個工業的神經中樞即金屬工業問題。

一 國際形勢

在國際形勢中基本上決定目前時局性質的新的特殊的情況是什麼呢？

在最近時期出現的對國際形勢有影響的新情況，就是歐洲開始了革命的退潮，開始出現了某種平靜現象，即在蘇聯經濟發展和政治威力增長的同時，出現了我們所說的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

什麼是革命的退潮，什麼是平靜現象呢？這是不是世界革命末日的開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的開始呢？列寧說過，在我國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以後便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即世界革命的時代；這是一個充滿衝突和戰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的時代，這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走向勝利的時代。既然歐洲革命的退潮已經開始，那末這是不是說，列寧關於新時代即世界革命時代的論點因而也就失效了呢？這是不是說，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也就取消了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

世界革命時代是一個新的革命階段，是包括好多年也許包括幾十年的整整一個戰略時期。在這段時期內可能有而且應當有革命的退潮和來潮。

我國革命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即兩個戰略時期，而在十月革命以後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第三個戰略時期。第一個階段（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七年）延續了十五年以上。這個階段的目的是推翻沙皇

制度，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在這段時期內我們經歷了許多次革命的退潮和來潮。我們經歷了一九〇五年的來潮。這次來潮是以革命暫時失敗而結束的。之後，我們經歷了延續好幾年（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退潮。接着我們經歷了因連納事件（一九一二年）而掀起的新的來潮，這次來潮後來被大戰時期的新的退潮所代替。一九一七年（二月）開始了新的來潮，這次來潮是以人民戰勝沙皇制度，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而結束的。在每次退潮以後，取消派都硬說革命完蛋了。但是，革命在經過了許多次退潮和來潮以後終於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取得了勝利。

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是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開始的。這個階段的目的是退出帝國主義戰爭，推翻資產階級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這個階段或者說這個戰略時期一共延續了八個月。但這是革命危機極度加深的八個月，當時戰爭和經濟破壞鞭策了革命，使革命的步伐極度加快。正因為如此，這八個月的革命危機至少可以而且應當等於八年的通常的立憲發展。這個戰略時期也像前一個戰略時期一樣，它的特徵就是：革命並不是像革命的庸人通常所想像的那樣一味直線上升，而是包含着退潮和來潮。在這個時期，在七月遊行示威的日子裏，我們經歷了革命運動的洶湧澎湃的來潮。接着，在布爾什維克七月失敗以後，我們經歷了革命的退潮。這次退潮緊接着被科爾尼洛夫叛亂以後的新的來潮所代替，而這次來潮是以十月革命勝利而結束的。這個時期的取消派瞎說什麼在七月失敗以後革命已被全部撲滅。但是大家知道，革命在經歷了多次考驗和退潮以後，終於取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我們進入了第三個戰略時期即革命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目的是在世界範圍內戰勝資產階級。這個時期會持續多久，——很難說。但是毫無疑問，這個時期無論如何是很長的，同樣毫無疑問，這個時期也會包含着來潮和退潮。世界革命運動目前已經進入革命退潮時期，但是這次退潮由於許多原因（關於這些原因我在下面還要談），一定會被來潮代替。來潮可能以無產階級的勝利來結束，也可能不以勝利來結束，而被新的退潮代替，但是新的退潮也一定會被革命的新來潮代替。現今時期的取消派說，已經出現的平靜現象是世界革命的末日。但是，他們弄錯了，正像他們過去在我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和第二個階段弄錯了一樣，那時他們把革命運動的每一次退潮都看成革命的毀滅。

這就是在革命的每個階段內即每個戰略時期內的起伏情形。

這些起伏說明什麼呢？它們是不是說明，列寧關於世界革命的新時代的論點已經失去意義或者可能會失去意義呢？當然不是！它們只是說明，革命的發展通常不是直綫上升，不是繼續不斷地向上高漲，而是要經過曲折的道路，經過進攻和退却、來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發展進程中來潮和退潮鍛鍊了革命力量並且準備了革命的最後勝利。

這就是已經到來的革命退潮時期的歷史意義，這就是目前我們所處的平靜時期的歷史意義。

但是退潮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除了歐洲革命的退潮以外，還有蘇聯經濟的蓬勃發展和蘇聯政治威力的日益增長。換句話說，現在不僅有資本主義的穩定，同時還有蘇維埃制度的穩

定。可見現在有兩種穩定：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和蘇維埃制度的穩定。這兩種穩定之間達到了某種暫時的平衡——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國際形勢的特點。

但什麼是穩定呢？這是不是停滯呢？如果穩定就是停滯，那末不能把它應用到蘇維埃制度上來呢？不，穩定不是停滯。穩定是目前局勢的鞏固，是進一步的發展。世界資本主義不只是在目前局勢下得到鞏固。它還在前進和向前發展，還在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和增殖自己的財富。如果認為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如果認為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²⁵⁾一書中所提出的關於資本主義腐朽的理論似乎是否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那是不對的。列寧在他的關於『帝國主義』一書中充分證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排除資本主義的逐漸腐朽，而是預定和準備資本主義的逐漸腐朽。

可見，現在有兩種穩定。一端是資本主義達到穩定，它在鞏固它現有的地位並且在繼續發展。另一端是蘇維埃制度達到穩定，它在鞏固它所奪得的陣地並且在繼續走向勝利。

誰戰勝誰，——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為什麼一種穩定和另一種穩定同時並存呢？怎麼會產生這兩端的呢？因為世界上再沒有單一的無所不包的資本主義了。因為世界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以英、美資產階級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國際形勢將愈來愈取決於這兩個陣營間的力量對比。

可見，目前時局的特徵不僅是資本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已經穩定，而且是這兩個陣營的力量已經達到某種暫時的平衡；這對資本稍為有利，而對革命運動稍為不利，因為已經出現的平靜現象和革命

高潮比較起來，對社會主義無疑是不利的，雖然是暫時的不利。

這兩種穩定之間有什麼差別呢？這兩種穩定各向哪一方面發展呢？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穩定使資本的力量暫時增強，同時也必然使資本主義的矛盾尖銳化。資本主義的矛盾就是：（甲）各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乙）每個國家內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丙）帝國主義和世界各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之間的矛盾。

蘇維埃制度下的穩定則使社會主義的力量增強，同時也必然使矛盾緩和，使相互關係改善。這裏的矛盾和相互關係就是：（甲）我國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和相互關係；（乙）無產階級和各被壓迫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之間的矛盾和相互關係；（丙）無產階級專政和世界各國的工人之間的矛盾和相互關係。

問題在於：不加緊剝削工人階級，不使大多數勞動者過半飢半飽的生活，不加緊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世界資產階級各帝國主義集團間不發生衝突和糾紛，資本主義就不能發展。而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却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發展；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改善蘇維埃國家全體勞動者的狀況，世界各國工人日益接近和聯合，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被壓迫人民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周圍。

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是在收買和豢養勞動者中間的一小撮上層分子的同時，使絕大多數勞動者陷於貧困和過半飢半飽的生活的道路。

與此相反，無產階級專政的發展道路，却是使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物質生活不斷提高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的發展就不能不產生使資本主義矛盾尖銳化的條件。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就無力解決這些矛盾。

當然，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這個規律使各資本主義國家間因爭奪殖民地而發生衝突和戰爭），如果資本主義不向落後國家，不向擁有廉價原料和勞動力的國家輸出資本也能發展，如果「宗主國」的過剩的資本不是用於輸出而是用來大力發展農業和改善農民的生活，最後，如果這些過剩的資本是用於提高全體工人階級羣衆的生活水平，——如果這樣，那就無所謂對工人階級加緊剝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使農民貧困化，對殖民地 and 附屬國加緊壓迫，以及資本家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了。

如果這樣，資本主義也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

全部問題在於：不使所有這些矛盾尖銳化，不積累那些歸根到底促使資本主義垮台的條件，資本主義就不能發展。

全部問題在於：與此相反，不創造那些使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極度高漲的條件，不為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準備條件，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繼續發展。

這就是兩種穩定之間的差別。

這也就說明為什麼資本主義的穩定既不能持久又不能鞏固。

現在我們來具體地研究一下資本主義的穩定問題。

資本主義的穩定具體表現在哪裏呢？

第一、表現在美、英、法三國暫時在對德國進行掠奪的方法和範圍方面達成了協議。換句話說，它們已經達成了它們稱做德國道威斯化的協議。能不能說這個協議是比較牢靠的呢？不，不能。第一、因為它是在沒有主人即沒有德國人民參加的情況下達成的；第二、因為這個協議會使德國人民受到雙重壓迫即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外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如果以為像德國這樣一個有文化的國家，像德國無產階級這樣一個有文化的無產階級，會甘受雙重束縛而不企圖進行一系列重大的革命爆發，那就是相信奇蹟。甚至像與登堡當選總統(Seydewitz)這樣一件實質上是反動的事情，也毫無疑義地說明協約國暫時達成的對付德國的協議是不牢靠的，而且不牢靠得令人可笑。

第二、資本主義的穩定表現在英、美、日三國的資產階級暫時在確定他們在中國這個能大量容納國際資本的市場上的勢力範圍方面，在對中國進行掠奪的方法方面，達成了協議。能不能認為這個協議是比較牢靠的呢？還是不能。第一、因為在協議者中間由於分贓而發生過並且還會發生殊死的搏鬥；第二、因為這個協議是背着中國人民達成的，中國人民是不願意而且也不會服從外國強盜的法律的。中國革命運動的增長難道不是說明外國帝國主義者的詭計註定要破產嗎？

第三、資本主義的穩定表現在各先進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暫時在互不干涉對方對「自己的」殖民地的掠奪和壓迫問題上達成了協議。能不能認為這個協議或者說達成協議的這種嘗試是比較牢靠的

呢？不，不能。第一、因為每一個帝國主義集團都在拚命奪取並且還會拚命奪取別人的一小塊殖民地；第二、因為帝國主義集團對殖民地的壓榨和對它們所實行的壓迫政策只能使這些殖民地受到鍛鍊，並且使它們革命化，從而加深革命危機。帝國主義者企圖『平定』印度，控制埃及，馴服摩洛哥，束縛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的手脚，因而施展了各種各樣的陰謀詭計。他們在這方面可能會取得一些『成績』。但是幾乎用不着懷疑，這些陰謀不會也不可能長久施展下去。

第四、資本主義的穩定可能表現在各先進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企圖在建立反蘇統一戰綫問題上達成協議。就算能够達成這個協議，就算它們能够靠施展各種各樣的詭計直到在索非亞爆炸事件⁽²⁵⁾上進行無恥的捏造等等而建立起某種類似統一戰綫的東西，有沒有根據認為這種反對我國的協議或者說這方面的穩定能够比較可靠、比較成功呢？我想這樣的根據是沒有的。爲什麼呢？第一、因爲資本家建立統一戰綫和舉行聯合進攻這種威脅會造成一個大圓箍，比任何時候都更緊地把我們全國東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使我國變成一座比『十四國』侵犯時更堅不可摧的堡壘。請回憶一下聲名狼藉的邱吉爾所說的關於十四國侵犯的威嚇話。你們知道，光是這種威嚇話，就足以使全國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來反對帝國主義強盜。第二、因爲向蘇維埃國家進攻，就一定會解開敵人後方的許多個革命紐結，使帝國主義的隊伍瓦解和渙散。近來已經積下了無數個這樣的紐結，它們不會是帝國主義有好結果的預兆，——這幾乎是用不着懷疑的。第三、因爲我國已經不再是孤獨的了，它已經有西方的工人和東方的被壓迫人民做同盟者。幾乎用不着懷疑，對蘇聯的戰爭將成爲帝國主義對本國工人和

自己的殖民地的戰爭。用不着證明，如果他們一旦進攻我國，那我們是不會坐着等死的，我們一定會採取一切辦法來駕御全世界的革命的獅子。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不會不知道我們在這方面是有一些經驗的。

以上這些事實和理由都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不可能鞏固的，這種穩定產生着使資本主義失敗的條件，相反，蘇維埃制度的穩定則不斷積累着使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使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高漲和使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

兩種穩定即資本主義的穩定和蘇維埃的穩定之間的這種原則性的對立，是兩種經濟制度之間和兩種管理制度之間即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對立的表現。

誰不了解這種對立，誰就永遠不會了解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實質。

目前國際形勢的一般情況就是這樣。

二 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的當前任務

現在來談第二類問題。

目前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所面臨的新的特殊的情況，就是革命的來潮時期被革命的退潮時期即平靜時期代替了。任務就是要利用目前所處的平靜時期來鞏固各國的共產黨，使它們布爾什維

克化，使它們成爲依靠工會的真正羣衆性的政黨，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分子首先是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並且用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精神去訓練無產者。

我不打算一一列舉西方各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你們讀一讀各項有關的決議，特別是共產國際擴大全會關於布爾什維克化的決議^(三)，就不難了解這些任務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了。

我只想談一談西方各國共產黨的一項基本任務，因爲闡明了這項任務以後，其餘各項當前任務就容易解決了。

這項任務是什麼呢？

這項任務就是把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和工會結合起來。這項任務就是：進一步開展統一工會的運動並且把它進行到底；讓所有的共產黨員都絕對無條件地加入工會，在那裏有系統地進行工作，把工人聯結成一條反資本的統一戰綫，從而創造各國共產黨能夠依靠工會的條件。

不執行這項任務，就既不能使各國共產黨變成真正羣衆性的政黨，也不能爲無產階級的勝利準備必要的條件。

西方的工會和黨並不像我們俄國的工會和黨。在西方工會和黨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在我們俄國所形成的那種相互關係大不相同。我國的工會是在黨建立以後，在工人階級政黨的周圍形成起來的。當我國還沒有工會的時候，黨及其組織就已經不僅領導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而且還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直到小規模的和極小規模的罷工。這主要是因爲：二月革命以前我們黨在工人中間所享

有的威信，比當時在我國各地存在的那些處於萌芽狀態的工會所享有的威信要高得多。我國真正的工會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才出現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就已經有了成形的工會組織，這些組織在工人中間享有極高的威信。列寧還在那時就說過，沒有像工會這樣的支柱，就既不能爭得無產階級專政，也不能保持住無產階級專政。在取得政權以後，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我們的工會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毫無疑問，現在我們的強大的工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我國工會發展史的主要特徵就是：我國工會是在黨建立以後，在黨的周圍並且在和黨友好的情況下產生、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西歐的工會完全是在另一種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第一、它們在工人階級政黨出現以前很久就在那裏產生並鞏固起來了。第二、在那裏，工會不是在工人階級政黨周圍發展起來的，恰恰相反，工人階級政黨本身却是從工會當中分離出來的。第三、由於對工人階級有極密切關係的經濟鬥爭領域可以說已經被工會佔領，因此黨就不得不主要進行國會中的政治鬥爭，這就不能不影響黨的工作性質和黨在工人階級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因為在那裏黨是在工會成立以後產生的，正因為工會在黨建立以前很久就產生了，並且工會確實是無產階級反資本鬥爭中的主要堡壘，——正因為如此，黨就成了
一支不依靠工會的獨立力量，就退到了次要地位。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如果共產黨想成爲一支能够把革命向前推進的真正羣衆性的力量，它就應當和工會結合起來並且依靠工會。

不估計到西方情況的這個特點，就一定會葬送共產主義運動事業。

在那裏，在西方，現在仍然有個別『共產黨員』不願意了解這個特點，還繼續沉醉於『退出工會』這一反無產階級的和反革命的口號。必須說，諸如此類的『共產黨員』對西方的共產主義運動是最有害不過的了。這些人把工會看成敵對的堡壘，企圖從外面來『攻擊』工會。他們不了解，實行這樣的政策，工人就會把他們看成敵人。他們不了解，不管工會好不好，工人羣衆總是把工會看成幫助自己保持工資、工作日等等的堡壘。他們不了解，這樣的政策不會促進而會破壞共產黨員深入到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中去的工作。

一個普通工人羣衆會向這樣的『共產黨員』說：『你們攻擊我的堡壘，你們想要破壞我幾十年來創造的事業，想向我證明共產主義比工聯主義好。也許你們的共產主義理論是正確的（像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工人怎麼能了解你們的理論呢），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點，就是我有我的工會堡壘，它領導我進行鬥爭，它保護我（不管保護得好不好），使我免受資本家的攻擊，誰想破壞這個堡壘，誰就是破壞我的事業即工人的事業。別再攻擊我的堡壘了，加入工會吧，在那裏工作五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幫助我們改善和鞏固工會，到那時候我再來看看你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你們真正够朋友，那我當然不會拒絕支持你們的』等等。

目前西方的普通工人羣衆就是這樣或者大致是這樣對待反工會主義者的。

誰不了解歐洲普通工人心理上的這個特點，誰就根本不會了解目前我們各國共產黨的狀況。

西方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在哪裏呢？

在於它依靠工會。

我們西方各國共產黨的弱點在哪裏呢？

在於它們還沒有和工會結合起來，而且這些共產黨內的某些分子不願意和工會結合。

因此，目前西方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就是：進一步開展統一工會的運動並且把它進行到底；讓所有的共產黨員個個都加入工會，在那裏有系統地耐心地進行工作，團結工人階級去反對資本，從而使共產黨能夠依靠工會。

這就是共產國際擴大全會關於西方各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的決議的意義。

三 殖民地 and 附屬國內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

現在來談第三類問題。

這方面的新情況如下：

(甲) 由於各先進國家向落後國家輸出的資本增多（這是資本主義的穩定所促成的），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國家中迅速地發展起來並且還會迅速地發展，它正在摧毀舊的社會政治條件，培植新的社會政治條件；

(乙) 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正在迅速地成長並且還會迅速地成長；

(丙) 殖民地內的工人革命運動和革命危機正在增長並且還會繼續增長；

(丁) 同時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最富裕和最有力量的階層也在成長並且還會繼續成長，他們害怕本國的革命比害怕帝國主義還要厲害，因此寧願和帝國主義勾結而不願為本國擺脫帝國主義的解放事業奮鬥，從而也就出賣他們的祖國（印度、埃及等國）；

(戊) 由於這一切，只有和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這些國家才能擺脫帝國主義而得到解放；

(己)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工業發達的和工業正在發展的殖民地內，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應當成為迫切的問題，就像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問題成為迫切的問題一樣。

過去的情形是這樣的：人們通常總是說東方是一個同一式樣的整體。現在大家都明白，單一的、同一式樣的東方已經不再存在了，現在有資本主義發達的和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殖民地，也有落後的和正在後退的殖民地，對於這些殖民地已經不能用任何同樣的尺度去衡量了。

過去，人們總是把民族解放運動看成是殖民地和附屬國內一切民族力量即從最反動的資產者起到最革命的無產者止的一條全面性的戰綫。現在，在民族資產階級分裂為革命的一翼和反革命的一翼以後，民族運動的面貌就有了一些改變。除了民族運動的革命分子以外，從資產階級當中還產生出

妥協分子和反動分子，這些人寧願和帝國主義勾結而不願爲本國的解放事業奮鬥。

因此，殖民地國家內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和資產階級中的革命分子，而首先是和農民結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同「本國的」資產階級中的妥協分子結成的聯盟，以便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爲擺脫帝國主義的桎梏進行真正的革命鬥爭。

結論只有一個：許多殖民地國家目前日益接近自己的一九〇五年。

任務就是：把殖民地國家內的先進工人團結到能夠領導日益增長的革命的統一的共產黨裏來。下面就是列寧早在一九二二年關於殖民地國家內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所說的話：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屠殺的「勝利者」，現在連小得可憐的愛爾蘭都不能戰勝，連它們彼此之間在財政問題和外匯問題上的混亂都不能克服。而印度和中國在咆哮着。這就有七億多人。如果加上周圍和它們完全相似的亞洲各國，那就佔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裏，一九〇五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來愈快地迫近着。而這個一九〇五年有一個很重要的極大的不同之處：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的革命還能夠孤立地進行（至少在開始時），也就是說，沒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國捲入革命，但是現在印度和中國的日益增長的革命却正在捲入或已經捲入革命鬥爭，捲入革命運動，捲入國際革命。」（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三卷第三一二頁）

殖民地國家正面臨着自己的一九〇五年，——結論就是如此。

共產國際擴大全會所通過的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決議的意義也就是如此。

四 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

現在來談第四類問題。

前面我談的是我們黨的代表會議就與共產國際直接有關的一些問題所通過的決議。現在我們來談談那些與共產國際、與俄共（布）直接有關的，因而也是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的聯結環節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會怎樣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的命運呢？這種穩定是不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末日或是末日的開始呢？

在其他國家於相當長的時期內保存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在我們這個技術上和經濟上落後的國家裏，一般說來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呢？

在資本主義包圍而且是目前還穩定的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能不能完全保證免除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完全保證免除舊制度在我國復辟的危險呢？

由於國際關係方面的新情況，所有這些問題就必然要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不給予準確而肯定的回答是不行的。

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另一種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

現在來分別考察這兩種矛盾。

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存在着某些矛盾，——這一點當然不能否認。只要回憶一下我國過去和現在由於農產品的價格政策，由於限價，由於降低工業品價格的運動等等而發生的一切事情，就會了解這些矛盾的全部現實性。我們面前有兩個主要階級：無產階級和私有者階級即農民階級。他們之間必然產生矛盾。全部問題在於：我們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所存在的這些矛盾。人們說：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那就是想說：我國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是否可以克服？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和農民一起去建設。

這樣回答的根據或理由是什麼呢？

這樣回答的理由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除了有矛盾以外，在發展的根本問題上還有共同的利益，這些共同利益遮蓋着這些矛盾，並且無論如何會超過這些矛盾。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農聯盟的基礎。

這些共同利益是什麼呢？

事實上農業有兩條發展的道路：資本主義的道路和社會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使大多數農民陷於貧困而讓城鄉資產階級上層發財致富的道路。恰恰相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則是使大多數

農民的物質生活不斷提高的道路。無產階級和農民，特別是農民，是樂意走第二條發展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因為這條道路是農民擺脫貧困和半飢半飽的生活的唯一生路。不用說，掌握經濟命脈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定會採取一切辦法使第二條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勝利。另一方面，不言而喻，農民是極樂意走第二條發展道路的。

可見，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共同利益遮蓋着他們之間的矛盾。

正因為如此，列寧主義說，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和農民一起並且依靠工農聯盟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正因為如此，列寧主義根據無產者和農民之間有共同利益這一點，說我們能夠而且必須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列寧主義就是這樣看這個問題的。

但是，顯然並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同意列寧主義的看法。例如托洛茨基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問題就這樣說：

「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見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一書的序言）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

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和解決我國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因為只有通過世界革命，只有依靠世界革命，我們才能解決這些矛盾並且最後建成社會主義。

不用說，這個論點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同一個托洛茨基還繼續說：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見托洛茨基「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換句話說，在西方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和給我們以國家援助以前，我們連夢想在比較長的時期內保持政權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

「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見「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頁）

換句話說，我們不但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且甚至在短時期內也無法「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住腳，儘管全世界都知道，我們不僅支持住了，而且還打退了保守的歐洲向我國發動的多次瘋狂進攻。

最後：

托洛茨基說：「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

得勝利以後^①，才會是可能的。」（同上，第九十三頁）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同志們，我引用這些話，是爲了把這些話和列寧著作中的一些話對照一下，使你們能夠領會關於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問題的本質。

現在來談談列寧著作中的一些話。

列寧早在一九一五年帝國主義大戰時就寫道：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爲「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

換句話說，被資本家包圍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決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而且還能够、還必須建成社會主義，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建立一支武裝力量，以便幫助周圍各國的無產者去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

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原理就是這樣。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談到我國電氣化問題時說過同樣的話（雖然在形式上有些不同）：

『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否則國家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是我們必須明確地意識到的。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而且我們一定會使經濟基礎從小農經濟轉到大工業經濟。只有國家實現了電氣化，只有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化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四頁）

換句話說，列寧完全意識到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所存在的技術上的困難，但是他絲毫沒有從這裏得出下面這個荒謬的結論：『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他却認爲我們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克服這些困難，從而取得『最

後的勝利」，即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

請聽列寧在一年以後即在一九二一年所說的話：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着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況下）。」（『論糧食稅』一書綱要）一九二一年版，——見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頁至第三〇三頁）

換句話說，列寧完全意識到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所存在的政治上的困難，但是他絲毫沒有從這裏得出下面這個不正確的結論：「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他却認為只要對農民採取正確的政策，我們完全能夠取得「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即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

但是，對農民的正確政策是什麼呢？對農民的正確政策是一件完全由而且僅僅由我們這個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黨確定的東西。

列寧於一九二二年在他的論合作制這篇札記中更肯定地說過同樣的話：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權力，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

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我們從前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三頁）

換句話說，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克服所有一切內部困難而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必要條件，因爲我們能夠而且必須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有人反對說，我國在經濟上比較落後，因此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列寧反擊並且駁倒了這種說法，認爲這種說法是一種和社會主義不相容的東西。

列寧說：「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背得爛熟的一條論據，已成爲他們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條論據就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或像他們的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二頁至第四三三頁）

要不然，就不用不着在十月奪取政權，用不着舉行十月革命了。因爲，如果根據某些理由而認爲沒

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和必要，那末十月革命也就失掉意義了。誰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的可能性，誰也就一定要否認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反過來說，誰不相信十月革命，誰就決不會承認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取得勝利的可能性。不相信十月革命和不承認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可能性，二者之間有緊密而直接的聯系。

列寧說：『我知道，當然有一些自以為很聰明、甚至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聰明人，他們硬說在世界各國的革命爆發以前不應奪取政權。他們並不懷疑他們這樣說就是脫離革命而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等待勞動階級完成世界規模的革命，——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滯不前。這是荒謬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頁）

關於第一種矛盾，關於內部的矛盾，也就是關於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二種矛盾即外部的矛盾，也就是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表現在哪裏呢？

這種矛盾表現在：只要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武裝干涉的危險；只要這種危險存在，就一定會有復辟的危險即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恢復的危險。

能不能認為這種矛盾是一個國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為靠一個國家的努力，即使這

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裝干涉的危險。因此，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只有通過若干國家的無產者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幾個國家的無產者取得勝利以後，才能够免除武裝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說，才能够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

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什麼意思呢？

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就是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因而就是免除復辟企圖的完全保障，因為稍微嚴重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各國工人對我國革命的支援，尤其是這些工人的勝利，即使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是完全保障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是保證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

列寧說：『當我們蘇維埃共和國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個孤立邊區的時候，就因為……各種各樣的危險已經消失，那是非常可笑的妄想和空想。當然，只要這些根本的對立性存在，危險也就存在，你也就無法躲避這些危險。』（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六二頁）

其次：

『我們不僅生活在一個國家裏，而且生活在許多國家組成的體系裏，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見『列寧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八頁）

正因爲如此，列寧說：

『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靠各國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後地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頁）

關於第二種矛盾就是如此。

第一種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努力來克服的，第二種矛盾却需要幾個國家無產者的努力才能解決，——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爲一談，誰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

今年一月有位同志寄給我一封信，談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這封信可以作爲這種糊塗思想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困惑地寫道：

『你說，列寧主義理論……就是社會主義能够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很遺憾，我在列寧著作中有關的地方沒有找到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指示。』

當然，糟糕的不是這位同志（我認爲他是我們青年學生中一位優秀的同志）『在列寧著作中有關的地方沒有找到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指示』。他總有一天會找到和讀到這種指示的。糟糕的是他把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混爲一談，結果就糾纏在這種糊塗思想裏。我不妨把我對這位同志的來信的答覆告訴你們。我的答覆如下：

『那裏指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而是社會主義的一般勝利，就是說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奪取政權，打退帝國主義的進攻，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這一切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

階級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復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過「幾個國家的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如果確信勝利了的俄國無產階級在其他國家的無產者公開的同情之下，在沒有幾個國家獲得勝利的情況下，「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那末在俄國發動十月革命就是愚蠢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最普通的機會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隨便叫什麼都可以。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論是正確的，那末伊里奇的下面這個論點便是不對的：我們一定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我們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①（見『論合作制』）……

我們政治實踐中最危險的就是：企圖把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國家看做一種被動的東西，以為它在沒有得到其他國家勝利了的無產者的援助時只能在原地踏步。假定在俄國蘇維埃制度建立以後五年到十年內西方還沒有爆發革命，假定我們共和國在這個時期內仍然作爲一個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蘇維埃共和國存在，那末你是否認爲我們國家在這五年到十年內只去幹些搗水勾當，而不去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呢？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了解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勝利的理論的全部危險性。

這是不是說，這個勝利是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因爲只要資本主義

① 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包圍還存在，就隨時有受軍事干涉的危險。」（一九二五年一月）
從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有名決議看來，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命運問題就是這樣。

五 黨在農村中的政策

現在來談第五類問題。

在談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黨在農村中的政策的決議以前，我想簡單地談一談資產階級報刊因我們黨批評我們自己在農村中的缺點而發出的叫囂。資產階級報刊吵吵嚷嚷，要所有的人都相信：我們公開批評自己的缺點是蘇維埃政權軟弱的標誌，是蘇維埃政權分崩離析的標誌。不用說，所有這些叫囂完全是捏造和欺騙。

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堅強的標誌，而不是我們黨軟弱的標誌。只有深入生活的和走向勝利的強有力的政黨才敢當着全體人民的面對自身的缺點進行無情的批評，過去這樣，將來也永遠是這樣。對人民掩蓋真相的政黨，害怕陽光和批評的政黨，並不是政黨，而是一個註定要滅亡的騙子集團。資產者老爺們用自己的尺度來衡量我們。他們害怕陽光並且竭力對人民隱瞞真相，用粉飾太平的辦法來掩蓋自己的缺點。因此，他們以為我們共產黨人也一定會對人民隱瞞真相。他們所以害怕陽光，是因為只要他們進行比較認真的自我批評，只要他們對自身的缺點進行比較自由的批評，資本主義制度就

會徹底崩潰。因此，他們以為只要我們共產黨人進行自我批評，那就是我們被圍困和無立足之地的標誌。他們這些可敬的資產者和社會民主黨人正是用自己的尺度來衡量我們的。只有後退的和註定滅亡的政黨才會害怕陽光和批評。我們既不害怕這個，也不害怕那個，我們所以不害怕，是因為我們是上升的政黨，是走向勝利的政黨。正因為如此，已經進行了幾個月自我批評是我們黨極度堅強的標誌，而不是我們黨軟弱的標誌；它是鞏固我們黨的手段，而不是瓦解我們黨的手段。

現在來談談黨在農村中的政策問題。

在國內和國際的新形勢下，在農村中可以指出哪些新的因素呢？

我認為可以指出四件主要的事實：

(一) 國際形勢的變化和革命速度的緩慢要求選擇一條痛苦最少的、哪怕是漫長的道路，來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來和農民一道建設社會主義；

(二) 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的分化過程要求肅清農村中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

(三) 農民的政治積極性要求改變農村中舊的領導方法和行政管理方法；

(四) 蘇維埃的改選暴露出一件無可置疑的事實，就是在我國許多地區內中農站[•]在富農方面[•]反對貧農[•]。

根據這些新的事實，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有些同志根據農村分化這一事實得出結論說，黨的基本任務就是挑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這種

說法是不對的。這是無謂的空談。這不是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這是重彈孟什維克舊百科全書中的孟什維克老調。

現在主要的問題完全不是挑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現在主要的問題是：使中農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重新把他們爭取過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和基本農民羣衆結合起來，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並和這些基本羣衆一道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主要的問題是：和農民一道，一定要和農民一道建設社會主義，同時一定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因為工人階級的領導是使建設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基本保障。

這就是黨現在的基本任務。

不妨回憶一下伊里奇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關於這一點所說的直到現在還完全有效的幾句話：

「全部關鍵在於，現在要同無比廣大的羣衆，即同農民一道前進。」（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八九頁）

其次：

『同農民羣衆，同普通的勞動農民結合起來，並開始前進，其速度雖比我們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極點，但整個羣衆却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那末到時候，我們的前進就會加快到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速度。』（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八頁）

因此我們在農村中有兩項基本任務。

第一、必須把農民經濟納入蘇維埃經濟發展的總體系。從前我們有兩個平行的過程：城市走城市的路；農村走農村的路。資本家竭力把農民經濟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體系。但這是通過農民羣衆貧困和農民中的上層發財致富而實現的。大家知道，這條道路孕育着革命。在無產階級勝利以後，把農民經濟納入蘇維埃經濟發展的總體系，是爲了創造條件以便能够在逐步地而又不斷地提高大多數農民的物質福利的基礎上，就是說在跟革命前資本家引導和邀請農民所走的道路相反的道路上把國民經濟向前推進。

但是，怎樣把農民經濟納入經濟建設體系呢？通過合作社。通過信用合作社、農業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工藝合作社。

通過這些道路，農民經濟一定會緩慢地然而徹底地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總體系。

第二項任務是：逐步地而又不斷地實現消滅農村中舊的行政管理方法和領導方法的路綫，實現活躍蘇維埃的路綫，使蘇維埃成爲真正的選舉機關的路綫以及在農村中確立蘇維埃民主制的原則的路綫。伊里奇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大多數勞動者的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伊里奇說過，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只有在我們有可能鞏固這個政權以後，民主制的這種最高形式才能實現。可見，這個鞏固蘇維埃政權和確立蘇維埃民主制的時期已經開始。我們應當謹慎小心地沿着這條道路前進，不要性急，我們應當在工作的進程中，在黨的周圍培養出大批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

如果第一項任務，即把農民經濟納入經濟建設總體系的任務，使我們能够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把農民和無產階級套在一輛馬車上，那末第二項任務，即在農村中確立蘇維埃民主制和活躍蘇維埃的任務，就一定會使我們有可能改建我們的國家機關，使它和人民羣衆聯系起來，使它成爲健全的、真實的、樸素的和節約的機關，以便創造易於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

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就我們黨在農村中的政策問題所通過的決議的基本路線就是如此。因此，黨在農村中的領導方法也就應當有所改變。

我們黨內有人斷言，既然有新經濟政策，既然資本主義開始暫時穩定，那末我們的任務就是在黨內和國家機關內實行最大限度的壓制政策，把周圍的一切壓得透不過氣來。我必須說，這種政策是不正確的和有致命危險的。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最大限度的壓制，而是在政治方面和組織方面的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即在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方面的最大限度的靈活性。不然，在當前複雜的情況下我們就會掌不住舵。我們所以需要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是爲了使黨能掌住舵，保證黨實現全面的領導。

其次，必須使農村中的共產黨員放棄畸形的行政管理方式。決不能只對農民發號施令。應當學會耐心地對農民解釋，他們所不了解的問題，應當學會說服農民，在這方面不要吝惜時間和精力。像我們某些鄉執行委員會主席那樣常常只是發號施令，這當然要容易得多，簡單得多。但是簡單的容易做

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好事情。不久以前有一位鄉支部書記在回答省委員會代表所提出的關於該鄉沒有報紙的問題時說：「我們幹嗎要報紙呢？沒有報紙倒安靜些，好些，不然，農夫們一讀報就會提出種種問題，那簡直麻煩透了。」這位書記也算共產黨員！幾乎用不着證明，這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一種不幸。問題在於：現在要進行領導，沒有「麻煩」是絕對不可能的，更不必說沒有報紙了。這個簡單的真理我們必須了解和領會，如果我們願意黨和蘇維埃政權保持住農村中的領導的話。

其次，現在要進行領導，就必須善於經營管理，必須懂得和理解經濟。現在只是高談「世界政治」，高談張伯倫和麥克唐納，是不會有什麼成就的。我們已經進入經濟建設時期。因此，只有通曉經濟的人，只有善於在經濟發展方面向農夫提出有益意見的人，只有善於幫助農夫進行經濟建設的人，才能做領導工作。研究經濟，和經濟結合，深入到經濟建設中的各項細節中去，——這就是農村中共產黨員現在的任務。不這樣做，連夢想領導也不可能。

現在不能按照舊方式進行領導了，因為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已經提高，必須使這種積極性以蘇維埃的形式表現出來，使這種積極性通過蘇維埃，而不是繞過蘇維埃。誰能在農村中活躍蘇維埃和在黨的周圍培養農民積極分子，誰就能做領導工作。

現在不能按照舊方式進行領導了，因為農村中的經營積極性已經提高，必須使這種積極性以合作社的形式表現出來，使這種積極性通過合作社，而不是繞過合作社。誰能在農村中開展合作社運動，誰就能做領導工作。

農村中黨的領導的具體任務大體上就是這些。

六 關於金屬工業

現在來談最後一類問題，這些問題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已經討論過了。

我們經濟領導方面的新的特殊的情況是什麼呢？

新的特殊的情況就是：我們的經濟計劃已經開始落後於我們經濟的實際發展，我們的經濟計劃訂得太低，因此它們常常趕不上經濟的實際發展。

我們的國家預算就是這件事實的一個明顯表現。你們知道，由於我們的預算草案沒有估計到我們預算的收入項目的迅速增多，我們會不得不在半年內三次更改我們的國家預算。換句話說，我們的預算草案和我們的預算計劃趕不上國家收入的增多，因此國庫中有了剩餘。這就是說，我國經濟生活的洪流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向前奔騰，把我們財政專家的一切科學計劃都沖垮了。這就是說，我們正處於經濟和勞動熱情的蓬勃高漲中，這種情況和內戰後的美國比起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國金屬工業的發展可以認為是我國經濟生活中這種新情況的最明顯表現。去年金屬的產值為一億九千一百萬戰前盧布。去年十一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年度計劃的預計產值為二億七千三百萬戰前盧布。今年一月，由於這個計劃和金屬工業的實際發展速度不相適應，因而修改了一下，

把產值提高到三億一千七百萬盧布。今年四月，這個擴大的計劃又不切實際了，因此不得不把預計產值提高到三億五千萬盧布。現在有人告訴我們說：連這個計劃也低了，因為還必須進一步擴大這個計劃，使預計產值達到三億六千萬至三億七千萬盧布。

換句話說，今年金屬工業的產值比去年產值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更不用說我們輕工業的巨大發展以及運輸業和燃料工業等等的發展了。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說明在建立作為社會主義主要基礎的工業方面，我們已經走上了廣闊的發展道路。至於說到作為全部工業的基本動力的金屬工業，那末停滯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的金屬工業是有蓬勃發展和欣欣向榮的一切條件的。捷爾任斯基同志說得對，我國能夠而且應當成為金屬國家。

幾乎用不着再證明，這個事實無論對我國內部的發展或對國際革命，都有巨大的意義。

毫無疑問，從內部發展方面來看，我國金屬工業的發展及其發展的意義是巨大的，因為它意味着我國全部工業的發展，意味着我國整個經濟的發展，因為金屬工業是全部工業的主要基礎，因為如果沒有金屬工業的蓬勃發展，輕工業、運輸業、燃料工業、電氣化或是農業就都不能立足。金屬工業的發展是全部工業發展的基礎，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

請聽列寧關於『重工業』（列寧主要是指金屬工業）所說的話吧：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業的豐收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的情況良好也還

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而要使重工業情況良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努力。」

還有：

「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國家。」（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至於我國金屬工業發展的國際意義，可以說是不可估量的。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金屬工業的蓬勃發展，如果不是直接證明無產階級不但能够破壞舊東西而且能够建設新東西，不是直接證明無產階級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建成新工業和建成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那又是表明什麼呢？用事實而不是用書本上的東西來證明這一點，這就等於有把握地徹底地把國際革命事業向前推進。西歐工人紛紛來我國訪問並不是偶然的。這對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有極偉大的鼓動意義和實踐意義。工人們到我國來，考察我們工廠的每個角落，——這種情況說明，他們不相信書本，而想用親身的體驗證實無產階級有建設新工業和創造新社會的本領。你們可以深信，一旦他們證實這一點，國際革命事業就會一日千里地向前進。

列寧說：「現在，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去影響國際革命。世界各國所有的勞動者毫無例外地（絕非誇大）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規模的鬥爭已轉到這個戰場上來了。我們一旦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我們就一定會最終地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對於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這條戰綫上，我們應當以緩慢的、逐步的——求速是

不行的——而又是不斷的上升和前進去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頁）

我們全部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金屬工業的發展的國際意義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大約有四百萬工業無產者。這個數目當然很小，但畢竟還是一種力量，可以用來建設社會主義和建立起我國的國防，使無產階級的敵人發抖。然而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停留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有二千五百萬到兩千萬工業無產者，我們要使我國各主要地區電氣化，我們要有合作化的農業和高度發達的金屬工業。到那時我們就不怕任何危險了。到那時我們就一定會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

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歷史意義正是在於：它明確地指出了走向這個偉大目標的道路。

這條道路是正確的，因為它是列寧的道路，是使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的道路。

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大體上就是這樣。

載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和十三日

『真理報』第一〇六號和第一〇七號

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學生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首先讓我向你們祝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建校四周年紀念。不用說，我祝你們的大學在爲東方培養共產主義幹部的艱難的道路上獲得各種成就。

現在我們來談談本題。

如果分析一下東方勞動者大學的成分，那就不能不發覺這個成分的某種兩重性。這個大學裏有不下五十個東方民族和民族集團的代表。這個大學的學生都是東方的兒女。但是這個定義還沒有提供任何明確而完整的概念。因爲這個大學的學生是由代表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條件的兩個基本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是從蘇維埃東方，從不再有資產階級政權、已經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並且已經由工人執政的那些國家來的。第二部分學生是從殖民地、和附屬國來的，也就是從資本主義仍在統治、帝國主義壓迫尙完全保存、還必須趕走帝國主義者以爭取獨立的那些國家來的。

這樣，在我們面前就有兩個過着不同生活並且在不同條件下發展着的東方。

不用說，學生成分的這種兩重性不能不影響東方勞動者大學的工作。這恰恰說明這個大學的一隻腳是踏在蘇維埃的土地上，另一隻腳是踏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土地上。

因此，這個大學有兩個工作方針：一個方針就是造就能為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需要服務的幹部；另一個方針就是造就能為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勞動羣衆的革命要求服務的幹部。

因此在東方勞動者大學面前也就產生了兩類任務。

現在讓我們來分別地考察一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這兩類任務。

一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對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所擔負的任務

這些國家，這些共和國的存在和發展不同於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這些共和國已經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

第二、它們是作為不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保護而受蘇維埃政權保護的民族在發展着和鞏固着。這是史無前例的事實，但這畢竟是事實。

第三、它們的工業不大發達，但是它們在自己的發展中完全可以依靠蘇聯工業無產階級的援助。

第四、這些共和國已經擺脫了殖民壓迫，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保護，並且成爲蘇維埃聯盟的成

員，因此它們可以而且應當參加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基本任務就是：促進這些共和國的工人和農民參加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根據這些共和國存在的特殊條件，創造和發展能夠推進並且加速這一工作的前提。

因此，蘇維埃東方的積極工作者的當前任務就是：

(一) 在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內建立工業基地，以作為把農民團結在工人階級周圍的基礎。你們知道，這項工作已經開始進行，並且將隨着蘇聯經濟的發展而向前推進。這些共和國擁有各種原料，這是這項工作將來可以進行到底的保證。

(二) 發展農業，首先是興修水利。你們知道，這項工作也有進展，至少在南高加索和土爾克斯坦是如此。

(三) 開展和推進農民和手工業者廣大羣衆的合作化工作，這是把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納入蘇維埃經濟建設總體系的最可靠的方法。

(四) 使蘇維埃接近羣衆，使蘇維埃的成分民族化，從而建立接近勞動羣衆並為他們所理解的本民族的蘇維埃國家制度。

(五) 發展民族文化，廣泛地建立使用本族語言的普通教育性質的和職業技術性質的訓練班網和學校網，以便從本地人中間培養蘇維埃幹部、黨的幹部和有專長的經濟幹部。

完成這些任務，也就是促進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有人在談論蘇維埃東方的模範共和國。什麼是模範共和國呢？模範共和國就是能真心誠意地完成這幾項任務，從而使鄰近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工人農民熱中於解放運動的共和國。

上面我已經談過使蘇維埃接近各民族的勞動羣衆的問題即蘇維埃民族化的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種接近怎樣在實踐中表現出來呢？我認爲，不久前在土爾克斯坦完成的民族疆界的劃分⁽²⁷⁾，可以說是這種接近羣衆的範例。資產階級報刊認爲這種疆界劃分是『布爾什維克的詭計』。其實很明顯，這裏表現出來的不是『詭計』，而是土爾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人民羣衆的強烈願望，他們要求有接近他們並爲他們所理解的自己的政權機關。在革命以前的時代，這兩個國家被分裂成許多小塊，建立了好多個不同的大小國家，成爲『當權者』實行剝削詭計的方便場所。現在時機到了，現在已經有可能把這些被分裂的小塊重新聯合成獨立的國家，使烏茲別克斯坦和土爾克斯坦的勞動羣衆和政權機關接近並且打成一片。土爾克斯坦的疆界劃分首先表明這兩個國家的分裂部分重新聯合成獨立的國家。既然這些國家後來願意加入蘇維埃聯盟而作爲它的平等的一員，那末這只是說明布爾什維克找到了一把能滿足東方人民羣衆強烈願望的鑰匙，說明蘇維埃聯盟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同民族勞動羣衆的自願聯合。資產階級爲了使波蘭重新統一，進行了許多次戰爭。而共產黨人爲了使土爾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重新聯合，却只進行了幾個月解釋性的宣傳工作。

這就說明應當怎樣使管理機關（這裏指的是蘇維埃）和不同民族的廣大勞動羣衆接近。這就證明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其次，我講過關於提高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民族文化問題。什麼是民族文化呢？怎樣把民族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結合起來呢？難道列寧不是在戰爭以前就說過我們這裏有兩種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並且說民族文化這個口號是力圖用民族主義毒素來毒化勞動者意識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口號嗎？〔三〕怎樣把民族文化的建設，把增設使用本族語言的學校和訓練班的工作以及從本地人中間培養幹部的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無產階級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呢？這裏有沒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呢？當然沒有！我們在建設無產階級文化。這是完全對的。但是社會主義內容的無產階級文化，在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不同的民族當中，依照不同的語言、生活方式等等，而採取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方法，這同樣也是對的。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全人類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並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賦予它內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無產階級文化，而是賦予它形式。當資產階級執政的時候，當各民族在資本主義制度保護下鞏固起來的時候，民族文化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當無產階級執政的時候，當各民族在蘇維埃政權保護下鞏固起來的時候，民族文化這個口號就成了無產階級的口號。誰不了解這兩種不同情況的原則性的差別，誰就永遠不會了解列寧主義，也永遠不會了解民族問題的實質。

人們（例如考茨基）談論在社會主義時期隨着一切語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統一的全人類的語言。我不大相信這個無所不包的統一語言的理論。無論如何，經驗不是證實而是推翻了這種理論。直到現在，情形是這樣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語言的數目，因為它震動了人類的最下層，

把他們推上政治舞台，喚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許多新的民族去追求新的生活。誰能想到過去的沙皇俄國是一個至少有五十個民族和民族集團的國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斷了舊的鎖鍊，把許多被遺忘了的民族和部族推上舞台，給了他們新的生活和新的發展。現在大家都說印度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但是幾乎用不着懷疑，一旦在印度發生革命震動，就一定會有幾十個早先大家不知道的、有自己的獨特語言和獨特文化的民族出現在舞台上。如果談到各民族參加發展無產階級文化，那末這種參加一定會採取符合這些民族的語言和生活方式的形式，這一點也幾乎用不着懷疑。

不久以前我接到幾位布里亞特同志的來信，他們要求我說明一下全人類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關係方面的一些重大而困難的問題。這封信寫道：

「我們懇切地請你說明下面幾個我們感到非常重大和困難的問題。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創立統一的全人類文化。怎樣設想通過在我們各個自治共和國領域內發展起來的民族文化向統一的全人類文化過渡呢？各個民族的文化（語言等等）的特點怎樣才能同化呢？」

我認爲以上所說的可以作爲對布里亞特同志所渴望解決的問題的答覆。

布里亞特同志提出在創立全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的過程中個別民族的同化問題。毫無疑問，有些民族可能會經受到、恐怕一定要經受到同化過程。這樣的過程從前是有過的。但是問題在於，一些民族的同化過程並不排斥許多有生氣的和正在發展的民族的強盛和發展這一相反的過程，而是以這一過程爲前提，因爲個別民族的局部同化過程是各民族一般發展過程的結果。正因爲如此，某些民族

可能發生的同化就不會削弱而會證實下面這個完全正確的論點：全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爲前提並且滋養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實和豐富全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一樣。

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積極工作者的當前任務大體上就是這樣。

這些任務的性質和內容就是這樣。

必須利用已經到來的加緊進行經濟建設和對農民實行新的讓步的時期，來加速完成這些任務，從而促進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這些共和國多半是農民國家）參加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有人說，黨對農民的新政策既然實行了許多新的讓步（短期租佃、容許僱傭勞動），那末它就會有若干退却的因素。這種說法對不對呢？對。但是，這是在黨和蘇維埃政權保持巨大的優勢的條件下所容許的一些退却因素。穩定的通貨、日益發展的工業、日益發展的運輸業、日益鞏固的信貸系統（依靠信貸系統，通過優惠信貸，可以使任何居民階層破產或提到較高的階段而不發生絲毫震動），——這一切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手中的後備力量，有了這些後備力量，戰綫上某一地段的若干退却因素就只能促進全綫的進攻準備。正因為如此，黨對農民實行的一些新的讓步在目前一定不會阻礙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反而會促進這一事業。

這種情況對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有什麼意義呢？它只能有這樣的意義，就是它給這些共和國的積極工作者一種新的武器，這種武器能促進和加速這些國家同蘇維埃經濟發展總體系的結合。

黨在農村中的政策和蘇維埃東方積極工作者當前民族任務之間的聯系就是這樣。

因此，東方民族大學對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所負擔的任務就是：為這些共和國培養幹部，以保證上述各項當前任務的完成。

東方民族大學不能脫離生活。它不是也不可能超越生活的機關。它應當使自己和實際生活緊密地聯系起來。因此，它不能撇開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當前任務。正因為如此，東方民族大學的任務就是：在為這些共和國培養適當的幹部的時候要考慮到它們的當前任務。

在這裏，必須注意到在蘇維埃東方積極工作者的實踐中所存在的兩種傾向。為了給蘇維埃東方培養真正的幹部和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須在這個大學內同這兩種傾向作鬥爭。

第一種傾向就是簡單化，就是把我在上面所說的那些任務簡單化，企圖機械地搬用在蘇聯中央地區完全可以理解而且適用，但是完全不適合所謂邊疆地區的發展條件的一套經濟建設辦法。有這種傾向的同志不懂得兩個道理。他們不懂得中央地區和『邊疆地區』的條件是不一樣的，而且是相差很遠的。此外，他們還不懂得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處於民族形成的高級階段，徹岑和卡巴爾達處於民族形成的低級階段，而柯爾克茲則處於這兩個極端的中間。這些同志不懂得，如果不適應當地的條件，不周密地考慮每個國家的各種特點，就辦不成任何重大的事情。這種傾向的後果就是脫離羣衆，蛻化成左派清談家。東方民族大學的任務就是：用這種簡單化作不調和的鬥爭的精神來教育幹部。

第二種傾向恰恰相反，是誇大地方的特點，忘記了把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同蘇聯工業區聯系起來的那些共同的和主要的東西，漠視社會主義的任務，遷就狹隘的有局限性的民族主義的任務。有這種傾向的同志很少關心自己國內的建設，而寧可聽其自然發展。在他們看來，主要的不是國內建設，而是「對外」政策，是擴大自己共和國的疆界，同周圍的各共和國爭執，希圖奪取鄰國一小塊土地以取悅於本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這種傾向的後果就是脫離社會主義，蛻化成普通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東方民族大學的任務就是：用和這種隱蔽的民族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的精神來教育幹部。這就是東方民族大學對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所擔負的任務。

二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對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國所擔負的任務

現在來談第二個問題，即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對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國所擔負的任務問題。

這些國家的存在和發展不同於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這些國家是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生存着和發展着。

第二、雙重壓迫即內部壓迫（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外部壓迫（外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

迫)的存在使這些國家的革命危機尖銳化和深刻化。

第三、在這些國家中，有的國家，如印度，資本主義在迅速地發展着，因而產生和形成了人數相當多的本國無產階級。

第四、隨着革命運動的發展，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分裂成兩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妥協部分（大資產階級），前者繼續進行革命鬥爭，後者則和帝國主義結成聯盟。

第五、除帝國主義聯盟外，在這些國家中還形成了另一種聯盟，即工人和革命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以擺脫帝國主義而謀求徹底解放為目的的反帝國主義的聯盟。

第六、這些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以及使人民羣衆擺脫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問題，愈來愈帶有迫切的性質。

第七、這種情況大大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同西方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結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一)不取得革命的勝利，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就不可能擺脫帝國主義而獲得解放，因為獨立是不會無代價地得到的。

(二)不孤立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不使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擺脫這個資產階級的影響，不實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政策，不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組織成獨立的共產黨，革命就不可能向前推

進，資本主義發達的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就不可能爭得完全的獨立。

(二) 沒有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運動和西方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結合，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就不可能取得鞏固的勝利。

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根據這些結論來進行革命工作。

在這些情況下，各殖民地和附屬國革命運動的當前任務是什麼呢？

目前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特點就是：天地間不再有統一的和無所不包的殖民地東方了。從前人們把殖民地東方看成是一個統一的和同一式樣的整體。現在這種看法已經不符合實際情況了。現在至少有三類殖民地和附屬國。第一類是像摩洛哥這樣的國家，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工業完全不發達。第二類是像中國和埃及這樣的國家，工業不大發達，有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第三類是像印度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比較發達，國內有人數較多的無產階級。

很明顯，決不能把所有這些國家混為一談。

在摩洛哥這類國家中，民族資產階級還不具備分裂為革命派和妥協派的基礎。對於這類國家，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採取一切辦法來建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綫。在這類國家中，共產主義者只有在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進程中，特別是在對帝國主義進行勝利的革命鬥爭以後，才能結成統一的政黨。

在埃及或中國這類國家中，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協派，但是資產階級的妥協部

分還不會和帝國主義聯合一起，在這類國家中，共產黨人已經不能以建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綫爲目的。在這類國家中，共產黨人應當從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政策。在這類國家中，這一聯盟可以採取統一政黨的形式即工農政黨的形式，但是要使這個獨特的政黨實際上成爲兩種力量的聯盟即共產黨和革命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聯盟。這個聯盟的任務是：揭穿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同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如果這種兩重成分的政黨不束縛共產黨的手脚，不限制共產黨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的自由，不妨礙把無產者團結在共產黨周圍，並且能使共產黨便於對革命運動進行實際領導，那它就是需要的和適當的。如果這種兩重成分的政黨不符合這一切條件，那它就是不需要的和不適當的，因爲它只會使共產主義者融化在資產階級中間，使共產黨失去無產階級大軍。

像印度這類國家的情況就有些不同。像印度這樣的殖民地，基本的和新的情況不但在於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協派，而且首先在於這個階級的妥協部分基本上已經和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這部分資產階級最富裕，最有勢力，他們害怕革命比害怕帝國主義更厲害，關心自己的錢袋比關心自己祖國的利益更多，因此他們的兩隻腳都站在革命的死敵的陣營中，和帝國主義結成聯盟來反對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不摧毀這個聯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但是要摧毀這個聯盟，就必須集中火力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揭穿他們的背叛行爲，使勞動羣衆擺脫他們的影響，並且要不斷地爲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準備必要的條件。換句話說，問題是要在像印度這樣的殖民地培養無產

階級去擔當解放運動的領袖，一步一步地把資產階級和它的代言人從這個光榮的崗位上擠下去。任務就是建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並且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這個聯盟可以採取表面上由統一的綱領聯系起來的統一的工農政黨的形式，但不是永遠必須採取這種形式。在這類國家中，維護共產黨的獨立性應當是先進的共產主義者的基本口號，因為只有共產黨才能為無產階級領導權準備條件並實現這一領導權。但是共產黨可以而且應當和資產階級的革命的一翼建立公開的聯盟，以便孤立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城鄉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羣衆去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

因此，資本主義發達的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革命運動的當前任務是：

- (一) 把工人階級中的優秀分子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並且建立獨立的共產黨。
- (二) 建立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民族革命聯盟以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聯盟。

(三) 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

(四) 為使城鄉小資產階級擺脫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而鬥爭。

(五) 保證解放運動同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結合。

這就是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積極工作者的三類當前任務。

如果就目前國際形勢來考察這些任務，那末它們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和特別重要的意義。當前國際形勢的特徵是：革命運動已經進入了暫時的平靜時期。什麼是平靜呢？目前它能說明什麼呢？它

只能說明對西方工人、對東方殖民地、而首先是對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旗手蘇聯的壓力的加強。幾乎用不着懷疑，對蘇聯施加壓力的準備工作已經在帝國主義者中間開始了。因愛沙尼亞的起義^(三)而進行誣衊性的宣傳，因索非亞爆炸事件而無恥地攻擊蘇聯，資產階級報刊的一致攻擊我國，——這一切都是進攻的準備階段。這是輿論上的砲火準備，其目的是訓練庸人來攻擊蘇聯並且替武裝干涉創造道義上的前提。這種造謠誣衊性的宣傳的效果如何，帝國主義者不會冒險實行大規模的進攻，——這我們還要看一看。但是這些攻擊註定對於殖民地不會有什麼好處，這一點恐怕是沒有理由懷疑的。因此，準備革命的聯合力量去反擊可能來自帝國主義方面的打擊，這是當前必然產生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堅決完成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革命運動的當前任務，在目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這種種情況下，東方民族大學對殖民地和附屬國所負的使命是什麼呢？這個使命就是：考慮這些國家革命發展的一切特點，培養來自這些國家的幹部，以便保證上述各項當前任務的完成。

東方民族大學的學生大約分為十個不同的班，他們來自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大家知道，這些同志渴望光明和知識。東方民族大學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同志造就成真正的革命者，造就成由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起來的、具有列寧主義的實際經驗的、能够真心誠意地完成殖民地和附屬國解放運動的當前任務的革命者。

在這裏，必須注意到在殖民地東方的積極工作者的實踐中所存在的兩種傾向。爲了培養真正的革命幹部，必須同這兩種傾向作鬥爭。

第一種傾向就是過低估計殖民地和附屬國解放運動的革命可能性，過高估計在這些國家建立無所不包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思想，而不考慮這些國家的狀況和發展程度。這是一種右的傾向，它包藏着降低革命運動的作用，使共產主義者的歌聲融和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大合唱裏的危險。同這種傾向作堅決鬥爭是東方民族大學的直接義務。

第二種傾向就是過高估計解放運動的革命可能性和過低估計工人階級和革命資產階級的反帝國主義聯盟的工作。爪哇的共產黨人似乎有這種傾向，他們在不久以前錯誤地提出了在本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是一種左的傾向，它包藏着脫離羣衆，使共產黨變成宗派的危險。同這種傾向作堅決鬥爭是爲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培養真正的革命幹部的必要條件。

東方民族大學對蘇維埃東方和殖民地東方的各族人民所擔負的政治任務大體上就是這樣。我們希望東方民族大學能够光榮地完成這些任務。

載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第一一五號

致『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全體委員

同志們！由於『共青團真理報』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想和你們談一談我們對該報登載的某些文章的初步印象。

(一) 我們認為，在斯捷茨基的『新經濟政策的新階段』的一些文章中，某些地方是會引起疑問的。的確，在這些文章中轉彎抹角地貫穿着『發財吧』的口號。這個口號不是我們的口號，這個口號是不正確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疑問和誤解，在『共青團真理報』的指導性的文章中是不容許有這樣的口號的。我們的口號是社會主義積累。我們正在掃除那些橫在提高農村物質福利道路上的行政障礙。這個措施一定會促使各種積累，無論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積累或社會主義的積累增加起來。但是黨從來也沒有說過要把私人積累當做自己的口號。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和容許私人積累，是爲了便於在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積累的口號。也許我們某些同志認爲這個問題值得爭論。如果是這樣，那就應當說，關於『發財吧』口號的問題才是值得爭論的，應當把贊成這種口號的文章登載出來讓大家爭論。但是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共青團真理報』不是爭論性的刊物，它首先是一種把黨一致公認的口號和論點提供給讀者的正面刊物。

總之，無論從形式上或者從實質上來看，都必須認爲斯捷茨基的文章在這一點上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今後應當慎重一些。

(二) 在斯捷茨基的文章中，有一個地方談到農村中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也是不完全恰當的。從前，說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是可以的。現在，當社會主義發展的因素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已經開始並且在激烈展開的時候，說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才是比較正確的。否則就會造成一種印象，以爲除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條發展道路以外，還有第三條道路。這是不正確的，並且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在斯列普柯夫的「論列寧的遺產」一文中，有一個地方談到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中必須同非黨農民積極分子競爭，我們認爲這也是不正確的。到現在爲止，我們提出的是在黨的周圍培養非黨農民積極分子、教育這種積極分子的問題，這是大家都認爲正確的。現在斯列普柯夫却提出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同那些還必須加以培養的非黨積極分子競爭的新問題。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同我們在活躍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整個運動不相符合的。不應當同這些積極分子競爭，而應當培養和教育他們。

(四) 如果「共青團真理報」建立附刊制度，那是很好的。這種附刊可以採取通俗小冊子的形式，由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負責寫稿，來論述關於共產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十月革命以及關於同城鄉共青團積極分子的實際工作有直接關係的各個經濟部門和管理部門的問題。這種小冊

子形式的附刊以後可以編成一種共青團積極分子小叢書之類的東西，這對教育共青團積極分子不會沒有極重大的意義。

(五) 如果使『共青團真理報』的文章通俗一些，要求寫稿人寫得樸實、簡潔，並且像伊·里·奇那樣盡量不用外來的術語，那是很好的。如果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非用外來語不可，那末可以仍舊用『共青團真理報』附刊的形式附上個外來語小字典，或者至少在文章中做出適當的說明。

約·斯 大林

維·莫洛托夫

安·安得列也夫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於莫斯科

第一次刊印

問題和答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新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說)

同志們！我來回答你們書面提出的問題。我將按照你們問題單上的排列次序來回答問題。你們知道，這些問題一共有十個。

我們從第一個問題談起。

一

如果蘇聯在未來的十年到十五年內得不到西方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支持，那末應當採取什麼辦法和具備什麼條件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結合呢？

我認爲，這個問題包括了你們書面提出的其餘一切問題。所以我的回答將是一般性的，因而遠不是詳盡的。否則在回答其餘問題時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我認爲，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已經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的回答。這些決議指出，對待農民的正確政策就是鞏固結合的基本保證。

什麼是對待農民的正確政策呢？

只有經濟、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保證鞏固結合的若干措施才能組成這種政策。我們先從經濟方面談起。

首先，必須消滅農村中的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其次，必須實行正確的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政策，以保證工業和農業的迅速增長，並且消滅「剪刀差」。此外，必須縮減農業稅的總額，並且逐漸使農業稅由全國總預算的軌道轉到地方預算的軌道上。必須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首先是使他們參加農業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為合作化是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總體系的手段。必須最大限度地供給農村拖拉機，因為這是使農業進行技術革命的手段，也是在農村中創立文化技術基地的方法。最後，必須實行電氣化計劃，因為這是使農村接近城市和消滅城鄉對立的手段。

這就是黨在經濟方面保證城市和農村的結合所應當遵循的途徑。

我希望你們注意農業稅由國家預算的軌道轉到地方預算的問題。這也許會使你們感到奇怪。但是農業稅現在具有並且將來也一直具有地方稅的性質，這是事實。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約兩年以前，農業稅是我們國家預算中的一項主要的或者幾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現在呢？現在它在國家預算中只佔很少一部分了。國家預算現在是二十五億盧布，而農業稅在今年將要提供的和能夠提供的至多不過二億五千萬到二億六千萬盧布，比去年的總數要少一億盧布。可見，這已經不是那麼多了。國家預算愈增多，農業稅在國家預算中所佔的比重就愈縮小。其次，在這二億六千萬農業稅中

有一億盧布正在轉入地方預算。這佔全部農業稅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在現有的切稅收中，農業稅最接近地方條件，最適於用做地方需要。不用懷疑，整個地方預算將日益增加。但是同樣毫無疑問，地方預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適合地方條件的農業稅。國家收入的重心已經轉到並且將要整個轉到他種收入，即國營企業收入和間接稅等方面去，這就更可以肯定的。

正因為如此，農業稅由全國總預算的軌道轉到地方預算的軌道，將來會成爲可能的，從鞏固結合的觀點來看是完全適當的。

現在來談談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證結合的措施。

爲了精簡國家機關並且使它們在精神上健全起來，爲了驅逐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腐化分子，爲了使國家機關徹底接近千百萬羣衆，就應當在城市和農村確立蘇維埃民主制並且活躍蘇維埃，——這就是黨在行政政治建設方面鞏固結合所應當遵循的途徑。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目的本身。專政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手段和道路。什麼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就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向無國家的社會的過渡。但是爲了實現這種過渡，就必須按照能夠真正保證專政的社會變爲共產主義社會的方針和方法，來準備改造國家機關。活躍蘇維埃的口號，在城和農村中確立蘇維埃民主制的口號，吸收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優秀分子直接管理國家的口號，都是爲了這個目的。改善國家機關，認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義分子和腐化分子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

去，使國家機關成爲同廣大羣衆休戚相關的機關，——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羣衆本身對國家機關的經常和積極的幫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農民中的優秀分子到管理機關中來，不建立國家機關同勞動羣衆最「下層」的直接聯系，要得到羣衆積極的和不斷的幫助也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國家機關同資產階級國家機關有什麼區別呢？

區別首先在於：資產階級國家機關是站在羣衆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間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壘，按它的本質來說，是和人民羣衆背道而馳的。而蘇維埃國家機關却是和羣衆打成一片的，因爲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爲蘇維埃國家機關，它就不能而且不應當站在羣衆之上，因爲如果它真正想團結千百萬勞動羣衆，它就不能同這些羣衆背道而馳。這就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同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原則性的區別之一。

列寧在他的「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這本小冊子中曾經說過：二十四萬布爾什維克黨員，無疑是能够管理國家來爲窮人謀福利而反對富人的，因爲他們決不會比過去管理國家來爲富人謀福利而反對窮人的十三萬地主差。有些共產黨員根據這一點就認爲，國家機關只要有幾十萬黨員就夠了，認爲這就足以管理巨大的國家了。因此，他們有時並不反對把黨和國家看做一個東西。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曲解列寧的思想。列寧說到二十四萬布爾什維克黨員時，決不是想說蘇維埃國家機關的人數和總的規模就以此爲限，或者可以以此爲限。恰恰相反，列寧除了把黨員列爲國家機關的人員外，還把在當時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贊成布爾什維克的一百萬人也包括在內，他說，我們

有方法一下子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擴大十倍，就是說，用吸收勞動者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國家機關達到一千萬人。

列寧說：「這二十四萬人現在至少已經擁有一百萬成年人的選票，因為正是黨員數目同黨所擁有的選票數目的這種比例關係，已經由歐洲的經驗和俄國的經驗，譬如說，至少已經由彼得堡杜馬的八月選舉確定了。因此我們的「國家機關」已經有了一百萬人，他們在思想上忠實於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爲了在每月二十日領取一大筆錢。

此外，我們還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們的國家機關擴大十倍的「絕妙的方法」，這種方法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過並且也不可能有的。這個絕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勞動者，吸收貧農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七頁）

但是「吸收勞動者、吸收貧農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這件事情是怎樣進行的呢？

這件事情是通過在蘇維埃、經濟機關、工廠委員會、文化機關、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各種合作組織以及其他等等的周圍所組成的那些羣衆發起的組織、各種委員會、各種會議和代表大會來進行的。我們的同志有時沒有注意到，在我們基層黨組織、蘇維埃機關、文化機關、工會組織、教育機關、共青團組織、軍隊組織、婦女部和其他一切組織的周圍，有大批的擁有千百萬非黨工農羣衆的自發組織、委員會和會議在活動着，它們在自己日常的細小煩瑣的和無聲無臭的工作中建立着蘇維埃的基礎和生活，創造着蘇維埃國家力量的泉源。沒有這些環繞着我們蘇維埃機關和黨機關的擁有千百萬

羣衆的組織，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對巨大國家的領導和管理都是決不可能的。蘇維埃國家機關不僅僅是由蘇維埃組成的。蘇維埃國家機關，就這個詞的深刻意義來說，是由蘇維埃加上擁有千百萬羣衆的各種各樣非黨的和黨的組織組成的，這些組織把蘇維埃同最「下層」結合起來，使國家機關同千百萬羣衆打成一片，並且在逐步消除着國家機關同人民之間的任何類似壁壘的東西。

因此，我們應當竭力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擴大十倍」，使它成爲同千百萬勞動羣衆休戚相關的機關，把官僚主義的殘餘從國家機關中剷除出去，使國家機關同羣衆打成一片，從而準備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活躍蘇維埃和確立蘇維埃民主制的口號的意義和作用。

這就是在黨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鞏固結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

至於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證結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說了，因爲這些措施都很明顯，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釋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時期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綫。這個基本路綫就是要爲在全國即在全蘇聯實行初等普通義務教育準備必要的條件。同志們，這是極重大的改革。實行這種改革，將不僅是文化戰綫上的極偉大的勝利，而且也會是政治戰綫上和經濟戰綫上的極偉大的勝利。這種改革必定成爲國家巨大發展的基礎。但是，實行這種改革要花費幾億盧布。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要實行這種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萬名男女教師的大軍。不管怎樣，如果我們真想使國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們就必須保證在最近時期實行這種改革。同志們，我們一定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不用

懷疑的。

這就是對你們第一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個問題。

二

如果資本主義的穩定長久保持下去，那末這種穩定會產生哪些使我們黨蛻化的危險呢？
一般說來，我們這裏有沒有這些危險呢？

這些可能的甚至是現實的危險無疑是存在的。我們這裏存在的危險是同穩定無關的。穩定僅僅使這些危險更加明顯。這些危險中主要的我認爲有三種：

(甲)我國的建設事業失去社會主義前途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取消主義；

(乙)失去國際革命前途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民族主義；

(丙)降低黨的領導的危險，以及由此可能使黨變成國家機關的附屬品。

我們先從第一種危險談起。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不相信工農聯盟；不相信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不相信『新經濟政策的俄國』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會勝利。

這是取消主義和蛻化的道路，因為它會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礎和目的，會使無產階級國家蛻化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

這種『思想』的來源和它在黨內產生的基礎，是資產階級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我國國民經濟內部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展開殊死鬥爭的條件下對黨的影響的加強。資本主義分子不僅在經濟方面進行鬥爭。他們還竭力把鬥爭轉到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方面，企圖把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懷疑我們建設工作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思想傳染給黨內最不穩定的隊伍，而且不能說，他們的這種努力是絕無成效的。

一些受到傳染的『共產黨員』說：『我們這個落後的國家哪裏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生產力的狀況不允許我們提出這種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馬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們哪能建成社會主義呢，反正就是建設吧，將來自見分曉……』

另外一些人說：『我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實現了十月革命，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國際革命，因為西方無產階級不預先取得勝利，我們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嚴格地說，革命者在俄國已經無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三年，在德國革命爆發的前夕，我國的一部分青年學生準備拋掉書本到德國去，他們說：『革命者在俄國已經無事可做，應當拋掉書本到德國去幹革命。』

可見，這兩類『共產黨員』，無論第一類或者第二類都是站在否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立場上，站在取消主義的立場上。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第一類用『科學的』『生產力論』來掩飾自己

的取消主義（無怪乎前幾天米留可夫讚揚他們，在『最近新聞報』⁽²⁾上稱他們爲「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二類則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關於世界革命的詞句來掩飾自己的取消主義。

事實上，就假定說，革命者在俄國無事可做；假定說，社會主義沒有在其他國家獲得勝利以前，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不能想像和不可能；假定說，社會主義在先進國家的勝利還要延遲十年到二十年，那在這些條件下，能不能設想我們經濟中那些在資本主義包圍我國的情況下活動着的資本主義成分，會同意停止同我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作殊死的鬥爭，並且會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勝利呢？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就能了解這種假定是多麼荒謬了。既然這種假定不能成立，那末我們這些「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還有什麼事情可幹呢？顯然他們只有一件事情可幹，就是開開空車，聽從自發勢力的支配，並且逐漸蛻化成普通的資產階級民主派。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把我們的國家看做無產階級革命的基地，我們擁有像列寧所說的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條件，——那末我們就能够而且應當建設這樣的社會，來完全戰勝我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或者是我們不認爲我們的國家是革命的基地，我們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我們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那末當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的勝利延緩的時候，就應當容許我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佔上風，容許蘇維埃政權瓦解，容許黨蛻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後者。

所以，不相信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會導致取消主義和蛻化。

所以，特別在現在，特別在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情況下，同取消主義的危險作鬥爭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種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相信它會勝利；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抱懷疑態度；不了解我們國家如果沒有其他國家革命運動的支持就不能抵擋住世界帝國主義；不了解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不可能是最後的勝利，因為只要革命還沒有在若干國家裏獲得勝利，它就不可能保證不遭受武裝干涉；不了解國際主義的基本要求，即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發展和支持其他國家革命的手段。

這是民族主義和蛻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的道路，因為患這種病的人，不是把我們的國家看做被稱為世界革命運動的那一整體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這一運動的開始和結束，認為其他一切國家的利益都應當為我們國家的利益而犧牲。

支持中國的解放運動嗎？為什麼呢？不會有危險嗎？這不會使我們同其他國家發生糾紛嗎？我們同其他「先進的」列強一起在中國確定「勢力範圍」，從中國拿到一些有利於自己的東西豈不是更好嗎？這樣做既有好處，又沒有危險……支持德國的解放運動嗎？值得冒險嗎？同意協約國的凡爾賽條約，通過賠款獲得一些利益豈不是更好嗎？……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嗎？值得這樣做嗎？同某些大國恢復「勢力範圍」豈不是更好嗎？如此等等。

這就是企圖取消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和正在培養蛻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義「思想」。

如果說，第一種危險即取消主義危險的根源，是資產階級在對內政策方面，即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鬥爭方面對黨的影響的加強，那末這第二種危險即民族主義危險的根源，應當認為是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即在資產階級國家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鬥爭方面對黨的影響的加強。不用懷疑，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國家的壓力是很大的，我們的外交工作人員不是隨時都能抵擋得住這種壓力的，產生各種糾紛的危險往往引誘人們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義的道路。

從另一方面來看，很明顯，只有在徹底的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的基礎上，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運動旗手的作用，而對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義的道路，則是使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所以，失去國際革命的前途，就會產生民族主義和蛻化的危險。

所以，同對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義危險作鬥爭是黨的當前任務。

最後談談第三種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黨的內部力量；不相信黨的領導；國家機關力圖削弱黨的領導，擺脫黨的領導；不了解沒有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這種危險是從三方面來的。

第一、需要領導的各個階級已經發生變化。現在的工人和農民已經不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工人和農民。在以前，工人階級是喪失階級性的，是散漫的，而農民則是充滿恐懼的，他們唯恐國內戰爭一旦失敗，地主又要回來，而且黨在這個時期是按照軍事方式進行領導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現在我們這裏是另一種情況。戰爭已經沒有了，因而使勞動羣衆集合在黨的周圍的軍事危險也就沒有了。無產階級無論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質方面都已經復原並且提高了。農民也同樣地提高和發展了。這兩個階級的政治積極性正在增長並且會繼續增長。現在按照軍事方式進行領導已經不行了。第一、在領導中必須有最大限度的靈活性。第二、對工人和農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須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須善於把由於工人和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增長而湧現出來的這兩個階級當中的優秀人物吸收到黨內來。但是大家知道，這些條件和品質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黨提出的要求和目前黨所具備的可能性之間產生了不相適應的情況。因此也就產生了削弱黨的領導的危險和失去黨的領導的危險。

第二、在最近時期，即經濟發展時期，國家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各個機關已經大大發展和鞏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貿易機關、信貸機關、行政政治機關、文化教育機關以及各種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幾十萬新的人員，主要是非黨人員，因而大大發展和擴大了。這些機關不僅自己的成員增多了，而且它們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們的作用愈增大，它們對黨的壓力就愈顯著，它們就愈頑強地力圖削弱黨的領導，它們對黨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這些機關內部必須根據能夠保證黨在新環境中的領導這一點來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備領導人員。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

此就產生了國家機關脫離黨的危險。

第三、工作本身複雜化和多樣化了。我指的是現在的建設工作。無論是農村的或是城市的許多工作部門和分部門都複雜化和發展了。因此，領導就更爲具體了。從前通常都講「一般的」領導。現在「一般的」領導就是句空話，因爲這句空話裏並不包含什麼領導內容。現在需要的是具體的和實際的領導。過去一個時期培養了一種自以爲知識廣博、準備解答一切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工作人員。現在這種舊型的自以爲知識廣博的工作人員，應當讓位給竭力要成爲某一工作部門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員了。要真正地實行領導，就應當懂得業務，就應當認真地、耐心地 and 頑強地鑽研業務。不懂得農業，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價格政策，不研究同農村有直接關係的法律，就不能在農村中進行領導。不懂得工業，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傾聽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會和俱樂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進行領導。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這一切呢？很遺憾，不能。要把黨的領導水平提到應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黨的工作人員的水平。現在應當把工作人員的質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黨的工作人員的質量，並不那麼容易。遺憾的是，那種不熟悉業務而急於求成發號施令的舊習慣，依然存在於黨的組織中。正因爲如此，所謂黨的領導有時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誰也不需要命令，退化或不觸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頭上的「領導」。這就是削弱和降低黨的領導的最嚴重危險之一。

失去黨的領導的危險所以會引起黨的瓦解和蛻化的理由，一般說來就是如此。

所以，同這種危險作堅決的鬥爭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

這就是對你們第二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我們來談第三個問題。

三

怎樣同富農進行鬥爭，而又不挑起階級鬥爭呢？

我認爲這個問題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確的。這裏指的是哪一種階級鬥爭呢？如果指的是農村中一般的階級鬥爭，那末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不僅僅是反對富農的。而無產階級和全體農民之間的矛盾，——這難道不是階級鬥爭（雖然這種階級鬥爭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嗎？無產階級和農民現在是我們社會中的兩個基本階級，在這兩個階級之間存在着矛盾，固然，這種矛盾是可以解決的，並且終究是可以克服的，但這畢竟是引起這兩個階級之間鬥爭的矛盾，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認爲，如果指的是城鄉之間，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則我國的階級鬥爭有三條主要的戰綫：

（甲）整個無產階級（以國家爲代表）同農民之間在規定工業品和農產品的最高價格，在使稅收工作正常化等方面的鬥爭戰綫；

（乙）整個無產階級（以國家爲代表）同富農之間在消滅農產品的投機價格，在把稅收負擔的主

要重心轉到富農身上等各方面的鬥爭戰綫；

(丙)貧農，首先是僱農同富農之間的鬥爭戰綫。

你們可以看出，這幾條戰綫無論在它們的比重上，或者在它們那裏所發生的鬥爭的性質上，都不可能是同樣的。因此，我們對待這幾條戰綫上的幾種階級鬥爭的態度，也應當是有區別的、不一樣的。

讓我們再進一步考察一下。

第一條戰綫。無產階級（以國家為代表）考慮到我國工業薄弱和不可能為我國工業獲得借款，規定了許多主要措施，這些措施可以使我國工業免受外國工業競爭的侵襲，並且能夠為了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而加快工業的發展。這些措施就是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制、關於農業稅、關於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形式、關於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貫徹計劃原則的措施。這一切都是以工業的主要部門、運輸業和信貸業的國有化為基礎的。你們知道，這些措施已經收到了應有的效果，就是說既制止了工業品價格的急劇下降，又制止了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從另一方面來說，很明顯，因為全體農民要購買工業品，要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農產品，所以他們總想用盡量低的價格獲得工業品，用盡量高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農產品。同時農民還希望完全沒有農業稅，或者至少把農業稅降到最低限度。這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發生鬥爭的基礎。

國家能不能不採取上述各項主要措施呢？不，不能。因為在目前不採取這些措施就會使我國工

業遭到破壞，使無產階級趨於毀滅，使我國變成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殖民地，使我們的整個革命遭到失敗。

全體農民是不是願意取消我們國家的這些主要措施呢？不，不願意。因為在目前取消這些措施就意味着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勝利，而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是為了一小撮富人即一小撮資本家發財致富而使大多數農民貧困的發展道路。誰敢斷言，農民願意自己貧困，願意把我國變成殖民地，根本不願意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獲得勝利呢？

這就是無產階級同農民之間結成聯盟的基礎。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工業機關依靠壟斷制就可以抬高工業品價格，來損害基本農民羣衆的利益，損害工業本身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政策首先會損害工業本身，使我國工業不可能從昨天溫室裏培養出來的嬌弱植物變成明天應有的堅固強大的工業。由此就產生了降低工業品價格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運動。你們知道，這個運動獲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

此外，這是不是說，我們的收購機關依靠壟斷制，就可以隨意降低農產品的價格，而使農民破產，損害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政策首先會危害工業，因為，第一、它會使對工人的農產品供應發生困難，第二、它會完全瓦解和擾亂我們工業的國內市場。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所謂「剪刀差」的運動。你們知道，這個運動已經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最後，這是不是說，我們的地方機關或者中央機關，依靠農業稅的法律和利用自己徵稅的權力，

就可以把這種法律看做某種絕對的東西，就可以在自己實際工作中搗毀那些力量單薄的納稅者的穀倉，拆掉他們的屋頂，像在唐波夫省某些地區發生過的那樣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政策會破壞農民對無產階級、對國家的一切信任。由此就產生了黨在最近所採取的各項措施：減少農業稅，使這種稅收多少具有地方性，整頓我國的整個稅收工作，消除那種由於徵稅而在某些地方表現出來的粗暴行為。你們知道，這些措施已經產生了預期的效果。

因此，第一、在根本問題上，無產階級同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都願意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獲得勝利。由此就產生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第二、在當前問題上，工人階級同農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產生了這個聯盟內部的鬥爭，這個鬥爭，按其比重來說，是被利益的一致性掩蓋着的，這種鬥爭在將來工人和農民不再是階級的時候，即當他們都變成沒有階級的社會的勞動者的時候，是必然會消失的。第三、我們擁有解決工人階級同農民之間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們是在維護和鞏固工農聯盟的範圍內根據兩個同盟者的利益來解決這些矛盾的。我們不僅擁有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複雜情況下，已經卓有成效地使用了這些方法和手段。

由此能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在這條戰綫上挑起階級鬥爭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竭力設法減弱這條戰綫上的鬥爭，用協商和互相讓步的方法來調節這一鬥爭，並且無論如何不要把它導向尖銳化的形式，導向衝突。我們現在正這樣做。因為我們有這樣做的

一切可能性。因為在這裏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 and 更深刻。

可見，挑起階級鬥爭的口號是完全不適合這條戰綫上的鬥爭情況的。

第二條戰綫。這裏的出場人物是無產階級（以蘇維埃國家為代表）和富農。這裏的階級鬥爭也具有獨特的形式，正像第一條戰綫上的鬥爭情況中階級鬥爭具有獨特的形式一樣。

國家希望使農業稅具有極為明顯的所得稅性質，把這種稅收的主要負擔轉到富農肩上。而富農對這一點却「千方百計地」竭力擺脫，他們利用自己在農村中的一切力量 and 一切影響來把稅收的負擔轉到中農和貧農的肩上去。

國家在制止生活費用上漲 and 竭力保持工資穩定的同時，竭力採取經濟性的措施，規定出完全符合農民經濟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農產品價格。而富農却去收買貧農和中農的農產品，收集了大批存糧，把它們囤積在自己的穀倉裏，而不拿到市場上去，以便人為地抬高農產品的價格，把農產品價格抬高到投機價格，然後才把農產品拿到市場上去榨取投機的暴利。你們也許知道，今年在我國某些省份，富農已經把糧價抬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了。

因此，這條戰綫上的階級鬥爭就具有獨特的和比較隱蔽的形式。

可能有人認為，挑起階級鬥爭的口號是完全適用於這條戰綫上的鬥爭情況的。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這裏我們同樣不願意挑起階級鬥爭。因為在這裏我們完全能夠並且應當避免挑起鬥爭，避免同鬥爭有關的各種糾紛。

我們能够並且應當活躍蘇維埃，在蘇維埃內部爭取中農和組織貧農，以便減輕基本農民羣衆的納稅負擔，而將稅收的主要負擔真正轉到富農的肩上。你們知道，在這方面是採取了一些措施的，這些措施已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們能够並且應當使國家掌握足夠的糧食儲備，爲了對糧食市場施加壓力，必要時加以干涉，爲了保持勞動羣衆所能接受的價格，從而粉碎富農的投機陰謀，這種糧食儲備是必要的。你們知道，我們今年在這方面已經用去幾千萬普特的糧食了。你們應當知道，我們這樣做了以後，已經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們不僅在列寧格勒、莫斯科、頓巴斯、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等等地區保持住了低廉的糧價，而且還迫使許多地區的富農投降，強迫他們把過去的存糧按不高的價格拋到市場上去。

當然，在這裏問題不僅僅取決於我們。在某些情況下，富農自己會挑起階級鬥爭的，他們企圖使階級鬥爭達到沸點，企圖使這種鬥爭採取匪徒騷擾或暴動的形式，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時挑起鬥爭的口號就已經不是我們的口號，而是富農的口號，也就是反革命的口號了。此外，毫無疑問，到那時，富農一定會親身體驗到這一反對蘇維埃國家的口號的一切不利之處了。

可見，在這第二條戰綫上挑起鬥爭的口號，並不是我們的口號。

第三條戰綫。這裏的出場人物是兩種力量：一方面是貧農，而首先是僱農；另一方面是富農。這裏，國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邊的。可見，這一條戰綫並不像前兩條戰綫那樣廣闊。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條戰綫上的階級鬥爭是十分明顯的和公開的，而前兩條戰綫上的階級鬥爭却是被掩蓋的和比較隱

蔽的。

這裏的問題是富農——企業主直接剝削僱傭工人或半僱傭工人。因此黨在這裏不能採取緩和鬥爭、減弱鬥爭的政策。我們在這裏的任務是組織貧農進行反富農的鬥爭並且領導這一鬥爭。

這不是說，我們因此就要挑起階級鬥爭了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挑起鬥爭不僅意味着組織和領導鬥爭。它同時意味着人爲地激起和故意煽動階級鬥爭。現在，當我們有無產階級專政，當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在我們這裏行動完全自由的時候，是不是需要這種人爲的辦法呢？當然不需要。

因此，挑起階級鬥爭的口號也是不適合於這第三條戰綫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如此。

可見，關於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問題並不像初看上去那麼簡單。

現在我們來談第四個問題。

四

工農政府是實際存在着，還是一個鼓動的口號？

我認爲這樣提問題是有些荒謬的。

工農政府是實際存在着，還是一個鼓動的口號，這種提法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僅僅爲了達到不知道爲什麼在這裏稱做『鼓動』的某種狡猾手腕的目的，黨可以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這就

是說，黨可以提出一些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科學根據的口號。這是不是確實的呢？當然不確實。這樣的黨只能存在一個短時期，然後就會像肥皂泡一樣消失掉。如果是這樣，我們的黨就不會是執行科學政策的無產階級政黨，而是一個漂浮在政治事變表面上的泡沫。

我們的政府，按它的性質、綱領和策略來說，是工人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政府。對這一點不應當有任何誤解和懷疑。我們的政府不可能同時有兩個綱領：一個是無產階級的綱領，另一個是別的什麼綱領。它的綱領和它的實際工作都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政府無疑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政府。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政府就不同時是工農政府了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的政府雖然按它的綱領和工作來說，是無產階級的政府，但同時又是工農政府。

爲什麼呢？

因爲在我國的條件下，基本農民羣衆的根本利益是同無產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因爲由於這個緣故，農民的利益就在無產階級的綱領中，即蘇維埃政府的綱領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因爲蘇維埃政府所依靠的是工農聯盟，是在工農這兩個階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建立起來的聯盟。

最後，因爲在政府機關的成員中，在蘇維埃的成員中，除了工人以外，還有在工人領導下和工人

一起反對共同敵人、一起建設新生活的農民。

所以『工農政府』的口號就不是一個空洞的『鼓動』口號，而是在共產主義綱領中具有科學根據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口號。

第四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第五個問題。

五

確·呢·？
某·些·同·志·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解·釋·成·對·農·民·擴·大·民·主·和·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這·種·解·釋·是·否·正·確·呢·？

事實上我們在農村是不是在擴大民主呢？

是的，是在擴大。

這是不是對農民的讓步呢？

當然是的。

這種讓步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限於我國憲法範圍以內？

我認爲這裏的讓步並不很大，它絲毫沒有改變我們的憲法。

既然如此，我們改變的究竟是什麼，讓步到底表現在哪裏呢？

我們改變的是在新的發展條件下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農村工作方法。我們改變的是農村中阻礙結合工作和妨礙黨把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那些已經建立的秩序。

到現在為止，情況是這樣的：在許多地區都是由一小羣人在管理農村，這些人同縣和省的聯系多於同農村居民的聯系。這種情況就使得農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縣裏看，而很少朝下看，朝農村居民看，他們覺得自己不是對農村負責，不是對選民負責，而是對縣和省負責，他們顯然不懂得「上層」和「下層」在這裏是一根鍊條，如果鍊條在下面裂開了，那末整根鍊條就必然散開。結果，一方面是管理者的無人監督、獨斷獨行和任意橫行，另一方面是農村中的不滿和抱怨。現在正在堅決而徹底地消除農村中的這種秩序。

到現在為止，情況是這樣的：在許多地區農村蘇維埃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而是一小羣害怕喪失權力的管理者用許多詭計和壓力來私拉「代表」的一種空洞的公文往返的手續。結果，就會有使蘇維埃從一個同羣衆休戚相關的機關變成一個同羣衆背道而馳的機關的危險，而工人對農民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基礎和堡壘，則有懸在半空中的危險。你們知道，黨因此不得不設法改選了蘇維埃，而改選證明：許多地區的舊的選舉方法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應當消滅這種有害的腐朽透頂的舊方法。現在正在消滅農村中的這種選舉方法。

這就是讓步的基礎，在農村中擴大民主的基礎。

這種讓步不僅是農民需要的，也是無產階級需要的，因為這種讓步加強了無產階級，提高了無產

階級在農村中的威信，鞏固了農民對無產階級的信任。大家知道，讓步和妥協的主要目的，歸根到底就是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

目前這些讓步的界限怎樣呢？

這些讓步的界限已經由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和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見）作了規定。你們知道，這些界限並不很寬，而且只限於我剛才講過的那些範圍。但這還不是說這些界限永久不能改變。恰恰相反，隨着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隨着無產階級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鞏固，隨着西方和東方革命運動的發展，隨着蘇維埃國家國際地位的加強，這些界限無疑是會擴大的。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曾經說過，必須「隨着剝削者反抗的停止，把蘇維埃憲法推廣到全體居民」（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一三〇頁）。可見，這裏所說的把憲法推廣到全體居民，其中也包括資產階級。這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說的話。從那時起到列寧逝世有五年多的時間。可是，列寧在這段時期內一次也沒提到實行這個原理是適當的。爲什麼呢？因爲擴大界限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但是，在蘇維埃國家國內和國際的地位完全鞏固以後，這種時候總會到來的，這一點是用不着懷疑的。

正因爲如此，我們雖然預見到將來要進一步擴大民主，但是我們認爲目前在民主方面的讓步必須限制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和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範圍內。

這些讓步會不會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呢？

不，不會改變。

這些讓步會不會改變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即會不會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呢？

絕對不會，一點也不會。

無產階級專政並沒有被削弱，它只是由於活躍蘇維埃和吸收農民中的優秀分子參加工作而日益鞏固了。由於擴大民主，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不僅保持着，而且還獲得新的力量，在無產階級周圍造成信任的氣氛。要知道，如果就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來說，這就是專政中主要的東西。

有些同志斷定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只限於暴力的概念，這是不正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對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實行領導，是建設比資本主義經濟類型更高的、具有比資本主義經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無產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三）對整個社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無論除去專政的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的危險。只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綜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黨在蘇維埃民主方面的新方針，會不會引起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的某種惡化呢？

不，不會引起的。恰恰相反！新方針只會改善工作，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如果指的是專政體系中的暴力因素，而紅軍是暴力的表現，那末幾乎用不着證明，在農村中確立蘇維埃民主制只會改善紅軍的狀況，把紅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因為我們的軍隊主要是農民。如果指的是專政體系中

的領導因素，那幾乎用不着懷疑，活羅蘇維埃的口號只會使無產階級便於實行這種領導，加強農民對工人階級的信任。如果指的是專政體系中的建設因素，那也幾乎用不着證明，黨的新方針只會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因為它的實施是爲了鞏固結合，而沒有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結論只有一個：在目前情況下，對農民的讓步只會加強無產階級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它絲毫不會改變我國政權的性質。

第五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六個問題。

六

由於資本主義的穩定，我們黨不是已經對共產國際中的右傾實行讓步？如果是這樣，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嗎？

顯然，這裏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指的是聯合什麥拉里同志和薩波托斯基同志的集團去反對該黨的右派分子這件事。

我認爲我們黨對共產國際中的右傾並沒有實行任何讓步。恰恰相反，整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三）是在孤立共產國際中的右派分子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讀一讀共產國際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決議，讀一讀關於布爾什維克化的決議，你們就不難了解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派分子

是共產國際所反對的主要目標。

正因爲如此，決不能說我們黨已經對共產國際中的右傾實行讓步。

嚴格地說，什麥拉里同志和薩波托斯基同志並不是右派。他們並不贊同右派的政綱，即勃留恩派的政綱。確切些說，他們是動搖於列寧主義者和右派之間，帶有動搖到右派方面去的傾向。他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上的表現的特點，就是他們一方面受到我們批評的壓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脅，他們在這一次動搖到我們這方面來了，動搖到列寧主義者方面來了，他們誓與列寧主義者結成反對右派的聯盟了。他們這樣做是好的。但是，同志們是否認爲在動搖分子已經動搖到列寧主義者方面來的時候，在他們已經向列寧主義者讓步而反對右派的時候，我們不應當歡迎他們呢？如果我們中間竟有人不能了解布爾什維克策略的起碼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並且是可悲的。難道實踐不是已經證明共產國際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問題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嗎？難道什麥拉里同志和薩波托斯基同志沒有同列寧主義者站在一個隊伍裏繼續進行反對右派的鬥爭嗎？難道捷克斯洛伐克黨內的勃留恩派不是已經孤立了嗎？

也許有人問：這種情況會不會長久呢？我當然不知道會不會長久，我不做預言。無論如何，很明顯，只要什麥拉里派同右派作鬥爭，就要同什麥拉里派聯合起來，而一旦什麥拉里派改變了現在的立場，那末同他們的聯合就必然會失去效力。但是現在的問題完全不在這裏。現在的問題在於：目前的反對右派的聯合加強了列寧主義者，使他們有領導動搖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在這

裏，而不在于什麥拉里同志和薩波托斯基同志還會發生什麼動搖。

有人以爲列寧主義者對每個左派空談家和神經衰弱者都一定會支持，以爲列寧主義者在任何場合下都是共產主義者中間固定不變的左派。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我們同工人階級的非共產主義政黨比較起來是左派。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像已經死去的帕爾烏斯會一度要求的那樣；一定要『比一切都左些』，而他當時因爲這一點是受到過列寧的嚴厲斥責的。在共產主義者中間，我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們就是列寧主義者。列寧在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時，即在既反對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又反對右傾時，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麼。無怪乎列寧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爲題寫了一本出色的小冊子。

我認爲，如果同志們及時地注意到這後一種情況，就不會向我提出這第六個問題了。

第六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七個問題。

七

由於農村黨組織的薄弱，在農村中有沒有因採取新方針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呢？

有，這種危險是有的。未必用得着懷疑，在活躍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蘇維埃選舉，就意味着地方

上有選舉鼓動的自由。不用說，反蘇維埃分子爲了乘隙再次破壞蘇維埃政權，是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的。因此在農村中就有加劇和形成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庫班、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等地改選前後的種種事實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們許多地區的農村組織的薄弱加劇了這種危險。同樣毫無疑問，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的癩性也促使這一危險加劇起來。

這種危險因何產生，它的根源何在呢？
它的根源至少有兩個。

第一、反蘇維埃分子覺察到最近在農村中發生了某種有利於富農的變動，覺察到許多地區的中農轉到富農方面去了。這一點在改選以前本來就可以猜測到。在改選以後，這種猜測已經成爲無可爭辯的事實。這就是農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的第一個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第二、在許多地區，有人把我們對農民的讓步看做我們軟弱的標誌。這一點在改選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選以後就不容懷疑了。因此農村中的白衛分子發出了「繼續施加壓力！」的叫聲。這就是農村中加劇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的第二個根源，雖然不是那樣重要的根源。

首先，共產黨員應當了解到：在農村中，目前時期是爲爭取中農而鬥爭的時期，把中農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是黨在農村中最重要、最艱巨的任務，不完成這個任務，反蘇維埃鼓動形成的危險就會加劇起來，而黨的新方針就只會對於白衛分子有利。

其次，共產黨員應當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據黨在蘇維埃、合作社、信貸、農業稅、地方預算以及其他

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農爭取過來，使用行政壓力只會損害工作，把事情弄糟，應當通過經濟措施和政治措施來說服中農，使他們相信我們政策的正確性，只有用實例，用示範的方法才能「爭取」他們。

此外，共產黨員應當了解到：實行新方針不是爲了活躍反蘇維埃分子，而是爲了活躍蘇維埃和吸引基本農民羣衆，新方針不是取消同反蘇維埃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而是預定要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如果反蘇維埃分子說：「繼續施加壓力」，如果他們把對農民的讓步看做我們軟弱的標誌，並且利用這些讓步來達到反革命的目的，——那末我們就一定要向他們指出，蘇維埃政權是牢不可破的，並且提醒他們說，監獄早就在等待他們了。

我認爲，我們的這些任務如果能够被領會並且付諸實現，那末農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劇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就一定會徹底剷除。

第七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八個問題。

八

由於非黨分子影響的加強，在蘇維埃裏有沒有形成非黨派別組織的危險呢？

可以說，在一定條件下才有這種危險。如果比較有組織的非黨分子的影響是在共產黨員的影響還沒有進入的地方增長起來，那就沒有什麼危險。例如，城市中的工會和農村中的近乎蘇維埃的非黨

組織的情況就是這樣。只是當非黨的組織開始想以自己來代替黨的時候，這種危險才開始產生。

這種危險是從哪裏來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工人階級中看不到或者幾乎看不到這樣的危險。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在黨的周圍，在工人階級中間，我們有大批非黨工人積極分子，他們對黨充滿信任，並且把黨同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連結在一起。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危險在農民中間特別嚴重。爲什麼呢？因為黨在農民中間很薄弱，黨還沒有大批的能夠把黨同數千萬農民連結在一起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農民中間那樣迫切需要非黨積極分子。

結論只有一個：要消除非黨農民羣衆脫離黨和疏遠黨的危險，就必須在黨的周圍培養大批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

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幾個月內就培養出這種積極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漸在工作過程中，在活躍蘇維埃的過程中，在發展合作社組織的過程中，才能從農民羣衆中間培養出和選拔出這種積極分子。爲了做到這一點，應當改變共產黨員對待非黨員的態度。爲了做到這一點，必須使共產黨員以平等的態度來對待非黨員。爲了做到這一點，必須使共產黨員學會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態度來對待非黨員。如果非黨員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末要求他們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列寧說過，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關係應當是「相互信任」的關係。列寧的這句話是不能忘記的。造成黨員和非黨員間相互信任的

環境——這是爲了給黨培養出大批非黨農民積極分子準備條件首先必須做到的。

但是這種相互信任怎樣建立起來呢？當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過命令就能建立起來的。如列寧所說的，這種相互信任只有通過黨員和非黨員的「相互檢查」，通過日常實際工作過程中的相互檢查才能建立起來。在第一次清黨時期，曾經通過非黨員檢查黨員，這使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黨的周圍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氣氛。關於這一點，列寧在當時就已經說過，應當把第一次清黨時在黨員同非黨員相互檢查方面的教訓推廣到一切工作部門中去。我認爲，現在應該記起列寧的這個意見並且採取措施來實現這個意見了。

因此，黨員和非黨員在日常實際工作過程中所進行的相互批評和相互檢查，是造成他們相互信任的氣氛的手段，——如果黨要想消除千百萬非黨分子同黨疏遠的危險，如果黨要想在自己的農村組織的周圍培養出大批非黨農民積極分子，這就是它所應當遵循的道路。

第八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九個問題。

九

沒有外國的援助，我們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擴大工業的固定資本呢？
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理解。

或者這裏指的是蘇維埃國家從現存的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立即得到貸款援助，以此作為發展蘇維埃工業必不可少的條件，那末，就可以作出一種符合於這一問題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蘇維埃國家在將來西方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以後從他們那裏得到援助，以此作為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必不可少的條件，那末，就得作出另一種回答。

為了使誰也不受委屈，我盡量對這個問題的兩種可能的解釋都作回答。

我們先從第一種解釋談起。

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外來的貸款是否有可能發展蘇維埃的大工業呢？

是的，有可能。這件事情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同時還必須經歷嚴重的考驗，但是，儘管有這一切困難，我們沒有外來的貸款還是能夠實行我國的工業化的。

到現在為止，在歷史上強大工業國的形成和發展有過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是侵佔和掠奪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英國在世界各地奪取了殖民地，它在兩個世紀當中為加強本國工業而從殖民地榨取「追加資本」，最後變成「世界工場」。你們知道，我們是不能走這條發展道路的，因為對殖民地的侵佔和掠奪是同蘇維埃制度的性質不相容的。

第二條道路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實行軍事破壞和索取賠款的道路。例如德國的情況就是這樣，德國在普法戰爭時期擊敗了法國，從法國榨取了五十億的賠款，然後把這筆款項投入自己的工業。你們知道，這條發展道路也是同蘇維埃制度的性質不相容的，因為它在實質上同第一條道路毫無

區別。

第三條道路是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在奴役性的條件下把經營權租讓給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並且在奴役性的條件下向這些國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國的情況就是這樣；沙皇俄國在奴役性的條件下把經營權租讓出去，在奴役性的條件下取得西方強國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縛，雖然它後來終於能夠爬上獨立發展工業的道路，當然這免不了要靠幾次比較「成功的」戰爭，也免不了要靠對鄰國的掠奪。幾乎無須證明，蘇維埃國家也不能走這條道路，因為我們同各國帝國主義者血戰三年，並不是爲了在國內戰爭勝利結束後的第二天又心甘情願地去受帝國主義的奴役。

在這幾條發展道路中，如果以爲每一條道路在實際生活中都必定是單純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開地實現的，那就不對了。事實上，在個別國家的歷史中，這幾條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錯、互爲補充的，並且有過交織在一起的範例。例如美國的發展歷史就是這種幾條道路交織在一起的例子。這種情況說明，各種不同的發展道路，雖然它們彼此有所區別，但是具有某些使它們相互接近，使它們能夠交織在一起的共同特徵；第一，它們都導致資本主義工業國的形成；第二，它們都是以採取某種方法從外面流入「追加資本」爲前提的，這是建立這些國家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就把它們攪在一起，混爲一談，不了解這三條發展道路畢竟是建立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三種不同方法，不了解這幾條道路中的每一條道路都在這些國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對了。

既然蘇維埃國家不能走舊的國家工業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條件下流入新的資本又不可

能，那末蘇維埃國家究竟還有什麼道路可走呢？

剩下來的只有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這是一條別的國家完全沒有經歷過的道路，不靠外來的貸款而發展大工業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國的資本來使國家工業化的道路，——這是列寧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寧說：「我們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並厲行節約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痕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國家機關盡量節約……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我們就有可能在我國用厲行節約的辦法把任何一點積蓄都保存起來，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列寧繼續說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打個比喻說——從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就是說，從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從指靠破產的農民國家實行節約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尋求的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跨到大機器工業、電氣化、沃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四頁至第四五五頁）這就是我們國家爲了發展自己的大工業和使自己發展成爲強大的無產階級工業國而已經走上的和應當通過的道路。

正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這條道路是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但是，這決不是說，這條道路對無產階級國家來說是不可能的。在這裏，對資產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無產階級國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在這方面具有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的，也許是不可能的優越性。國有化的土地、國有化的工業、國有化的運輸業和信貸業、壟斷化的對外貿易、由國家調整的國內貿易，——這一切都是能夠用來發展我國工業的『追加資本』的新泉源，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中都不曾有過。你們知道，無產階級政權已經利用這些以及和這些相類似的新泉源在發展我們的工業了。你們知道，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已經取得了一些相當重要的成就。

正因為如此，對資產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發展道路，對無產階級國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儘管要遇到種種困難和考驗。

此外，應當指出，目前這種缺少非奴役性外資流入的情況，不可能是什麼永恆不變的。你們知道，已經有一些外資開始流入我國了。幾乎沒有理由懷疑，這種流入將隨着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鞏固而日益增多。

關於問題的第一種解釋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問題的第二種解釋。

沒有歐洲主要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預先勝利，沒有歐洲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在技術方面和設備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國有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

在談這個問題以前，——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我在這次講話的開頭就已經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種同這個問題有關的非常普遍的誤解。這種誤解就是：某些同志愛把『更新和擴大大工業的

固定資本』的問題同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混爲一談。能不能同意把這兩個問題混爲一談呢？不，不能。爲什麼呢？因爲按範圍來說，第一個問題要比第二個問題狹窄些。因爲第一個問題，即關於擴大工業的固定資本的問題，只包括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即工業，而關於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則包括整個國民經濟，既包括工業，也包括農業。因爲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是組織整個國民經濟的問題，是使工業同農業正確結合的問題，而關於擴大工業的固定資本的問題，嚴格說來，甚至不涉及這個問題。就假定工業的固定資本已經更新和擴大，但是，這還完全不是說，這樣就已經解決了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是工業和農業工作人員的生產消費組合。如果在這個組合中，工業與供給原料、食物並且消耗工業品的農業不協調，如果工業與農業因此不能組成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的整體，那就根本不會有社會主義。

正因爲如此，工業和農業的相互關係問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問題是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中的基本問題。

正因爲如此，決不能把更新和擴大大工業的固定資本的問題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混爲一談。

那末，沒有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預先勝利，沒有西方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在技術方面和設備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國有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

有，有可能。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並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我們已經在建設社會主義，我

們在發展國有化的工業並且把它同農業結合起來，我們在農村中發展合作社並且把農民經濟納入蘇維埃發展的整個體系中，我們在活躍蘇維埃並且使國家機關和千百萬人民羣衆打成一片，我們在建設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會生活。毫無疑問，在這條道路上是困難重重的，我們還必須經受許多考驗。毫無疑問，如果有西方的社會主義勝利的及時援助，事情就根本好辦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會主義勝利的『來臨』並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快，第二、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並且大家知道，我們已經在克服它們了。

這一切我已經在自己講話的開頭談過了。在此以前，我在給莫斯科積極分子所做的報告①中也談過這一點。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的『序言』中也談過這一點。我曾經說過，否認我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是使黨蛻化的取消主義。現在未必值得再來重複從前一再講過的話了。因此我介紹你們去讀讀列寧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你們可以找到關於這一問題的足夠數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簡單地談談這個問題的歷史和這個問題在目前對黨的意義。

如果不把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間的爭論計算在內，那末關於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在一九一五年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初次在黨內提出的。大家知道，當時列寧第一次提出了關於

『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論點（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這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大家知道，當時托洛茨基曾經反駁列寧的這個論點，他說：『……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見『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頁）。

在一九二一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以後，當建設問題已提到日程上的時候，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又重新在黨內提出來了。這個時期，某些同志認為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是離開社會主義的任務，是離開社會主義的建設。大家知道，當時列寧在他的『論糧食稅』（『小冊子中斷定說』，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是使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的必要條件，是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是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一九二一年四月裏的事情。好像是爲了回答這一點，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他的『一九〇五年』一書的序言中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提出了完全對立的論點，他說：『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

此後經過了一年（在一九二二年），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所作的聲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綱領』的跋中所作的聲明又互相對立起來了，列寧說：『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而托洛茨基說：『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

最後，又經過了一年，列寧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論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文中又重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在我們蘇聯具有『爲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

問題的簡短歷史就是如此。

從這個歷史的考證中已經可以看出，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我們黨的實踐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列寧不認爲這個問題是我們實踐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他就不會再三重複這個問題了。

後來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只是加強和加深了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的意義。

從黨的實踐觀點看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哪裏呢？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涉及我國建設的前途問題，涉及這個建設的任務和目的問題。不知道爲什麼建設，就不能真正建設。不知道前進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進。關於前途的問題，是慣於有自己明確而肯定的目標的我們黨的最重要問題。究竟我們是爲了社會主義，期待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進行建設，還是爲了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而碰運氣地盲目地進行建設，——這就是現在的基本問題之一。如果不對這個很明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設。成百成千個黨的工作人員，工會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經濟工作者，文化工作者，軍事工作人員和共青團員來找我們，詢問我們，詢問我們黨：我們把專業向哪一方面引

導，我們爲什麼建設？不幸的是有些領導者不善於或者不願意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而肯定的回答，他們支吾搪塞，把人們推東推西，使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淹沒在知識分子的懷疑主義中。

列寧主義的偉大意義之一，就在於它不認爲建設是碰運氣，是盲目的，它不認爲建設是沒有前途的，它對我們工作的前途問題作了明確而肯定的回答，它說，我們具有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切條件，我們能够並且應當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關於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性問題就是如此。

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這不僅取決於我們。這也取決於我們國外的敵人和朋友的強弱。如果讓我們建設，如果我們能延長「喘息」時期，如果不發生嚴重的武裝干涉，如果武裝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國際革命運動的力量和實力同我們自己國家的力量和實力都強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裝干涉企圖不能實現，我們就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相反地，如果武裝干涉得逞而我們被擊敗，我們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

第九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最後一個問題。

十

請指出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建設由於資本主義的穩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緩而面臨的最大的困難，

特別是在黨和工人階級的相互關係，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方面所面臨的最大的困難。

這些困難，如果就其中主要的來說，我認爲有五個。資本主義穩定的作用，在於它稍微加劇了這些困難。

第一個困難。這是同外國武裝干涉的危險有關的困難。這並不是說，我們面臨着武裝干涉的直接危險，帝國主義者已經做好準備並且完全能够立即對我國進行武裝干涉。要做到這一點，帝國主義起碼應當像大戰以前那樣強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目前摩洛哥的戰爭〔三〕和對中國的武裝干涉〔四〕，這些未來的戰爭和武裝干涉的演習，顯著地表明了帝國主義的脊背開始發軟了。可見，這裏不是指直接的武裝干涉，而是指只要資本主義的包圍還存在，一般地就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而只要武裝干涉的危險還存在，我們就不得不爲鞏固國防而每年花費數億盧布來供養陸軍和海軍。每年在陸軍和海軍上花費數億盧布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相應地縮減了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經費。不用說，要是沒有武裝干涉的危險，我們就可以把這筆款項，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強工業，改進農業，實行初等普通義務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產生了同武裝干涉的危險有關的建設工作方面的困難。

同其他一切困難不同，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克服這個困難不僅取決於我們，這個困難只有靠我國和所有其他各國革命運動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第二個困難。這是同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有關的困難。我在分析農村階級鬥爭問題時已

經談過這些矛盾了。重複已經談過的話是毫無必要的。這些矛盾發生在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格政策方面，發生在農業稅和對農村的管理等方面。這裏的危險在於工農結合工作的混亂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這一思想的破壞。由此就產生了同這一危險有關的困難。

同前一個困難不同，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它是可以用我們的內部力量來克服的。農村中的新方法就是克服這一困難所必需的方法。

第三個困難。這是同我們聯盟內部的民族矛盾、同「中央地區」和「邊疆地區」之間的矛盾有關的困難。這些矛盾是由於「中央地區」和「邊疆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條件不同，是由於後者落後於前者而發展起來的。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認為是已經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別是經濟上的矛盾還剛剛形成和固定起來，因此還需要把它們消除。這裏的危險是雙重的：一種危險是聯盟中央機關表現出大國主義的傲慢和官僚式的專橫，不願意或者不善於對各民族共和國的要求表現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種危險是各共和國和各地區對「中央地區」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閉關自守。同這些危險作鬥爭，特別是同第一種危險作鬥爭，就是克服民族問題方面的困難的方法。

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它也像第二個困難一樣，是可以利用聯盟的內部力量來克服的。

第四個困難。這是同國家機關脫離黨的危險、同削弱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的危險有關的困難。我在分析黨的蜕化危險的問題時已經談過這種危險了。重複已經談過的話未必是必要的。這種危險是由於國家機關中存在着資產階級官僚主義分子而滋長起來的。這種危險隨着國家機關的發展及其

比重的增大而加劇和嚴重起來了。任務就是要盡可能地精簡國家機關，陸續把官僚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腐化分子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把黨的領導力量分配到國家機關的各個樞紐點上去，從而保證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

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它也像第三個困難一樣，是可以用我們本身的力量來克服的。

第五個困難。這就是部分黨組織和工會脫離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脫離這些羣衆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險。這種危險所以產生和發展起來，是因為在許多黨機關和工會組織，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廠委員會裏，存在着官僚主義分子的惡勢力。這種危險最近因「面向農村」的口號而加劇起來了，這個口號把我們組織的注意力從城市轉向農村，從無產階級轉向農民，而許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農村的同時，決不能背向無產階級，不懂得「面向農村」的口號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用無產階級的力量才能實現，不懂得對工人階級的要求採取漫不經心的態度，只能加深黨組織和工會組織脫離工人羣衆的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徵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的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對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關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們的統治階級感覺已經提高了，他們是不能領受和容忍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態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慮不周的命令去麻煩工人是不行的，現在的重心不是在這些「措施」上，而是在爭取整個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

進行準備活動，如果不舉行廣泛性的生產會議，就不能實行稍微廣泛些的涉及工人羣衆的措施（例如，在紡織區改行看管三台織布機制）。

這一切使許多黨組織和工會組織脫離廣大工人階級羣衆，使企業中發生衝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紡織區爆發的衝突，揭露出我們許多黨組織和工會組織是存在着這一切毛病的。

這就是我們建設道路上第五個困難的特點。

要克服這些困難，首先必須把我們的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從這些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的手中解放出來，着手改善工廠委員會的成分，一定要使生產會議活躍起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大的生產單位的支部方面去，並且給這些支部配備優秀的黨的工作人員。

更多地注意和考慮工人階級的要求和需要，盡量減少我們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實際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更多地關心和同情工人階級的階級自尊心，——這就是現在的任務。

第十個問題就是如此。

載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真理報」第一三九、
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和第一四五各號

給斯維爾德洛夫大學

(慶祝本科和專科第二屆畢業典禮)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在培養黨的領導羣衆的指揮人員方面是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在成立以來的幾年內，已經獻給黨許多支積極工作者的隊伍，這些積極工作者正活躍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戰綫上。

現在大學又要將一支由二百十四人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工人的大學生隊伍輸送給黨，把他們送到工作崗位上去。

爲了使這支隊伍將要從事的工作在黨所面臨的複雜的建設任務下收到成效，就必須使這支隊伍了解我們環境中在目前具有決定意義的某些新情況。

這是些什麼情況呢？

第一、我國的基本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最近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他們無論在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都更加積極了，因此就要求黨用新的態度對待他們。我們這裏再也沒有喪失階級性的工人階級了，現在這是完全定形的和健壯的無產者階級，他們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提高了，因此就要求黨

實行更靈活更慎重的領導。關於農民也可以這樣說。這已經不是舊的農民，不是那些受盡舊日殘酷迫害的折磨，唯恐失去以前屬於地主的土地，或者受餘糧收集制的限制而頹然不振的農民了。這是新的農民，他們在文化上提高了，他們已經忘掉了地主和餘糧收集制，他們要求獲得廉價的商品和高價出售糧食，並且已經會充分利用黨的關於活躍蘇維埃的口號了。要以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對待現在的農民，這就是現在對黨的要求。重新把農民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這就是現在黨的任務。

第二、在許多地區，中農同富農聯合起來了。這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的主要事實。從工農聯盟的觀點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對農民的領導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要完全恢復基本農民羣衆對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信任。沒有這種信任，就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沒有這種領導，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要在恢復基本農民羣衆對工人階級的完全信任方面進行工作，這就是黨和黨的工作人員的任務。

第三、最近我們黨的工作人員由於「面向農村」的口號而漸漸把工人忘記了，他們忽略了在面向農村的同時，我們不能背向城市，首先不能背向無產階級。這同樣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的新事實。應當記住，近來工人階級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特別增長和加強了。這就是我國統治階級的主人翁感的增長。同志們，這是我們整個工作中最巨大的成就，因為工人階級已經感到自己不僅是勞動階級，而且是領導階級，它是能夠創造奇蹟的。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哪一個共產黨員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注意到無產階級的這種主人翁感，他就是一點也不了解新環境，嚴格地說，他就不是一个共產黨員，他就一

定會失敗。因此，我們在講到「面向農村」的口號時應當同時記住：工人階級是負有實現這個口號的使命的基本階級，只有工人階級成爲國家的真正的領導力量，這個口號才能實現。因此，黨的當前任務就是要使我們黨的地方工作人員終究會懂得：絕對必須用最關心和最慎重的態度來對待工人階級在物質上和文化上的一切需要。

你們這支畢業生隊伍的任務，就是要在當地的工作中注意到這一切情況。

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够完成這項任務。

讓我祝你們在將要從事的工作中得到完全的勝利。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真理報」第一三二號

再論民族問題

(關於謝米奇的文章)

現在，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經過爭論以後，謝米奇在文章中表示完全贊同俄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立場，這一點是值得歡迎的。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就認為俄共（布）代表團和謝米奇之間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爭論以前或爭論期間不會有過意見分歧，那是不正確的。看來，謝米奇正是想這樣來看民族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他力圖把這些意見分歧歸結為誤會。但是很可惜，他大錯特錯了。他在文章中硬說，同他的論戰是由「許多誤會」促成的，而這些誤會是由於他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的「一次沒有被全部翻譯過來的」演說所引起的。換句話說，這裏的過錯是在翻譯員，不知為什麼這個翻譯員沒有把謝米奇的演說全部翻譯過來。爲了維護真理，我不得不聲明，謝米奇的這種斷言是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如果謝米奇能夠從他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現在保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館裏）中引用一些話來證實他的這種說法，那當然要好些。但是不知爲什麼他並沒有這樣做。因此，我不得不代替謝米奇來完成這個不大愉快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手續。

甚至現在，當謝米奇表示完全贊同俄共（布）代表團的立場的時候，他的立場仍然有不少不明確的地方，因此就更有這樣做的必要。

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所做的演說（見「布爾什維克」雜誌（三）第七期）^①中曾經談到三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一）關於解決民族問題的途徑問題；（二）關於在當前歷史時代民族運動的社會內容問題；（三）關於國際因素在民族問題中的作用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曾經肯定地說，謝米奇『沒有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對民族問題的提法的實質』，他把民族問題和革命總問題分開，因此走上了把民族問題歸結為立憲問題的道路。

這樣說對不對呢？

請你們讀一讀謝米奇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中的一段話，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能不能把民族問題歸結為立憲問題呢？首先從理論上來談這個問題。比如說，在某一個國家裏有甲、乙、丙三個民族。這三個民族都表示它們願意生活在一個國家裏。在這種情況下，問題究竟在哪裏呢？當然是在這個國家的內部關係的調整上。就是說，這是立憲方面的問題。在這種理論前提下，民族問題就歸結為立憲問題……如果在這種理論前提下我們把民族問題

^① 見本卷第五十九頁至第六十四頁。——編者註

歸結爲立憲問題，那就必須說，——我經常強調這一點，——直到分離的民族自決權是解決立憲問題的條件。我只是在這種看法下提出立憲問題的。」

我認爲沒有必要進一步解釋謝米奇演說中的這一段話。很明顯，誰把民族問題看成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誰就不會把民族問題歸結爲立憲問題。反過來說，只有把民族問題和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分開的人，才會把民族問題歸結爲立憲問題。

在謝米奇的演說中有這樣一種說法：沒有革命鬥爭就不能爭得民族自決權。謝米奇說：「很明顯，只有通過革命鬥爭才能爭得這種權利。用議會鬥爭的方法是不能爭得這種權利的，只有通過羣衆性的革命行動才能取得這種權利。」但什麼是「革命鬥爭」和「革命行動」呢？能不能把「革命鬥爭」和「革命行動」同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以及爭取革命勝利（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等量齊觀呢？當然不能。把革命的勝利說成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條件，這是一回事；把「革命行動」和「革命鬥爭」當做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必須指出，改良的道路即立憲的道路完全排斥「革命行動」和「革命鬥爭」。在確定某個政黨是革命的政黨還是改良主義的政黨的時候，起決定作用的不應當認爲是「革命行動」本身，而應當認爲是黨採取和利用「革命行動」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務。大家知道，在一九〇六年第一屆杜馬解散以後，俄國的孟什維克曾經提議組織「總罷工」，甚至提議組織「武裝起義」。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仍然是孟什維克。他們當時提議這樣做是爲了什麼呢？當然不是爲了摧毀沙皇制度和組織革命的徹底勝利，而是爲了對沙皇政府「施加壓力」，以期實

行改良，擴大「憲法」的範圍，召集「改善了的」杜馬。在保留統治階級政權的情況下，爲了改良舊制度而採取「革命行動」，這是一回事，這是立憲的道路。爲了摧毀舊制度，爲了推翻統治階級而採取「革命行動」，這是另一回事，這是革命的道路，這是取得革命徹底勝利的道路。這裏是有根本的差別的。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謝米奇在把民族問題歸結爲立憲問題的時候，所說的關於「革命鬥爭」的那些話並沒有推翻而只是證實了我的說法，即謝米奇「沒有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對民族問題的提法的實質」，因爲他沒有了解到，不應當孤立地看民族問題，而應當把民族問題和革命勝利問題密切聯系起來看，把它看成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

我堅持這一點，決不是說我對謝米奇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有什麼新的看法。絲毫沒有。曼努伊里斯基同志早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⁵⁾上就已經談到謝米奇的這個錯誤，他說：

「謝米奇在他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民族問題」這本小冊子中以及在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拉德尼克」上發表的幾篇文章中，都提出把修改憲法的鬥爭作爲共產黨的實踐口號，就是說，他實際上把整個民族自決問題僅僅歸結爲立憲問題。」（見第五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五九六頁至第五九七頁）

季諾維也夫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也談到過這個錯誤，他說：

「在謝米奇的前途中顯然缺少一樣小東西——革命」，民族問題是「革命的問題，而不是立

憲的問題』（見『真理報』第八十三號）。

俄共（布）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們對謝米奇的錯誤所提出的這一切意見決不可能是偶然的，沒有根據的。無風是不起浪的。

關於謝米奇的第一個錯誤即基本錯誤就是如此。

他的其餘的錯誤都是從這個基本錯誤中直接產生出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在我的演說（見『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七期）中曾經肯定地說，謝米奇「不願意把民族問題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①。

這樣說對不對呢？

請你們讀一讀謝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中的一段話，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謝米奇問道：「南斯拉夫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是什麼呢？」他接着就答道：「這個社會內容就是塞爾維亞資本同克羅地亞資本和斯洛文尼亞資本之間的競爭。」（見謝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斯洛文尼亞資產階級和克羅地亞資產階級同塞爾維亞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在這裏不能不起一定的作用，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說成是各個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

① 見本卷第六十一頁。——編者註

競爭的人，不會把民族問題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這同樣是毫無疑義的。現在，當民族問題已經從地方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世界的問題，變成殖民地 and 從屬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的時候，民族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現在民族問題的實質是：殖民地和從屬民族的人民羣衆反對統治民族中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這些殖民地和這些民族的財政剝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在民族問題的這種提法下，各個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能有什麼意義呢？無疑是沒有決定性的意義的，在某種場合連重大的意義都沒有。十分明顯，這裏的問題主要不在於某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在競爭中打敗或者可能打敗另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而在於統治民族中的帝國主義集團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和從屬民族的基本羣衆首先是農民羣衆；帝國主義集團壓迫和剝削他們，就促使他們加入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把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歸結爲各個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就不能把民族問題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反過來說，如果把民族問題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就不能把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說成是各個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在這兩個公式之間是無論如何不能劃等號的。

謝米奇引證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末所寫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這本小冊子中的一句話。那裏說道：「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民族鬥爭是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顯然，他想用這句話來暗示他給目前歷史條件下的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所下的定義是正確的。但是，斯大林的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寫的，當時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具有全世界意義的問題，當時馬克

思主義者提出的關於自決權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從那時候起，國際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戰爭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太可笑了。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寧在他的「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2]一文中就說過：民族問題中自決權這個要點已不再是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成爲整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更不用說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後來論述民族問題的著作了。既然如此，那末在現在，當我們由於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了新的時代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的時候，謝米奇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小冊子中的一些話能有什麼意義呢？只能有這樣的意義：謝米奇離開空間和時間，離開當前的歷史環境來引證別人的話，因而違反了辯證法最基本的要求，他沒有考慮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東西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可能是不正確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所做的演說中說過，俄國布爾什維克對民族問題的提法應當分爲兩個階段：十月革命以前的階段和十月革命階段。前一階段進行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問題被看做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後一階段進行的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民族問題已經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未必用得着證明，這種區別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恐怕謝米奇還沒有理解民族問題提法的兩個階段之間的這種區別的用意和意義。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謝米奇企圖不把民族運動看成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而把它看成各個不同民

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問題，「是由於他過低估計了民族運動的內部威力，不了解民族運動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見『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七期）^①。

謝米奇的第二個錯誤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季諾維也夫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中也談到過謝米奇的這個錯誤，他說：

「謝米奇說，南斯拉夫的農民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因此它是不革命的。他的這個論斷是不正確的。」（見『真理報』第八十三號）

這是不是巧合呢？當然不是！
還是那句話：無風不起浪的。

最後，關於第三個問題，我曾經肯定地說，謝米奇「企圖脫離國際形勢和歐洲可能的前途來談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②。

這樣說對不對呢？

是對的。因為謝米奇在他的演說中甚至沒有間接暗示過下面這一點：在現今條件下國際形勢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最重要的因素，對南斯拉夫來說尤其如此。南斯拉夫國家本身是由於兩個主要的帝

① 見本卷第六十一頁。——編者註

② 見本卷第六十一頁。——編者註

國主義聯盟的格鬥而形成的，南斯拉夫無法跳出它周圍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目前所進行的激烈的角鬥，——這些事實謝米奇都沒有看到。謝米奇說他完全考慮到可能使自決權問題成爲迫切實踐問題的國際形勢的某些變化，這種說法在現在，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應當認爲已經不夠了。現在的問題完全不在於在遙遠的和可能設想的未來國際形勢起某些變化的情況下承認民族自決權問題的迫切性，因爲現在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在必要時也可以承認這種前途。現在的問題不在這裏，而在於不要把因戰爭和暴力而形成的現在南斯拉夫的國界問題變成解決民族問題的出發點和法律根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民族自決問題即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的國界問題是民族綱領的附加物，這種附加物將在遙遠的未來隱隱約約地出現；或者這個問題是民族綱領的基礎。很明顯，自決權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既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民族綱領的附加物，又是這一綱領的基礎。恐怕謝米奇還要繼續把自決權看成民族綱領的未來附加物。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謝米奇把民族問題和一般國際形勢問題分開了，因此他的關於自決權的問題即關於改變南斯拉夫的國界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現實問題，而是一個學院式的問題。

謝米奇的第三個錯誤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曼努伊里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也談到了謝米奇的這個錯誤，他說：

「謝米奇對民族問題的整個提法的基本前提，是認爲無產階級應當在由多次戰爭和種種暴

行所形成的資產階級國家的疆界內奪取這個國家。」^①（見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五九七頁）

能不能認為這是巧合呢？當然不能！

再說一遍：無風是不起浪的。

識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一、

十二兩期合刊

署名：約·斯大林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關於東方革命運動

(和日本「日日新聞」記者布施先生的談話)

布施先生的問題和約·維·斯大林的答覆

第一·個·問·題：日本人民是東方各國人民中最先進的人民，他們最關心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成就。

日本人民願意在這個偉大的事業中，在這個把東方被奴役的民族從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的事業中成爲蘇聯的同盟者。但是，日本同時又是資本主義國家，它有時不得和西方列強站在一條戰綫上來反對這個運動。(例如由於英日同盟，日本曾經在英國鎮壓印度的起義者時幫助過英國；又如在最近發生的上海事件中，日本同英國、美國、法國一起反對中國的工人。)

在你看來，要擺脫日本人民的民族意向與日本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這種困難局面，能有什麼出路呢？

答：日本人民是東方各國人民中最先進的人民，他們關心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成就，這是事實。如果日本人民和蘇聯各族人民結成同盟，這在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事業中將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步驟。這樣的同盟將標誌着龐大的殖民帝國滅亡的開始，標誌着世界帝國主義滅亡的開始。這種同盟

將是不可戰勝的。

但是，日本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驅使日本人民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使日本人民不是成爲解放東方民族的工具，而是成爲奴役東方民族的工具，這也是事實。

你問：怎樣才能從日本人民的利益與日本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中擺脫出來？

出路只有一條：按照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來改變日本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

俄國曾經有一個時候是東方民族的惡魔，是一切解放運動的憲兵。俄國由解放運動的憲兵變成這個運動的朋友和旗手的原因是什麼呢？僅僅是因爲俄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有了改變。

第二個問題：居住在蘇聯境內的各東方部族，由於沙皇統治的專制制度而落後了許多世紀，他們只是在革命以後才獲得獨立發展工業、農業、文化等等的權利。

在你看來，蘇聯這些東方部族大約需要多少年才能達到與蘇聯其他部族相同的文化水平？

答：你問：蘇聯各東方民族大約需要多少年才能達到與蘇聯其他民族相同的文化水平？

這很難說。這些民族的文化發展速度要取決於許多內部的和外部的條件。我應當說，一般說來，預測的發展速度向來是不精確的，特別是講到年數。這些民族的文化發展的基本有利條件，就是像沙皇制度、俄國帝國主義、中央地區對邊疆地區的剝削制度之類的主要發展障礙都已經掃除了。這種情況大大推動了蘇聯各東方民族的文化發展。但是這個基本的有利條件將被利用到什麼程度，這就要取決於各東方民族本身，並且首先取決於各東方民族在蘇維埃革命完成時所處的那個文化發展階段。

不管怎樣，有一點可以毫不猶豫地說：蘇聯各東方民族在目前的發展條件下所具有的迅速而全面發展民族文化的可能性，要比他們在最「自由的」和最「文明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能有的可能性大得多。

第三個問題：你說，東方被奴役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同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結合，將保證世界革命的勝利。而我們日本人民有個口號——「亞洲是亞洲人的」。你是不是認為我們的意向和你們對待東方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策略之間具有共同性？

答：你問：「亞洲是亞洲人的」這個口號和布爾什維克對待東方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策略之間沒有共同性？

既然「亞洲是亞洲人的」這個口號是號召同西方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那末在這一點上（僅僅是在這一點上）無疑是有共同性的。

但是「亞洲是亞洲人的」這個口號不僅包括問題的這一方面。它還包含着同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完全不相容的兩個組成部分。第一、這個口號避開東方帝國主義的問題，似乎認為東方帝國主義要比西方帝國主義好些，因而可以不同東方帝國主義作鬥爭。第二、這個口號使亞洲工人產生不信任歐洲工人的感情，使前者疏遠後者，割斷兩者之間的國際聯系，從而破壞解放運動的基礎。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策略不僅是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而且是反對包括東方帝國主義在內的一切帝國主義。這個策略不是要削弱亞洲工人和歐美各國工人的國際聯系，而是要擴大和加強這種聯系。

因此，在『亞洲是亞洲人的』這個口號和布爾什維克在東方的策略之間除了共同性以外，還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第四個問題：一九二〇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我談話時，對我提出的『共產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在哪裏比較大，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這一問題回答說：『真正的共產主義暫時只能在西方取得勝利。但要知道，西方是靠東方活命的；歐洲資本主義列強主要靠東方殖民地發財致富，但是他們同時也在武裝自己的殖民地，並且教給它們如何進行鬥爭，這樣，西方就親自在東方爲自己挖掘了墳墓。』你不是認爲，在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東方國家中日益頻繁地發生的事件，是西方列強葬身於他們親自在東方挖掘的墳墓裏的時候就要到來的一種預兆？

答：你問：我不是認爲，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東方國家中革命運動的加強，是西方列強葬身於他們親自在東方挖掘的墳墓裏的時候就要到來的一種預兆？

是的，我是這樣認爲的。殖民地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基本後方。這個後方的革命化不會不摧毀帝國主義，這不僅因爲帝國主義將失去後方，而且因爲東方的革命化必然會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機尖銳化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受到兩方面——既從後方又從前綫——攻擊的帝國主義，必然會承認自己是註定要滅亡的。

載於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真理報」第一五〇號

給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

答覆遲了，非常抱歉。我休假了兩個月，昨天回到莫斯科，今天才有機會讀到你的信。但是，答覆遲總比不答覆好。

恩格斯對「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發生？」這個問題所作的否定答覆，完全反映了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代，即帝國主義前的時代，當時還沒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和躍進式發展的條件，因而也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條件（大家知道，這種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是從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中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以及同這個規律有關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原理，只是在帝國主義時期才被列寧提了出來，而且也只有在那時才可能被列寧提出來。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帝國主義前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的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儘管恩格斯很有天才，他也不可能看出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他寫「共產主義原理」的時候還沒有出現的，只是後來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才出現的東西。從另一方面來說，列寧這

個天才的馬克思主義者，却不可能不看出在恩格斯逝世以後，在帝國主義時期已經出現的東西。列寧和恩格斯之間的差別，是把他們分隔開來的兩個歷史時期的差別。

根本談不上「托洛茨基的理論和恩格斯的學說是相同的」。恩格斯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在根本談不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有理由對第十九個問題（見他的「共產主義原理」）給予否定答覆的。相反地，托洛茨基却沒有任何理由在二十世紀重複恩格斯的那個已經過了時的舊的答覆，並且在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已經成爲人所共知的事實的新的帝國主義時代機械地應用它。恩格斯根據對他當時所處的壟斷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分析，做出了自己的答覆。托洛茨基却沒有分析現時代，而是撇開了現時代，他忘記了他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而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他狡猾地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伊萬·伊萬諾維奇的鼻子按在二十世紀初的伊萬·尼基弗羅維奇的下巴上，顯然，他以為可以用這種辦法來瞞哄歷史。我不認爲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方法可以作爲理由來說明「托洛茨基的理論和恩格斯的學說是相同的」。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次刊印

和宣傳鼓動部會議的參加者的談話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問：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以後的時間內，資本主義的穩定發生了什麼變化？

答：在我們黨內經常談到兩種穩定：資本主義的穩定和蘇維埃制度的穩定。資本主義的穩定意味着在資本主義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日益增長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危機的某種暫時的緩和，而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發展必然會引起下一次新的資本主義危機。不管這方面發生什麼變化，新的危機總是避免不了的。至於蘇維埃制度的穩定，那末這種穩定正在加速發展，正在團結我國的社會主義力量，剷除資本主義成分的根本。毫無疑問，我國社會主義成分完全戰勝資本主義成分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了。

問：西方工會的左傾運動的日益發展，不會引起無產階級的某個部分離開共產黨嗎？

答：不，一定不會引起的。恰恰相反，工會的左傾一定會加強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社會改良主義者在工人運動中的力量，不僅在於甚至並不在於他們控制着社會民主黨，而主要在於他們依靠着工會。只要奪走他們的這個支柱，他們就會懸在半空中。工會的左傾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按職

業組織起來的工人開始離開舊的改良主義的領袖，而在尋找新的左派領袖。共產黨的錯誤就在於它們不了解這個有益的過程，它們不但向社會民主黨中的左傾的工人伸出手去，幫助他們跳出泥潭，反而罵他們是叛徒，使得他們離開了自己。

應當看到，西方工會的情況和我們這裏不一樣。我們的工會是在黨出現以後，在黨已經鞏固並且已經在工人中間取得很高的威信以後產生的。我們的工會是在黨的領導下，在黨的幫助下，由黨的力量培植和組織起來的。這就是我們黨在工人中間的威信大大超過工會的威信的一個原因。我們在西方看到的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景。那裏工會的出現要比工人階級的政黨早得多。在那裏還沒有黨的時候，工會就已經領導工人罷工，組織工人和幫助工人在同資本家作鬥爭中捍衛自己的利益了。而且，那裏的黨是從工會當中分離出來的。這就是西方的工會在羣衆中所享有的威信要比黨高得多的原因。不管那裏的工會和工會的領袖好還是不好，有一點畢竟是很明顯的：工人都把工會當做他們反對資本家的堡壘。所有這些特點，在揭露工會的改良主義領袖時都必須估計到。惡言謾罵改良主義的領袖，在這裏於事無補。相反地，惡言謾罵只會在工人中間造成一種印象，以為這裏的問題不是清除不中用的領袖，而是破壞工會。

問：德國共產黨在清除「極左派」以後的情況怎樣？

答：毫無疑問，清除「極左派」，使德國共產黨的情況有了好轉。「極左派」是工人階級的異己分子。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註)同德國的工人階級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清除「極左派」，使得共產黨

的新領袖從工人中間湧現出來了。這對德國的工人運動有很大好處。

問：蘇聯是不是由於和德國締結了公約而擬定了新的方針？

答：沒有。我們的方針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我們依靠的是蘇聯以及蘇聯在國內外的成就。其他任何方針我們都不需要。不管締結了什麼公約，都絲毫不能改變這一點。

問：我們黨在廣大羣衆中進行工作的基本方法是什麼？

答：是消滅黨的工作中的戰時共產主義殘餘而改用說服的方法。對待我國的剝削分子，我們有經過考驗的老方法，即強迫的方法。至於對待我國的勞動人民，對待工人和農民等等，我們就應當採用說服的方法。問題不在於黨的指示和指令是正確的。這當然很好，但是這還不夠。現在的問題在於使廣大的勞動羣衆相信這些指令和指示的正確性。問題在於使羣衆根據親身的經驗相信黨的指令和指示的正確性。這就要求黨進行巨大而複雜的、靈活而耐心的工作。而這是在目前勞動羣衆積極性高漲的條件下唯一正確的工作方法。

問：由於黨的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宣傳鼓動部應當注意哪些問題？

答：第一、應當注意我國的工業化問題，第二、應當注意農民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應當着重指出，工業化是維護我國經濟獨立的基本方法，沒有工業化，我們的國家就有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屬品的危險。關於第二個問題，應當圍繞着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結合問題展開工作，因為沒有這種結合，就不可能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

問：由於黨的發展和調整這種發展的必要性，產生了哪些問題？

答：最近黨在數量上的發展是迅速的。這當然很好，因為黨的迅速發展意味着工人階級對我們黨的信任的增長。但是這裏也有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就是黨的迅速發展使黨的隊伍的覺悟水平有某些下降，使黨的質量有一定的降低。而質量對我們來說，其意義即使不大於數量，也應當不小於數量。要消滅這些缺點，必須使我們的某些同志不再過分迷戀黨在數量上的發展，必須制止那種讓大批人湧進黨來的現象，並且在今後接收新黨員入黨時必須遵守嚴格選擇的原則。這是第一。第二、必須在新黨員中間組織緊張的政治學習，把他們的政治覺悟提高到必要的水平。

問：現在怎樣才能使我們同非黨農民羣衆的聯系更有保證：是吸收農民入黨還是在黨的周圍培養非黨積極分子？

答：我們既需要前者也需要後者。如果在農村中沒有一定數量的、組織在黨內的農民，就很難在我們黨的周圍培養廣大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如果沒有廣大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就更難在農村中建立堅強的黨組織，因為黨組織通常是靠那些積極分子建立起來的。培養廣大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畢竟是更重要的任務。

從黨同羣衆的聯系來看，為什麼黨會強大有力呢？因為它在自己的周圍有廣大的同情黨的非黨積極分子。如果黨在自己的周圍沒有這些廣大的同情黨的積極分子，它就不能領導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進行鬥爭。如果沒有這些積極分子的幫助，黨就不能實現對千百萬人民羣衆的領導。這是基本

的領導規律之一。

你們是否記得在爲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時，幾天之內就有二十萬新黨員即工人階級的優秀子弟入黨這件史實呢？這二十萬人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是從廣大的同情我們黨的非黨工人積極分子的隊伍中來的。

因此，非黨積極分子是供給黨生存和發展的滋養料的基地。這不僅對工人階級來說是正確的。這對勞動農民來說也是正確的。

問：租讓制在擴大工業方面預料會有什麼實際的效果？

答：列寧早就說過，租讓制在我們這裏並沒有實現成。我們現在有可能根據所掌握的新材料來證實列寧的這個說法。我們現在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租讓制在我國是沒有前途的。事實上，租讓工業在我國整個工業生產體系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這種比重有變爲零的趨勢。

第一次刊印

論共青團的任務

(答「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提出的問題)

一

蘇聯目前所處的國際形勢和它的內部狀況使共青團應該擔負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呢？

問題提得太一般化了，因此答覆也只能是一般性的。蘇聯目前所處的國際形勢和它的內部狀況使共青團應該擔負的主要任務是：共青團要在言論上和行動上支持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運動，支持蘇聯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爭取無產階級國家的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此就應該得出結論說，共青團只有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遵照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指示，才能完成自己的這個總任務。

二

由於取消主義（喪失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民族主義（喪失國際革命的前途）和縮小黨的領導等等的危險的存在，即由於「問題和答覆」小冊子中所指出的那些危險的存在，擺在共青團面前的任

•••
務是什麼呢？

簡單地說，共青團在這方面的任務就是要用列寧主義的精神教育我們的工農青年。而用列寧主義的精神教育青年是什麼意思呢？第一、這就是說，使青年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第二、這就是說，使青年確信我們的工人國家是國際無產階級的產兒，確信它是發展世界各國革命的基地，確信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事業。第三、這就是說，教育青年信任俄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在共青團內培養出一些正是在這些方面能夠對青年進行教育的幹部和積極分子。

共青團員在一切建設部門中，即在工業、農業、合作社、蘇維埃、文化教育機關等等部門中進行着工作。必須使每個共青團員積極分子都把自己在各個建設部門中的日常工作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前途結合起來。必須使他們善於根據實現這一前途的精神和方向來進行自己的日常工作。

共青團員在各種不同民族的工人和農民中間進行着工作。共青團本身好像是一個獨特的國際。同時，在這裏起作用的不僅是共青團的民族成分，而且是共青團直接靠近全世界無產階級國際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隊俄共（布）這一事實。國際主義是貫穿在共青團工作中的基本思想。共青團的力量就在這裏。共青團的威力就在這裏。必須使共青團永遠充滿着國際主義的精神。必須使共青團員認識到我國無產階級鬥爭的成敗是同國際革命運動的成敗相關聯的。必須使共青團員學會把我國的革命不是看做目的本身，而是看做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手段和助力。

共青團在形式上是一個非黨組織。但它同時又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組織。這就是說，共青團在形式上是工人和農民的非黨組織，但它同時又應當在我們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任務就是要保證青年對我們黨的信任，保證我們黨在共青團中的領導。共青團員應當記住，保證黨的領導是共青團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點。共青團員應當記住，沒有這種領導，共青團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即用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工農青年的任務。

三

現在應當怎樣提出發展共青團的問題：應當在基本上繼續貫徹吸收全部工人青年、僱農青年、貧農青年以及中農青年中的優秀分子入團的方針，還是應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加強和教育已經入團的青年羣衆上呢？

不能說是這樣還是那樣。必須在這兩方面都進行工作。必須盡可能把全部工人青年以及貧農和中農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共青團裏來。但同時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通過共青團積極分子教育新團員上。加強無產階級核心是共青團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能保證共青團走正確的道路。但是共青團不僅僅是工人青年的組織。共青團是工農青年的組織。因此，在加強無產階級核心的同時，應當進行吸收農民青年中的優秀分子入團的工作，應當進行保證共青團內的無產階級核心同農民青年結成鞏固聯盟的工作。不這樣，共青團內的無產階級核心就不可能領導農民青年。

四

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某些省委員會援引婦女代表會議做例子，着手組織有固定成員的非黨農民青年代表會議。這種會議的作用就是在共青團的領導下團結農民青年積極分子，主要是中農青年積極分子。這種立場是不是正確，這裏是不是包含着使這種代表會議蛻化成一種可能同我們的青年團對立的非黨農民青年團的危險呢？

在我看來，這種立場是不正確的。爲什麼呢？原因如下：

第一、這裏包含着某種害怕中農的心理，包含着使中農青年和我們疏遠的意向，包含着避開中農青年的企圖。這種意向是不是正確呢？當然是不正確的。我們不應當使中農青年和我們疏遠，而應當使他們接近我們，接近共青團。只有這樣，才能培養中農青年對工人的信任，對共青團的無產階級核心的信任，對我們黨的信任。

第二、毫無疑問，在目前一切農民集團都活躍起來的條件下，共青團內特殊的中農青年代表會議必然會變成特殊的中農青年團。同時，這個特殊的青年團不可避免地必然會把自己同現在的青年團及其領導者俄共（布）對立起來，會把共青團中的農民青年吸引到自己方面去，使共青團有分裂爲兩個青年團即工人青年團和農民青年團的危險。我們能不能不估計到這種危險呢？當然不能不估計到這種危險。特別是在目前情況下，特別是在目前我國發展的條件下，我們是不是需要這種分裂呢？當

然不需要。恰恰相反，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使共青團內的農民青年和無產階級核心疏遠，而是使他們接近這個核心，不是使他們發生糾紛，而是使他們結成鞏固的聯盟。

第三、決不能用女工和農婦代表會議的存在做藉口，來為成立中農青年代表會議辯護。決不能把自己的特殊組織即共青團的工農青年同沒有自己的特殊組織的女工和農婦相提並論，就如同不能把農民中的中農青年同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個部分的女工混為一談一樣。中農青年代表會議的存在會給青年團造成危險，而女工和農婦代表會議的存在則不會使任何人受到任何危險的威脅，因為目前女工和農婦並沒有自己的類似青年團的特殊固定組織。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在共青團內成立特別的中農青年代表會議是多餘的。

共青團第六次代表大會^[四]只建議在農村共青團的周圍建立像自學小組、農業研究小組等等輔助組織，我認為這是正確的。

五

在我們的條件下，共青團積極分子有沒有可能把實際工作同鑽研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結合起來？共青團組織和各個共青團員在這方面應當做些什麼呢？

第一、我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這種提法稍微發表一點意見。這樣提問題，會使人以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而列寧主義又是一回事，以為一個人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却可以是列寧主義者。

但是這種概念決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列寧主義並不是列寧的學說，減去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說，列寧主義包括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學說，加上列寧給馬克思主義寶庫加進去的和必然從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農民問題、民族問題、黨、關於改良主義的社會根源問題、關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傾向問題等等）中產生出來的新東西。因此，最好在提問題時說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基本上是一個東西），而不說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

第二、毫無疑問，如果共青團積極分子不把實際工作同他們的理論學習（「研究列寧主義」）結合起來，共青團內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帶些自覺性的共產主義工作。列寧主義是全世界工人革命運動經驗的概括。這個經驗是一盞指路明燈，它照耀着實際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給他們指出方向。如果實際工作者甚至沒有最低限度地掌握住這個經驗，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會有信心，就不會認識到這個工作的正確性。如果實際工作者不研究列寧主義，不努力掌握列寧主義，不願意把自己的實際工作同必要的理論學習結合起來，他們的遭遇就會是這樣：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因此，研究列寧主義和學習列寧主義，就是使現在的共青團積極分子成爲能够用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千百萬共青團員的真正的列寧主義積極分子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是，在目前共青團積極分子負擔過重的條件下，是不是有可能把理論和實踐這樣結合起來呢？是的，是有可能的。不用說，這是件困難的事情。但是，既然這件事情是如此需要，既然沒有這

個條件就不能在共青團內培養真正的列寧主義積極分子，那末這件事情就是完全可能的。我們不能和那些逃避困難、只找輕鬆工作做的懦夫一樣。困難之所以存在，正是爲了要去同它們作鬥爭和克服它們。如果布爾什維克沒有學會克服困難，他們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就一定滅亡了。如果共青團害怕困難，它就不成其爲共青團了。共青團積極分子擔負着偉大的任務。因此，他們必須拿出自己的力量來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

耐·心·地·和·頑·強·地·學·習·列·寧·主·義，——這就是共青團積極分子應該走的道路，如果他們真想用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教育千百萬青年羣衆的話。

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共青團真理報」第一三三號

署名：約·斯大林

在米·瓦·伏龍芝葬禮上的演說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同志們！我不能講很長時間的話，我的心情不允許我這樣做。我只想說，我們失去了伏龍芝同志這樣一個最純正、最真誠和最無畏的當代革命家。

黨失去了伏龍芝同志這樣一個最忠實和最有紀律性的領導者。

蘇維埃政權失去了伏龍芝同志這樣一個最勇敢和最明智的我們國家的建設者。

軍隊失去了伏龍芝同志這樣一個最親愛和最可敬的領導者和締造者。

這就是黨為失去伏龍芝同志而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

同志們！今年對我們來說是可詛咒的。它從我們中間奪去了許多領導同志。但是這還不夠，它還要使我們再遭到一次損失。老的老同志這樣容易這樣簡單地走進墳墓，也許這正是必然的。但遺憾的是，我們的年輕同志站起來接替老一輩却不是這樣容易，也決不是這樣簡單。

我們相信，我們希望，黨和工人階級一定會採取一切措施加速培養新幹部來接替老一輩。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託我表達全黨為失去伏龍芝同志而感到的悲痛。

願我的簡短的演說能够表達這種悲痛，悲痛是無限的，它是不需要用長篇的演說來表達的。

獻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真理報」第一五三號

十月革命、列寧和我們的發展前途

我認爲在八年前的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和十月革命八年後的目前時期之間雖然有極大的差別，但還是有一個共同點的。這個共同點就是：這兩個時期都反映了我國革命發展中的轉折點。那時，在一九一七年，問題在於把資產階級政權轉變爲無產階級政權。現在，在一九二五年，問題在於把目前的還不能完全稱爲社會主義經濟的經濟轉變爲社會主義經濟，即轉變爲應當成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的那種經濟。

在十月革命時期，即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在列寧的領導下通過關於組織武裝起義的決議的時候，情況是怎樣的呢？

第一、歐洲的兩個聯盟之間進行着戰爭，社會主義革命的因素在整個歐洲日益增長，存在着和德國單獨媾和以扼殺俄國革命的威脅。這是外部的情況。第二、我們黨爭取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全國各地農民起義，前蘇革命運動高漲，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陷於孤立，存在着發生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威脅。這是內部的情況。

這主要是一條政治鬥爭戰綫。

這個轉折點當時是以工人和農民起義的勝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而結束的。

現在，在摧毀資產階級政權八年以後，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第一、世界上存在着兩個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在殖民地和附屬國（中國、摩洛哥、敘利亞等等）的革命運動顯著增長的情況下暫時達到穩定；社會主義陣營蘇聯由於自己的經濟發展而日益成長起來，它把各先進國家的工人以及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被壓迫人民都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使短促的「喘息時機」變成整整的一個「喘息」時期。這是外部的情況。第二、我國的工業和合作社日益發展，工人和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無疑已有改善，黨在工人和農民中間的威信日益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和農民一起把社會主義建設向前推進。這是內部的情況。這主要是一條經濟建設戰綫。

目前的轉變時期不會以無產階級的勝利而結束，這首先取決於我國建設的成就，取決於西方和東方革命運動的成就，取決於腐蝕資本主義世界的那些矛盾的發展。

八年前的任務是：使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結合起來，中立農民中的中農階層，利用兩個帝國主義聯盟之間的殊死鬥爭，推翻俄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加強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聯系，把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向前推進。

經過了八年，現在的任務是：一方面，使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同中農在建立鞏固聯盟的基礎上結

合起來，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加緊發展和加速重新裝備我國的工業，吸引千百萬農民羣衆加入合作社，從而保證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核心戰勝資本主義成分；另一方面，和世界各國的無產者以及各被壓迫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建立聯盟，以便幫助革命的無產階級戰勝資本主義。

中立中農現在已經不夠了。現在的任務是：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以便保持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正確關係。因為既然列寧所說的『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四三〕}這個論點是正確的，那末列寧所說的『……現在要同無比廣大的羣衆，即同農民一道前進』^{〔四四〕}的話也是正確的。

一般地發展國營工業現在已經不夠了。何況戰前國營工業的水平本來就不高。現在的任務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重新裝備我們的國營工業並使它進一步擴展。因為我們的國營工業是社會主義類型的工業。因為它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基礎。因為沒有這樣的基礎，就談不上把我國變成工業國，談不上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一般地發展農村的合作社現在已經不夠了。現在的任務是：吸引千百萬農民羣衆加入合作社和在農村中開展合作社運動。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類型的工業存在的條件下，合作社是使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環節。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十月革命、列寧和我們的發展前途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勝利所必需的條件大致就是這些。

八年前，黨所以能戰勝資產階級政權，是因為黨在執行無產階級的任務時不怕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不怕它的個別隊伍發生動搖，而能夠表現出列寧式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現在，經過了八年，如果黨在執行自己的任務時不怕它所面臨的無數困難，不怕它的個別隊伍可能發生動搖，而能夠表現出過去的那種列寧式的不屈不撓的精神，黨就完全能夠保證戰勝我們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

在執行無產階級的迫切任務時表現出列寧式的不屈不撓的精神，——這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勝利的一個最必需的條件。

戰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報」第二五五號

署名：約·斯大林

給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 代表會議主席團的信

(七)

親愛的同志們！

俄共（布）中央書記處得到消息，說你們代表會議的某些代表認為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中央總結報告的決議⁽⁶⁾似乎是對付列寧格勒組織的；這些同志似乎還號召列寧格勒的代表團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進行公開的鬥爭。如果這些消息符合實際情況，我認為自己有義務向你們作如下的說明。

在莫斯科代表會議上是通過了一項關於原則性問題的原則性決議。無論從莫斯科代表會議或者各區代表會議的演說速記記錄來看，或者從上面提到的決議來看，都不難令人相信，在莫斯科誰也不想破壞列寧格勒組織的威信，誰也不想號召大家同它作鬥爭。因此，薩爾基斯、薩發羅夫和其他一些人還在各區代表會議上就開始發表的，以後在你們省的代表會議上又繼續發表的演說，使我感到不安。而某些同志最近在你們代表會議上發表的號召你們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進行公開鬥爭的演說，

特別使我感到不安。在目前情況下，列寧主義者的團結，——即使他們在個別問題上有某些意見分歧，——比任何時候都更爲必要。只要你們有強烈的願望，列寧主義者的團結就不僅能够保持，而且能够加強。列寧格勒組織現在是而且應當始終是我們黨的一個最重要的支柱。

作爲你們代表會議主席團的委員，我認爲自己有義務告訴你們這一切。

列寧格勒組織代表會議主席團委員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載於一九三四年「紅色史料」
雜誌第一期（總第五十八期）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載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九日
「真理報」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三九六各號

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十二月十八日)

同志們！最近兩星期以來，你們已經聽過好幾位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關於中央委員會從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期間的工作報告；報告都是很長的，基本上無疑都是正確的。我認爲重複這些報告幾乎沒有什麼意義。我想這種情況減輕了我在這裏的任務，因此我認爲只談談有關我黨中央從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期間的工作的一些問題是比較好的。

中央的工作報告通常總是先從外部狀況談起。我不違反這個慣例。我也先從外部狀況談起。

一 國際形勢

這個時期，在對外關係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現象，有決定意義的和貫穿一切事變的現象，就是我們這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和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之間已經確立了某種暫時的均勢。這種均勢決定了當前蘇維埃國家和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和平共處」階段。有一個時期被我們認爲是戰後的一個

短促的喘息時機，現在已經變成整整的一個喘息時期了。由此就產生了資產階級世界和無產階級世界間的某種均勢和一個『和平共處』時期。

產生這一切情況的根源，一方面是世界資本主義內部的軟弱，世界資本主義的軟弱無力，另一方面是工人革命運動的普遍增長，特別是我們蘇維埃國家的力量的增長。

產生資本主義世界的這種軟弱的根源是什麼呢？

產生這種軟弱的根源，就是那些為資本主義所無法克服而決定整個國際形勢的矛盾，就是那些為各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克服而只能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進程中被克服的矛盾。

這是一些什麼矛盾呢？這些矛盾可以歸結為以下五類。

第一類矛盾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第二類矛盾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及附屬國的解放運動之間的矛盾。

第三類矛盾就是帝國主義大戰中的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正在發展而且不能不發展的矛盾。

第四類矛盾就是各戰勝國之間正在發展而且不能不發展的矛盾。

最後，第五類矛盾就是蘇維埃國家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正在發展的矛盾。

這就是決定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的發展的五類基本矛盾。

同志們，如果我們不簡略地研究一下這些矛盾的本質和它們的增長情形，我們就無法了解目前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所以，對這些矛盾的簡單的論述就必然成爲我的報告的一部分。

一、資本主義的穩定

這樣，我們就先來談第一類矛盾即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方面的主要事實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資本主義正在擺脫或者說已經擺脫它在戰後所陷入的那種生產、貿易以及財政方面的混亂狀態。黨把這種情況叫做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或暫時穩定。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危機時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產和貿易已經開始向前發展，而資產階級政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鞏固起來。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暫時已經擺脫它在戰後所陷入的那種混亂狀態。

下面就是歐洲方面的一些數字。

歐洲一切先進國家的生產同一九一九年比較起來，有的已經在向前發展，向上增長，某些地方已經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有的處在原來水準上。只有英國還有某些生產部門沒有恢復。從整個歐洲來說，生產和貿易基本上在向前發展，不過目前還沒有達到戰前水準。拿糧食生產來說，英國只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法國達到百分之八十三，德國達到百分之六十八。德國的糧食生產提高得很慢，法國沒有提高，英國則下降。這些國家都要靠從美國輸入糧食來彌補。一九二五年，英國在煤的產量方面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法國等於百分之一百零七，德國等於百分

之九十三。在鋼的產量方面，英國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八，法國等於百分之一百零二，德國等於百分之七十八。在棉花消費量方面，英國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八十二，法國等於百分之八十三，德國等於百分之八十一。在對外貿易方面，英國是入超，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四；德國較一九一九年稍有提高，也是入超；法國目前已經超過戰前水準，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百零二。整個歐洲的貿易水準，拿一九二一年來說，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三，而現在，即在一九二五年，已經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這些國家的預算不管怎樣是保持平衡的，但這種平衡是靠拚命增加居民的捐稅負擔來維持的。在個別國家裏有通貨不穩定的現象，但是一般說來，從前的那種混亂狀態現在已經看不見了。

總的情況是：歐洲的戰後經濟危機正在消失，生產和貿易正逐漸達到戰前水準。歐洲的一個國家法國在貿易和生產方面已經超過戰前水準，歐洲的另一個國家——我說的是英國——則還停留在或幾乎停留在原來水準上，還沒有達到戰前水準。

第二、現在我們在歐洲看到的不是戰後危機年代曾經看到的革命來潮時期，而是革命退潮時期。這就是說，奪取政權的問題，無產階級在最近奪取政權的問題，現今在歐洲還沒有列入日程。革命浪潮高漲時期，即運動突飛猛進、向上升漲而黨提出的口號却跟不上運動的發展的時期，像我國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七年所發生的情形一樣，——這樣的高漲時期還在前面。這樣的時期現在還沒有到來，現在所處的是暫時退潮時期，是無產階級積蓄力量的時期。這個時期，就確定運動的新的形式方面，

就在爭取工會運動統一的旗幟下的羣衆性運動的存在和發展方面，就建立和鞏固西方的工人運動和蘇聯的工人運動之間的聯系方面，就工人運動（比如英國工人運動）左傾方面，就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瓦解及其內部產生深刻裂痕等方面來說，都能產生重大的結果。我重複一遍，現在我們是處在積蓄力量的時期，這個時期對於未來的革命發動有很大的意義。這個時期，共產主義運動的口號就是要掌握無產階級的羣衆性組織（工會以及其他組織）和把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撤職」，像我國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間的情形一樣。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財政勢力的中心，全世界財政資本剝削的中心，已經從歐洲移到美國。過去通常總是把法德英三國說成世界財政資本剝削的中心。現在已經絕對不能這樣說了。現在世界財政資本剝削的中心主要是北美合衆國。這個國家在各方面，無論在生產和貿易方面或在資本積累方面，都在發展。讓我舉一些數字來說明。美國的糧食產量已經超過戰前水準，現在已經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產量雖然只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但是這方面的差額有石油方面的大量增產額來彌補。而且必須指出，美國的石油產量佔全世界石油總產量的百分之七十。鋼的產量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四十七。國民收入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對外貿易方面靠向歐洲各國輸出而造成巨額出超，已經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價值九十億的黃金儲備中大約有五十億是在美國。北美合衆國的通貨是世界上最穩定的通貨。至於資本輸出，美國現在差不多是資本輸出率不斷增長的唯一國家。法德

兩國輸出得極少，英國也大大地減少了自己的資本輸出。

第四、我在上面講到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主要是靠美國資本的幫助和以西歐各國在財政上服從美國爲代價達到的。爲了證明這一點，只要舉出歐洲各國積欠美國的國家債款的數字就夠了。這個數字至少達二百六十億盧布。我還不說積欠美國的私人債款，即美國投入歐洲各國企業的資本，這種投資額在歐洲總共達數十億。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歐洲各國靠美國資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國資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站穩腳跟。這是以什麼爲代價的呢？這是以歐洲各國在財政上服從美國爲代價的。

第五、因此，歐洲各國爲了有可能償還利息和債款，就不得不加重居民的捐稅負擔，就不得不使工人的境遇惡化。現在歐洲各國的情形正是這樣。雖然償還債款和利息的工作還沒有很好地開始進行，可是現在例如英國的稅收在全部國民收入中已經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十一增長到一九二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三，法國已經從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增長到百分之二十一，意大利已經從百分之十三增長到百分之十九。不用說，在最近的將來捐稅負擔一定還會進一步加重。因此，歐洲勞動者首先是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必然會惡化下去，而工人階級也一定會革命化。這種革命化的徵兆無論在英國或在歐洲其他國家都已經出現了。我指的是歐洲工人階級顯然在左傾這一事實。

以上這些主要事實都說明：歐洲各國所達到的資本主義暫時穩定是在腐爛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腐朽的穩定。

很可能——我並不認爲這是不可能的——歐洲各國的生產和貿易也會達到戰前水準。但這還不是說，資本主義因此就一定會達到它在戰前所達到的那種穩定程度。那種穩定程度它永遠達不到了。爲什麼呢？第一、因爲歐洲是以在財政上服從美國爲代價換得它的暫時穩定的，這就使人民的捐稅負擔大大加重，使工人的境遇必然惡化，使歐洲各國革命化；第二、因爲還有其他許多使目前的穩定成爲不持久不鞏固的穩定的原因，這些原因，我在下面就要談到。

把我剛才在分析第一種矛盾時所講的一切情況總結一下，總的結論就是：剝削世界的主要國家的圈子與戰前時期相比，已經縮小到極點了。從前，主要的剝削者是英法德三國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國，現在這個圈子已經縮小到極點了。現在世界上的主要財政剝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債權人，是美國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幫手——英國。

這還不是說，歐洲已經陷入殖民地的地位。歐洲各國繼續剝削着自己的殖民地，同時它們自己在財政上也受美國的支配，因此它們自己現在也受美國剝削而且將來還會受美國剝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世界進行財政剝削的主要國家的圈子已經縮小到最低限度，而被剝削國家的圈子擴大了。這就是目前資本主義的穩定不鞏固和內部虛弱的原因之一。

二、帝國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現在來談第二類矛盾即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

這方面的主要事實是：各殖民地的工業和無產階級的發展和增長，特別是在戰爭時期和戰爭以後；這些國家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其中包括本國知識分子的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增長以及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的總危機；印度和埃及反對英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敘利亞和摩洛哥反對法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中國反對英日美帝國主義等等的解放鬥爭；印度和中國的工人運動的增長以及這兩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作用的增長。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列強當前有喪失它們的主要後方即殖民地的危險。資本主義的穩定在這方面是不鞏固的，因為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逐步增長，有些地方（摩洛哥、敘利亞、中國）已經開始採取直接同帝國主義作戰的形式，而帝國主義顯然是担負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務的。

有些人——特別是資產階級作家——說殖民地危機的增長應歸咎於布爾什維克。我應當說，人家把這一點歸咎於我們，未免太看得起我們了。遺憾得很，我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直接幫助各殖民地國家爭取解放。必須深入一層地去尋找原因。除了其他一切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歐洲各國必須向美國繳付利息，因此它們不得不加緊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和附屬國，這樣就不能不使這些國家的危機和革命運動增長起來。

這一切都說明世界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的情況是壞透了。如果說在那方面，在第一類矛盾方面，歐洲資本主義已經局部穩定，無產階級在最近期間奪取政權的問題暫時還沒有列入日程，那末殖民地危機却已經達到頂點，從許多殖民地中逐走帝國主義者的問題已經列入日程了。

三、戰勝國和戰敗國

現在來談第三類矛盾即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矛盾。

這方面的主要事實有以下幾點：第一、歐洲在凡爾賽和約締結以後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戰敗國陣營（德國、奧國及其他國家）和戰勝國陣營（協約國加上美國）。第二、必須指出一種情況，就是各戰勝國從前企圖用軍事佔領手段來扼殺各戰敗國（請你們回憶一下魯爾問題），現在它們已經放棄這種手段而採取了另一種方法，即先對德國後對奧國進行財政剝削的方法。道威斯計劃就是這種新方法的表現，而這個計劃的惡果只是到了現在才表現出來。第三、羅迦諾會議⁽⁵⁾表面上彷彿消除了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一切矛盾，但是實際上並沒有消除任何矛盾（不管在這個問題上如何喧嚷），而只是使這些矛盾尖銳化。

道威斯計劃的目的就是要德國不折不扣地向協約國分期償付約一千三百億金馬克。道威斯計劃的後果已經表現出來，這就是德國的經濟狀況惡化，整批企業破產，失業人數增多等等。這個由美國制定的道威斯計劃的內容，就是要歐洲各國利用德國所應償付歐洲各國的賠款去償還積欠美國的債款，但是德國無法憑空找到這一大筆款項，所以德國就應當獲得許多還沒有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佔據的空閒市場，以便能夠從那裏汲取新的力量和新的血液來償付賠款。美國在這裏所指的市場，除了一些小市場以外，就是我們俄國市場。按照道威斯計劃，這些市場應該讓給德國，使它能夠榨取一

些東西來向歐洲各國償付賠款，而歐洲各國則應當向美國償還國家債款。這個計劃整個是編得很好的，但它是在沒有主人參加的情況下編制成的，因為它對德國人民說來是雙重壓榨，即德國資產階級對德國無產階級的壓榨和外國資本對德國全體人民的壓榨。如果以為德國人民會白白忍受這種雙重壓榨，那就錯了。所以，我認為道威斯計劃在這方面必定會導致德國革命。道威斯計劃本來是為綏靖德國而制定的，但是這個計劃必定會引起德國革命。這個計劃的第二部分規定德國應當剝削俄國市場來為歐洲榨取金錢，這也是在沒有主人參加的情況下做出的一種決定。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決不願意變成受其他任何國家（其中包括德國）支配的農業國。我們自己要生產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所以，指望我們會同意把我們的祖國變成受德國支配的農業國，那就是指望在沒有主人參加的情況下處理問題。在這方面，道威斯計劃是毫無根基的。

至於羅迦諾公約，它不過是凡爾賽和約的繼續，它的目的只能是像人們在辦外交時所說的那樣保持『現狀』，即維持德國是戰敗國而協約國是戰勝國這樣的現狀。羅迦諾會議在法律上把這種秩序固定下來，也就是說規定把德國的新國界保持下來而使波蘭和法國得到利益，德國喪失它的殖民地，這個被綁在普羅克拉斯提斯牀上的德國同時還必須採取一切辦法來榨取一千三百萬億金馬克。如果認為日益向前發展的德國會容忍這種情況，那就是指望出現奇蹟。如果從前，在普法戰爭以後，當時的矛盾焦點之一亞爾薩斯—洛林問題成了帝國主義大戰爆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那末，試問有什麼辦法保障這個在法律上確認德國喪失西里西亞、但澤走廊和但澤，烏克蘭喪失加里西亞和沃倫省西

部，白俄羅斯喪失它的西部領土，立陶宛喪失維里諾等等的凡爾賽和約和它的繼續羅迦諾公約，保障這個割裂了許多國家的領土和造成了一連串矛盾焦點的條約，不會遭到與普法戰爭後從法國割去亞爾薩斯——洛林的那個舊普法條約同樣的命運呢？

這樣的保障是沒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道威斯計劃孕育着德國的革命，那末羅迦諾公約却孕育着歐洲的新戰爭。

英國保守黨人既想用保持『現狀』的辦法來對付德國，又想利用德國來對付蘇聯。他們不是太貪得無厭了嗎？

人們在談論和平主義，在談論歐洲各國間的和平。布利安和張伯倫擁抱接吻，斯特萊斯曼滿口恭維英國。這一切都不足介意。我們從歐洲的歷史中知道，每當締結關於為新戰爭配置力量的條約的時候，總是把這種條約稱爲和平條約。在締結包含有未來戰爭的因素的條約的時候，總是聽到關於和平的叫囂。在這樣的時候，總是有偽善的和平歌手出現。我想起普法戰爭後的幾件歷史事實，當時德國是戰勝國，法國是戰敗國，當時俾斯麥千方百計想保持『現狀』，即保持在德國打敗法國後所確立的秩序。當時俾斯麥主張和平，因爲這種和平使他對法國享有許多特權。法國也主張和平，至少在初期即當它還沒有從戰爭失敗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的時候是如此。正是在這個時期，即當大家談論和平，偽善的歌手歌頌俾斯麥的和平願望的時候，德國和奧國簽訂了一個完全和平性的和完全和平主義的協定，這個協定後來就成了未來帝國主義戰爭的基礎之一。我指的是奧國和德國在一八七九年簽訂

的協定。這個協定是對付誰的呢？是對付俄國和法國的。這個協定的內容是什麼呢？請聽吧：

『鑒於德奧兩國的密切合作並不威脅任何國家，而且合作的目的是要按照柏林條約所確立的原則來鞏固歐洲和平，因此兩國國王陛下決定締結同盟和約和互助協定。』

你們聽見了吧：德奧兩國是爲了歐洲的和平，而實行密切合作的。這個協定曾經被解釋爲『和平同盟』，但是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爲這個協定是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大戰的直接準備。由於簽訂了這個表面上是維護歐洲和平而實際上是準備歐洲戰爭的協定，就產生了另一個協定，即俄國和法國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三年間簽訂的協定，——當然也是爲了維護和平，而不是爲了別的！這個協定裏講的是些什麼呢？講的是：

『法俄兩國被維護和平的共同願望所激勵而達成如下協議。』

究竟達成了什麼協議——這點當時根本沒有公開說明。但是在協定的秘密條文中規定：一旦戰爭爆發，俄國應當派遣七十萬軍隊對抗德國，而法國應當派遣（似乎是）一百三十萬軍隊對抗德國。

這兩個協定都被正式稱爲維持全歐的和平、友誼和安寧的協定。

最後，經過六年以後即在一八九九年召開了海牙和平會議，提出了裁軍問題。正是在那個時候，法國總參謀部的軍官根據法俄協定到俄國來擬定戰爭爆發時調動軍隊的計劃，而俄國總參謀部的軍官則到法國去協同法國將軍編制將來對德作戰的計劃。正是在那個時候，德奧兩國的總參謀部共同擬制雙方應當共同向它們的西方和東方的鄰國進攻的計劃和條件。正在這個時候（當然這一切都是

在背後偷偷摸摸地進行的），一八九九年的海牙會議召開了，在這次會議上宣佈了和平，發出了關於裁軍的虛偽的喧嚷聲。

你們看，這就是極端虛偽的典型的資產階級外交，他們竭力用關於和平的叫嚷和歌唱來掩蓋準備新戰爭的活動。

既然如此，我們還有沒有理由相信關於國際聯盟和羅迦諾公約的歌唱呢？當然沒有理由。正因為如此，我們既不能相信張伯倫和布利安互相擁抱接吻的玩意，也不能相信斯特萊斯曼的那套恭維話。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羅迦諾公約是為新戰爭配置力量的計劃，而不是為和平配置力量的計劃。

第二國際在這個問題上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要知道第二國際領袖們比任何人都賣力，他們硬要工人們相信羅迦諾公約是和平工具而國際聯盟是和平救星，布爾什維克不願加入國際聯盟是因為他們反對和平等等。根據上述情況看來，特別是根據我所舉的說明在普法戰爭以後締結的許多表面上稱為和平協定而實際上是戰爭協定的那些歷史考證看來，第二國際的這種種叫罵究竟說明什麼呢？第二國際目前對羅迦諾公約所採取的態度究竟說明什麼呢？它說明第二國際不但是資產階級廢化工人階級的組織，而且是在道義上為凡爾賽和約的一切不正規定作辯護的組織。它說明第二國際是一個輔助協約國的組織，它的任務就是用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擁護羅迦諾公約和國際聯盟的叫罵來在道義上為凡爾賽和約——羅迦諾公約所造成的一切不公正情形和整個壓迫制度辯護。

四、戰勝國間的矛盾

現在來談第四類矛盾即戰勝國之間的矛盾。這方面的主要事實是：雖然美英兩國成立了某種聯盟，雖然它們兩國成立了以反對廢除盟國債務的美英協定為基礎的聯盟，但是我認為英美兩國之間的利害衝突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加劇了。現在世界列強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石油問題。比如拿美國來說，它的石油產量約佔全世界石油總產量的百分之七十，同時它的石油消費量也佔全世界石油消費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正是在這方面，在世界列強全部經濟活動和軍事活動的神經中樞方面，美國隨時隨地都遇到英國的抵抗。拿全世界兩大石油公司——代表美國的「美孚石油公司」和代表英國的「英荷殼牌石油公司」——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公司在全世界一切出產石油的地方都在進行鬥爭。這是美英兩國之間的鬥爭。因為石油問題是生命攸關的問題；因為誰擁有更多的石油，誰就能在未來的戰爭中佔指揮地位。誰擁有更多的石油，誰就能指揮世界的工業和商業。自從各先進國家的船隻改用馬達來發動以後，石油就成了世界列強在平時和戰時爭奪優越地位的命脈了。正是在這方面，英國的石油公司和美國的石油公司進行着殊死的鬥爭，雖然這種鬥爭不是任何時候都很明顯，但是它始終存在着並且微微地燃燒着，這可以從英美間談判的歷史中以及英美間因這個問題而引起的衝突的歷史中看出來。只要提起尤茲在他任美國外交部長期間關於石油問題向英國提出的多次照會就夠了。在南美洲；在波斯，在歐洲；在羅馬尼亞和加里西亞那些出產石油的地區，在世界

各地都進行着這種明爭暗鬥。更不必說英美在中國的利益發生衝突這樣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實了。你們想必知道，這裏進行的是暗鬥，並且由於美國幹得比較靈活，由於美國不採用英國貴族尚未拋棄的那些粗暴的殖民主義的方法，因此它往往能使英國在中國處於窘境，從而把英國排擠出去，爲自己開闢一條打入中國的道路。當然，英國是不會漠視這一點的。

我也不多談法英兩國間因爭奪歐洲大陸統治權而引起的利害衝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同樣明顯的是：英法兩國不僅在歐洲大陸霸權問題上發生利害衝突，在殖民地霸權問題上也發生利害衝突。報刊上已透露這樣的消息：敘利亞和摩洛哥進行反對法帝國主義的戰爭不是沒有英國參加的。雖然我手頭沒有文件，但是我以爲這種消息不是沒有根據的。

其次，我也不想談美日兩國間的利害衝突，因爲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只要回憶一下不久前美國艦隊在太平洋舉行的演習以及日本艦隊舉行的演習，就會明白這樣做是爲了什麼了。

最後，我必須指出一件必定會使大家感到驚奇的事實，這就是各戰勝國在大量擴充軍備。我說的是戰勝國，是戰勝國間的矛盾。這些戰勝國都稱爲盟國。誠然，美國並沒有加入協約國，但是它曾經同協約國結成聯盟打過德國。現在正是這些盟國在拚命擴充軍備。它們擴充軍備是要對付誰呢？從前，當協約國擴充軍備的時候，通常總是以德國爲藉口，說它武裝到了牙齒，說它威脅着世界和平，因此必須擴充軍備來保衛自己。而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德國已經不是一支武裝力量，因爲它已經被解除武裝。但是現在各戰勝國擴充軍備却比任何時候都要加緊。比如說，應當怎樣解釋法國空

軍驚人擴充這一事實呢？應當怎樣解釋英國軍備特別是英國海軍驚人擴充這一事實呢？應當怎樣解釋美日兩國海軍驚人擴充這一事實呢？這些共同戰勝了德國並且共同解除了德國武裝的『盟友』先生害怕的是什麼，害怕的是誰呢？他們害怕的是什麼？他們爲什麼要擴充軍備呢？第二國際的和平主義究竟在哪裏呢？爲什麼第二國際高喊和平却看不見——彷彿看不見——那些曾經正式自稱爲朋友的『盟國』正在瘋狂擴充軍備來對付『不存在的』敵人呢？國際聯盟和第二國際採取了什麼辦法來制止瘋狂擴充軍備的行爲呢？難道他們不知道在擴充軍備的情況下『槍砲會不開自響』嗎？不要期待國際聯盟和第二國際的答覆吧。這裏的問題在於各戰勝國彼此間因爭奪利益而產生的矛盾在日益增長和加深，它們之間的衝突日益成爲不可避免，而它們既預察到新的戰爭，於是就用盡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來擴充軍備。要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各戰勝國現在並沒有友好的和平，而只有武裝的和平，只有醞釀着戰爭的武裝和平狀態，那並沒有誇大。現在各戰勝國間的情況很像一九一四年大戰前的情況——武裝和平狀態。

歐洲各國的執政者現在力圖用關於和平主義的叫囂來掩蓋這一事實。可是我已經說過這種和平主義有多大價值以及它應當得到什麼樣的評價。布爾什維克從熱那亞會議召開時起就要求裁減軍備⁽⁵⁾。爲什麼第二國際和其他和平主義的空談家們不來支持我們的提議呢？

這種情況再次說明，歐洲各國用受人奴役的代價換來的那種暫時的局部的穩定是不鞏固的，因爲各戰勝國間的矛盾在日益增長和加深，更不必說戰勝國和戰敗國間的矛盾了。

五、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

現在來談第五類矛盾即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矛盾。

這方面主要的一點，就是無所不包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經不再存在了。自從蘇維埃國家出現以後，自從舊俄國變成蘇聯以後，無所不包的世界資本主義就不再存在了。世界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帝國主義陣營和反帝國主義陣營。這是必須指出的第一點。

這方面必須指出的第二點，就是現在領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是兩個主要國家——英國和美國即英美聯盟。領導對帝國主義不滿的國家和同帝國主義作殊死鬥爭的國家的是我國——蘇聯。

第三點，就是現在形成了兩個主要的然而互相對立的吸引中心，並且與此相適應在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傾向於這兩個吸引中心的兩種趨向：各資產階級政府傾向於英美，西方的工人和東方的革命者傾向於蘇聯。英美兩國是用它們的財富來吸引人的，從它們那裏可以得到借款。蘇聯是用它的革命經驗，用它為工人擺脫資本主義、為被壓迫人民擺脫帝國主義而進行的鬥爭的經驗來吸引人的。我說的是歐洲的工人和東方的革命者嚮往於我國的趨向。你們知道，到我國來訪問對於歐洲的工人或被壓迫國家的革命者來說具有什麼意義，他們怎樣紛紛來我國訪問，全世界的一切忠誠的革命者怎樣嚮往我國。

兩個陣營，兩個吸引中心。

第四點，就是在這個陣營裏，在資本主義陣營裏，沒有一致的利益和團結；那裏充滿着利害衝突、分崩離析的現象，戰勝國和戰敗國間的鬥爭，各戰勝國本身間的鬥爭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因爭奪殖民地和利潤而引起的鬥爭。由於這一切，這個陣營的穩定是不可能鞏固的，而在我們國家裏則有一個健康的日益鞏固的穩定；我國的經濟在日益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向前推進，在我們整個陣營裏，西方和東方的一切不滿分子和階層逐漸地和不斷地團結到我國無產階級周圍，團結到蘇聯周圍來。

在資本主義陣營那裏呈現着不和與瓦解的現象。在社會主義陣營這裏大家在反對共同敵人即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團結一致和利益愈來愈趨於一致。

這就是我想在第五類矛盾即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世界之間的矛盾方面指出的幾件主要事實。我想特別談一件事實，這件事實就是我說的全世界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嚮往於我國無產階級的那種趨向。我指的是各國工人代表團來我國訪問這一事實，他們仔細地觀察我國建設中的每個角落，以便深信我們不但能够破壞舊東西，而且能够建設新東西。反映目前西方工人運動發展中整整一個階段的工人代表團紛紛來我國訪問這一事實有什麼意義呢？你們已經聽到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人是怎樣接待英國工人代表團和德國工人代表團的。你們是不是注意到我們各個管理機關的領導同志不只是向工人代表團的代表們介紹情況而簡直是向他們彙報工作？當時我不在莫斯科，我因事在外，但是我讀到報紙，知道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捷爾任斯基同志不是簡單地向德國工人代表團介紹

情況，而是向他們彙報工作。這是我國生活中一種新的、特殊的現象，我們必須予以特別注意。我從報上知道，我國石油工業的領導人——柯秀爾在格羅茲內和謝列勃羅夫斯基在巴庫——不是像對一般參觀者那樣簡單地向工人代表們介紹情況，而是像對最高監督機關那樣向工人代表團彙報工作。我從報上知道，我們的一切最高機關（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地方的執行委員會都準備向工人代表團彙報工作，認為他們是西方工人階級派來對我國建設、對我們這個工人國家實行兄弟般的友好的監督的代表。

所有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它們說明兩件事情。第一，說明歐洲工人階級——至少是歐洲工人階級中的革命部分——認為我國是他們的產兒，說明工人階級派代表團到我國來不是因為好奇，而是爲了看一看我們這裏的情況怎樣以及我們在做什麼，他們顯然認爲自己對於我們在這裏所建設的一切負有道義上的責任。第二，說明歐洲無產階級中的革命部分把我國認做自己的子女，把我國看做自己的產兒，決心來捍衛它，並且在必要時甘願爲它戰鬥。你們試指出還有哪一個國家——哪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敢於把自己置於其他國家的工人代表團的兄弟般的監督之下！你們指不出這樣的國家，因爲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家。只有我們的國家，即工農國家，才能够這樣做。我國既然對各國工人代表團表示最大限度的信任，那末也就能取得歐洲工人階級方面的最大限度的信任。對我們的這種信任在我們看來比任何借款都要寶貴，因爲工人對我們國家的這種信任是抵抗帝國主義及其武裝干涉陰謀的主要藥劑。

這就是我們國家和西方無產階級相互關係上由於工人紛紛來我國訪問而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那種變化的根源。這就是許多人所沒有覺察到而在現在却具有決定意義的新現象。既然我們被認定是歐洲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被認定是歐洲工人階級的產兒，既然歐洲工人階級根據這一點而對我國擔負道義上的責任，比如說，在我國一旦受到武裝干涉時擔負保衛我國免遭資本主義侵犯的任務，擔負保衛我國利益而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那末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我們的力量正在增長，並且將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的。這說明資本主義的軟弱程度將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的。因為在今天沒有工人參加就不能作戰。既然工人不願意對我們共和國作戰，既然他們認為我們共和國是他們的產兒，而這個產兒的命運又同他們緊密地聯系着，那末要對我國進行戰爭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工人代表團紛紛來我國訪問的秘密、根源和意義，這種訪問已經進行並且還會進行，這種訪問我們應當竭力鼓勵，因為這是我國工人和西方各國工人互相團結的保證，是鞏固我國工人和西方各國工人間的親密友誼的保證。

這裏不妨簡略地談一談來我國訪問的代表團的數量。不久以前，我聽說在莫斯科黨代表會議上有位同志向李可夫提出一個問題：『這些代表團豈不是使我們耗費太大了嗎？』同志們，決不能說這樣的話。對於前來我國訪問的工人代表團決不能說這樣的話。這樣說是可恥的。爲了幫助西方工人階級派代表到我們這裏來訪問，幫助他們確信工人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不但能夠破壞資本主義，而且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應當害怕任何耗費和任何犧牲。西方的工人，至少是他們中

間的許多人，至今還深信工人階級非靠資產階級不可。這種偏見是西方工人階級的主要病症，是社會民主黨人傳染給他們的。爲了使西方工人階級有可能通過自己的代表確信工人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不但能够破壞舊東西，而且能够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怕任何犧牲。爲了使西方工人階級有可能確信我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國家，他們在西方值得爲它戰鬥，他們值得保衛它而去反對本國資本主義，我們不怕任何犧牲。（鼓掌）

我們這裏已經來過三種代表團：知識分子代表團即教師等等的代表團；成年工人代表團，這種代表團粗略地計算一下大約有十個；青年工人代表團。總共有五百五十位代表和參觀者到我國來過。會向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登記過的還有十六個代表團，它們不久也要來訪問。今後我們還要推動這件事務，以便鞏固我國工人階級和西方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系，從而造成一座屏障以防止任何武裝干涉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腐蝕資本主義的那些基本矛盾的特徵。

從這一切矛盾中究竟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它們說明什麼呢？它們說明：資本主義世界正被許多內部矛盾腐蝕着，這些矛盾使資本主義軟弱無力；另一方面，我們的世界，社會主義世界，却愈來愈聯合，愈來愈團結；因此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一種暫時的均勢，這種均勢結束了侵犯我國的戰爭，並且開闢了蘇維埃國家和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階段。

我還要提到兩件事實，這兩件事實對我們由戰爭時期進入「和平共處」階段這一轉變也有影響。

第一件事實就是目前美國不希望歐洲爆發戰爭。它彷彿對歐洲這樣說：我借給了你幾十億，如果你今後還想借錢，如果你不願意你的通貨大大貶值，那你就不要胡作非爲，就應該安心工作，賺些錢來償付借款的利息。未必用得着證明，美國所貢獻的這種意見，即使對歐洲不起決定性的作用，無論如何也不能不發生影響。

第二件事實就是從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時起，擁有龐大銷售市場和龐大原料產地的整整一個龐大國家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當然不能不影響歐洲的經濟狀況。失去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失去我國的市場和原料產地，這對資本主義的歐洲來說，意味着使它的生產縮小，根本動搖它的生產。因此，要消除歐洲資本和我國隔絕的狀態，要消除歐洲資本和我國市場以及原料產地隔絕的狀態，就必須和我們「和平共處」一個階段，以便擠到我國的市場和原料產地裏來，——不然，歐洲的經濟就不可能達到任何程度的穩定。

六、蘇聯的外部狀況

以上所說的這一切因素，決定了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間的某種均勢，使喘息時期代替戰爭時期，使短促的喘息時機變成整整的一個喘息時期，使我們有可能像伊里奇所說的那樣去和資本主義世界實行某種「合作」。

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承認」蘇聯的時期，這個時期已經開始而且還要延續下去。

我不想列舉有哪些國家『已經承認』我國。大國中還沒有承認我國的彷彿只有美國了。我也不想多談我們在被『承認』後比如說已經和德國及意大利簽訂了通商條約。我不想詳細地談我國的對外貿易額已經大大增加；對這種貿易特別感到興趣的有向我國輸出棉花的美國，有輸入我國糧食和農產品的英國和德國。可是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自從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共處』的階段確立以來，我們今年才開始在比較廣闊的範圍內和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紛繁而廣泛的貿易關係。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消滅了一切所謂隱諱的事，已經消滅了我國與西方各國間曾經有過而且現在還有的一切所謂要求和反要求。我們知道有人要求我們償還債款。這點歐洲還沒有忘記，大概也不會忘記，至少不是很快就會忘記的。他們對我們說，我國戰前積欠歐洲各國的債款等於六十億盧布，軍事債款估計為七十多億盧布，這樣總數就達一百三十多億盧布。如果估計到通貨貶值並且從這個數目中除去邊陲國家所應承擔的部分，那末我們還欠西歐各國七十多億盧布。大家知道，我國因在國內戰爭時期受英法美三國武裝干涉而向它們提出的反要求，據拉林計算彷彿是五百億盧布。這就是說，它們欠我們的債款比我們欠它們的要多四倍。（拉林喊道：『我們一定會取得這筆款子的。』）拉林同志說，我們總有一天會取得這筆款子的。（笑聲）如果我們像財政人民委員部那樣更精確地來計算一下，那末至少也能得到二百億盧布。我們結果還是贏了錢的。（笑聲）但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不願意容忍這一點，因此我們至今還是被他們列在債務人名單上。

正因為如此，我們在跟資本家談判時總是遇到各種困難和阻礙。過去跟英國談判時是如此，將來

跟法國談判時想必也是如此。

我們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怎樣的呢？

中央的立場還是像同麥克唐納簽訂條約〔五〕時所採取的立場一樣。

我們不能撤銷我國在一九一八年頒佈的關於取消沙皇政府所欠債務的著名法令〔五〕。我們還要實行這項法令。我們不能撤銷那些已經宣佈的使剝奪剝奪者在我國合法化的法令。我們現在實行並且將來還要實行這些法令。然而我們並不反對在過去沙皇政府的債務方面用切合實際的談判方式對英法兩國作某些例外的讓步，以便付出少量的錢而換回某些東西。我們並不反對把企業經營權出讓給從前的私有者，但是仍然要使這種出讓的條件不能是奴役性的。我們是在這種基礎上和麥克唐納達成協議的。事實上取消軍事債款的思想是這次談判的基礎。正因為如此，這個條約也就被人撕破了。是誰撕破的呢？無疑是美國。雖然美國並沒有參加拉柯夫斯基和麥克唐納的談判，雖然麥克唐納和拉柯夫斯基共同商定了一個衆所周知的協定草案，雖然這個協定草案使雙方都能有出路，使雙方的利益多多少少都能得到滿足，但是因為這個草案是以取消軍事債款的思想爲出發點的，而美國又不願意破這個例，怕那樣做會喪失歐洲欠它的幾十億錢，所以美國便『提出忠告』，結果條約就被撕破了。雖然如此，我們現在還是以上述草案爲立足點的。

從我國對外政策方面的問題中，從報告涉及的時期內發生的問題中，從牽涉到我國政府和西歐各國政府相互關係的那些特別棘手和特別迫切的問題中，我想提出下面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

英國保守黨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而且還會繼續提出的問題即關於宣傳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的問題。

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不論在歐洲或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內都進行着特種宣傳來反對帝國主義。英國保守黨人硬說，俄國共產黨人是一些負有摧毀不列顛帝國威力的使命的人。我想在這裏聲明，這一切完全是胡說。我們不需要在西方或東方進行任何特種宣傳，因為各國工人代表團親自到我們這裏認識我國制度並且把關於我國制度的消息傳到西方各國去。我們不需要任何其他宣傳。這是擁護蘇維埃制度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和最有效的宣傳。（鼓掌）

有人說我們在東方進行宣傳。我肯定說，這也完全是胡說。我們不需要在東方進行任何特種宣傳，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整個國家制度是建立在我國各族人民和睦共處和兄弟般合作的基礎上的。到我國來住過半年的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埃及人，每一個印度人，都有可能深信，我國是唯一了解被壓迫民族人民的心意的國家，是唯一能使從前統治民族中的無產者和從前被壓迫民族中的無產者彼此合作的國家。我們不需要在東方進行任何其他宣傳，也不需要任何其他鼓動，只要那些來自中國、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團在我們這裏進行研究和考察以後把關於我國制度的消息傳到全世界去就行了。這是最好的一種宣傳，是各種各樣宣傳中最有效的一種宣傳。

然而有一種力量能够摧毀而且一定會摧毀不列顛帝國。這就是英國保守黨人。這是一種必定會把不列顛帝國引向滅亡的力量。只要回憶一下保守黨人上台執政（言）時所施行的政策就足够了。他們是

從哪方面開始的呢？是從制服埃及、加緊壓迫印度、干涉中國等等開始的。這就是保守黨人的政策。既然英國貴族沒有本領施行別的政策，那末又能怪誰呢？又能責備誰呢？既然保守黨人走上這條道路，那末他們必定會像二乘二等於四一樣把不列顛帝國引向滅亡，這難道還難懂嗎？

關於共產國際，現在我來講幾句話。在西方，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和偽造信件的人散佈謠言，說共產國際是陰謀家和恐怖分子的組織，說共產黨人到西方各國去製造陰謀反對歐洲各國的執政者。比如他們說保加利亞的索非亞爆炸事件和共產黨人有聯系。我必須聲明，每一個有文化的人，只要不是一竅不通或是被人收買，都一定會知道，共產黨人無論過去或現在與個人恐怖的理論和實踐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聯系，共產黨人無論過去或現在與陰謀陷害個別人物的理論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聯系。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踐是在於組織羣衆性的革命運動去反對資本主義。這是對的。這是共產黨人的任務。只有愚人和白痴才會把陰謀和個人恐怖手段與共產國際對羣衆性的革命運動所採取的政策混爲一談。

關於日本，現在我來講幾句話。在西方，我們的某些敵人洋洋得意地說：看呀，中國境內已經開始了革命運動，這當然是布爾什維克收買了中國人民，不是他們又有誰會收買四萬萬中國人民呢？而這就一定會使「俄國人」和日本人打起來。同志們，這一切都是胡說。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無窮盡的。這種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它在將來一定會表現出來。東方和西方的執政者看不見這種力量，不充分估計這種力量，他們一定要吃虧。我們作爲一個國家不能不估計到這一力量。我們認爲目

前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從前美國在統一爲一個國家時所要解決的那個問題，就是從前德國在形成爲一個國家和實現統一時所要解決的那個問題，也就是從前意大利在實現統一和逐走外敵時所要解決的那個問題。這裏真理和正義完全在中國革命方面。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同情並且將來還會同情中國革命，同情它爲使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者的枷鎖並把中國統一爲一個國家而進行的鬥爭。誰在現在和將來不估計到這一力量，誰就一定要失敗。我想日本一定會了解，中國民族運動這日益壯大的力量，這一不斷前進並在掃除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的力量，是日本也應該估計到的。張作霖之所以必定滅亡，正是因爲他不了解這一點。但是他的必定滅亡，還由於他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建築在使蘇日兩國發生糾紛和關係惡化這個基礎上。滿洲的任何一個將軍，任何一個執政者，要是他把自己的政策建築在使我國和日本發生糾紛，使我國和日本的關係惡化這個基礎上，他就一定會遭到滅亡。他們中間只有把自己的政策建築在使我國和日本的關係好轉，使我國和日本接近這個基礎上的人，才能站住脚跟，只有這樣的將軍和執政者才能在滿洲坐穩，因爲使我國同日本關係尖銳化對我們是沒有好處的。我國只有同日本接近才有好處。

七、黨的任務

現在來談談我們黨因外部狀況而產生的任務問題。

就黨的工作的內容來說，我認爲黨在這裏的任務應該分爲兩方面，即國際革命運動方面和蘇聯

對·外·政·策·方·面。

在國際革命運動方面有哪些任務呢？

第一項任務就是：鞏固西方各國的共產黨，使這些共產黨爭得工人羣衆的大多數。第二項任務就是：加強西方各國工人爲工會的統一，爲鞏固我們聯盟的無產階級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間的友誼而進行的鬥爭。這裏也包括外國工人紛紛來我國訪問的活動，關於這種活動和它的意義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第三項任務就是：鞏固我國無產階級和各被壓迫國家解放運動間的結合，因爲各被壓迫國家是我們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同盟者。第四項任務就是：鞏固我國社會主義成分，使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這種勝利對於世界各國工人革命化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同志們在談到我們黨在國際革命運動方面的任務時，通常總是局限於前三項任務而忘記第四項任務，殊不知我們在國內所進行的鬥爭，爲使我國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而進行的鬥爭，在建設方面所進行的鬥爭，就其意義來說，也是國際性的鬥爭即國際主義的鬥爭，因爲我國是國際革命的根據地，因爲我國是使國際革命運動擴展的主要槓桿，如果我們這裏的建設工作按照應有的速度進行，那就是表明我們在國際革命運動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正是像黨所要求於我們的那樣進行的。

這就是黨在國際革命運動方面的一些任務。

現在來談黨在我們聯盟的對·外·政·策·方·面的任務。

第一項任務就是：反對新戰爭，維護和平並保持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正常關係。我國政府的

對外政策是以和平思想爲基礎的。爭取和平，反對新戰爭，揭穿爲準備新戰爭而採取的一切步驟，揭穿用和平主義幌子來掩蓋事實上準備戰爭的那些步驟，——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正因爲如此，我們不願意加入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是掩蓋戰爭準備工作的組織，要加入國際聯盟，正像李維諾夫同志所正確說過的，就必須在鐵錘和鐵砧之間作一選擇。然而我們既不願意成爲敲打弱小民族的鐵錘，也不願意成爲受強大民族敲打的鐵砧。我們既不想當這個，也不想當那個。我們主張和平，我們主張揭穿一切準備戰爭的步驟，不管這些步驟是用哪種和平主義幌子掩蓋起來的。無論是國際聯盟或是羅迦諾公約——反正都一樣，用幌子是欺騙不了我們的，用叫囂是嚇唬不了我們的。

第二項任務就是：在對外貿易壟斷的基礎上擴大我國和外界的貿易。

第三項任務就是：和那些在帝國主義大戰中遭到失敗的國家接近，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那些最受委屈和分贓最少因而對統治地位的強國聯盟抱反對態度的國家接近。

第四項任務就是：聯合附屬國及殖民地國家。

以上就是目前黨在國際關係方面和國際工人運動方面的任務。

二 蘇聯的內部狀況

現在我來談談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所涉及的是我國的內部狀況和中央委員

會在同內部狀況有關的問題上的政策。我要舉出一些數字。雖然近來在報刊上已經公佈了不少數字，但是很遺憾，不舉出一些數字是不行的。

一、整個國民經濟

在沒有列舉數字之前，讓我談談決定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工作的幾個一般原理（我想從經濟方面談起）。

第一原理。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工作和建設的。這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和我國的建設將在我國經濟體系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矛盾和衝突中發展起來。這種矛盾我們是無法避免的。這是一種範圍，在這種範圍內，兩個體系即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必定進行着鬥爭。此外，這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建設不僅要在它同外部資本主義經濟相對立的情況下進行，並且要在我國內部各種不同的成分相對立的情況下，即在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相對立的情況下進行。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該這樣來建設我國的經濟：使我國不致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屬品，使我國不致被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總體系中去成爲它的輔助企業，使我國經濟不是作爲世界資本主義的輔助企業發展起來，而是作爲獨立的經濟單位發展起來，這種獨立的經濟單位主要是依靠國內市場，依靠我國工業和我國農民經濟的結合。

有兩條總路綫，一條總路綫的出發點是，我國還應該在長期內保留爲一個農業國，應該輸出農產

品而輸入設備，並且應該堅持這條道路，今後也應當沿着這條道路發展下去。這條路綫實際上是要求收縮我國的工業。這條路綫不久前在沙寧所寫的提綱（也許有人已經在『經濟生活報』^(註)上讀過這個提綱了）中得到了反映。這條路綫將使我國永遠或者差不多永遠不能實現真正的工業化，將使我國客觀上必然由依靠國內市場的獨立的經濟單位變成資本主義總體系的附屬品。這條路綫就是要離開我國建設方面的各種任務。

這不是我們的路綫。

還有另一條總路綫，它的出發點是，我們應該竭盡全力使我國成為經濟上獨立自主而依靠國內市場的國家，成為能把其他一切逐漸脫離資本主義而進入社會主義經濟軌道的國家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的基地。這條路綫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展我國工業，但是這種擴展要估計到並且要適應我國擁有的資源。這條路綫堅決摒棄把我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附屬品的政策。這就是我們的建設路綫，就是黨現在遵循的並且今後還要遵循的路綫。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這條路綫就是必需的。

如果革命在德國或者法國取得勝利，或者在這兩個國家內同時取得勝利，如果那裏開始在更高的技術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那又是一回事了。那時，我們就會從把我國變成獨立的經濟單位的政策，轉到把我國納入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的政策。但是當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我們絕對必須使我國國民經濟保持最低限度的獨立性，否則就不能保護我國，使我國在經濟上不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支配。

這就是第一個原理。

第二個原理。我們在建設中應該像對第一個原理一樣奉爲指針的第二個原理，就是隨時都要估計到我們對國民經濟的領導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的特點。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是私人資本佔統治地位，那裏各個資本主義托拉斯、辛迪加和各個資本家集團所犯的錯誤，是由市場上的自發勢力來糾正的。如果生產得太多了，就會發生危機，但是在危機過去之後，經濟又會轉入常態。如果輸入過多而造成貿易逆差，票據行市就會波動，就會發生通貨膨脹，入口縮減，出口增加。這一切都是危機發生時的通常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任何一種較爲重大的錯誤，任何一次較爲嚴重的生產過剩或生產和需求總量之間的嚴重脫節現象，都不可避免地要由某種危機來糾正。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就是這樣生活着的。但是我們決不能這樣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所發生的經濟危機、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都只是觸及個別資本家集團。而在我們這裏却是另一種情況。商業和生產中的每次嚴重停滯，我國經濟中的每個嚴重失算，都不會只以某種個別危機來結束，而一定會打擊到整個國民經濟。每次危機，不論是商業危機、財政危機或工業危機，在我們這裏都可能變成打擊全國的總危機。因此，我們在建設方面就應當特別謹慎小心，應當具有遠見。因此，我們在按計劃領導經濟方面，必須做到使失算的情況減少，使我們領導經濟的工作極爲明智，極爲謹慎小心，極其正確無誤。但是，同志們，很遺憾，既然我們不特別明智，也不特別謹慎小心，又不特別善於正確地領導經濟，既然我們不過是在學習建設，那末我們就會有錯誤，並且將來還會犯錯誤。因此，我們在建設時應當擁有後

備，我們需要有能够彌補我們的各種缺陷的後備。我們最近兩年來的全部工作表明，我們既不能保證不發生意外，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在農業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決於我們的經營管理，而且取決於自然界的力量（如歉收等等）。在工業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決於我們的經營管理，而且還取決於我們還沒有掌握住的國內市場。在對外貿易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決於我們，而且取決於西歐資本家的行爲，而我國的出口和進口愈發展，我們也就愈依賴於資本主義西方，愈容易受到敵人的打擊。爲了保證自己不受這一切意外事件和不可避免的錯誤的影響，我們應該懂得必須積累後備的思想。

我們在農業方面不能保證不發生歉收。因此就需要有後備。我們在我國工業發展方面不能保證國內市場不發生意外事件。更不用說我們既然是靠自己積累的資金過活，我們在花費所積累的資金方面就應該特別節省和審慎，盡力做到使每個戈比都用得合理，把每個戈比用到某一時期所絕對必需發展的事業上去。因此就需要有供工業使用的後備。我們在對外貿易方面不能保證不發生意外事件（隱蔽形式的抵制，隱蔽形式的封鎖等等）。因此就需要有後備。

本來可以把農貸發放的數目增加一倍，但是這樣做就會缺乏必要的後備來資助工業，工業發展就會遠遠落後於農業，工業品的產量就會縮減，結果就會發生工業品價格高漲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本來可以把用做擴展工業的撥款增加一倍，但是這就會使工業的發展速度太快，我們會因大大

缺少閒置資金而不能保持這種發展速度，因此我們就一定會遭到挫折，更不用說缺乏充分的後備來發放農貸了。

本來可以把我國的進口額，主要是設備的進口額比現有的進口額增加一倍，以便迅速地推進工業發展，但是這會引起輸入超過輸出，造成貿易逆差，使我國金融受到破壞，就是說，使工業能夠借以實行計劃和發展的唯一基礎受到破壞。

本來可以不管國內市場狀況如何，不顧一切地拚命擴大出口額，但是這一定會在城市中引起嚴重後果，使農產品的價格迅速上漲，因而使工資遭到破壞，發生某種人為的飢荒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本來可以盡量提高人工工資，不僅可以把它提高到戰前水平，並且可以把它提得更高些，但是這種情況會降低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因為在我國的條件下，在缺少外債、缺少貸款等等的情況下，擴展工業只能依靠積累某些為資助和滋養工業所必需的利潤，但是如果我們過快地提高工資，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是說不能有比較大量的積累。

如此等等。

這就是我們在我國的建設工作中應該奉為指南，應該當做燈塔的兩個基本指導原理。
現在讓我來談談數字。

不過，我還要離開主題講一點。我國經濟體系中情況有些複雜，整整有五種經濟成分。第一種經

濟成分差不多是自然經濟的成分，這就是商品產量極少的農民經濟。第二種經濟成分是商品生產的經濟成分，在這種成分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農民經濟中的商品生產。第三種經濟成分是私人資本主義，它還沒有消滅掉，還在活躍，並且只要我們還實行新經濟政策，它還會在一定範圍內活躍着。第四種經濟成分是國家資本主義，即我們容許它存在並且有可能按照無產階級國家的要求來加以監督和限制的那種資本主義。最後，第五種經濟成分是社會主義工業，即我們的國營工業，在這種成分的生產中沒有兩個彼此敵對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只有一個階級——無產階級。

我想簡單地談談這五種經濟成分，因為不這樣簡單地說明一下，便很難了解我將要宣佈的那些數字，很難了解我國工業發展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趨勢，況且關於我國制度中的這五種經濟成分，列寧曾十分詳細地談到過^(參)，他教導我們要善於在我們的建設工作中估計到這幾種經濟成分間的鬥爭。我想簡單地談談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類型的國營工業，以便消除黨內對這個問題所產生的誤解和糊塗觀念。

—— 能不能把我們的國營工業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呢？不能。為什麼呢？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存在着兩個階級的生產組織：一個是佔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另一個是不佔有生產資料的被剝削階級。不管國家資本主義具有何種特殊形式，但是按實質來說它終究應當是資本主義的。伊里奇在分析國家資本主義時所指的首先是租讓企業。就拿租讓企業來說，那裏是不存在着兩個階級呢？是的，是存在着兩個階級的。一個是資產階級，即從事剝削和暫時佔有生產資

料的承租企業家，另一個是受承租企業家剝削的無產階級。這裏是沒有社會主義成分的，這一點只要從下面的事實就可以明顯地看出：誰都不敢跑到租讓企業中去進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運動，因為大家知道，租讓企業是非社會主義的企業，是同社會主義不相干的企業。

再拿另一種類型的企業即國營企業來看。這種企業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呢？不，不是的。爲什麼呢？因爲這種企業中不存在兩個階級，只存在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它通過自己的國家來掌握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它不受剝削，因爲企業中生產出來的一切除了支付工資以外，最大部分是用來繼續擴大工業，即用來改善整個工人階級的狀況。

有人會說，如果估計到我國企業管理機關中還存在官僚主義殘餘，那末這終究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是這同國營工業按類型來說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這一點並不矛盾。有兩種類型的生產：一種是資本主義類型的生產，其中包括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生產，那裏存在着兩個階級，那裏在爲資本家的利潤進行生產；另一種是社會主義類型的生產，那裏沒有剝削，那裏生產資料屬於工人階級，那裏企業不是爲異己階級的利潤進行生產，而是爲全體工人擴大工業進行生產。列寧正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國營企業按類型來說是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

這裏可以拿我們的國家來比擬一下。我們的國家也叫做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爲它按列寧的說法是新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國家機關並不像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國家那樣爲了壓迫工人階級而工作，而是爲了使工人階級擺脫資產階級的壓迫而工作。正因爲如

此。我們的國家按類型來說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雖然在這個國家的機關中還能找到許多壞分子和舊時代的殘餘。列寧宣佈了我國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嚴厲地譴責了我們蘇維埃制度中的官僚主義殘餘。雖然如此，他始終肯定說我們的國家是新型的無產階級國家。應該把國家的類型同國家系統和國家機關中保留下來的那種遺毒和殘餘區別開來。同樣也必須把國營企業中的官僚主義殘餘同我們稱爲社會主義類型的那種工業組織區別開來。決不能因爲經濟機關或托拉斯中還存在着錯誤和官僚主義等等，就說我們的國營工業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決不能這樣說。如果這樣說，那末我們這個按類型來說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也不能稱爲無產階級的國家了。我可以舉出許多資產階級機關，它們比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工作得更好更節約。但這還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機關就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我們的國家機關按類型來說就不高於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了。爲什麼呢？因爲這種資產階級機關雖然工作得好些，但它是在爲資本家工作，而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即使它有時不免搖擺不定，但它畢竟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而爲無產階級工作的。

這種原則上的差別是不能忘記的。

關於國營工業也應當這樣說。決不能因爲我們國營企業管理機關中現在存在着並且將來還會有不協調現象和官僚主義殘餘，決不能因爲這些殘餘和這些缺點存在，而忘記我們的企業按實質來說就是社會主義的企業。比如說，在福特的某些工作得不錯的企業中，也許偷竊現象要少些，但這些企業終究是在爲福特，在爲資本家工作，而我們的企業，雖然有時發生偷竊現象，事情不總是很順利的；

但它們終究是在爲無產階級工作。

這種原則上的差別是不能忘記的。

現在，來談談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數字。

農業。如果拿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水平和戰前即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相比，則我國農業總產值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一。換句話說，在一九一三年出產了一百二十餘億盧布（按戰前價格計算）的產品，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則出產了九十餘億盧布的產品。到下半年度，即到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根據我們各個計劃機關的材料來看，產值將進一步提高到一百一十億盧布，即提高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農業在日益發展，——這是自然要得出的結論。

工業。如果拿我國全部工業、國營工業、租讓工業和私營工業來說，全部工業在一九一三年的總產值爲七十億盧布，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則爲五十億盧布。這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七十一。我們各計劃機關預定，下半年度的產值將要達到六十五億盧布，即約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三。工業在日益發展。它在本年度內比農業發展得更快。

特別有必要指出電氣化問題。按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在一九二一年的計劃規定，在十年至十五年時間內應該建成三十個電站，其發電能力總共爲一百五十萬瓩，費用爲八億金盧布。十月革命以前各電站的發電能力總共爲四十萬零二千瓩。我們現在已經建成了發電能力總共爲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瓩的電站，預定在一九二六年將有發電能力達三十二萬六千瓩的發電站發電。如果按這樣的

速度發展下去，那末在十年內，即大約到一九三二年（最低限度的預定期限），蘇聯的電氣化計劃就可以實現。電力工業隨着電站建設的發展而日益發展，它的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生產計劃預定要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七十。但是，必須指出，建築巨大水電站的費用竟大大超過了原定的計劃。例如，沃爾霍夫水電站建築費最初預算「暫定」為二千四百三十萬盧布，而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却增加到九千五百二十萬切爾文盧布，即等於建造頭批電站所花費的資金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九，而沃爾霍夫水電站的發電能力只等於這批電站總發電能力的百分之三十。捷莫—阿夫恰里水電站的建築費最初的預算為二百六十萬金盧布，但是最近要求的費用約達一千六百萬切爾文盧布，並且其中約有一千二百萬切爾文盧布已經花掉了。

如果我們拿這樣或那樣聯合起來的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的生產同私營工業的生產來比較一下，那就可以看到如下的情況：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佔全年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六點三，而私營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所佔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九點三，私營工業所佔的比重已經不是百分之二十三點七，而是百分之二十點七了。

在這個時期內，私營工業所佔的比重下降了。明年度預定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所佔的比重約達百分之八十，而私營工業所佔的比重將減到百分之二十。在絕對數量方面，私營工業是有增長的，但是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增長得更快，所以私營工業所佔比重也就逐漸下降了。

這是一件不能忽視的事實，它說明了社會主義工業對私營工業的優勢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如果拿集中在國家手裏的財產和私有主所掌握的財產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這方面——我指的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控制數字——也是無產階級國家佔優勢，因為國家擁有的基金總額至少等於一百一十七億切爾文盧布，而私有主，主要是農戶，所擁有的基金總額最多只達七十五億切爾文盧布。這一事實說明了，公營經濟的基金所佔的比重很大，並且這種比重和非公營部分的財產所佔的比重相比較，是在日益增長。

而我們整個制度終究是既不能稱為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稱為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整個制度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制度，在這裏，就總產值來說，私有主農民的生產還是佔優勢，但是這裏社會主義工業所佔的比重却在不斷地增長。社會主義工業所佔的比重在不斷地增長；它利用本身的集中性，利用本身的組織性，利用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運輸業掌握在國家手中以及信貸系統和銀行都歸我們掌握的事實，利用這一切，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在全國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逐漸增大，不斷向前邁進，開始使私營工業服從它，使其餘一切經濟成分都適應它並且跟着它走。農村的命運也是這樣的：它應該跟着城市走，跟着大工業走。

這就是基本的結論，就是我們提到我國制度的性質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在這個制度中所佔比重問題，私營資本主義工業所佔比重問題，以及小商品生產，主要是農民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問題時，應該得出的基本結論。

現在簡單地談一下國家預算。你們大概知道，我國的預算已經增加到四十億盧布。如果拿戰前盧布來計算，那末我們現在的國家預算至少等於戰前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七十一。其次，如果全國預算總額加上可能計算的地方預算額，那末我們現在的國家預算至少等於一九一三年預算的百分之七十四點六。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國家預算結構中的非稅收部分的比重大大超過稅收部分的比重。這一切也說明了我國的經濟在日益發展和向前邁進。

關於我們去年從我國國營企業和合作社營企業方面所獲得的利潤問題，是有極重要意義的，因為我國是資金不足的國家，是得不到大批外債的國家。我們應該仔細地考察一下我國的工商企業、銀行和合作社，以便知道我們能夠用多少資金來進一步擴展我國工業。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有全國意義的國營工業和金屬工業總局似乎提供了約一億四千二百萬切爾文盧布的利潤，其中有七千一百萬繳入了國庫。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我們已經獲得三億一千五百萬盧布的利潤，按計劃規定，其中有一億七千三百萬繳入國庫。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有全國意義的國營商業提供了約三千七百萬盧布的利潤，其中有一千四百萬繳入了國庫。在一九二五年度，由於實行了降低價格的政策，我們所獲得的利潤較少，即獲得了二千二百萬盧布，其中約有一千萬將繳入國庫。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我們在對外貿易方面獲得了二千六百多萬盧布的利潤，其中約有一千七百萬繳入了國庫。在一九二五年度，對外貿易將要提供，正確些說是已經提供了四千四百萬盧

布，其中有二千九百萬繳入國庫。

根據財政人民委員部的計算，各銀行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提供了四千六百萬盧布的利潤，其中有一千八百萬繳入了國庫，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提供了九千七百多萬盧布的利潤，其中有五千一百萬繳入了國庫。

消費合作社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提供了五千七百萬盧布的利潤。農業合作社提供了四百萬盧布的利潤。

我剛才舉出的這些數字，是多少估計低了些的。原因你們是知道的。你們知道，我們各個經濟機關在計算時，總是考慮給自己多留一點來擴展業務。如果你們覺得這些數字小（這些數字確實是小），那你們就要估計到，它們是稍微估計低了些的。

現在簡單談談我國的對外貿易額。

如果以我國一九一三年度的全部貿易額為一百，那末我國對外貿易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已經達到了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一，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達到了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出口額為五億二千二百萬盧布，進口額為四億三千九百萬盧布，進出口總額為九億六千一百萬盧布，出超八千三百萬盧布。我國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發生貿易順差。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度的出口額為五億六千四百萬盧布，進口額為七億零八百萬盧布，進出口總額為十二億七千二百萬盧布，入超一億四千四百萬盧布。本年度我國對外貿易逆差是一億四千四

百萬盧布。

關於這一點，讓我稍微說明一下。

有些人講到本經濟年度的這種入超的時候，往往愛說是由於我國在這一年遭到歉收而輸入了許多糧食的緣故。但是我們只輸入八千三百萬盧布的糧食，而入超却是一億四千四百萬盧布。這種入超會造成什麼結果呢？結果就是，我們買得多買得少，輸入多輸出少，因而我們的收支情況發生了問題，我們的金融也發生了問題。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向我們指示說，黨無論如何要做到貿易順差至。我應當承認，我們大家，無論蘇維埃機關或是中央委員會，在這方面都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因為我們沒有執行黨給我們的指示。執行這個指示是有困難的，但是如果抓緊點，至少還是可以得到某些出超的。我們既然犯了這個嚴重錯誤，代表大會就應該加以糾正。順便說一句，中央委員會本身在今年十一月的專門會議上已經竭力設法糾正了這個錯誤，當時中央委員會在審查了我國進出口的數字後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我們在下半年度——在會議上我們已經草擬了我國下半年度對外貿易中的基本項目——對外貿易至少要有一億盧布的出超。這是必要的。這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國家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我們的資本很少，又沒有從國外輸入的資本，就是有，為數也極少，我國的收支要靠貿易差額來維持平衡，才能使我國切爾文貨幣不致有漲落，才能使我們的金融穩定，從而也才有可能進一步擴展我國工業和農業。你們大家都曾嘗過金融不穩定的滋味。我們不應該讓這種倒楣的事情重新出現，應該採取各種措施來根除一切在今後可能使我國金融陷於不穩定的因素。

關於我國整個國民經濟，關於工業和農業這兩個部門，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對其他各種經濟所佔的比重，以及關於我講過的和我們黨中央委員會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指導思想等方面的數字和意見就是這樣。

二、工業和農業

如果再拿直接關係到工業和農業在現在和最近的將來的相互關係的各個問題考察一下，那末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爲下面幾點。

第一、我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產值超過工業產值。工業的基本狀況是：它已經接近戰前的水準，工業繼續前進的步驟就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擴展工業，利用新設備和建設新工廠。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要跨過這道門檻，即從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國工業中原有的一切的政策，過渡到在新技术基礎上和在建設新工廠的基礎上建設新工業的政策，是需要大量資本的。但是我國資本很不足，所以將來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大概不會像迄今以前那樣快。

農業方面的情况却不是這樣。決不能說，農業在它現今的技術基礎上所蘊藏着的一切潛力都已經挖掘盡了。農業不同於工業：它在現今的技術基礎上也能迅速發展一個相當時期。單是把農民的 cultural 水平提高一下，單是實行淨種這樣的辦法，就能把農業的總產值提高百分之十至十五。你們計算一下，這對全國有多大意義。可見，農業中還蘊藏着很大的潛力。這就是爲什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暫

時還沒有遇到像我國工業所遇到的那種技術方面的困難。因此，工業的發展和農業的發展不相適應的情況，在今後幾年內還會繼續加劇，因為農業中還蘊藏着許多潛力，這些潛力還遠沒有利用，在最近幾年內應該加以利用。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無論如何要發展我們的國營大工業，克服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其次，就是要發展蘇維埃地方工業。同志們，我們決不能只集中力量發展全國性的工業，因為全國性的工業，我們的集中的托拉斯和辛迪加，不可能滿足一億四千萬人民各種不同的口味和需求。爲了能夠滿足這些需求，必須使每個區、每個專區、每個省、每個區域、每個民族共和國的生活，即工業生活沸騰起來。如果不發揮各個地方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潛力，不盡量幫助區和專區以上的地方工業，不發揮所有這些力量，我們就不能使我國的經濟建設達到像列寧所說的普遍高漲。不這樣做，不把中央的利益同各個地方的利益結合起來，我們就不能解決發揮建設的主動性的問題，就不能解決我國經濟普遍高漲的問題，不能解決盡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第二、從前在燃料方面的問題是它的生產過剩。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却是燃料的危機，因為我國工業比燃料增長得更快。我們將接近我國在資產階級制度下的那種水平，當時我們由於燃料不夠而不得不輸入燃料。換句話說，就是燃料的產量和工業的需求量不相適應。因此，任務就是加緊發展我國的燃料業，改進燃料的開採技術，以便使燃料業的發展趕上或者說使它能夠趕上工業的發展。

第三、金屬的產量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需求量也有些不相適應。如果計算一下最低限度的金屬需求量和最高限度的金屬出產能力，那就可以看出我們還缺少價值數千萬盧布的金屬。我國的經濟，特別是我國工業，決不能繼續這樣發展下去。因此，對於這種情況應當予以特別注意。金屬是我國工業基礎的基礎，所以金屬產量必須同工業和運輸業的需求量相適應。

第四、我國熟練工人的數量和我國工業的需求量是不相適應的。報刊上已經公佈過許多數字，因此我不想再列舉這些數字，我只指出一點：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全部工業需要補充的熟練工人是四十三萬三千人，而我們却只能提供這個需求額的四分之一。

第五、我還要指出一個缺點和一個不相適應的情況，這就是各鐵路上的車輛的使用率已經超過了一切限度。對於車輛的要求是很高的，明年機車和車廂的利用率不能只是百分之一百，而是必須達到百分之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這樣，交通人民委員部的固定資本就會損耗過度，我們如果不採取堅決的措施，那在最近的將來災禍就會臨頭。

以上就是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內部，特別是工業內部所存在的必須加以克服的缺點和不相適應的情況。

三、商業問題

現在讓我來談談商業問題。數字表明，這方面也和工業方面一樣，國營部分和私人資本主義部

分相比較，它的比重是向上增長的。如果認定戰前的國內商業流轉總額按商品盧布計算是二百億盧布，那末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這項流轉總額就是一百億盧布，即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是一百四十億盧布，即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七十。國內商業流轉總額的增長是不用懷疑的。如果講到國營部分在全部國內商品流轉中所佔的比重，那末它的比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為百分之四十五，合作社部分的比重為百分之十九，私人資本部分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五。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國營部分的比重則為百分之五十，合作社部分的比重已經不是百分之十九，而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七，私人資本部分的比重已經不是百分之三十五，而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九了。私人資本部分在全部流轉中所佔的比重日趨下降，國營部分和合作社部分的比重則日益增長。如果把流轉分成兩個部分，即分為批發和零售，那末這裏也有同樣的趨勢。在批發方面，國營商業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全部流轉中所佔的比重為百分之六十二強，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則為百分之六十八點九。比重的增加是很明顯的。合作社部分已經由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九。私營商業在上年度佔百分之二十一，現在只佔百分之十一。在零售方面，國營部分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比重為百分之十六，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則幾乎達到百分之二十三。合作社部分上年度在零售方面的比重為百分之二十五點九，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則為百分之三十二點九。比重的增加是毫無疑問的。私人資本部分在零售方面的比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為百分之五十七，現在則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三。在零售方面我們顯然已經跨過門

糧。上年度在零售方面是私人資本佔優勢，本年度則已經是國營部分和合作社部分佔優勢了。

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在原料和糧食收購方面的比重增長情況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在油子方面佔百分之六十五，在亞麻方面佔百分之九十四，在棉花方面幾乎佔百分之百，在糧食方面，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佔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佔百分之七十。這方面我們有了某些下降。整個來說，在國內商業中，國營部分和合作社部分無論在批發方面或零售方面顯然都有增長。

雖然國營商業在糧食收購方面的比重佔了優勢，但終究還是比去年少些，這個事實說明了在糧食收購中犯了錯誤。問題在於，收購工作的過錯不僅是蘇維埃機關的過錯，而且也是中央委員會的過錯，因為中央委員會應該監督蘇維埃機關，它對蘇維埃機關所做的一切都要負責。這個過錯就在於我們在做計劃時沒有估計到今年的市場情況和收購條件已有新的變化，同去年和前年有所不同。今年是我們在糧食市場上不採用行政壓制手段的頭一年，是我們把賦稅的重担和賦稅的壓制縮減到最低限度的頭一年，是農民和政府的收購機關以平等的身分在市場上直接接觸的頭一年。我們的計劃機關竟沒有估計到這些情況，而想在一九二五年底就能收購全年應當收購的全部糧食的百分之七十。我們沒有估計到，農民也會耍手腕，他們會把自己值錢的貨物即小麥留下，等待價格繼續提高，而寧願暫時把其他不很值錢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去賣。這一點我們沒有估計到。因此只好修改收購計劃和縮減糧食的輸出計劃，同時也相應地縮減輸入計劃。現在正在重新審訂進出口計劃，計劃中應該

規定最低限度要有一億盧布的出超，但是這個計劃還沒有最後制定好。

四、各個階級，它們的積極性和相互關係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首先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得到了改善。工人階級喪失階級性的狀況早已成爲過去了。工人階級在迅速地恢復和增長。請看下面這些數字：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材料，截至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如果把包括小工業在內的各種工業中的全部工人，連同季節工人和農業工人合在一起計算，則爲五百五十萬人，其中有一百萬僱農，七十六萬失業者。截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工人總數已達七百多萬，其中有一百二十萬僱農和七十一萬五千失業者。工人階級的增長是毫無疑問的。

在全部工業中，每個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按切爾文盧布計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三十五盧布，即等於戰前的百分之六十二。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五十盧布，即等於戰前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五。個別部門已經超過了戰前的水平。每個工人每日的平均實際工資（按商品盧布計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零點八八盧布，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一盧布二十一戈比。在全部工業中，每人每日的平均產值（按戰前盧布計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爲四點一八盧布，而在一九二五年則爲六點一四盧布，即等於戰前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拿工資和勞動生產率逐月的對比關係來看，那末可以看到它們是在並列前進：工資不斷增加，勞動生產率也不斷提高。但是在六月和七月，工資在增加，而勞動生產率却

比工資增加得少些。這是因爲當時正值假期，並且工廠裏來了新的工人階層即半農民。

現在來談工資基金問題。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材料來看，工資基金（我指的是工業，而不涉及其他部門），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爲八億零八百萬盧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十二億多盧布，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預定爲十七億盧布。

同志們，我不想談社會保險基金的用途，因爲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讓我舉出一個總的數字，以便使大家能夠了解無產階級國家究竟在工人保險事業上花費了多少錢。受保險的工人總數，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六百七十萬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預定爲七百萬人。從企業工資基金中撥充保險費的平均數額，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佔百分之十四點六，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預定爲百分之十三點八四。拿經費的總數來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爲四億二千二百萬盧布，而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預定爲五億八千八百萬盧布。再說明一點也許不是多餘的，就是在去年所規定的社會保險基金中還有七千一百萬盧布存放在社會保險基金會裏。

在農民方面，農產品的增加，自然不能不使農民物質狀況得到改善。從我們計劃機關的材料可以看出，農民個人消費量增長的百分數高於城市居民消費量增長的百分數。農民已經吃得好些了，他們爲進行生產和個人消費而留下的農產品的比重比去年大得多。

無產階級國家對貧苦農戶的幫助，對遭受歉收災害的農戶的幫助，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根據財政人民委員會初步的不完全確切的統計，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對貧農財政上的幫助是一

億至一億零五百萬盧布，其中減免的稅款和保險費約六千萬盧布，救災災害救濟金二千四百萬盧布，貸款一千二百萬盧布。在一九二四年，對遭受款收災害的農戶的救濟包括了計有七百餘萬人口的地區。在這方面總共花了一億零八百萬至一億一千萬盧布，其中從國家預算中撥出的有七千一百萬盧布，由社會組織籌集和銀行機關發放的有三千八百萬盧布。此外，籌集了七千七百萬盧布的防旱基金。無產階級國家對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的幫助就表現在這些地方。當然，這種幫助還是不夠的，但這種幫助終究是值得我們簡單地談一下的。

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物質狀況的改善，是我國建設事業得以向前發展的必不可少的主要前提。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有了這些前提。

現在簡單地談談羣衆積極性的提高。我國內部狀況中引人注目而無可否認的基本事實，就是工人農民的政治積極性由於他們的物質狀況的改善而提高了，他們開始更多地批評我們的缺點，更大聲地說出我們實際工作中的各種缺點了。我們已經進入各個階級和各個社會集團活躍的時期。工人階級活躍起來了，農民和他們的各個集團都活躍起來了，新資產階級、它在農村中的代理人（富農）和它在知識分子中的代表也活躍起來了。這一事實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所反映的我們政策上的轉變的基礎。活躍蘇維埃的政策，活躍合作社和工會的政策，在確定租佃問題和僱傭勞動問題上對農民讓步，物質上幫助貧農，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政策，消滅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這就是黨在農村中的新方針的主要表現。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們農村中的情況，你們是知道得很清

楚的。當時，在農民中間普遍的不滿情緒增長起來了，某些地方甚至企圖舉行暴動。正是這些情況決定了黨在農村中的新方針。

這就是黨在羣衆積極性已經提高和他們各個組織已經活躍的時期對農民所採取的政策的基础，採取這個政策的目的，是要調整農村中的關係，提高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在農村中的威信，並保證無產階級和貧農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

你們知道，這個政策已經完全證明是正確的。

五、列寧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口號

我們採取聯合中農的方針是否做得正確呢？這個新方針的原則方面的情況怎樣呢？我們有沒有列寧對於這個問題的某種指示呢？

人們說，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項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決議中說在奪取政權的時期可能成爲無產階級同盟者的只有貧農，而中農只能使他們中立。這對不對呢？對。列寧起草這個決議（英）時指的是奪取政權的黨。而我們的黨已經是執政的黨了。差別就在這裏。在農民問題上，在工人同農民或者同個別農民階層結成聯盟的問題上，列寧主義提出了適合於革命三個時期的三個基本口號。全部問題在於，要正確地掌握住由第一個口號過渡到第二個口號，由第二個口號過渡到第三個口號的時機。

以前，當我們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當我們布爾什維克最初擬定自己對農民的策略的時候，列寧說過：「聯合全體農民去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我們當時是以這個口號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我們勝利了。這是我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後來，當我們進入第二階段，即進入十月革命的時候，列寧就提出了適合新情況的新口號：無產階級聯合貧農去反對全體資產者，中立中農。這是進行奪取政權的各國共產黨所必須採取的口號。甚至在它們已奪得了政權但是還沒有使政權鞏固的時候，它們也還不能指望同中農結成聯盟。中農是一種採取觀望態度的人。他們在觀望誰會獲得勝利，他們在等待，只有在你趕走了地主和資產者而獲得勝利的時候，他們才會同你結成聯盟。這就是中農的本色。因此，在我國革命第二階段，我們採取的已經不是工人同全體農民結成聯盟的口號，而是無產階級同貧苦農民結成聯盟的口號了。

以後又是怎樣呢？以後，當我們擊退了帝國主義者的進攻而使政權十分鞏固，並且已經進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候，列寧就提出了第三個口號——無產階級和貧農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這個口號是適合我國革命新時期即大規模建設時期的唯一正確的口號。這個口號之所以正確，不只是因為現在可以指靠這個聯盟，而且是因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時應該在農村中利用的不只是數百萬人，而是數千萬人。否則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僅包括城市。社會主義是根據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公有化的原則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的經濟組織。不把這兩個經濟部門結合起來，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

列寧主義關於同農民聯盟的幾個口號就是如此。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講的話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當你在奪取政權或者還沒有把已經奪得的政權鞏固起來的時候，你就只能指望同貧農結成聯盟而中立中農。但是，當你自己已經鞏固了，已經奪得了政權，已經開始建設，並且已經應當利用數千萬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和貧農同中農結成聯盟就成爲唯一正確的口號了。

這個從『無產階級聯合貧農』的舊口號，從中立中農的舊口號過渡到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口號，早在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了。讓我從伊里奇在那次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援引一段話。下面就是這段話：

『舊時的社會主義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並在理論上爲革命服務的時候，曾說到中立農民，就是說，即使不能把中農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階層，至少也要把他們變成不妨礙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社會階層。對任務的這種抽象的、理論上的提法，我們是十分懂得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進入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此時必須具體地詳細地制定一種爲農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以這種規則和指示爲準繩而對中農採取鞏固聯盟的立場』^①（五九）。

① 着重號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就是黨在目前這個歷史時期同中農結成鞏固聯盟的政策所持的理論基礎。

誰想拿列寧起草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來推翻列寧所說的這段話，那就直截了當地說吧。

問題的理論方面就是如此。我們不要抓住個別部分，而要全面地領會列寧的學說。列寧對農民問題提出過三個口號：一個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口號，另一個是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口號，第三個是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的口號。誰想用某一個總的口號來代替這三個口號，誰就要犯極嚴重的錯誤。

問題的理論方面就是如此。而問題的實踐方面却是這樣：在我們實現了十月革命，趕走了地主並把土地分給農民以後，很明顯，我們正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已經使俄國多少中農化了，現在中農在農村中佔了多數，雖然那裏存在着分化過程。

分化過程當然是在存在着。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在現階段上，情況不能不是這樣。但是分化過程是緩慢的。不久以前，我讀過兩本手冊，一本似乎是由中央宣傳鼓動部出版的，另一本如果我沒有弄錯，是由列寧格勒組織的宣傳鼓動部出版的。如果相信了這兩本手冊，那就會得出如下的情況：在沙皇時代，我國的貧農約佔百分之六十，而現在則佔百分之七十五；在沙皇時代，富農約佔百分之五，而現在則佔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在沙皇時代，有若干中農，而現在則少了一些。我不願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我必須說，這些數字比反革命還要壞。一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考慮問題的人怎麼能開這

種玩笑，並且還把它刊印出來，還刊印在手冊上呢？我既然是一個中央委員，當然也要對這種前所未聞的謬誤負責。既然在沙皇時代實行了培植富農的政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土地集中（它特別加劇了分化過程），既然當時的政府是竭力促進分化過程的政府，而貧農終究不過是百分之六十，那末，在我們的政府即蘇維埃政府時代，土地私有制已經不存在，就是說土地已經禁止買賣，因而存在着阻止分化的障礙，而且我們實行過一兩年剝奪富農的政策，直到現在還沒有放棄剝奪富農的一切方法，我們實行着一種阻礙分化過程的特殊信貸和合作化政策，——試問，在有這種種障礙的條件下，我們這裏的分化過程怎麼還會比沙皇時代更加劇烈？富農和貧農怎麼還會比以前更多呢？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怎麼會說出這種荒謬絕倫的話來呢？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笑聲）

關於中央統計局在六月公佈的那個倒霉的穀物飼料平衡表，也可以這樣說。根據這個平衡表來看，富裕農民的商品餘糧似乎佔百分之六十一，貧農一點也沒有，而中農則佔有其餘的百分數。可笑的是，過了幾個月以後，中央統計局又公佈了另一種數字：不是百分之六十一，而是百分之五十二。在不久以前，中央統計局所公佈的數字已經不是百分之五十二，而是百分之四十二了。難道可以這樣計算嗎？我們相信中央統計局是科學的堡壘。我們認為如果沒有中央統計局的數字，任何一個管理機關都不能進行計算和計劃工作。我們認為中央統計局應該提供不受任何偏見影響的客觀材料，因為使數字適合於某種偏見的企圖是一種帶有刑事性質的犯罪行為。既然如此，如果中央統計局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數字，那末人家又怎能相信它的數字呢？

簡單地說，既然我們由於實現土地革命而已經使農村中農化，既然儘管有分化過程發生而中農在農村中仍佔多數，而我們的建設工作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都要求吸引基本農民羣衆參加這個事業，那末同中農結成聯盟的政策就是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唯一正確的政策了。

這就是問題的實踐方面。

現在我們來看看列寧在論證新經濟政策時是怎樣規定我們的任務的。我手頭有列寧寫的『論糧食稅』一書的大綱，他在這個大綱中明確地提出了基本的領導路線。

『現在增加農產品成爲（已經成了）關鍵和樞紐……因此，在農業方面要「指望」中農。

勤勞的農民是我國經濟高漲的「中心人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頁）

因此，在農業方面要指望中農，勤勞的農民是我國經濟高漲的中心人物。列寧同志在一九二二年就是這樣寫的。

同志們，在我們黨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會議上通過的那些決議和那些對農民讓步的辦法，就是以這個思想爲依據的。

黨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會議的決議和中央在十月一致通過（正如它一致通過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一樣）的關於貧農工作的決議（б）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擺在我們中央十月全會面前的基本任務，就是要防止我們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所制定的那個政策即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政策遭

到破壞，所以要防止這個政策遭到破壞，是因為當時在我們黨內出現了一種情緒，認為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或者是不能接受的。同時還出現了一種情緒，認為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政策似乎是忘記了貧農，似乎有誰在力圖越過貧農來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同志們，這是愚蠢的，但這是事實，因為這樣的情緒是有過的。當我們參加十月全會的時候，貧農問題對於我們是不是什麼新東西呢？當然不是。只要貧農還存在，我們就應當同貧農結成聯盟。這一點我們從一九〇三年列寧的小冊子『告貧農書』⁽²⁾最初出版時就已經知道了。我們既然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既然是共產黨人，我們在農村中就應當依靠貧農。難道還有誰可以依靠嗎？這個問題並不是新問題，它無論在四月或十月，無論在代表會議上或在中央全會上，對我們都不是什麼新東西，並且也不可能是在新東西。如果貧農問題終究提了出來，那是由於我們在改選蘇維埃時積累了一些經驗的緣故。當時出現了什麼情況呢？當時蘇維埃活躍起來了，蘇維埃民主開始建立起來了。這是為什麼呢？要知道，蘇維埃民主——這意味着工人階級的領導。要知道，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的領導，任何蘇維埃民主都不能稱為真正蘇維埃的和真正無產階級的民主。但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蘇維埃民主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在農村中應該有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應該由誰來担任呢？應該由貧農的代表來担任。而在我們使蘇維埃活躍起來的時候，貧農是處在什麼情況下呢？他們當時是處在極端渙散的狀況下。當時不僅某些貧農分子，而且某些共產黨員也認為我們摒棄剝奪富農的政策和行政壓制手段就是摒棄貧農，就是忘記貧農的利益。他們不去同富農進行有組織的鬥爭，却很

不體面地訴起苦來了。

要克服這種情緒應該怎樣做呢？第一、應該完成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向黨提出的任務，就是說，應該規定以物質援助貧農的條件、方式和方法。第二、需要提出成立專門的貧農組或貧農團的口號，以便在選舉蘇維埃和選舉合作社時進行公開的政治鬥爭來爭取中農和孤立富農，如此等等。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所寫的關於貧農工作的提綱中正是這樣做的，這個提綱是他在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進行了三個月的工作以後寫成的，並且已經由中央十月全會一致批准了。

由此可見，中央十月全會的決議是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的直接繼續。

在當時，第一、應當具體提出物質援助問題，以便改善貧農的物質狀況，第二、應當提出組織貧農的口號。這種新東西完全是屬於莫洛托夫同志的，成立貧農團的口號就是他的思想。

爲什麼需要提出成立貧農團的口號呢？其所以需要，是爲了消除貧農的渙散狀態，並使他們有可能在共產黨員幫助下組織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這種力量能够成爲無產階級在農村中進行反對富農和爭取中農的鬥爭的有組織的支柱。貧農還有依賴心理，他們依靠國家政治保衛局，依靠領導，隨便什麼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自己的力量。這種消極情緒和依賴心理應該從貧農意識中清除出去。應當對貧農提出口號，以便使他們終於自立起來，使他們在共產黨和國家的幫助下組織成一個集團，使他們在蘇維埃舞台上，在合作社舞台上，在農民委員會舞台上以及在所有一切農村社會團體舞台上學習同富農作鬥爭，但不是用請求國家政治保衛局幫助的方法進行鬥爭，而是用政治鬥爭的

方法，用有組織的鬥爭方法進行鬥爭。只有這樣才可以鍛鍊貧農，只有這樣才可以組織貧農，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把貧農由一個依賴他人的集團變成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

這就是我們在十月提出貧農問題的原因。

六、農民問題上的兩種危險和兩種傾向

我們黨內關於農民問題產生了兩種傾向。一種是輕視富農危險的傾向，另一種是誇大這種危險的傾向，即輕視或低估中農作用的傾向。我並不認為這兩種傾向對於我們有什麼致命的危險。傾向總是傾向，傾向是某種尚未成形的東西。傾向是錯誤的開始。或者我們讓這種錯誤發展下去，那末事情就會不妙；或者我們把這種錯誤根除，那末危險就會消滅。傾向是某種錯誤的東西，如果不及時制止它，那它以後就會帶來惡果。

現在簡單地談談關於低估富農危險的問題。人們在談論富農傾向。這當然是愚蠢的。在黨內決不能有富農傾向。問題不是富農傾向，而是低估富農危險的傾向。即使還沒有人成為這種傾向的犧牲品，還沒有人站在這種傾向的立場上，但這種人反正是會出現的，因為我們這裏的發展是向着容許資本主義某些活躍的方面進行的，而資本主義的活躍不能不在黨的周圍引起混亂。另一方面，我們這裏發展着社會主義工業，在社會主義工業同私人資本之間進行着鬥爭。誰超過誰呢？現在的優勢是在社會主義成分方面。我們將使富農和城市私人資本家都受我們的支配。但是目前的事實還是這

樣：富農在發展着，我們在經濟上還遠沒有把他們打垮。富農無疑是在聚集力量，誰不注意到這一點，說這是小事，說富農是個嚇人字眼，誰就是使黨在危險的面前失去警惕性，使黨在同富農作鬥爭中，在同資本主義作鬥爭中陷於被解除武裝的地位，因為富農是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代理人。

有人講到鮑古舍夫斯基。他當然沒有富農傾向。他有低估富農危險的傾向。如果他富農傾向，那就應該把他開除出黨了。但是據我所知，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有一個人要求把他開除出黨。他這種傾向是低估農村中的富農危險的傾向，這種傾向使黨不能保持在經常的戰鬥準備狀態中，並且在黨同資本主義分子鬥爭時解除黨的武裝。大家知道，這種傾向受到了黨中央委員會決議的斥責。

但是還有另一種傾向，就是誇大富農危險的傾向，即在富農危險面前張皇失措，慌慌張張地喊叫『富農來了，救命！』。真是咄咄怪事！人們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就知道新經濟政策會使資本主義活躍起來，會使富農活躍起來，知道富農一定會抬起頭來。可是當富農一出現時，他們就開始大叫『救命』而張皇失措了。他們竟慌張到把中農都忘記了。但是現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却是爭取中農，使中農脫離富農，用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辦法來孤立富農。而那些在富農危險面前張皇失措的同志却把這點忘記了。

我認爲如果要追究這兩種傾向的根源，那末可以把它們歸結爲以下幾個出發點。

第一種傾向就是輕視富農和農村中所有資本主義分子的作用，抹殺富農的危險。這種傾向的出發點就是不正確地認爲新經濟政策的發展不會使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活躍起來，認爲我國富農和

所有資本主義分子正在成爲或者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跡了，認爲在農村中不會發生分化過程，認爲富農是過去的回聲，是嚇人的字眼，如此而已。

這種傾向會引起什麼後果呢？

事實上，這種傾向會引導到否認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第二種傾向就是誇大富農和農村中所有資本主義分子的作用，在這些分子面前張皇失措，否認無產階級和貧農同中農結成聯盟是可能的和適當的。

這種傾向的出發點，就是認爲現在我們農村中似乎在單純地恢復資本主義，認爲這種恢復資本主義的過程是把我國合作社也全部或絕大部分包括在內的一個包羅萬象的過程，認爲這種發展的結果必然使大批農民的分化過程不斷加劇，認爲兩個極端集團即富農和貧農一定會逐年加強和增長起來，認爲中間集團即中農也一定會逐年減弱和被沖刷。

事實上這種傾向是要挑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要恢復貧農委員會的剝奪富農的政策，因而就是要在我國宣佈國內戰爭，這樣也就是要破壞我們的全部建設工作，也就是要否認列寧的那個主張吸引千百萬農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體系的合作化計劃。

你們要問：哪一種傾向壞些？不能這樣提問題。這兩種傾向，無論第一種傾向或第二種傾向都壞。如果這兩種傾向發展下去，它們就會瓦解和斷送黨。幸而我們黨內有能够消滅第一種傾向和第二種傾向的力量。（鼓掌）雖然這兩種傾向都壞，雖然提出它們中間哪一種傾向更危險些的問題是愚

蠢的，但是還有另一種應該用來對待這兩種傾向的觀點。黨同哪一種傾向作鬥爭最有準備，是同第一種傾向還是同第二種傾向呢？這是實際上需要提出的問題。這兩種傾向都是危險的，都是壞的，決不能說它們中間哪一種要危險些，但是說黨同哪一種傾向作鬥爭最有準備，則是可以的並且是應該的。如果有人向共產黨員提出問題說，究竟黨更有準備的是剝奪富農，還是不這樣做而去同中農結成聯盟呢，我以為，在一百個共產黨員中就有九十九個人會說，黨最有準備的是這樣的口號：打擊富農。只要讓他們幹，那他們一下子就會把富農剝奪乾淨。至於不要剝奪富農，而要實行較為複雜的經過同中農聯盟來孤立富農的政策，那他們就不那麼容易領會了。正因為如此，我認為黨在反對這兩種傾向的鬥爭中還是應該集中火力反對第二種傾向。（鼓掌）任何馬克思主義，任何列寧主義，都不能掩蓋富農是有危險的這一原理。富農總是富農。無論鮑古舍夫斯基怎樣硬說富農只是嚇人的字眼，但富農總是有危險的。這一點無論你用什麼引證也不能把它從共產黨員的意識中消除掉。至於必須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原理，那任何時候都可以用些關於列寧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加以抹殺和遮蓋的，因為伊里奇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中寫的是中立中農。在這裏，有着可以運用引證的廣大地盤，在這裏，每一個想攪亂我們黨的人，每一個想對黨隱瞞真相的人，即想隱瞞列寧對農民問題不止提出一個口號而是提出過三個口號這一真相的人，都有廣大的活動地盤。在這裏，可以對馬克思主義作種種篡改。正因為如此，應該集中火力來反對第二種傾向。

關於蘇聯的內部狀況，即關於蘇聯的經濟，關於工業和農業；關於各個階級，關於各個階級的積

極性，關於活躍蘇維埃，關於農民問題等等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不來談某些有關國家機關的問題了，國家機關在不斷增長並力圖脫離黨的領導，當然這是辦不到的。

我也不來談我們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我所以不談，是因為我的報告拖得太長了。我所以不談這一點，是因為這個問題對黨說來並不是什麼新問題。

七、黨的任務

現在我來談黨在對內政策方面的任務。

我們在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方面應該進行的工作是：

- (甲) 進一步增加國民經濟的產值；
 - (乙) 把我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 (丙) 在國民經濟中保證社會主義成分對資本主義成分的決定性優勢；
 - (丁) 保證蘇聯國民經濟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具有必要的獨立性；
 - (戊) 增加非稅收部分在國家預算總額中所佔的比重。
- 在工業和農業方面應該進行的工作是：
- (甲) 在提高技術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和加速資金周轉的基礎上擴展我國社會主義

工業；

(乙) 使燃料和金屬的產量以及鐵路運輸的固定資本的數額適應於我國日益增長的需要；

(丙) 加緊發展蘇維埃地方工業；

(丁) 提高土地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農業的技術水平，發展技術作物，實行農業工業化；

(戊) 通過普遍合作化和提高農民文化水平的辦法，吸引分散的農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在商業方面應該進行的工作是：

(甲) 進一步擴大和在質量上改進商品運銷網（各種合作社和國營商店）；

(乙) 最大限度地加速商品流轉；

(丙) 降低零售價格並進一步加強蘇維埃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對私營商業的優勢；

(丁) 在一切收購機關中建立統一戰綫並規定嚴格的收購工作紀律；

(戊) 加強對外貿易，保證貿易順差，也就是說，保證收支順差，因為這是保持通貨穩定的最必

要條件和避免通貨膨脹的必要保證。

在計劃方面應當按照必須保證必要後備的方向進行工作。

順便簡單地談一下後備泉源之一的燒酒問題。有人認為可以帶着白手套來建設社會主義。同志們，這是極嚴重的錯誤。既然我們得不到借款，既然我們缺少資本，除此以外，我們又不能受西歐資本家的奴役，不能接受他們向我們提出的而被我們拒絕了的奴役條件，我們就只有一條出路：在其他

方面尋找泉源。這樣做總比受奴役好些。這裏正是應該在奴役和燒酒之間進行抉擇，而那些認為可以帶着白手套來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是犯了極大的錯誤的。

在階級關係方面應該進行的工作是：

(甲) 保證無產階級和貧農同中農結成聯盟；

(乙) 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

(丙) 在政治上孤立和在經濟上排擠富農和城市資本家。

在蘇維埃建設方面應該進行的工作是堅決同官僚主義作鬥爭，吸引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來參加這一鬥爭。

我想簡單地談一下新資產階級和它的思想家路標轉換派分子。路標轉換派，這是日益成長並逐漸同富農和舊知識分子勾結起來的新資產階級的思想。新資產階級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即路標轉換派的思想，其內容就是認為共產黨必定蛻化，而新資產階級則必定團結起來，同時我們布爾什維克必定會不知不覺地走近民主共和國的門檻，之後又必定跨過這道門檻，並在某一個不知是從軍人中間還是從文官中間推舉出來的『凱撒』幫助下，我們必定陷於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狀態中。

這個新思想就是這樣，這種思想力圖迷惑我國舊知識分子，並且不僅迷惑他們，甚至也力圖迷惑某些接近我們的人。我不來駁斥關於我們黨蛻化的說法。這種蠢話不值一駁。我們黨沒有蛻化，並且一定不會蛻化。它不是由那種會使它蛻化的材料組成的，也不是由那種會使它蛻化的人鍛鍊成的。

（鼓掌）我們的幹部，無論是年輕幹部或者老幹部，在思想方面都成長起來了。我們幸運的就是，列寧的一些著作我們已經出過好多版了。現在人們都在閱讀，都在學習並開始了解問題了。不僅黨的領導者，而且普通黨員都開始了解問題了，他們已經不再受人愚弄了。現在蛻化的叫囂已經嚇不倒任何人了。人們自己能夠判別問題。不管有人怎樣叫囂，不管有人怎樣用引證來嚇唬人，但是普通黨員聽了以後是能夠判別的，因為現在他們手裏都有列寧的著作。（鼓掌）這個事實就是我們黨不會離開列寧主義道路的一個基本保證。（熱烈鼓掌）

我所以終於講到了路標轉換派分子，是爲了簡單地回答所有那些指望我們黨和我們中央委員會蛻化的人。烏斯特里雅洛夫是這種思想的創始人。他在我們的運輸部門中工作。據說他工作得很好。我認爲，既然他工作得很好，那末就讓他去幻想我們黨蛻化吧。幻想我們是不禁止的。讓他盡情地去幻想吧。但是，讓他知道，他在幻想蛻化時，應該爲我們布爾什維克效力。否則他是會倒臺的。（鼓掌）

三 黨

現在來談黨的問題。我把黨放在我的報告的最後一部分來談，並不是因爲黨是我國發展的一切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不，不是這個原因。而是因爲我們這裏的一切事情都是由黨領導的。

我已經講過無產階級專政在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即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

下對外隨機應變方面以及在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我們黨不能勝任自己的任務，如果黨沒有得到發展和鞏固，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在這方面，作爲領導力量的黨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自流地實行的，它首先是依靠黨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實行的。在現今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要是沒有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只要把黨動搖一下，把黨削弱一下，無產階級專政馬上就會動搖和削弱。正因爲如此，世界各國所有的資產者都在瘋狂地談論我們的黨。

我這樣講決不是想說我們黨和國家是一個東西。一點也沒有這個意思。黨是我們國家中的領導力量。如果根據這一點說政治局是國家的最高機關，像某些同志所說的那樣，那是愚蠢的。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這是一種糊塗思想，它對我們的敵人有利。政治局不是國家的最高機關，是黨的最高機關，而黨又是國家的最高領導力量。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都是黨的機關。我並不想把國家機關和黨看成一個東西。我只是想說，在我們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一切基本問題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黨。也只是因爲這樣，我們才在我們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就。因此，關於黨的成分，關於黨的思想水平，關於黨的幹部，關於黨在提出經濟建設和蘇維埃建設問題方面的領導能力，關於黨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所佔的比重以及關於黨的內部一般狀況等問題，都是我們政策的基本問題。

首先來談黨的成分問題。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以前黨員和預備黨員總共有四十四萬六千人（爲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黨員不包括在內）。其中工人十九萬六千人，佔百分之四十四；農民十二萬八千

人；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八；職員及其他成分十二萬一千人，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二。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黨員和預備黨員已經不止四十四萬六千人，而是九十一萬一千元了，其中工人五十三萬四千人，佔百分之五十八點六；農民二十一萬六千人，佔百分之二十三點八；職員及其他成分十六萬人，佔百分之十七點六。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以前我們已經有一百零二萬五千名共產黨員。

工人階級（如果拿整個工人階級來說）有百分之幾已經加入了我們黨呢？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組織報告中說過，我們國內總共有四百一十萬工人（其中包括農業工人）。我當時沒有統計小工業中的工人，因為他們是無法統計的，當時社會保險還不普遍，而統計機關又沒有從事這項工作。我當時所舉的是一九二四年一月的數字。後來到了已經有可能統計小工業中工人的人數時，我們才知道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以前我國的工人總數為五百五十萬人（其中包括農業工人）。其中入黨的工人有三十九萬人，佔工人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七。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工人總數已經是六百五十萬人，其中入黨的有五十三萬四千人，佔工人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八。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以前我國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中小工業和大工業內的產業工人統統包括在內）的總人數為七百萬人。其中入黨的有五十七萬人，佔百分之八。

我所以講這一切，是爲了指明那種關於要在一兩年內使我國工人階級全體成員中入黨的人數達到百分之九十的說法是多麼無知。

現在我們來看看俄共（布）黨內工人黨員在標準工業工人中所佔的比重。大工業即標準工業（國

營工業和非國營工業，還包括軍事工業、主要鐵路修理廠和主要機車修理廠）中的固定工人（不是季節工人）的人數，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以前爲一百六十萬零五千人。當時我們有十九萬六千工人黨員。這佔大工業中工人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二。如果拿產業工人黨員來說，並且確定一下他們在大工業工人階級總人數中所佔的百分比，那末我們可以看到，一月一日以前有八萬三千產業工人黨員，他們佔大工業中工人總人數的百分之五。這都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以前的情形。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以前大工業中工人的人數爲一百七十八萬人；當時有三十八萬九千工人黨員，佔大工業中工人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八。當時有二十六萬七千產業工人黨員，佔大工業中工人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以前大工業即標準工業中工人的人數爲一百八十四萬五千人；當時我們工人黨員的總數（包括產業工人黨員和非產業工人黨員）爲四十二萬九千人，佔大工業中工人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二；當時有三十萬零二千產業工人黨員，佔大工業中工人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六點三。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大工業中工人的人數爲二百零九萬四千人；當時有五十三萬四千工人黨員，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五；當時有三十八萬三千產業工人黨員，佔大工業中工人階級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八點二。

你們可以看到，在那裏，在整個工人階級方面，入黨工人數目的增長比工人階級本身的增長要慢些；在這裏，在大工業方面，情形就恰恰相反，工人黨員的百分比的增長比大工業工人數目的增長要快些。這一點必須指出來，以便我們在談到黨內的工人成分時能知道我們黨的面貌究竟怎樣。黨內

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大工業中的工人。

既然如此，現在我們不能說要在一年內把產業工人黨員的人數增加到工人總人數的百分之九十呢？不，不能這樣說，因為我們不願意陷入空想。因為：既然我們有三十八萬產業工人黨員，那末爲了使其餘的——約七十萬非產業工人黨員——組成百分之十，就必須使黨員的人數在一年內增加到七百萬人。可見，某些同志根本就沒有去計算一下，只是隨便提出百分之九十這個數字而使自己出醜。

黨在工人階級中所佔的比重是不是在增長呢？這個不言自明的真理未必還用得着證明。你們知道，我們的黨實質上是由工人階級中所挑選出來的人組成的。我們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都沒有過的。單是這一事實就已經說明，我們黨在工人階級隊伍中所佔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我們黨在工人階級內部佔獨佔地位。

至於我們黨在農村中所佔的比重，那末這方面的情況是很不好的。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我國十八歲到六十歲的農村居民共有五千三百萬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已經有五千四百餘萬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農村支部中的共產黨員有十三萬六千人，佔農村成年居民總人數的百分之零點二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前我們有二十萬零二千農民黨員，佔百分之零點三七。我們黨在農村中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我並不想說黨在那裏必須一日千里地發展，但是我們農民黨員的百分比終究還是很低的。我們黨是工人的政黨。這個黨內總是要工人佔多數的。這是我們的無

產階級專政的表現。但是下面這一點也是很明顯的：如果不同農民聯盟，那就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黨的成分中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優秀農民，作爲黨在農村中的支柱。從這方面來看，情形暫時還是不大好的。

其次，我必須指出我們黨的思想水平普遍提高這一事實。關於組織方面，莫洛托夫同志將向你們做報告，我不來談這個問題，但是我不能不說明一點：根據一切材料看來，我們黨的領導幹部（年輕的和年老的）的思想水平都已經大大提高。可以拿去年我們同托洛茨基主義進行的爭論來做例子。你們知道，當時所涉及的是關於修正列寧主義的問題，是關於所謂隨時更換黨的領導的問題。當時黨如何一致地對付了這次反黨浪潮，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黨已經成長起來了。黨的幹部已經堅強了，黨已經不怕爭論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進入了新的爭論時期。我深信黨一定也能在這次爭論中很快地取得勝利，決不會發生什麼特別事故。（喊聲：「對！」鼓掌。）爲了不預決事變的進程和不刺激人，現在我不來談列寧格勒的同志們在自己的代表會議上的行動的實質以及莫斯科的同志們對這種行動的反應的實質。我想大會代表自己會談到這一點，而我只要在結論中做個總結就行了。

我就要結束我的報告了。

我已經講過我國的對外政策，已經講過腐蝕資本主義世界的那些矛盾。我已經講過只有西方的工人革命才能克服這些矛盾。

其次，我講過決定我們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的那些矛盾。我講過，這些國家將力圖把我國變成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屬品，它們將力圖對我們進行武裝干涉，我們則將予以還擊，而且我們指望獲得西方工人階級的大力支援，特別是在西方工人常到我們這裏來並且同我們建立友好關係以後。同時，我們預計到這種友好關係是不能為資本家所容許的。這些矛盾也正在被我們克服。但是歸根到底我國外部的矛盾即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間的矛盾單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克服不了的，為此就需要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這一援助。

其次，我講過我國內部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間的矛盾。我講過，我們用自己的力量能夠克服這些矛盾。誰不相信這一點，誰就是取消主義者，誰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我們能夠克服這些矛盾，並且我們已經在克服這些矛盾。當然，西方的援助來得愈快，情形也就愈好，我們也就能更快地克服這些矛盾，以便徹底消滅私人資本，並使社會主義在我國取得完全勝利即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如果沒有外援，我們也不會垂頭喪氣，不會喊救命，不會拋棄自己的工作，（鼓掌）也不會懼怕困難。誰疲倦了，誰被困難嚇倒了，誰失掉了理智，那就請他讓路給那些能保持勇氣和堅定性的人。（鼓掌）我們不是怕困難的人。我們既然是布爾什維克，我們既然受過列寧主義的鍛鍊，也就不會逃避困難，而會面向困難並去克服困難。（喊聲：「對！」鼓掌。）

其次，同志們，我講過我們黨的成就和錯誤。我們犯過不少錯誤。不論在對外貿易方面，在收購工作方面或在其他一些工作方面，我們都犯過不少錯誤。伊里奇教導我們不要驕傲自大。我們決不

會驕傲自大。雖然我們犯過不少錯誤，但是成就還是有的。無論如何我們有一點是已經達到了，這是誰也不能從我們手裏奪去的。這一點就是：我們用大規模的建設工作，用在經濟戰綫上實行的布爾什維克的進攻，用我們在這方面所獲得的種種成就向全世界表明，工人在奪得政權以後不僅能打敗資本主義，能破壞舊東西，而且能建設新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使這個真理明顯化了，這一成就是誰也不能從我們手裏奪去的。這是我們至今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中最大的和最難獲得的成就。我們已經向西方工人階級和東方被壓迫人民表明，歷來只會替老爺們做工和聽從老爺們指揮的工人在奪得政權以後是能够管理一個龐大的國家，能够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

西方無產者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呢？首先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要認識到工人階級沒有資產階級也能過活，要認識到工人階級不但有能力破壞舊東西，而且有能力建成新東西，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使工人產生懷疑主義思想，使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使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強力戰勝資產階級。我們全部工作的意義，我們全部建設的意義在於：這種工作和這種建設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相信，工人階級沒有資產階級也能過活，靠自身力量也能建設新社會。各國工人紛紛來我國訪問，各國工人代表團來到我國考察我國建設中的每個角落並力求了解我國建設中的成就，——這一切都說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違反社會民主黨的意旨而開始相信自身的力量，相信工人階級有能力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新社會。

我並不想說我們在報告涉及的時期內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是有一點終究必須承認，那就是

我們已經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表明和證明，工人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得政權以後能夠按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這是我們所取得的成就，這是任何人絕對不能從我們手裏奪去的。這一成就是無法估價的。因為取得這一成就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勝利。這就是交給他們一種新的武器去反對資產階級。至於他們正在拿起這種武器並準備使用這種武器，這只要從工人紛紛來我國訪問的活動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加活躍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而當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時候，那就可以確信這將是資本主義死亡的開端，這將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最可靠的徵象。

正因為如此，我認爲我們爲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的工作不是徒勞無益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爲我們在這個工作中一定會獲得國際範圍的勝利。（熱烈鼓掌多時。全場歡呼。）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

(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不想一一答覆字條上所提出的問題，因為我的全部結論實際上就是對這些字條的答覆。

其次，我不打算答覆那些個人的攻擊和各種純粹帶個人成分的狂言，因為我認為代表大會擁有充分的材料來審查這些攻擊的動機和內幕。

關於『穴中人』即曾在基斯洛沃得斯克附近某地集會並在中央機關的人選問題上進行種種陰謀活動的人，我也不想談。好吧，讓他們去進行陰謀活動吧，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只想着重指出一點，就是拉舍維奇在這裏充滿自信地發言反對進行陰謀活動的政策，他自己原來就是一個進行陰謀活動的人，並且他在基斯洛沃得斯克附近召開的『穴中人』會議上還扮演過遠非次要的角色。好吧，讓上帝保佑他吧。（笑聲）

現在來談本題。

一 索柯里尼柯夫和我國道威斯化

首先談幾點反對意見。第一點反對意見是對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他在發言時說：「斯大林在指出兩條總路綫，指出我國經濟建設的兩條路綫的時候，把我們弄糊塗了，因為他本來應該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這兩條路綫，他本來不應該說輸入裝備而應該說輸入成品。」我斷言索柯里尼柯夫的這種說法恰巧表明他是沙寧提綱的擁護者。我是想說索柯里尼柯夫在這裏實際上表明他是一個擁護我國道威斯化的人。我在報告中講的是什麼呢？難道我講的是進出口計劃嗎？當然不是的。誰都知道，我們現在不得不輸入裝備。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却把這種需要變成原則，變成理論，變成發展前途。索柯里尼柯夫的錯誤就在這裏。我在報告中談到我們國民經濟建設方面的兩條基本路綫，即兩條領導路綫或總路綫。我談到這一點，是爲了說明關於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保證我國經濟獨立發展的道路問題。我在報告中談到我們的總路綫，我們的前途，意思是說要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什麼是農業國呢？農業國就是輸出農產品和輸入裝備而不能自力生產或幾乎不能自力生產這種裝備（機器等等）的國家。如果我們停留在只輸入裝備和機器而不能自力生產裝備和機器的發展階段上，我們就不能担保我國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屬品。正因爲如此，我們應當抱定在我國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方針。難道索柯里尼柯夫連這個淺顯的道理都不懂嗎？我在報告中所談的也無非是這個道理。

道威斯計劃要求的是什麼呢？它要求德國從國外市場，主要是從我們蘇聯市場榨取金錢來償付賠款。從這裏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應當得出一個結論：德國將賣給我們裝備，而我們將輸入這些裝備，並向國外輸出農產品。這樣，我們，也就是說我國工業，就會處於依附歐洲的地位。這也就是道威斯計劃的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在報告中曾說，道威斯計劃損害我國的利益，所以它是建築在沙地上的。爲什麼呢？我當時說，『因爲我們決不願意變成受其他任何國家（其中包括德國）支配的農業國』，因爲『我們自己要生產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綫的實質和基礎。我們應當設法使經濟工作人員的全部思想和意圖都集中到這一方面，即集中到把我國從一個輸入裝備的國家變成一個生產這種裝備的國家。因爲這是我國經濟獨立的基本保證。因爲這樣就能保證我國不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品。索柯里尼柯夫不願意了解這個簡單而明白的道理。他們這些道威斯計劃的制定人，想使我們只生產花布這種物品，但是這對於我們是不夠的，因爲我們不僅要生產花布，而且要生產織造花布所必需的機器。他們想使我們只生產汽車這種物品，但是這對於我們是不夠的，因爲我們不僅要生產汽車，而且要生產製造汽車所必需的機器。他們想使我們只生產皮鞋這種物品，但是這對於我們是不夠的，因爲我們不僅要生產皮鞋，而且要生產製造皮鞋所必需的機器。如此等等。

這就是兩條總路綫之間的差別，這也是索柯里尼柯夫所不願意了解的東西。

離開我們的路綫就是放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就是主張我國道威斯化。

二 加米涅夫和我們對農民的讓步

第二點反對意見是對加米涅夫提出的。他說，我們既然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通過了關於經濟、關於活躍蘇維埃、關於肅清戰時共產主義殘餘以及關於確定租佃問題和僱傭勞動問題的一些有名的決議，那我們就是對富農讓步而對農民讓步，就是不對農民讓步而對資本主義分子讓步。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可以肯定說，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這是對黨的誣蔑。我可以肯定說，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會這樣看問題，只有自由主義者才會這樣看問題。

我們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所做的讓步究竟是怎樣一種讓步呢？這種讓步是不是在新經濟政策範圍以內呢？無疑是在範圍以內的。也許是我們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把新經濟政策的範圍擴大了？讓反對派來回答下面這個問題：我們在四月是不是擴大了新經濟政策的範圍？如果我們擴大了新經濟政策的範圍，那末他們為什麼舉手贊成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呢？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們都是反對擴大新經濟政策範圍的嗎？那末問題究竟在哪裏呢？問題在於加米涅夫糊塗了，因為新經濟政策容許貿易，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和容許僱傭勞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則是列寧在世時所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表現。列寧是不是知道新經濟政策在實行初期首先會被資本家、商人和富農利用呢？當然知道。但列寧是不是說過，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對投機分子和資本主義分子讓步而不是

對農民讓步呢？列寧沒有說過，而且他也不會說這樣的話。恰恰相反，列寧始終肯定地說，我們容許貿易，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爲了保持和鞏固我們和農民的結合而對農民實行讓步，因爲在現今條件下，沒有商品流轉，不容許資本主義有某種活躍，農民便不能生活下去；因爲我們現在只有通過貿易才能調整這種結合；因爲我們只有這樣才能鞏固這種結合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這就是當時列寧對讓步問題的看法。這就是對一九二五年四月的讓步問題應有的看法。

讓我把列寧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讀給你們聽一聽。列寧在莫斯科省支部書記會議上所做的「關於糧食稅」的報告中曾經這樣論證黨向新政策即新經濟政策的轉變：

「我想談談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這個政策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是可以容忍的，爲什麼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權會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這種做法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好不好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仔細地觀察一下農民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化。最初的情況是全體農民反抗地主的權力。貧農和富農都一樣反對地主，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的打算：富農反對地主的目的是奪取地主的土地並在這塊土地上發展自己的經濟。這樣一來就暴露出富農和貧農之間的不同利益和不同意向。在烏克蘭，這種利益上的不一致就是現在也比我們這裏表現得更加明顯。貧農很少有可能直接利用從地主那裏奪來的土地，因爲他們既沒有耕種土地的資料，又沒有耕種土地的工具。於是貧農就組織起來，不讓富農去霸佔自己已經奪得的土地。蘇維埃政權正在幫助我們這裏的貧農委員會和烏克蘭的「貧苦農民委員會」。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中農在農村中佔多

數……富農和貧農這兩個極端的人數都減少了，大多數農民接近於中農水平。如果我們要提高我國農民經濟的生產率，我們首先就應該考慮到中農。共產黨就是根據這種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的……這樣看來，對農民的政策改變是因為農民本身的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農村已經更加中農化了，要提高生產力，我們就必須考慮到這種情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七一頁至第二七二頁）

其次，列寧在同卷第二〇三頁上做了一個總的結論：

『我們必須適應中農經濟來建設我們的國家經濟，我們在過去三年內沒有能把中農經濟改造過來，在今後十年內也還不能把它改造過來。』

換句話說，我們實行貿易自由，容許資本主義活躍，實行新經濟政策，都是爲了提高生產力，增加全國產品的數量，鞏固我們同農民的結合。把同農民的結合，同農民結合的利益作爲我們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中所做的讓步的基礎，——這就是列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當時列寧不知道投機分子、資本家和富農一定會利用新經濟政策，一定會利用我們對農民的讓步呢？當然知道。這是不是說，這種讓步實際上就是對投機分子和富農的讓步呢？不，決不是這個意思。因爲一般利用新經濟政策特別是利用商業的不但有資本家和富農，而且有國營商業機關

○ ○ 着重號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和合作社，因為做生意的也不但有資本家和富農，而且有國營商業機關和合作社，何況國營商業機關和合作社一旦學會了做生意，就一定會佔私商的上風（現在已經佔上風！），會把我國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起來。

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的讓步主要是爲了鞏固結合，是爲了同農民的結合。

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以列寧主義者的態度而是以自由主義者的態度來對待問題。

三 誰的失算？

第三點反對意見是對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他說：「入秋以來，我們在經濟戰綫上遭到了不少損失，其原因就在於過高估計我們的力量，過高估計社會主義的成熟程度，過高估計我們的國營經濟現在所具有的那種領導整個國民經濟的可能性。」

照他說來，在收購工作方面的失算和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失算（我指的是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人超）並不是由於我們調節機關的錯誤，而是由於過高估計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成熟程度。照他說來，這也應當歸咎於布哈林，因為布哈林「學派」專門培植迷戀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成熟程度的思想。當然，在談話時「可以」隨便瞎扯一通，像索柯里尼柯夫所常常做的那樣。但是也應當知道限度。

怎麼能在代表大會上說出如此不近情理和公然撒謊的話來呢？政治局在十一月初召集了一次專門會議，討論了收購工作和對外貿易問題，當時中央委員會——彷彿過高估計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可能性的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糾正了調節機關的錯誤，難道索柯里尼柯夫不知道嗎？怎麼能在代表大會上這樣胡說八道呢？這與布哈林「學派」或布哈林本人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是嫁禍於人的做法！難道索柯里尼柯夫不知道在中央的會議上關於失算問題的發言速記記錄都已經分發給各省委員會了嗎？怎麼能說出抹殺明顯的事實的話來呢？在談話時瞎扯一通是「可以」的，但是也應當知道限度。

四 索柯里尼柯夫是怎樣保護貧農的

第四點反對意見也是對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他在這裏說，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聽見沒有——，曾經竭力設法保證我國農業稅按所得比例徵收，可是人家妨礙他這樣做，其所以妨礙他，是因為人家不讓他保護貧農和約制富農。同志們，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這是對黨的誣蔑。關於在形式上把農業稅改為所得稅的問題——我所以說是形式上，是因為農業稅實際上就是所得稅——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會上就已經提出來了，但是當時除了索柯里尼柯夫以外，誰也不贊成把這個問題提到代表大會上來討論，因為當時還沒有準備把這個問題提到代表大會上來。當時索柯里尼柯夫並沒有堅持自己的提議。而現在索柯里尼柯夫竟利用這件事來攻擊中央，這當然不是為了貧農的利益，而是為

了反對派的利益。好吧，既然索柯里尼柯夫在這裏談到貧農，那就讓我來告訴你們一件事實，這件事實能揭穿這個似乎一貫保護貧農的索柯里尼柯夫的真正立場。不久以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米柳亭同志簽署了一項決定：貧苦農戶一概免納稅額在一個盧布以下的稅款。從米柳亭同志給中央的書面報告中可以看出，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這種使農民生氣的稅額在一個盧布以下的稅款，總共約有三四十萬盧布，單單為徵收這筆稅款所需的費用却比這筆稅款的總數小不了多少。而索柯里尼柯夫，這位貧農的保護者，究竟幹了些什麼呢？他撤銷了米柳亭同志的這個決定。中央收到了十五個省委員會對此提出的抗議書。但索柯里尼柯夫還是固執己見。只是受到中央的壓力以後，索柯里尼柯夫才收回成命，沒有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部關於不徵收稅額在一個盧布以下的稅款這個完全正確的決定撤銷。這就是索柯里尼柯夫所謂對貧農利益的「保護」。揹着這種包袱的人居然也有——說得輕一點——勇氣來反對中央。同志們，這真是怪事。

五 思想鬥爭還是誣蔑？

最後，還有一點反對意見。這點反對意見是對「有關爭論問題的材料彙編」的編者們提出的。昨天在這裏有人把剛出版的「有關爭論問題的材料彙編」秘密地專門發給大會的代表。在這本彙編中，

有一個地方說我在今年四月接見了農村通訊員代表團，說我對恢復土地私有制這種思想表示同情。原來在『貧農報』^(六)上登載過一位農村通訊員所寫的一篇內容相同的『感想』，這篇感想我並不知道，也沒有經我看過。直到今年十月我才知道有這件事。還在這以前，即在四月，那個由於制造我們的各種謠言而與其他一切通訊社不同的里加通訊社也在外國報刊上報道了同樣的消息，我們在巴黎的工人人員會打電報向外交人民委員部報告這件事，並要求闢謠。我當時立即叫我的助手回答契切林同志說：『如果契切林同志認為有駁斥一切荒唐的流言的必要，那就去駁斥好了。』（見中央檔案）

這本珍貴的『彙編』的編者們是不是知道這一切情形呢？當然知道。那末他們為什麼還繼續散佈種種荒誕無稽的言論呢？他們這些反對派分子怎麼可以採用里加通訊社的手段呢？難道他們竟墮落到這種地步了嗎？（喊聲：『真可恥！』）

我既然知道『穴中人』的習性，既然知道他們善於採用里加通訊社的手段，也就寫了一封闢謠的信寄給『貧農報』編輯部。本來這種謬論是不值得駁斥的，但是我知道我在和什麼人打交道，所以我終於寄出了一封闢謠的信。這封信的原文如下：

『給『貧農報』編輯部的信。』

編輯同志！不久以前我從一些同志那裏得知，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的『貧農報』上登載了一位農村通訊員所寫的一篇關於農村通訊員代表團和我談話的感想。我當時沒有機會讀到這篇感想。在這篇感想中說我對在四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確保土地所有權這種思想，對保存土地私

有制等等思想表示同情。雖然這種憑空捏造的說法顯然荒誕無稽，沒有加以駁斥的必要；但是也不妨請你們准許我在「貧農報」上作如下聲明：這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它完全是由它的報道人憑空捏造出來的。

約·斯大林

「彙編」的編者同志們是不是知道這封信呢？無疑是知道的。那末他們為什麼還繼續散佈這種荒謬的言論呢？這是一種什麼鬥爭方法呢？據說這是思想鬥爭。不，同志們，這決不是思想鬥爭。用我們的俄語來說，這純粹是誣衊。

現在讓我來談一談幾個帶有原則性的基本問題。

六 關於新經濟政策

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我要談的是克魯普斯卡婭同志和她的那篇論及新經濟政策問題的演說。她說：「新經濟政策實質上是在某種條件下被容許的資本主義，是受無產階級國家約束的資本主義……」這種說法對不對呢？又對，又不對。我們約束着資本主義，並且只要它還存在，我們還會約束它，這是事實，這是對的。但是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那就是胡說，那就是極其荒謬的說法。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所採取的一種特殊政策，它預計到在經濟命脈掌握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

件下容許資本主義存在，預計到資本主義成分同社會主義成分的鬥爭，預計到社會主義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長而資本主義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預計到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預計到消滅階級和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誰不了解新經濟政策的這種過渡性即兩重性，誰就是離開列寧主義。如果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那末列寧所說的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就是資本主義的俄國了。但是，難道現今的俄國是資本主義的俄國而不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俄國嗎？爲什麼當時列寧不干脆說「資本主義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而寧願提出另一個公式——「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呢？反對派是不是同意克魯普斯卡婭同志關於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說法呢？我想代表大會沒有一個代表會同意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的說法。克魯普斯卡婭同志（請她原諒我）關於新經濟政策說了一些十分荒謬的話。在這裏是不能用這種荒謬的話來擁護列寧而反對布哈林的。

七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

布哈林的錯誤是和這個問題有聯系的。布哈林的錯誤在哪裏呢？列寧在哪些問題上曾經和布哈林爭論過呢？列寧肯定說國家資本主義這一範疇是和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相容的。布哈林却否認這一點。他認爲——「左派」共產黨人（其中包括薩發羅夫）也和他一起認爲——國家資本主義這一範疇是和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不能相容的。當然，列寧是對的，布哈林是錯的。布哈林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這

個錯誤。布哈林的錯誤就在這裏。但這是過去的事情。如果他在今天，即在一九二五年五月，還重提他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和列寧發生意見分歧，那末我認爲這純粹是謾會。或者是他應當直截了當地拋棄這種說法；或者是出於誤會，因爲他現今在國營工業本質問題上所擁護的路綫就是列寧的路綫。不是列寧同意布哈林的意見，恰恰相反，是布哈林同意列寧的意見。正因爲如此，我們才擁護布哈林。（鼓掌）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基本錯誤是：他們不是辯證地，而是學究式地即脫離歷史環境來研究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這種研究問題的態度是違反列寧主義的整個精神的。列寧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在一九二一年，列寧知道我國工業不發達而農民又需要商品，知道工業不能立刻得到發展，知道工人們因爲受某種環境的影響不去進行工業生產而去製造打火機，所以當時列寧認爲在一切可行的辦法中最妥善的辦法就是吸收外資；利用外資來振興工業，也就是說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通過它來建立蘇維埃政權和農村的結合。這條道路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因爲當時我們還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來滿足農民，因爲當時我們的工業衰敗，運輸停頓或幾乎停頓，沒有燃料或缺乏燃料。當時列寧是否認爲把國家資本主義作爲我國經濟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容許的而且是恰當的呢？是的，當時列寧是這樣認爲的。但這是一九二一年的情形。而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能不能說我國沒有自己的工業，運輸停頓，沒有燃料等等呢？不，不能。現在我國工業和商業已經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建立着工業（我國的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這一點能不能否認呢？不，不能。目前在工業方面『國家資本主義』和

「社會主義」二者的地位已經互相轉換，因為社會主義工業已經是佔統治地位的工業，而租賃企業和租賃企業所佔的比重（前者有五萬工人，後者有三萬五千工人）則已經縮小到最低限度，——這一點能不能否認呢？不，不能。列寧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說過，租賃制和租賃制在我們這裏並沒有實現成。

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應該得出一個結論：從一九二一年起，我國的情況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營商業以及合作社營商業已經是佔優勢的力量，我們已經學會用自己的力量來建立城鄉間的結合，國家資本主義最顯著的形式——租賃制和租賃制——在這個時期內並沒有得到重大的發展，所以現在，即在一九二五年，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國經濟的主要形式，那就是曲解我們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本質，那就是不了解過去的情況和現在的情況的全部差別，那就是不是辯證地而是學究式地、形而上學地來研究國家資本主義問題。

你們願意聽一聽索柯里尼柯夫所說的話嗎？他在發言時說：

『我們的對外貿易是作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來經營的……我們的國內貿易公司也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同志們，我必須說，國家銀行也同樣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我們的貨幣制度是怎樣的呢？我們貨幣制度的基礎就是：在蘇維埃經濟中，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採取了一種浸透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

這就是索柯里尼柯夫所說的話。

我看他很快就要把財政人民委員會也宣佈為國家資本主義了。到現在為止，我個人以及我們大

家都認為，國家銀行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到現在為止，我個人以及我們大家都認為，我們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如果不把環繞在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周圍的那些國家資本主義機關計算在內）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我們的國家機關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機關。到現在為止，我們大家都是這樣認為，因為無產階級政權是這些機關的唯一主人。而現在照索柯里尼柯夫說來，這些作為我們國家機關組成部分的機關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機關。也許我們的蘇維埃機關也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像列寧所認定的那樣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機關吧？怎麼會不是呢？難道我們的蘇維埃機關不是利用着「浸透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嗎？你們看，這個人竟會說出如此荒唐的話來。

讓我先來引證列寧對國家銀行的本質和意義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同志們，我想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寫的一本書中的一段話。我指的是「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一書。在這本書中他所主張的是對工業實行監督（而不是實行國有），雖然如此，他已經認為掌握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國家銀行十分之九是社會主義機關。關於國家銀行他這樣寫道：

「大銀行就是我們為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國家機關」，我們把它作為現成的機關從資本主義那裏奪取過來，而我們在這裏的任務只是把這個絕妙的機關中的資本主義弊端除去，使它成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羅萬象的機關。那時量變就會轉為質變。統一而規模最大的國家銀行，連同它在各鄉和各工廠中的辦事處，——這已經十分之九是社會主義的機關了。這是全國性的簿記機關，是全國性的計算產品生產和分配的機關，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骨

幹。」（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二頁）

你們只要把列寧的這段話和索柯里尼柯夫的發言對照一下，就一定會了解索柯里尼柯夫滾到什麼地方去了。如果他把財政人民委員部宣佈爲國家資本主義，那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這裏的問題在哪裏呢？索柯里尼柯夫怎麼會犯這種錯誤呢？

問題在於索柯里尼柯夫不了解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不了解在目前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鬥爭的條件下我國商業的兩重性，他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在過渡時期的環境下我國發展的辯證法，在這種環境下社會主義成分利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和武器來克服和消滅資本主義成分。問題決不在於商業和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問題在於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成分在同資本主義成分鬥爭時掌握着資產階級的這些方法和武器來克服資本主義成分，在於社會主義成分成功地利用它們來反對資本主義，成功地利用它們來建成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所以問題在於：由於我國發展的辯證法，資產階級的這些工具的職能和使命都發生了原則性的、根本的變化，變得有利於社會主義而不利於資本主義了。索柯里尼柯夫的錯誤就在於他不了解我國經濟中發生的種種過程的全部複雜性和矛盾性。

現在讓我來引證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問題所講的話，讓我引證一段話來說明列寧在什麼時候和爲什麼提議把國家資本主義當做主要形式，爲什麼他不得不這樣做，以及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具體條件下提議這樣做的。（賦聲：『請吧！』）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我們時常看到的東西——國營工廠中工人的社會主義態度；在那裏，工人們自己收集燃料、原料和食物，或者工人竭力設法把工業品合理地分配給農民，用運輸工具把它們運給農民。這就是社會主義。可是與此並存的，還有小經濟，這種經濟往往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存在。爲什麼它能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存在呢？因爲大工業還沒有恢復，因爲社會主義工廠大概只能得到它所應得的十分之一的東西。既然社會主義工廠還沒有得到它所應得的東西，小經濟就仍然會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存在。國家遭到難以置信的破壞，燃料、原料和運輸工具缺乏，這就使得小生產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存在。所以我說如果要問這種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什麼，那就要說它是小生產的聯合。資本把小生產聯合起來，資本從小生產中成長起來。閉眼不看這個事實是沒有用的。當然，貿易自由意味着資本主義的增長；要避開這個事實是絕對不可能的，誰想避開和抹殺這個事實，誰就是用空話來安慰自己。既然存在着小經濟，既然存在着交換自由，也就會產生資本主義。但是既然我們掌握着工廠、運輸業和對外貿易，那末這種資本主義對於我們又有什麼可怕呢？所以我當時說，現在還要重複說，這種資本主義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可怕的，而且我認爲這一點是反駁不了的。租讓企業就是這樣的資本主義。」^①（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① 着重號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就是列寧對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看法。

在一九二一年我們幾乎沒有自己的工業，原料缺乏，運輸停頓，所以當時列寧提議把國家資本主義當做一種手段，想通過它把農民經濟和工業聯結起來。這在當時是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列寧認為這條道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恰當的呢？當然不是。他所以提議通過國家資本主義來建立這種結合，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而現在的情形怎樣呢？能不能說我們現在沒有發達的國營工業呢？當然不能這樣說。我們在另一條軌道上發展，租讓制幾乎沒有什麼結果，國營工業已經成長起來，國營商業也成長了，合作社增多了，城鄉間的結合已經通過社會主義工業而建立起來。我們所處的境地比我們自己所設想的更好。既然如此，怎麼能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國經濟的主要形式呢？反對派糟糕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願意了解這些簡單的道理。

八 季諾維也夫和農民

農民問題。我在自己的報告中講過，而一些發言的同志也在這裏肯定說，季諾維也夫有忽視中農的傾向，他在不久以前還堅決地抱着中立中農的觀點，只是在現在，在黨內展開鬥爭以後，他才企圖轉而抱定另一種觀點，即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觀點。這一切是不是事實呢？讓我來引證幾個文
件吧。

季諾維也夫在今年發表的「論布爾什維克化」一文中寫道：

「有許多任務是共產國際各個黨完全共同的任務。這些任務就是：例如……以正確的態度對待農民。在全世界農業人口中間，有三個階層（農業無產階級，半無產者——極小農和不僱用別人勞動力的小農）是可以而且應當被我們爭取過來並成爲無產階級同盟者的階層。還有另一個農民階層（中農）至少是我們應該使之中立的階層。」（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真理報」）

這就是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擯棄了中立中農的口號，代之以堅固聯合中農的口號）過了六年以後談到中農時說的話。巴卡也夫問：這有什麼了不得呢？我要請你把季諾維也夫的文章和列寧關於指望中農的論點對照一下，再來回答季諾維也夫是不是離開了列寧的論點……（有人喊道：「這裏指的是除了俄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喧嘩聲。）同志，不能這樣說，因爲在季諾維也夫的文章中說的是「共產國際各個黨完全共同的任務」。難道你要否認我們黨也是共產國際的一個部分嗎？這裏是直截了當地說：「各個黨」（列寧格勒代表團中有人喊道：「在一定的時候。」大笑）

把季諾維也夫文章中關於中立中農的這段話和列寧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中關於我們需要堅固聯合中農的一段話對照一下，你們就會知道這兩段話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值得注意的是，拉林同志這位主張在農村中實行『第二次革命』的人，讀了季諾維也夫文章中這幾行字，就立刻附和季諾維也夫了。我認爲，雖然拉林同志在幾天前曾反對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並且反對得相當有成效，但是這並沒有消除我們和他的意見分歧，因此我們應當在這裏和他劃清界限。請看拉林同志是怎樣詳論季諾維也夫這篇文章的：

『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從共產國際各個黨的共同任務的觀點出發，十分正確地表述了「對待農民的正確態度」。』（拉林的『蘇維埃農村』第八十頁）

我知道拉林同志要提出抗議說，他在自己的書中已經聲明他不同意季諾維也夫的意見，因爲季諾維也夫竟把中立中農的口號推廣到俄國來了。他在自己的書中確實聲明過這一點，並且斷定說，中立中農對我們來說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去『同中農成立協議反對富農』。但遺憾的是，拉林同志還搬出了他那個反對富農惡勢力的『第二次革命』的方案，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這使他和季諾維也夫接近起來了，因此我不得不不多少和他劃清一下界限。

可見，在我上面引證的文件中，季諾維也夫是公開和肯定地主張中立中農的口號而反對列寧的，因爲列寧宣佈說中立中農的口號是不夠的，還必須堅固地聯合中農。

請看下面一個文件。季諾維也夫在他的『列寧主義』一書中，引證了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所說的一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段話：『同農民一起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同農民中的貧苦部分即無產者和半無產者部分一起向着社會主義革命前進！』就得出了一樣一個結論：

『我們現在關心的基本……問題……在所引證的列寧的這段話中已經得到充分和透徹的闡明了。這裏不能增加什麼東西，也不能減少一個字。這裏一切都用伊里奇那種簡潔明確的口吻扼要而清楚地說明了，因此只要編進文選就行了。』（『列寧主義』第六十頁）

按照季諾維也夫的說法，這就是列寧主義關於農民問題的詳盡無遺的說明。聯合全體農民去反對沙皇和地主，這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聯合貧農去反對資產階級，這就是十月革命。這一切都很好。列寧的兩個口號都提出來了。而列寧的第三個口號，即聯合中農，反對富農，為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的口號又怎樣了呢？列寧的這個第三個口號藏到哪裏去了呢？這個口號不在季諾維也夫那裏。這個口號不知下落了。雖然季諾維也夫肯定說『這裏不能增加什麼東西』，但是，如果我們在這裏不把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第三個口號加進去，那我們就有歪曲列寧的話的危險，像季諾維也夫那樣。列寧的這個目前對我們最迫切的第三個口號不知下落了，被季諾維也夫遺失了，能不能認為這是偶然的呢？不，決不能認為是偶然的，因為季諾維也夫所抱的是中立中農的觀點。第一個文件和第二個文件之間的差別只在於：他在第一個文件中表示反對堅固地聯合中農的口

號，而在第二個文件中却對這個口號避而不談。

第三個文件是季諾維也夫的「時代哲學」一文。我指的是這篇文章未經中央委員修改和補充前的初稿。這篇文章的特點，就是它也和第二個文件一樣完全避而不談中農問題，避開了這個迫切的問題，却談論着不指出平等的階級背景的某種民粹派的含糊不清的平等。在這篇文章中講到了貧農，講到了富農，講到了資本家，講到了攻擊布哈林的話，講到了社會革命黨式的平等，講到了烏斯特里雅洛夫，就是沒有講到中農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雖然這篇文章也叫做「時代哲學」。當莫洛托夫同志把這篇文章寄給我的時候（我當時外出了），我在回信中對這篇文章作了粗暴而嚴厲的批評。同志們，是的，我是一個直率而粗暴的人，這是事實，我並不否認這一點。（笑聲）我所以在回信中粗暴地批評了這篇文章，是因為決不能容忍季諾維也夫一年來一貫抹殺或歪曲列寧主義在農民問題上的最重要的特徵，一貫抹殺或歪曲我們黨關於聯合基本農民羣衆的當前口號。下面是我當時給莫洛托夫同志的回信：

「季諾維也夫的「時代哲學」一文用拉林的精神來歪曲黨的路綫。在這篇文章中，談到了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但是對這次代表會議的主要問題——中農問題和合作化問題却避而不談。中農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都消失掉了。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既然如此，那末談論什麼「爭取解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就是實行破壞這些決議的路綫。像季諾維也夫那樣把布哈林和斯托雷平混在一起，就是誣蔑布哈林。要是這樣，那末也可以把列寧和斯托雷平混在一起了，因為

列寧說過：「你們去做買賣吧，而且要學會做買賣。」平等的口號在目前是社會革命黨人的惡意宣傳。只要存在着階級；只要存在着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就不會有任何的平等。（見列寧「國家和革命」）應當談的不是模糊不清的平等，而是階級的消滅，是社會主義。把我國革命稱爲「非典型的」革命，就是滾到孟什維主義那邊去了。在我看來，應當把這篇文章徹底修改一下，使它不致帶有向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提出的政綱的性質。

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這一切現在我還是要堅持的。我要堅持每一個字和每一句話。

在主要的指導性文章中，不嚴格地說明這裏指的是哪種平等：是農民同工人階級的平等，是農民內部的平等，是工人階級內部即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平等，還是指消滅階級意義上的平等，就不能講什麼平等。在指導性的文章中決不能避而不談黨關於農村工作的當前口號。決不能玩弄關於平等的詞句，因爲這就是玩火，同樣也決不能玩弄關於列寧主義的詞句，而避而不談列寧主義在農民問題上的當前口號。

這裏有三個文件：季諾維也夫的主張中立中農的文章（一九二五年一月）、季諾維也夫所寫的對列寧關於中農的第三個口號避而不談的『列寧主義』一書（一九二五年九月），以及季諾維也夫新寫的對中農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避而不談的『時代哲學』一文（一九二五年九月）。

季諾維也夫在農民問題上這種經常搖擺不定的態度是偶然的嗎？

你們知道，這不是偶然的。

不久以前，季諾維也夫在列寧格勒關於中央總結報告所做的報告中，終於決定了擁護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口號。這是在中央委員會中經過鬥爭，經過摩擦和衝突以後的事情。這很好。但是我不相信他以後不會放棄這種意見。因為事實證明，季諾維也夫在農民問題的路綫上從來沒有過我們所需要的那種堅定性。（鼓掌）

下面就是季諾維也夫在農民問題上動搖不定的幾件事實。一九二四年，季諾維也夫在中央全會上曾經堅持所謂「農民」政策，主張在中央和地方組織有自己的周報的非黨農民團體。這個提案因為遭到中央反對而被否決了。在此以前不久，季諾維也夫甚至誇耀自己有「農民傾向」。例如，他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說：「當人們對我說：你有一種「傾向」，你傾向到農民方面去了，我就回答道：是的，我們不僅應當「傾向」到農民和他們的經濟需要方面去，並且我們應當在跟隨我們無產階級走的那些農民的經濟需要面前鞠躬，在必要時甚至應該在這種需要面前磕頭。」你們聽：「傾向」、「鞠躬」、「磕頭」。（笑聲，鼓掌。）後來，當農民的狀況有了好轉，我們在農村中的情況有了改進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就不是那樣心醉神迷，而是來了一個「轉變」，對中農抱猜疑的態度，並提出了中立中農的口號。再過了一些時候，他又來了一個新的「轉變」，實際上是要求修改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時代哲學」），他責難說幾乎整個中央委員會都有農民傾向，而他自己則更堅決地「傾向」於反對

中農。最後，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之前，他又來了一個「轉變」，但這次已經是轉到聯合中農方面來了，也許他又會誇耀自己說，他又決心向農民「磕頭」了。

怎樣能保證季諾維也夫不會再來一次動搖呢？

但是，同志們要知道，這是動搖，而不是政策。（笑聲，鼓掌。）這是歇斯底里，而不是政策。（呼喊聲：「對！」）

有人說，用不着特別注意對第二種傾向的鬥爭。這是不對的。如果說我們這裏有兩種傾向，即鮑古舍夫斯基的傾向和季諾維也夫的傾向，那末你們應當了解到，鮑古舍夫斯基是絕對比不上季諾維也夫的。鮑古舍夫斯基是一個已經完蛋了的人。（笑聲）鮑古舍夫斯基沒有自己的報刊，而中立中農的傾向，反對鞏固地聯合中農的傾向，即季諾維也夫的傾向，則有它自己的報刊，並且到今天還在繼續反對中央。這個報刊叫做「列寧格勒真理報」^(註)。因為「列寧格勒真理報」極力宣揚不久以前在列寧格勒製造出來的那個專門名詞「中農布爾什維主義」，這不是表明該報在農民問題上離開了列寧主義，又是表明什麼呢？單從這一情況就可以看出，同第二種傾向作鬥爭，要比同第一種傾向，即同鮑古舍夫斯基傾向作鬥爭困難些，這難道還不明顯嗎？正因為我們面前有「列寧格勒真理報」這樣一個第二種傾向的代表者，這樣一個第二種傾向的保衛者和庇護人，我們就應當採取一切方法使黨特別有準備地去同這種傾向作鬥爭，這種傾向是強烈而複雜的，應當集中火力去反對它。正因為如此，第二種傾向應當是我們黨特別注意的對象。（喊聲：「對！」鼓掌。）

九 意見分歧的歷史

現在讓我來談談在我們大多數中央委員中間的內部鬥爭的歷史。我們的爭執是從什麼開始的呢？爭執是從『怎樣處理托洛茨基』這個問題開始的。這是一九二四年年底發生的事情。列寧格勒一批同志起初建議把托洛茨基開除出黨。我這裏指的是一九二四年的爭論時期。當時列寧格勒省委員會通過了開除托洛茨基出黨的決定。我們大多數中央委員不同意這樣做，（喊聲：『對！』）我們同列寧格勒的同志經過了一些鬥爭，並說服了他們從自己決議中刪去關於開除托洛茨基一項。此後不久，當我們召開中央全會時，列寧格勒的同志和加米涅夫一起要求立刻撤銷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我們也沒有同意反對派的這個建議，我們在中央委員會內獲得了多數，只是撤銷了托洛茨基在軍事人民委員部擔任的職務。我們所以沒有同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議，是因為我們知道，割除政策對黨是很危險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們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險的，是有傳染性的；今天割除一個人，明天割除另一個人，後天再割除第三個人，——那在我們黨內還會留下什麼人呢？（鼓掌）

在大多數中央委員內部發生的這第一次衝突，暴露了我們之間在黨的組織政策問題上的基本分歧。

引起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二個問題，是同薩爾基斯針對布哈林而作的發言有關的問題。這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列寧格勒第二十一次代表會議上發生的事情。當時，薩爾基斯在發言中責備布哈林犯了工團主義的錯誤。下面是他講的話：

『我們在莫斯科「真理報」上讀到了布哈林關於工農通訊員的文章。布哈林所發揮的那種觀點，在我們組織中是沒有人擁護的。但是這種觀點可以說是一種工團主義的、非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黨的觀點，却在許多甚至是負責同志（我重複一遍，不是在列寧格勒，而是在其他組織內的負責同志）那裏存在着。這種觀點是主張各種工農羣衆社會組織脫離共產黨而取得獨立和治外法權。』（列寧格勒第二十一次代表會議速記記錄）

第一、這個發言是薩爾基斯的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布哈林在關於工農通訊員運動問題上是絕對正確的；第二、這裏顯然是受了列寧格勒組織領導人的鼓勵而極粗暴地破壞了以同志態度討論問題的基本原則。不用說，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中央內部的關係惡化起來。結果薩爾基斯在報刊上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

這個事件表明，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避免公開爭論和用黨內方式消除意見分歧的最好方法。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列寧格勒共青團的問題。這裏在座的省委會委員大概都記得，關於共青團列寧格勒省委會未經共青團中央的許可和同意而企圖在列寧格勒召開幾乎是全國性的共青團代表會議這個問題，政治局曾經做了一個相當的決議。俄共（布）中央的決議你們是知道的。我們不能容許除

了共青團中央委員會以外，還存在另一個和它競爭、和它對立的中央。我們布爾什維克決不能容許有兩個中央並存。正因為如此，中央認為必須採取措施來刷新容忍了這種分立主義的共青團中央，並撤銷薩發羅夫在共青團列寧格勒省委會的領導職務。

這個事件表明，列寧格勒的同志們有一種把自己列寧格勒組織變成反對中央的鬥爭中心的傾向。

第四個問題是季諾維也夫提出的一個問題，即在列寧格勒出版名爲『布爾什維克』的專門性雜誌，並由下面幾個人組織編輯部：季諾維也夫、薩發羅夫、瓦爾丁、薩爾基斯和塔爾哈諾夫。我們不同意這樣做，並且聲明說，這種和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雜誌平行的雜誌，必然會變成一個集團的機關刊物，必然會變成反對派的派別組織的機關刊物；這種做法是危險的，並且會破壞黨的統一。換句話說，我們禁止出版這種雜誌。現在他們想用『禁止』的字眼來嚇唬我們。但是，同志們，這算不了什麼。我們不是自由主義者。在我們看來，黨的利益高於形式上的民主。是的，我們禁止出版派別組織的機關刊物，並且今後也要禁止這類的東西。（喊聲：『對！當然是這樣！』熱烈鼓掌。）

這個事件表明，列寧格勒的上層想獨樹一幟，成爲特殊集團。

其次，關於布哈林的問題。我指的是『發財吧』這個口號。我指的是布哈林在四月裏的演說，當時他脫口說出了『發財吧』這句話。過了兩天我們黨的四月代表會議開幕了。當時在代表會議主席團上，索柯里尼柯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加里寧都在場，不是別人，正是我聲明說，『發財吧』這個口號不是我們的口號。我不記得布哈林曾經反對過這個抗議。當拉林同志在代表會議上好像是爲了

反對布哈林而要求發言時，不是別人，正是季諾維也夫要求不准發言反對布哈林。可是，在此以後，克魯普斯卡婭同志送來了一篇反對布哈林的文章，要求把它發表。布哈林當然不甘示弱，也寫了一篇文章來反對克魯普斯卡婭同志。大多數中央委員決定不發表任何一篇爭論性的文章，也不展開爭論，而建議布哈林在報刊上作一個聲明，承認『發財吧』的口號是錯誤的。布哈林同意這個建議，並且後來在他休假回來以後就在反對烏斯特里雅洛夫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做了。現在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想用『禁止』這種嚇人的字眼來嚇唬不了什麼人的。第一、我們不僅沒有發表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的文章表示了自由主義的憤慨。你們用這種方法是嚇唬不了什麼人的。第一、我們不僅沒有發表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的文章，而且也沒有發表布哈林的文章；第二、既然黨的統一的利益要求我們禁止發表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的文章，爲什麼不這樣做呢？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負責同志有什麼區別呢？你們是不是認爲個別同志的利益應該放在黨的利益之上，應該放在黨的統一的利益之上呢？難道反對派同志們不知道，在我們布爾什維克看來，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黨的實際利益才是一切嗎？（鼓掌）

讓這些同志指出來，在黨中央的機關報『真理報』上究竟有哪一篇文章是爲『發財吧』的口號進行了直接或間接的辯護的。他們是指不出來的，因爲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文章。曾經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斯捷茨基在『共青團真理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力圖用婉轉而隱約的形式爲『發財吧』的口號作辯護。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在這篇文章發表後的第二天，中央書記處就由莫洛托夫、安得烈也夫和斯大林署名特別寫了一封信警告該報編輯部。這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的事情。過了幾天，中央組織

局在布哈林完全同意之下決定先撤銷該報主筆的職務。下面就是這封信的摘錄：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莫斯科。致「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全體委員。

我們認為，在斯捷茨基的「新經濟政策的新階段」的一些文章中，某些地方是會引起疑問的。的確，在這些文章中轉彎抹角地貫穿着「發財吧」的口號。這個口號不是我們的口號，這個口號是不正確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疑問和誤解，在「共青團真理報」的指導性的文章中是不容許有這樣的口號的。我們的口號是社會主義積累。我們正在掃除那些橫在提高農村物質福利道路上的行政障礙。這個措施一定會促使各種積累，無論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積累或社會主義的積累增加起來。但是黨從來也沒有說過要把私人積累當做自己的口號……』

反對派是不是知道這一切事實呢？當然知道。既然如此，他們又爲什麼不停止對布哈林的攻擊呢？他們對布哈林的錯誤要叫喊到什麼時候呢？

我知道某些同志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錯誤，和這些同志的錯誤比較起來，布哈林的錯誤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這些同志當時不僅犯了錯誤，而且有『勇氣』一連兩次違反了在列寧領導和參加下通過的中央最重要的決議。雖然如此，在這些同志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以後，黨也就把這些錯誤忘掉了。但是，和這些同志比較起來，布哈林只是犯了一個不大的錯誤。而且他沒有違反過中央任何一個決議。既然如此，他們爲什麼還要繼續肆無忌憚地攻擊布哈林呢？他們對布哈林的要求究竟是什麼呢？

關於布哈林的錯誤問題就是如此。

再次，關於季諾維也夫的『時代哲學』的文章和關於加米涅夫在今年夏末秋初在莫斯科全會會議上所做的報告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使我們黨內的關係緊張起來了。關於這一點，我在演說中已經講過，就不再重複了。當時講的是：關於『時代哲學』這篇文章，關於這篇文章的錯誤，關於我們怎樣糾正了這些錯誤，關於加米涅夫所犯的那些同中央統計局穀物飼料平衡表有關的錯誤，關於加米涅夫怎樣相信了中央統計局關於農民的上層集團擁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商品餘糧的數字，後來又怎樣在我們同志們的壓力下不得不在報上發表的那篇致勞動國防委員會的特別聲明中糾正了自己的錯誤，承認大部分餘糧都掌握在中農手中。這一切毫無疑問地使我們的關係緊張起來了。

再其次是同十月全會有關的一些問題，即一些新的糾紛，當時反對派要求進行公開爭論，當時產生了關於查魯茨基的所謂『特米多爾』問題，最後就是列寧格勒代表會議從開會第一天起就向中央開火。我指的是薩發羅夫、薩爾基斯、舍拉文和其他人的發言。我指的是季諾維也夫的發言，即他在代表會議閉幕時最後幾次發言中的一次，當時他號召代表會議向莫斯科同志開戰，提議選出一些決心反對中央的人來組成代表團。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正因為如此，柯馬羅夫和洛波夫這兩個工人布爾什維克沒有被選進列寧格勒代表團（因為他們不接受對中央進行鬥爭的政綱）。代替他們而被選進代表團的却是戈爾頓和塔爾哈諾夫。如果把戈爾頓和塔爾哈諾夫兩人放在天平的一端，把柯馬羅夫和洛波夫兩人放在天平的另一端秤一下，那末任何一個公正的人都會說，前兩人是根本比不上後兩

人的。（鼓掌）而洛波夫和柯馬羅夫的過錯在哪裏呢？柯馬羅夫和洛波夫的全部過錯，就在於他們不願意反對中央。他們的全部過錯就在這裏。但是要知道，就在一個月以前，列寧格勒的同志還提議柯馬羅夫担任自己組織的第一書記。當時的情況正是這樣。是不是這樣呢？（列寧格勒代表團中有人喊道：「是這樣，是這樣。」）柯馬羅夫在一個月內怎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布哈林：「他在一個月內蛻化了。」）你們把自己提議來担任你們組織的第一書記的中央委員柯馬羅夫趕出了列寧格勒省委員會書記處，並且認為不能把他選做出席代表大會的一個代表，怎麼會在一個月內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列寧格勒代表中有人喊道：「他侮辱了代表會議。」喊聲：「納烏莫夫，這是造謠！」喧嘩聲。）

一〇 反對派的政綱

現在來談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舍維奇的政綱。現在已經是談論反對派政綱的時候了。他們的政綱是很奇特的。反對派在我們這裏講了各種各樣的話。加米涅夫講的是一種話，他傾向於一方面；季諾維也夫講的是另一種話，他傾向於另一方面；拉舍維奇講的是第三種話；索柯里尼柯夫講的又是第四種話。雖然他們講的話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的相同點是什麼呢？他們的政綱究竟是什麼呢？他們的政綱就是要改組中央書記處。使他們完全聯結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書記處問題。這是奇怪而可笑的，但這是事實。

這個問題是有它的歷史的。一九二三年，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那些聚會會在『山洞』中的人（笑聲）制定了一個政綱，主張取消政治局和書記處政治化，即主張把書記處變成由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組成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領導機關。這個政綱的用意何在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不要加里寧，不要莫洛托夫來領導黨。這個政綱沒有得到什麼結果，這不僅因為這個政綱在當時是毫無原則的，而且因為沒有我上面指出的幾個同志，在目前是無法領導黨的。我對從基斯洛沃得斯克山洞向我提出的書面問題給了否定的答覆，並且聲明說，如果同志們要堅持的話，我情願讓出位置來，決不聲張，也不用進行公開的或秘密的爭論，也不要求保障少數的權利。（笑聲）

這就是所謂第一個階段。

而現在我們竟進入同第一個階段相反的第二個階段了。現在他們已經不是要求使書記處政治化，而是要求使書記處技術化；不是要求取消政治局，而是要求政治局擁有全權。

如果把書記處變成單純的技術機關對加米涅夫真是方便的話，也許應當同意這樣做。但是只怕黨不會同意這樣做。（喊聲：『對！』）技術性的書記處是不是能夠既為組織局又為政治局準備它應當準備的問題，這一點我是懷疑的。

至於說到使政治局擁有全權：那末這種政綱簡直是荒唐透頂的。難道政治局不是擁有全權嗎？難道書記處和組織局不是服從政治局嗎？而中央全會呢？我們的反對派為什麼不提中央全會呢？他們是不是想使政治局比全會更擁有全權呢？

不，反對派和它的政綱或者關於書記處的各個政綱是肯定要倒臺的。

一一 他們的「愛和平」

你們要問，以後又怎樣呢，要採取什麼辦法才能够擺脫現狀呢？這個問題無論在代表大會開會期間或在代表大會以前都一直是我們所關心的。我們需要黨的隊伍的統一，現在問題就在這裏。反對派是愛談論困難的。但是有一種困難比一切困難都更加危險，並且它是由反對派給我們造成的，這就是使黨渙散和瓦解的危險。（鼓掌）首先應當克服這種困難。我們在舉行代表大會的前兩天曾經向反對派提出一些目的在於可能達到和解的協議條件，也就是爲了這一點。下面就是這封建建議信的原文。

『在下面署名的中央委員認爲，列寧格勒組織的許多領導同志所進行的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是同黨中央的路綫背道而馳的，並且是在反對列寧格勒那些擁護中央路綫的同志。在下面署名的中央委員認爲，莫斯科代表會議的決議無論在實質上和形式上都是完全正確的，並認爲中央應該給予所有一切反對黨的路綫和瓦解黨的傾向以回擊。』

但是，爲了黨的統一，爲了黨內的和平，爲了防止俄國共產黨最優秀組織之一的列寧格勒組織有可能離開黨中央的危險，在下面署名的中央委員認爲，在代表大會確認中央明確的政治路綫的情況下，可以實行一些讓步。因此，我們提出如下的建議：

(一) 在起草中央總結報告的決議時，應當以莫斯科代表會議的決議為基礎，而個別條文的措詞可以稍微緩和些。

(二) 爲了黨的統一，我們認爲無論在報紙或公報上發表列寧格勒代表會議的來信和莫斯科委員會的回信都是不適當的。

(三) 政治局委員……不得在代表大會上互相攻擊。

(四) 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要同薩爾基斯（調整黨內成分問題）和薩發羅夫（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劃清界限。

(五) 在關於柯馬羅夫、洛波夫和莫斯克文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應當用組織方法糾正。

(六) 中央關於吸收列寧格勒同志參加書記處的決議，在代表大會閉會後立即執行。

(七) 爲了加強同中央機關報的聯系，將吸收列寧格勒一個工作人員參加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

(八) 鑒於「列寧格勒真理報」主筆（格拉德涅夫）能力薄弱，我們認爲必須在取得中央的同意之下由更得力的同志來代替他。

加里寧、斯大林、莫洛托夫、捷爾任斯基和其他等人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提出的一些協議條件。

但是反對派不同意。他們不要和平，寧願在代表大會上進行公開而殘酷的鬥爭。這就是反對派的「愛和平」。

一二 黨一定能達到統一

我們現在基本上還是堅持着這個文件的觀點。你們知道，爲了黨內的和平，我們在我們的決議草案中已經緩和了某些條文的措詞。

我們反對割除辦法。我們反對割除政策。但這並不是說，可以容許領袖們爲所欲爲，騎在黨的頭上。對不起，決不能這樣。向領袖們磕頭的事是不會有的（呼喊聲：「對！」鼓掌。）我們主張統一，我們反對割除辦法。割除政策是同我們不相容的。黨要求統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願意這樣，黨就和他們一起去達到這種統一；如果他們不願意，黨沒有他們也要達到這種統一。（呼喊聲：「對！」鼓掌。）

統一需要什麼呢？需要少數服從多數。否則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統一。

我們反對出版爭論專頁。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關有爭論欄。這已經足夠了。不能沉溺於爭論。我們是國家的執政黨，不要忘記這一點。不要忘記，上層所發生的每一個小爭執都會在國內引起對我們不利的影響。至於在國外就更不用說了。

中央各機關應該保持它們現有的狀態。黨是未必會同意把它們破壞的。（呼喊聲：『對！』鼓掌。）政治局是擁有全權的機關，除了中央全會以外，它是高於一切中央機關的。而最高機關是全會，這一點人們有時忘記了。在我們這裏全會決定一切，當領袖們開始失常的時候，它就來糾正他們。（呼喊聲：『對！』笑聲，鼓掌。）

我們應該有統一，只要黨，只要代表大會顯示出剛強性而不怕恐嚇，就一定會有統一。（喊聲：『我們是不怕恐嚇的，這裏都是些久經戰鬥的人。』）如果我們中間有人想肆意妄為，那人們就會來制止我們，——這是必要的，這是必需的。離開集體來領導黨是辦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後，誰要幻想這點，那是愚蠢的，（鼓掌）誰要講到這點，那也是愚蠢的。

集體工作，集體領導，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條件下保持黨的統一，保持中央各機關中的統一，——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至於列寧格勒的工人共產黨員，那我相信他們始終會站在我們黨的前列。我們同他們一起建設了黨，同他們一起養育了黨，同他們一起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舉起了起義的旗幟，同他們一起戰勝了資產階級，過去同他們一起將來還要同他們一起克服我們建設道路上的困難。我相信，列寧格勒的工人共產黨員在為爭取黨內鐵一般的列寧式的統一的鬥爭中，是不會落後於其他工業中心的朋友們的。（熱烈鼓掌。高唱『國際歌』。）

註 釋

(一) 全蘇教師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共一千六百六十人，代表蘇聯的四十九個民族。代表大會的代表有四分之三是鄉村教師。代表大會聽取並討論了下列幾個報告：蘇維埃建設的當前任務、教師和無產階級革命、蘇維埃建設中的教育任務、蘇維埃學校、民族問題和學校、教師和共青团、蘇聯所處的國際形勢等等。代表大會通過了一篇宣言，聲明教師決不把自己的任務和共產黨的任務分開，和共產黨為爭取建成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分開。——(正文第五頁)

(二) 『紅色青年』(月刊)是大學生的雜誌，於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由無產階級大學生中央常務局和無產階級大學生莫斯科常務局共同出版。『紅色青年』雜誌的主筆是維·米·莫洛托夫。該雜誌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改名為『紅色大學生』。——(正文第六頁)

(三) 俄共(布)中央全會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舉行。一月十七日舉行了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聽取了約·維·斯大林關於各地方組織對托洛茨基的言論的決議，全會通過決議，確認托洛茨基的言論是要修正布爾什維主義，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約·維·斯大林於一月十九日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就米·瓦·伏蘭芝『關於對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會撥款』的報告發表演說(見本卷第十二頁至第十五頁)。——(正文第八頁)

(四) 指一九二四年秋西班牙軍隊的失敗。當時西班牙的法西斯獨裁者普利莫·德·利維拉派遣了十五萬軍隊去鎮壓羅洛哥的西班牙佔領區(利弗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果羅洛哥人取得了勝利，解放了西班牙軍隊佔領區的三分之二。——(正文第十三頁)

(五) 一九二四年夏，由於阿爾巴尼亞進步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反動的阿罕默德索古政府被推翻。范諾里政府上台執政後開始和蘇聯政府進行關於建立蘇聯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友好外交關係的談判。蘇聯和阿爾巴尼亞互相派遣了外交使節。英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三國政府要求阿爾巴尼亞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阿罕默德索古匪幫在南斯拉夫法西斯政府武裝力量的支援下侵入阿爾巴尼亞，推翻了范諾里政府。於是阿罕默德索古又執掌了阿爾巴尼亞的政權。——(正文第十三頁)

(六) 「工人報」(日刊)是羣衆性的報紙，是聯共(布)中央機關報，於一九二二年三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出版，最初的名稱是「工人日報」，從一九二二年七月起改名爲「工人報」。——(正文第十六頁)

(七) 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報」第二九〇號上登載的約·維·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一文。該文是「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的序言的一部分。這篇序言約·維·斯大林寫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中發表過。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的標題刊載在各種文集，出過單行本，並刊載在約·維·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的各種版本中，同時還刊載在「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五八頁至第四〇一頁①。——(正文第十七頁)

(八) 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二頁至第四三〇頁。——(正文第十八頁)

(九) 「逆流」文集於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編入該文集的有弗·伊·列寧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間所寫的「論歐洲聯邦口號」、「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論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第二國際的破產」及其他等文章，所有這些文章後來編入「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八卷和第十九卷。——(正文第十九頁)

(一〇) 弗·伊·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見「列寧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十八卷第二〇九頁至第三〇六頁)。——(正文第十九頁)

(一一) 弗·伊·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頁至第九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六八九頁至第七七八頁)。——(正文第十九頁)

(一二)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討論關於救德薩省尼古拉專員得莫夫卡村的事件問題時發表了演說。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農村通訊員格昂哥里·馬林諾夫斯基在得莫夫卡被一夥爲富農所唆使的犯罪分子殺害。俄共(布)

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因農村通訊員馬林諾夫斯基被害而引起的得莫夫卡事件的決議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真理報」第三十號上。——（正文第二十五頁）

（二）指白衛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外國代理人組織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富農暴動和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亂。——（正文第二十三頁）

（三）指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格魯吉亞的反革命暴動。這次暴動是被擊潰的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的殘餘和薩爾丹尼亞孟什維克流亡「政府」在帝國主義國家及第二國際的首領的指示和資助下組織的。在格魯吉亞工人和勞動農民的積極協助下，暴動於八月二十九日被平息。——（正文第二十三頁）

（四）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舉行。出席代表會議的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人，代表六萬四千零七十八個黨員和三萬零七百七十個預備黨員。代表會議討論了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莫斯科委員會的補充報告、莫斯科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莫斯科省的預算和經濟狀況以及農村工作問題，並選出了領導機關。約·維·斯大林在代表會議上就農村工作問題發表了演說。——（正文第二十五頁）

（五）道威斯計劃就是人所共知的關於德國賠償問題的報告書，它是由美國財政家道威斯特將軍主持下的國際專家委員會制定的，並於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六日經盟國倫敦會議批准（關於道威斯計劃，見本卷第二二五頁至第二二六頁）。——（正文第三十二頁）

（六）布爾德勒和塔爾蓋麥是德國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首領，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曾參與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布爾德勒和塔爾蓋麥的叛變政策使德國工人階級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事變中遭到失敗。一九二四年四月德國共產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撤銷了布爾德勒和塔爾蓋麥在德國共產黨內的領導職務。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斥責了布爾德勒、塔爾蓋麥集團的投降路線。一九二九年布爾德勒和塔爾蓋麥因進行反黨的派別活動而被開除出共產黨。——（正文第三十八頁）

（七）指一九二五年初「巴爾馬特兄弟康采恩」事件的審判。在審判中揭露了以維爾斯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著名活動家曾接受康采恩的巨額賄賂這一事實，同時還發現他們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德國國會選舉時曾利用康采恩以及和康采恩

有聯系的銀行的資金反對過德國共產黨。——（正文第四十頁）

(二五) 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國際代表大會上成立。加入聯合會的有西歐許多國家和美國的改良主義工會。聯合會會員在一九一九年達二千四百萬人，至一九二三年末則減少到一千六百萬。往後數年內，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的威信不斷降低，其會員人數也不斷減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實際上已停止活動。由於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成立，阿姆斯特丹工會聯合會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取消。——（正文第四十七頁）

(二六) 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上成立的。全會研究了下列幾個問題：國際發展趨勢和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爭取世界工會運動統一的鬥爭、農民問題、俄共（布）黨內的爭論、共產國際個別支部的問題等等。在全會上成立了政治委員會、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南斯拉夫委員會等等。約·維·斯大林被選為政治委員會委員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委員。三月三十日，約·維·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就南斯拉夫民族問題發表演說（見本卷第五十九頁至第六十四頁）。——（正文第五十一頁）

(二七) 見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八九頁至第三五八頁）。——（正文第五十九頁）

(二八) 見弗·伊·列寧「論民族自決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六五頁至第四二四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二二頁至第八七八頁）。——（正文第六十三頁）

(二九) 蘇聯無產階級大學生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會議的代表約有三百人，代表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和工農速成中學的二十五萬名學生。代表會議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蘇聯所處的國際形勢和內部狀況、工會和大学生、無產階級大學生中央常務局的活動的總結、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職業教育總局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職業教育總局的工作、高等學校與生產的聯系。約·維·斯大林於四月十三日和代表會議的代表團談話，於四月十五日寫了本卷所刊載的那封致代表會議的信。——（正文第七十一頁）

(三〇)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會議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關於黨的建設、關於合作社、關於單一農業稅、關於金屬工業、關於革命法制、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

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關於代表會議的決議，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分册第二頁至第五十一頁）。——（正文第七十五頁）

〔五〕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二九〇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頁至第一〇三二頁）。——（正文第七十九頁）

〔六〕興登堡元帥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被選為德國總統，他是狂熱的保皇派分子，是德國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意志的表達者。——（正文第八十二頁）

〔七〕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索非亞「聖禮拜」大教堂內發生了爆炸事件，當時以察柯夫為首的保加利亞法西斯政府官員們也在教堂內。事後察柯夫向美國發出一篇誣蔑性的聲明書，指控蘇聯政府是爆炸事件的唆使者。外國的反動報刊發動了反蘇宣傳運動，要求本國政府改變對蘇聯的態度。一九二五年五月舉行的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曾就察柯夫政府殘暴地迫害保加利亞人民的優秀代表一事發表告全世界勞動者書，駁斥了對蘇聯的誣蔑性的攻擊。——（正文第八十三頁）

〔八〕指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通過的關於共產國際各黨布爾什維克化的提綱。——（正文第八十五頁）

〔九〕指一九二四年實行的中亞細亞各蘇維埃共和國（土爾克斯坦蘇維埃共和國和花刺子模蘇維埃共和國）的民族國家的疆界劃分。在民族疆界劃分以後，成立了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卡拉—柯爾克茲自治區（後來的柯爾克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加入柯爾克茲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和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區（後來併入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二五年五月舉行的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接受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並因此對蘇聯憲法提出了相應的修正。中亞細亞各蘇維埃共和國的民族國家的疆界劃分是在約·維·斯大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正文第一一六頁）

〔一〇〕見弗·伊·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一頁至第三十四頁）。——（正文第一一七頁）

(三) 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列維里(塔林)的工人武裝起義。起義是由愛沙尼亞法庭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對一百四十九個被控告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政治犯案件的判決激起的。按照這一判決，大多數被告被判處多年苦役徒刑，其中三十九人被判處終身苦役徒刑，而愛沙尼亞工人的領袖湯普則被槍決。這次起義被愛沙尼亞反動政府殘酷地鎮壓下去了。——(正文第一二六頁)

(三) 「共青團真理報」(日刊)是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根據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和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出版。——(正文第一二八頁)

(三) 「最近新聞報」(日刊)是白俄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巴黎創刊。該報的編輯是立憲民主黨人的首領巴·尼·米留可夫。——(正文第二一九頁)

(三) 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關於上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政府的總報告，蘇聯工業狀況，蘇維埃建設問題，提高和鞏固農民經濟的措施，關於紅軍以及其他問題。米·伊·加里寧在代表大會上做了關於蘇維埃建設問題的報告。——(正文第一五四頁)

(三) 指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會議上所做的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演說，見本卷第五十一頁至第五十八頁)。——(正文第一五六頁)

(三)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頁至第三四三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五頁至第八八〇頁。——(正文第一六九頁)

(三) 指一九二五年春季開始的摩洛哥利弗人反對法國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一九二四年秋季，西班牙佔領軍在摩洛哥失敗以後，法國就決定佔據西班牙在摩洛哥的佔領區利弗區，並且挑起了戰爭。在一九二五年春季和夏季，利弗人使法國人遭到了一連串嚴重的失敗。只是在法國和西班牙締結了軍事同盟以後，這兩國的軍隊才得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將利弗人擊敗。——(正文第一七二頁)

(三) 指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英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華南，英國人用自己的陸海軍支援廣州

反革命商團爲反對孫中山領導的廣州革命政府而舉行的叛亂。在華北，英美帝國主義者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瓜分中國而在他們的代理人中國軍閥吳佩孚和張作霖之間挑起了戰爭。武裝干涉激起了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巨大高漲，後來這一鬥爭發展成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正文第一七二頁）

〔三〕「布爾什維克」雜誌（雙月刊）是聯共（布）中央的政治理論性的雜誌，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創刊。——（正文第一八〇頁）

〔四〕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在莫斯科舉行。德·查·曼努伊里斯基於六月三十日在代表大會上做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正文第一八二頁）

〔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〇六頁至第三四四頁。——（正文第一八五頁）

〔六〕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附錄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七十五頁至第九十七頁。——（正文第一九三頁）

〔七〕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是德國共產黨內的托洛茨基集團的首領。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德國共產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上，在撤銷了已破產的布爾德勒—塔爾蓋麥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在德國共產黨內的領導以後，路特·費舍—馬斯洛夫集團在新選出來的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擡取了領導。路特·費舍和馬斯洛夫及其信徒們於一九二五年秋被撤銷了在德國共產黨內的領導職位，並於一九二六年被作爲階級敵人的走狗開除出黨。德國共產黨由艾·台爾曼領導。——（正文第一九六頁）

〔八〕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關於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改名爲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關於政治狀況和青年的任務，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駐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青年勞動的前途和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經濟工作的任務，關於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農村中的工作，關於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在紅軍和海軍中的工作以及其他問題。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贊同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並斥責了共青團在同反黨傾向鬥爭中保持中立的機會主義理論（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見「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彙編」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正文第二〇四頁）

〔四五〕弗·伊·列寧「論糧食稅」一書綱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頁）。——（正文第二二一頁）

〔四六〕弗·伊·列寧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時的演說（見「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八九頁）。——（正文第二二一頁）

〔四七〕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至十日，即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舉行。本卷發表的約·維·斯大林的信曾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代表會議的閉幕會議上宣讀過。——（正文第二二三頁）

〔四八〕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三日，即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舉行。代表會議在關於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中贊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正文第二二三頁）

〔四九〕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和下列幾個報告：關於工會工作，關於共青团的工作，關於修改黨章以及其他報告。代表大會一致贊同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指出了為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而繼續奮鬥的道路，批准了黨在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的總方針，否決了反對派分子的投降計劃，並責成中央委員會同一切破壞黨的統一的企圖進行堅決的鬥爭。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是作為工業化的代表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的。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同否認蘇聯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新反對派」作鬥爭的標誌下進行的。根據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黨開始稱為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關於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五頁至第三六九頁）。——（正文第二二五頁）

〔五〇〕羅迦諾（瑞士）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舉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大不列顛、法國、意大利、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的代表（關於羅迦諾會議，見本卷第二二六頁至第二二七頁）。——（正文第二二五頁）

〔五一〕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熱那亞（意大利）舉行了國際經濟會議，參加會議的一方是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是蘇維埃俄國。熱那亞會議的召開是為了解定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俄國之間的關係。在會議閉幕時，蘇俄代表團提出了一個廣泛的復興歐洲的計劃，並提出了普遍裁減軍備的方案，但會議沒有接受。

蘇俄代表團的提案。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蘇維埃政府在莫斯科召開了有西部鄰國（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波蘭和立陶宛）代表參加的會議，在會議上，把按比例裁減軍備的計劃提出並進行了討論。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告世界各國人民書」中確認了蘇維埃政府和平政策的路線，並號召世界各國勞動人民支持這個路線。一九二四年二月，蘇維埃代表在羅馬舉行的海軍會議上提出了裁減海軍軍備的具體議案。——（正文第二三二頁）

〔五二〕指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蘇聯政府代表和麥克唐納工黨政府代表在倫敦簽訂的大不列顛和蘇聯的總的（一般性的）條約和商務條約。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上台執政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拒絕批准這些條約。——（正文第二四〇頁）

〔五三〕指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通過的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廢除沙皇政府所欠國債的法令。——（正文第二四〇頁）

〔五四〕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代替麥克唐納工黨政府上台執政的鮑爾溫—奧斯汀·張伯倫保守黨政府。——（正文第二四一頁）

〔五五〕「經濟生活報」（日刊）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財經人民委員部和財經機關（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勞動國防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銀行、財政人民委員部等）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正文第二四七頁）

〔五六〕見弗·伊·列寧的下列著作：『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九一至第三一九頁）、『一九二一年四月九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書記和支部負責人會議上關於糧食稅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六二頁至第二七六頁）、『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頁至第三四三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五頁至第八八〇頁）、『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列寧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七七頁至第三九〇頁）。——（正文第二五一頁）

〔五七〕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十頁。——（正文第二五九頁）

〔五八〕見弗·伊·列寧「土地問題提綱初稿（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作）」（『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

九頁至第一四一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七七九頁至第七八九頁。——（正文第二六八頁）

〔五〕見『列寧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十九卷第一二〇頁。——（正文第二七〇頁）

〔六〕指俄共（布）中央全會（一九二五年十月三日至十日）根據維·米·莫洛托夫「關於黨在貧農中的工作」的報告所通過的決議（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分冊第六十頁至第六十五頁）。——（正文第二七三頁）

〔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六卷第三二五頁至第三九二頁。——（正文第二七四頁）

〔六〕『貧農報』（日刊）是聯共（布）中央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正文第三〇二頁）

〔六〕『列寧格勒真理報』（日刊）是聯共（布）列寧格勒區域委員會和市委員會、列寧格勒區域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和市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用「彼得格勒真理報」的名稱創刊。一九二四年，該報改名為『列寧格勒真理報』。一九二五年末，『列寧格勒真理報』——俄共（布）中央西北區常務局、俄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省工會聯合會和區域經濟委員會的機關報——曾被「新反對派」利用來達到其派別組織的反黨目的。——（正文第三一六頁）

① 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第六卷第三一〇頁至第三四八頁。——譯者註

年 表

一九二五年

- 一月初
約·維·斯大林和「紅色青年」雜誌編輯部委員們談雜誌的任務。談話記錄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紅色青年」雜誌第一期（總第五期）上發表。
- 一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從斯大林諾城（舊名尤佐夫卡）來莫斯科參觀的黨校學生談話。約·維·斯大林寫完「女工和農婦們，要記住並實現伊里奇的遺訓！」一文。該文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女工」雜誌第一期上發表。
- 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全蘇教師代表大會。該信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教師報」第二號上發表。
- 一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和一批派往農村工作的共產黨員談話。
- 一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全蘇無產階級作家協會領導者談關於召開無產階級作家代表會議。
- 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 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聯席會議上傳達各地方組織關於托洛茨基的言論的決議。

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就米·瓦·伏龍芝「關於對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部撥款」的報告發表演說。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弗·伊·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日寫給「工人報」的信在「工人報」第十七號上發表。

一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寫回信給德·奧夫同志談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

一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發表「關於「得莫夫卡事件」」的演說。

一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發表「論無產階級和農民問題」的演說。

一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及其主席團會議。

一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向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土爾克明斯坦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致賀電，賀電中確定了這兩個共和國的共產黨在中亞細亞實行民族疆界劃分後的任務。賀電分別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東方真理報」第二十九號及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土爾克明尼亞火星報」第三十四號上發表。

一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一次代表會議上被選入俄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

二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和全蘇無產階級作家協會代表團談無產階級文學問題。

二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海爾佐克的談話「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在「真理報」第

二十七號上發表。

二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和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及莫斯科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人員談共青團的工作問題。

二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無產階級文化」全體人員大會的代表團談「無產階級文化」的今後工作問題。

二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和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領導工作人員談共青團的工作問題。

二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向察里津省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致賀電。

二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

二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和土拉省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代表談合作社工作問題和住宅建設問題。

二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

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麥爾特同志談關於德國共產黨黨內狀況問題。

三月六日 爲慶祝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成立，約·維·斯大林向塔吉克斯坦勞動人民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東方真理報」第五十八號上發表。

三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慶祝國際婦女節」一文在「真理報」第五十六號上發表。

三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關於召開俄共（布）全國代表會議和關於代表會議的議程「致俄共（布）各級組織」的通知。

三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因下新城斯大林步兵學校選他爲榮譽學員寫信給該校學員，指揮人員、政治工作人員和教員。該信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下新城公社報」第四十五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向察里津省農業合作社代表大會致賀電，祝代表們在吸引勞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取得成就。

三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俄共（布）中央爲哀悼孫中山逝世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唁電。唁電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真理報」第六十號上發表。

三月十四日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和全蘇農村通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團談話。

三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向卡拉—柯爾克茲自治區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致賀電，賀電中確定了卡拉—柯爾克茲共產黨員的當前任務。賀電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東方真理報」第六十七號上發表。

三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前來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

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的工作。

三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被選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政治委員會委員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委員。

三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的「論國際形勢和共產黨的任務」一文在「真理報」第六十六號上發表。

三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工廠工人代表團及「狄納莫」工廠工人代表團談話，該

兩廠工人會邀請他參加莫斯科工人農民紅軍代表蘇維埃選舉大會和莫斯科無產階級區工人農民紅軍代表蘇維埃選舉大會。

約·維·斯大林和紅色波羅的海艦隊「斯大林號」雷擊艦艦員代表團談話。

約·維·斯大林和列寧研究院領導工作人員談研究院的工作問題。

三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前來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演說。

三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北方鐵路機務第一段工人大會上被選為莫斯科工人農民紅軍代表蘇維埃的代表。

三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捷克斯洛伐克分委員會會議上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黨內狀況作了幾次發言。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的演說。

約·維·斯大林和柯爾克茲共和國代表團談柯爾克茲的情況。

約·維·斯大林和「貧農報」編輯部代表們談該報農民欄的工作問題。

四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和北方鐵路機務第一段工人代表團談話，該代表團將委任約·維·斯大林為莫斯科蘇維埃代表的委任狀授與斯大林。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致電阿捷爾拜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謝·米·基洛夫，祝賀阿捷爾拜疆共產黨成立五周年。賀電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巴庫工人報」第七十五號上發表。

四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發表「關於農村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分子的演說」。

四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

四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蘇聯無產階級大學生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團談話。

四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寫「致蘇聯無產階級大學生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一信。該信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真理報」第八十七號上發表。

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

五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五一慶祝典禮，檢閱部隊和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五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爲慶祝出版節向「東方真理報」（塔什干）編輯部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東方真理報」號外上發表。

五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十月鐵路工人代表團談話。

五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向「在伊里奇旗幟下報」（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機關報）致賀電，在賀電中確定了該報的當前任務。

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蘇維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五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做「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的報告。

五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第十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五月十三日至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五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大會上發表「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的演說。

五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被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選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盟蘇維埃委員。

五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被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五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和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土爾克明尼亞共和國及烏茲別克共和國的代表談話。

五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南沃舍梯自治省及北沃舍梯自治省的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談話。

五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塔吉

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及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代表談各共和國的情況。

五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

六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和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達格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及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領導工作人員談話。

六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和安·安·安得列也夫寫信給「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委員們。

六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縣級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學員談話。

六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

六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回答該校學生提出的問題。

六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給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慶祝本科和專科第二屆畢業典禮）」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三二號上發表。

六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唐波夫省、奧勒爾省、沃龍涅什省及庫爾斯克省等省執行委員會主席談恢復黑土地帶的國民經濟的措施。

六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的「再論民族問題（關於謝米奇的文章）」一文在「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一、十二兩期合刊上發表。

七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被選入波蘭問題委員會。

七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波蘭委員會會議上就波蘭共產黨黨內狀況問題發表演說。

約·維·斯大林和日本「日日新聞」記者布施先生「關於東方革命運動」的談話在「真理報」第一五〇號上發表。

七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選入德國問題委員會。

八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哥里亞切沃德斯卡亞村哥薩克，答謝他們在該村成立一百周年紀念日授予選舉斯大林為該村名譽哥薩克的證書。該信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捷列克報」第一八九號上發表。

九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維·米·莫洛托夫談季諾維也夫「時代哲學」一文的反布爾什維克性。

九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的來信。

九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致烏契—傑列療養所的休養員的賀電在「蘇維埃南方報」第二一五號上發表。

九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選入俄共（布）中央中亞細亞常務局關於中亞細亞土地—水利改良問題的提案審查委員會。

九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和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代表談共和國的民族機構和國家機構的問題。

十月三日至十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十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克拉拉·蔡特金談德國共產黨內的狀況。

年 表

十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和梯弗里斯及下新城黨委員會的宣傳鼓動部工作人員——俄共（布）中央召開的宣傳鼓動部負責人員會議的參加者談話。

十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召開的宣傳鼓動部會議的參加者談話。

十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的關於召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通知在「真理報」第二三六號上發表。

十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和南沃舍梯自治省及北沃舍梯自治省的代表談南沃舍梯和北沃舍梯的合併問題。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上發表關於糧食黨組織工作的演說。

約·維·斯大林和庫爾斯克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庫爾斯克省黨委員會書記談農村工作問題。

約·維·斯大林和土拉兵工廠廠長談工廠工作問題。

十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為慶祝蘇聯第一艘木材運輸船「斯大林同志號」下水向波羅的海造船廠工人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消息報」第二四六號上發表。

十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提出的關於共青團任務的問題在「共青團真理報」第一三三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在波特金（索爾達欽柯夫）醫院探望患病的米·瓦·伏龍芝。

十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因米·瓦·伏龍芝的遺體當時安放在波特金醫院而去該醫院。

十一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追悼米·瓦·伏龍芝的紀念大會。

- 十一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紅場舉行的米·瓦·伏龍芝的葬禮上發表演說。
-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十月革命、列寧和我們的發展前途」一文在「真理報」第二五五號上發表。
- 十一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和俄國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及莫斯科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人員談共青團的工作問題。
- 十一月十五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被十月鐵路斯大林修理廠工人的黨員大會選為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市索科里尼基區第五次代表會議的代表。
- 十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和阿捷爾拜疆五金工會分會及礦工工會分會的領導人員談工人狀況。
- 十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
- 十一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向俄共（布）莫斯科市索科里尼基區第五次代表會議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汽笛報」第二六五號上發表。
- 十一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致電在列寧格勒的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談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的籌備工作。
- 十一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選為代表會議主席團的名譽委員。
- 十二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被選為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主席團的名譽委員。
約·維·斯大林給「貧農報」編輯部的信在「貧農報」第二二七八號上發表。

十二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主席團。該信在一九三四年「紅色史料」雜誌第一期(總第五十八期)上發表。

十二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選入俄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

十二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選為出席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十二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俄共(布)中央委員就保持黨的統一問題告「新反對派」書。

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並就俄共(布)改名為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聯共(布)發表演說。

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向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做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就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草案發表聲明。該聲明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真理報」第二九八號上發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黨中央緊急全會的工作；由於「新反對派」利用「列寧格勒真理報」來達到其派別組織的反黨目的，約·維·斯大林發表了關於「列寧格勒真理報」的演說。

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會議上被選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